

第9卷 宗教与民俗
第10卷 中外文化交流
第11卷 历史文化沿革

第3卷 民族文化
第4卷 制度文化
第5卷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7卷 科学技术
第8卷 艺术

中华文化
通志

第2卷

【地域文化】

燕赵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杜荣泉 谢志诚
夏自正 杨借拙 撰
魏建震 胡克夫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地域文化】

燕赵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03
Z669
:2(4)

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 (2-014)

宁可 主编

燕赵文化志

杜荣泉 谢志诚 夏自正 杨倩描 魏建震
胡克夫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数 317,000

印张 13

插页 1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273-9/K·492

141552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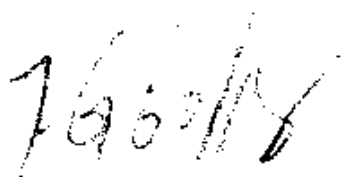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141552

燕赵文化志

作者简介

杜荣泉,1934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河北简史》、《河北城市发展史》等。

谢志诚,1940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或独立完成的著作有《河北通史·宋辽金元》、《中国国情丛书·定州卷》等。发表论文20余篇。

夏自正,1938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著有《燕赵地域文化》;主编有《河北通史》(十卷)。

杨倩描,1955年生。史学硕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吴玠吴玘吴玠吴曦合传》。发表论文20余篇。

魏建震,1966年生。史学硕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发表论文数篇。

胡克夫,1954年生。参加《当代中国的河北》、《河北近现代历史人物辞典》等书的编撰。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战国时期燕赵是指战国七雄中的燕国和赵国。从秦到唐,燕赵成为统一王朝管辖下的北方郡、县。元明清三朝均以北京为国都,燕赵的大部分区域成为京师外围、畿辅重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全国的共性,又具有地域的特性。本书前有概述,对燕赵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及文化特征作了简要的叙述。随后共设原始文化、民族融合、都城建筑、历代长城、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学术与教育、文学与艺术、园林桥梁、帝王陵墓、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十一章,分别加以叙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生动可读。人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燕赵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点,而且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纮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玫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玫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校对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原始文化	19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19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36
第二章 民族融合	48
第一节 先秦时期北方的戎狄	49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匈奴、乌桓和鲜卑	5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族	61
第四节 契丹、女真、蒙古的崛起	70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北方民族	77
第三章 都城建筑	83
第一节 燕、赵、中山国都	84
第二节 古都邺城、平城	89
第三节 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	95
第四节 明清的京师——北京	107

第四章 历代长城 ·····	120
第一节 燕、赵、中山长城·····	122
第二节 秦汉长城·····	132
第三节 西晋、北魏至元代的长城·····	138
第四节 明长城·····	146
第五章 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 ·····	153
第一节 天文、历法与数学·····	154
第二节 地理学·····	162
第三节 医药学·····	165
第四节 农业科技·····	172
第五节 矿冶铸造技术·····	176
第六节 制瓷工艺技术·····	182
第七节 纺织工艺技术·····	185
第六章 学术与教育 ·····	191
第一节 哲学·····	192
第二节 经学·····	200
第三节 史学·····	204
第四节 文献编纂·····	210
第五节 地方志·····	214
第六节 教育·····	217
第七章 文学与艺术 ·····	225
第一节 文学·····	227
第二节 戏剧曲艺·····	242
第三节 绘画书法雕塑·····	250

第四节 音乐歌舞杂技·····	257
第八章 园林、桥梁 ·····	262
第一节 明清以前著名的园林·····	263
第二节 清代北京皇家园林·····	268
第三节 承德避暑山庄·····	283
第四节 著名的桥·····	292
第九章 帝王陵墓 ·····	299
第一节 燕、赵、中山王陵·····	300
第二节 两汉分封王陵墓·····	303
第三节 魏晋至辽金帝王陵·····	306
第四节 明十三陵·····	311
第五节 清朝帝王三陵区·····	317
第十章 宗教文化 ·····	329
第一节 道教·····	330
第二节 佛教·····	337
第三节 伊斯兰教·····	355
第四节 天主教、基督教·····	358
第五节 民间秘密宗教·····	361
第十一章 民俗文化 ·····	367
第一节 生活习俗·····	368
第二节 社会文化习俗·····	380
第三节 生产习俗·····	389
参考文献 ·····	398

导 言

燕赵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就其在全国的地位而言,经历过三次大的变化。

战国时期,燕赵是指战国七雄中的燕国和赵国。燕赵两国的疆域范围,大致是北起阴山南麓,西至太行山,南抵古黄河,东临大海。在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

从秦至唐,位于北方的燕赵,成为奠都长安、洛阳的统一王朝管辖下的北方郡县。

从辽代设五京,改幽州为南京,以幽云十六州的南部为界与北宋对峙,燕赵分成南北两部分。金灭辽,继而灭北宋,统一了中国北方,以辽南京为中都。元明清三朝均奠都北京,燕赵的大部分区域划为“腹里”和“直隶”,成为京师外围、畿辅重地。

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大致是与历史进程同步形成和发展的。燕赵所经历的这几次重大变化,都在文化发展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全国的共性,又具有地域的特性。就燕赵区域而言,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

在当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的燕赵,只有河北省沿用这种习惯称

谓,流行于世。虽然如此,古燕赵和今燕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又有紧密的联系。为便于了解燕赵传统文化,有必要对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梗概及其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的概述。

一、燕赵自然地理概貌

燕赵地域的山脉地势,河流水系,平原山地,高原草原,都独具特色,自成体系。

主要山脉有阴山、燕山、太行山、恒山,总体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陡东缓的态势。

阴山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呈东西延伸的一条山链。东起河北省的大马群山,西至狼山,东西长约 1000 多公里,宽度在 50—200 公里之间,主峰大青山海拔 2338 米。阴山在内蒙古境内的分别称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狼山。阴山是一条不对称的山脉,南坡陡峭,北坡平缓,从山顶往北下走,就是广阔的内蒙古高原。阴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国历史上历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基地。

燕山 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界山,位于河北省北部至辽宁省西部,处于大兴安岭、太行山和阴山相互交汇的部位。燕山东西长约 500 公里,南北最宽处约 200 公里。总体山势呈东西向,高度在海拔 600—1500 米之间,其最高峰东猴顶海拔 2293 米,位于河北省丰宁县境。

燕山山脉在辽宁省西部有努鲁儿虎山,为西辽河水系与大凌河水系的分水岭。在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及辽宁省交界处,有七老图山,是滦河水系和西拉木伦河水系的分水岭。辽代的中京城遗址在山地东坡,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位于山地西坡。在北京市北部昌平区有军都山,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北部支脉延伸部分的结合部,为一块陡然而起的断块山地,北京市就在其南坡下,具有特别重要的

战略地位。古代著名关隘八达岭、居庸关、慕田峪等均在军都山脉。如按现代地理形势看,除长城关隘已成为历史文化遗迹外,在军都山西有官厅水库,东有密云水库,南有怀柔和十三陵水库,尤其是密云水库,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水源。

太行山 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界山,总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北段是多条由东北走向西南的斜列式山脉,北端在北京市西山北端南口附近与燕山山脉斜交;中段呈南北走向;南段又呈近东西走向,最南端即中条山西端。太行山海拔 1500—2000 米,东西坡极不对称,山西省境内的西坡长而缓,河北省境内的东坡短而陡,以近 2000 米的高差俯视华北平原,从河北省西望太行山,山势嵯峨,异常陡峭。山顶又多为平坦面,出现若干台地。由于太行山是在古老地块上断裂上升而形成的块状山脉,断崖明显,加之河流割切,形成许多深险峡谷,地势十分险峻。古人称这些险峻之处为“陁”。著名的“太行八陁”,自古以来就是山西高原通往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

恒山 属太行山山脉,位于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始起于管涔山,连绵而东,直至河北省曲阳县境。山势呈东北—西南走向,山高一般海拔 1500 米左右。山地呈不对称状,北坡为断崖,坡度陡峻,南坡呈缓斜坡。恒山是桑干河水系与滹沱河水系的分水岭。分水岭上的低口,为山地南北重要隘口,雁门关为其著名的关口。恒山为五岳中的北岳。自汉至明,祭祀北岳均在河北省曲阳县,清顺治时改在山西省浑源县。北岳恒山为道教胜地,曲阳县恒山被称为“第五小洞天”。

燕赵的河流水系主要有海河水系和滦河、辽河、大凌河以及古黄河、大运河。

海河水系 海河又称沽河,其本身只长 74 公里,从天津市金钢桥以下横贯市区至大沽口入渤海。海河上游,支流众多,汇合成五大支流: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支流分别自北、

西、南三面汇流到天津,构成典型的扇状水系。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倚内蒙古高原南缘。以漳卫河为源地算起,全长 1090 公里。流域面积 22.9 万平方公里。全流域山区约占 54.1%,平原约占 45.9%,海河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

滦河 古称濡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西北的巴延图古尔山麓。上游流经河北省沽源县东南至内蒙古自治区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这一段叫闪电河或上都河;由多伦县大河口南折流再入河北省境,经丰宁县北四岔口向东南至郭家屯与小滦河汇合才称滦河。经承德、迁西、迁安、滦县,至乐亭县境东注入渤海。全长约 833 公里,流域面积约 44900 平方公里。

辽河 古称辽水,发源于河北省七老图山脉的光头山,在苏家堡汇入西拉木伦河后称西辽河,流至福德店会合源于吉林省辽源市哈达岭的东辽河后始称辽河。经铁岭后转向西南,流至六间房,左岸汇入主要支流有招苏台河、清河、柴河、范河等,右岸汇入秀水河、养息牧河、柳河等。六间房以下,辽河分两股:一股南流为外辽河,到三岔河合浑河、太子河,称大辽河,经营口市注入渤海;另一股西南流,称双台子河,在盘山西南会合绕阳河注入辽东湾。辽河全长 1394 公里,流域面积 201153 平方公里。

大凌河 汉唐时称白狼水,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北源凌源县打鹿沟,南源建昌县黑山,到大城子会合后东北流,经努鲁儿虎山和松林间纵谷,接纳老虎河、牯牛河、西河等支流,再循医巫闾山西侧南流,到锦县东南注入渤海。全长 397 公里,流域面积 23549 平方公里。

古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源远流长。但自今河南省武陟县以下,历代屡经变迁。据史籍记载,古黄河原经今河北省东部从天津市南入渤海。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黄河改道,从今河北黄骅市以北入海。西汉一代,黄河屡次决口。汉武帝时,冲出屯氏河,

从今河北沧州市东北入海。东汉时王景治河，从今山东省利津县入海。历经魏晋、北朝至隋唐，黄河相对安流。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于商胡(今河南濮阳市东北)，泛滥于今河北的大名、清河、冀州等地，其后形成两支，北支合永济渠，从今天津市南入海。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今河北大名县西南决口，是为东流，从今黄河口以北处入海。此后，黄河多次决口，今河北省巨鹿、南宫、冀州、沧州、河间等地成为黄泛区。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宋东京留守杜充于李固渡决黄河入清河，以阻金兵，黄河自此不复故道。决河由泗入淮，从今江苏省北部夺淮入海。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今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形成今道，从山东省利津县、垦利县东北入海。

今河北省总体讲位于黄河以北，实际上已远离黄河北岸。因此，燕赵地域的南部，具体讲是按现行政区以河北省磁县为界。

大运河 燕赵南部河北平原还有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大运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全长1000余公里，全程多利用自然河道。永济渠为隋大运河北段。唐以后改以清、淇二水为源，不再引用沁水。北宋以后通称御河。金元以来屡经改道，至明称卫河。大运河沟通了海河水系，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通，促进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今海河水系五大支流之二仍以北运河、南运河相称，盖源于大运河的开凿。

燕赵的平原、高原和山地的分布，总体讲呈从西到东、由北而南的态势。

华北大平原是中国第二大平原，又名黄淮海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地跨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东临渤海、黄海，西到太行山、伏牛山，西南至大别山和桐柏山，东南至苏、皖长江北岸，北达燕山南麓。南北长约1000多公里，东西宽约700—800

公里之间,总面积为 31 万平方公里。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黄河以南称黄淮平原;黄河以北称河北平原,又称海河平原。

河北平原,北起燕山南麓,西至太行山东麓,东抵渤海之滨。按广义讲南至黄河北岸,按狭义讲南至今河北省界。在河北省境内总面积为 79650 平方公里。海拔多在 50 米以下,地势坦荡辽阔。

辽河平原位于辽东山地丘陵和辽西山地丘陵之间,东连渤海,东北延伸与松嫩平原相接。总面积约为 5 万余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高原与山地 在河北省境内的高原与山地海拔一般在 1000—1500 米之间,在张家口至围场一线称张北高原,俗称“坝上”,属内蒙古高原东南部。冀北山地是内蒙古高原同华北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区。燕山山脉为其南部边缘,山间多盆地。冀西山地是太行山脉的一部分,以桑干河谷地与冀北山地为界。北京市北部山地属燕山山脉,西部山地属太行山脉,一般海拔在 1000—1500 米之间。辽宁省西部山地丘陵是内蒙古高原和辽河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

内蒙古高原一般海拔在 1000 米以上,起伏和缓,是优良牧场。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处,也是南下进入中原的根据地。

二、燕赵历史发展梗概

早在旧石器时期,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的火堆,便照亮了燕赵大地。新石器时期冀南“磁山人”播种的粟,破土而出,燕赵便诞生了原始农业。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聚落中心部位发现并清理出一条采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石块堆塑而成的长龙,全长达 19.7 米,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的作品。中国人被称之为龙的传人,龙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拜,成为

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象征。龙的传人,在燕赵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原始社会末期,黄帝、炎帝、蚩尤三大原始部落,在燕赵汇合。经过激烈的冲突,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以后,互相融合,成为活动在燕赵最初的华夏族。

古史相传,尧立国于唐(今河北唐县、顺平县一带),舜曾至北岳(今河北曲阳县)巡狩,大禹治水,始于冀州,东至碣石。

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兴盛期。商代远祖,季、王亥、上甲微等活动于河北易水流域。商王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市)。盘庚迁殷,燕赵南部已为王畿之地。在今河北省藁城市台西村、定州市、邢台市都发现了规模相当大的商代遗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商代的方国孤竹、燕、亳、蓟等都居于燕赵北部。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亚微罍”,铸有铭文“父丁、孤竹、亚微”六个字,据考证为商代孤竹国的遗物。

西周初期,封召公于燕,是为姬姓燕国之始。春秋时期,燕赵地域分属于燕、晋、卫、齐诸国。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三家分晋,七雄并立,秦居西,齐在东,楚居南,燕在北,赵、魏、韩居中。而在赵魏韩三国中,赵靠北,魏居中,韩偏南。这样,燕赵两国连起来看,都位在北方。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新局面。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废封建,置郡县”,在全国设置了36郡(后又陆续增至40余郡)。燕赵成为统一的封建王朝管辖下的北方区域,由南而北设置:邯鄲郡(治邯鄲,今河北邯鄲市)、巨鹿郡(治巨鹿,今河北鸡泽县东北)、恒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郊东古城)、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广阳郡(治蓟,今北京市)、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郡(治无终,今天津市蓟县)、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

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东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共 13 郡,占秦始皇初分天下为 36 郡的 1/3 以上。

西汉统一全国后,一方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一方面分封王侯,从而形成郡、国并置的行政体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置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实为十三个行政监察区,每州部设刺史一人。燕赵区域主要部分属幽州刺史部和冀州刺史部,西部和西北太行、燕山山区一小部分属并州刺史部。西汉时在燕赵境内的分封王国有中山国、真定国、赵国、广平国、信都国、河间国、广阳国等。东汉时在燕赵境内的分封王国有常山国、中山国、安平国、河间国、清河国、赵国等。此外还有若干相当于县一级的侯国。两汉分封的王国,是地方上的头等豪强,他们生前穷侈极欲,死后极尽奢糜。分封王所建陵墓,如著名的河北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陵墓,简直就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晋末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燕赵地域呈现出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长城,向南迁徙,建都立国。鲜卑慕容皝建立前燕,先都柳城,后改柳城为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西南),之后又迁都至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立国 33 年(337—370 年),为前秦所灭。鲜卑慕容垂建立后燕,奠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立国 23 年(384—407 年),为北燕所灭。两年后,鲜卑化汉人冯跋称王。北燕奠都龙城,立国 29 年(407—436 年),为北魏所灭。羯人石勒建立后赵,先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后迁都邺城,立国 32 年(319—351 年),为冉魏所灭。汉人冉闵建立冉魏,都邺,立国仅两年(350—352 年)即为前燕所灭。鲜卑拓跋猗卢建立代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立国 52 年(315—376 年),为前秦所灭。前秦为氐人苻洪所建,虽奠都长安,但在灭前燕以后,统治了燕赵大部分地区。

公元398年,鲜卑拓跋珪建都平城,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宋,是为宋武帝,仍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由是,刘宋与北魏,南朝与北朝对峙。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迁洛和实行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北魏末年,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自河北率兵入洛阳,于普泰二年(532年)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西奔长安,高欢另立孝静帝,自己执掌朝政,并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仍都邺城。在长安的北魏孝武帝,则为宇文泰所鸩杀,并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史称西魏。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晋末十六国北朝时期,燕赵高门豪族纷纷南迁,聚族于江淮地区,主要有范阳祖氏、渤海刁氏、高阳许氏等。东晋时出现了侨置州郡。这对开发江南具有一定的作用。

隋唐时期,全国重新统一,燕赵仍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北边区域。唐太宗时因山川形便,分全国为十道,河北道是其中之一。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河北道的管辖范围未变。唐朝的道,在贞观时还是监察区性质,到开元时期,已成为地方的一级政区。河北道的范围包括了燕赵的大部分地域。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割据,北方游牧民族奚、契丹、靺鞨等崛起。唐后期,契丹开始强大。入五代,公元916年,契丹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公元926年,契丹灭掉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燕赵大地南北分裂。契丹所建立的王朝(后改称辽)先与五代之后晋、后汉、后周,复与北宋在燕赵对峙。

辽在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建立五京,京所在地称府。上京临潢

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治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西京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市)、东京辽阳府(治今辽宁辽阳市),南京亦称燕京幽都府,后又改称析津府(治今北京市西南部)。上京为辽朝国都,又称皇都,其他四京属陪都性质。

1125年,金灭辽,继而灭北宋,统一了中国北方。金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至燕京,改称中都,整个燕赵成为金朝京畿之地。从此,燕赵文化便具有京都文化的特征。

蒙古族在唐朝称为“蒙兀室韦”。到1206年,蒙古各部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封建的蒙古汗国。随后即四向攻掠征战,横跨欧亚。1234年灭金,占领中原广大地区,隔淮水与南宋为界。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以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正式建国号“大元”,次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大都为国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灭南宋,成为统一全国的元王朝。

元朝,定都北京,在全国分置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辽宁是其左臂,设辽阳行省。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在元朝时期,燕赵作为地域名称,已为“腹里”所代替。

明朝建立后,先奠都南京。在全国分设12个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明军攻克大都后,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设北京行部,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王朝由南京迁都北京,遂以北京为国都,以南京为陪都。京师之地直隶中央,故称直隶。由于有陪都南京,习惯上称南直隶,而京师之地则称北直隶。

北直隶辖8府:顺天府、保定府、永平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

府、广平府、大名府。除此还有 2 个直隶州,17 个府属州。北直隶口外大部分地区自正统、景泰以后,成为蒙古兀良哈、察哈尔等部驻牧之地。

元朝灭亡以后,统一的蒙古又趋分裂,雄踞大漠南北的主要为兀良哈、瓦剌、鞑靼三部。

明代在辽宁设辽东都指挥使司,领 25 卫、2 州。

在元明时期,天津在燕赵地域开始崛起。在远古时代,天津曾是渤海的一部分,陆地是河流逐渐冲积形成的。天津聚落的起点,最初是在海河的三岔河口一带,即今狮子林桥和金钢桥附近。约在西汉中叶至东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曾经发生一次大海浸,海水浸入地区相当于今天津、宁河和河北黄骅市一带。在海浸消退以后,海岸线内遗留下大量沼泽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开凿永济渠,对天津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时,海河是宋辽的界河。北宋在这里设置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泥沽寨、双港寨等。金代,今天津始称直沽。元延祐三年(1316 年)改直沽为海津镇。明成祖即帝位后,将直沽改为天津。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1406 年),先后设置了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永乐三年(1405 年)在三岔河口西南建筑卫城,即后来的天津城。天津城周长 4.5 公里,北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津三卫衙门都设在北城内。北门外是商业区。筑城设卫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

元朝,南粮北运以海运为主,粮船经渤海进入海河,天津成为向大都转运的中心。明代永乐年间,疏通了运河。河运代替了海运,进一步促进了漕运的发展。同时,也使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南北土产物资和各行商贸云集天津,使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展,人口日渐增多,市区日益繁荣。到清代前期,天津已成为燕赵地域的新兴的经济中心了。《畿辅通志》载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

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清同治九年(187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令封河,还驻保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直隶总督常驻天津。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统治者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金朝灭亡后,女真族各部世代臣属于元朝、明朝。在明朝有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十五世纪后期以建州部为核心,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辽宁是清朝勃兴的根据地。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以沈阳为留都,时称盛京。清朝在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较中央只少一个吏部。五部直接秉承皇帝或军机处的旨意办事,不受中央六部领导。另外还设立盛京内务府,管理镶黄、正黄、正白即上三旗包衣和故宫皇庄。

清朝政府以戈壁为界,将漠南地区划为内蒙古,漠北地区划为外蒙古。内蒙古分为25部、6个盟、51个旗,确立了盟旗制度。此后,中国史籍中始有“内蒙古”、“外蒙古”之称。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天津作为京师的海上门户,受到帝国主义武装多次入侵。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英法联军北犯,陷大沽炮台。沙俄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也仿效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8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通州相继失陷。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大肆抢掠,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三夜不灭。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及沙俄的威逼下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除规定《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白银约800万两。此后,英、法、美、日、俄、比、意、奥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天津强行建立租界。在租界内驻扎军队,建立巡捕房、监狱、法庭以及其他侵略机构,压榨中国人民。天津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城市,是燕赵大地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除天津外,辽宁的营口在 1861 年也被强迫开辟为商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侵略东北的桥头堡。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历史。在一百多年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燕赵儿女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

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原农耕经济文化与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的相互汇合;二是汉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三是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而这三者又都统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现综合叙述如下。

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以经济为基础,文化则是上层建筑。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文化从广义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历史的发展中同经济的基本特征往往是密不可分的,而经济文化特征又是同民族特征紧密相连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表现。

燕赵的地势山脉、河流水系、平原山地、高原草原的分布和走向,从大范围讲,阴山以南,燕山以北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在古代属草原游牧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海河流域以及东北辽河流域是平原农耕区,主要是汉族的活动区。由于燕赵南部平原区域处于黄河中下游平

原的北方,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讲,又呈现出南北交汇的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代,燕山南北便出现了以打磨细小石器为特征的北方草原地带狩猎畜牧民族的经济文化;而在燕赵南部则出现了以磁山文化为代表的定居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两种文化便在燕赵大地相互交汇。

战国时期,燕、赵北长城以南,由于广泛使用铁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大量增殖,成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农耕区,社会发展已进入封建社会。燕、赵北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则人烟稀少,土地空旷,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社会发展还处于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阶段,尚未建立起国家。

燕赵农耕区实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在唐以前,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燕赵农耕区是其中一个重要区域。“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

燕赵农耕区以旱作农业为主,以精耕细作著称。实现农耕,必须定居。从原始居民点、聚落、村落,发展到里、乡、县城,形成若干城市。从早期的城市发展若干具有区域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征的城市。战国时期,燕赵境内已有燕都蓟城,燕下都武阳城,赵都邯郸,中山灵寿都城。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燕下都、邯郸均具有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发展农业生产要兴修水利,燕赵的水利工程从战国直到唐前期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燕赵农耕区的农产品以粮食、桑丝、棉麻、油料为主,兼有以枣、栗为特点的各种果菜。农村家庭手工业早期以织绢帛为主,明代之后以棉织为主。家庭饲养主要品种是猪、羊、狗、鸡,大牲畜则以耕牛为主。官办或民办的较大型的手工业有冶铜、铸铁、制钱、煮盐、制陶、烧瓷等,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丰富优良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成为同畜牧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物质基础。

农耕区通用的语言为汉语,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燕赵使用北方方言。现代汉语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燕赵使用全国通行的汉字。

燕赵是古代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重要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经学、史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业绩和著作,代表着燕赵文化发展的水平。

燕赵畜牧区的经济文化,从早期的戎狄、林胡、楼烦、东胡,到匈奴、乌桓、鲜卑,再到后来的契丹、女真、蒙古等,直至满族,当他们兴起之初,一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实行部落联盟制。

畜牧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为主,兼以狩猎。以肉食为主,以皮毛为衣,以穹庐为室,不定居,逐水草迁徙,擅长骑射。他们的社会结构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牧民平时为生产者,战时则为冲锋陷阵的骑兵,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族的“领户分封”制、满族的“八旗”制,都很具有代表性。

北方游牧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手工业,诸如青铜铸造、冶铁、制弓箭、制毛毡等,并具有独特的文化风格,如青铜剑、青铜刀等,从燕山南北已出土的实物看,有许多装饰着马首、羊首、鹿首、鹰头等。北方青铜器有些器形如三足小铜锅、弓形器、马具、铜釜等,以小件为特征,显然是便于随身携带、利于随时迁徙。契丹的马鞍制作,独具特色。

北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初期往往是信仰萨满教,宗教活动由“巫”以舞蹈的形式进行,后来才从汉族的宗教信仰中接受了佛教。蒙古族、满族则接受了藏传佛教。

北方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一遇重大天灾如雪灾、旱蝗等,牲畜便会大量死亡,牧区经济萎缩,人口骤减,部落的

整体实力急剧下降。游牧经济又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各部势力往往各霸一方,各自独立。因此,历史上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崛起时,在其内部总有一个兼并、统一的过程。一旦完成兼并和统一以后,当他们越过长城,南下燕赵平原时,铁骑驰骋,疾如旋风,一往无前,具有一种难以阻挡的爆发力。

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农耕区需要畜牧区提供农耕、交通运输的畜力,尤其是马匹。此外,还需要皮毛等各种畜产品以及珍贵药材等。而畜牧区则需要农耕区提供粮食、绢帛、布匹、铁器、陶瓷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这便形成了既有矛盾冲突而更多的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关系。

历史上两种经济文化的交融交汇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实现的。既有激烈的战争,也有和平的交往。在激烈战争中,既有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南下侵掠,又有汉族统治者的出塞远征。和平交往时,既有朝贡、赏赐,外迁、内附,也有互市贸易;既有经济交往,也有文化交流。无论是哪种方式和途径,都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乃至多向性的,体现出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特征。

燕赵地处北方,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南下中原,首先进入幽蓟,再扩展到河北平原。因此,自古以来,燕赵便是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的汇合之处,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之所。

先秦时期的北方戎狄,曾在燕赵地域建立过若干小国,都先后为齐、晋所灭,而融入华夏族。白狄鲜虞在燕赵腹地所建中山国,虽然最后为赵国所灭,但中山国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却藉出土文物再现人世,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则成为华夏族吸取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先驱。

秦、汉大一统王朝,燕赵属北方地区,秦、汉统治者大致沿袭燕、赵北长城的走向修筑了秦长城、汉长城,设置郡县,徙民实边,实行军屯。这对开发边疆,推进农业生产向北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出—

种“农进牧退”的现象。而秦、汉王朝发生内乱，国力衰落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越过长城，深入燕赵腹地，随之表现出“牧进农退”的现象。

晋末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长安、洛阳残破不堪。北方各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燕赵则成为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交融交汇的中心区域。“农进牧退”、“牧进农退”交错进行。这一时期，幽蓟是燕赵北部中心，而燕赵南部中心邯郸已经衰落，南移至邺城。从曹魏都邺直至北齐，邺城都处于显著地位。此外，值得提出的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奠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徙山东6州民吏10余万口，鲜卑慕容部、高丽等族36万口，百工技巧10余万口，充实平城地区。给新徙民耕牛，实行计口授田。其后明元帝、太武帝又数次徙北方各族人民至平城地区，至孝文帝时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使平城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

隋唐五代时期，出现过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燕赵作为统一王朝的北方农耕区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唐中叶“安史之乱”起于幽州，乱后，河北藩镇割据，经历五代，一直陷入战乱，农耕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

辽金元三代，北方和东北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相继崛起，辽占领半个燕赵，金占领全部燕赵，元统治了全中国而以燕赵为“腹里”。这一时期农耕经济文化与游牧经济文化前进与后退相互交错，在燕赵大地表现十分突出。在辽初、金初、元初对农耕经济文化的破坏，燕赵首当其冲；而当辽金元的统治稳定以后，燕赵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中原汉族农耕经济、学习汉族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起点和赖以生存、维护统治的要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往往出现由破坏到恢复，由恢复到发展的过程。

明清时期，燕赵是京畿重地。明洪武、永乐期间对燕赵的大规模移民是为了充实京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清初多次大规模的圈

地,使燕赵农耕经济文化遭受破坏。后经封建王朝的政策调整,农业、手工业又重新获得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强盛期,即“康乾盛世”。

金元明清莫都北京,燕赵便成为“腹里”、“京畿”,元以后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同燕赵地域文化相结合,使燕赵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都城建筑、宫殿园林、帝王陵墓,无一不显示出皇家气派,威严庄重,豪华壮观,成为燕赵历史文化极为辉煌的部分。几代封建王朝莫都北京,使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人才和各民族文化在北京融汇、聚合、交流,又辐射到全国各地。而从北京到全国东南西北各地,或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京,都必须经过燕赵大地。因此,燕赵受京都文化的熏染和影响,在时间上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在程度上要深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清朝在承德地区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和木兰围场,使承德成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京都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燕赵文化南北交融交汇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原始文化、民族融合、都城建筑、历代长城、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学术与教育、文学与艺术、园林桥梁、帝王陵墓、宗教及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本书的各章各节将分别加以叙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具有全国的共同性,又具有地域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赵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近代以来,在文化范畴里,全国有“京派”、“海派”之分,后又兴起“广派”(即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派),燕赵显然是在“京派”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创造更加辉煌壮丽、富有时代精神的燕赵文化,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便成为燕赵儿女的神圣使命!

第一章 原始文化

人类的原始社会从“人猿相揖别”序幕的拉开,到氏族公社的消亡、阶级社会的产生,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燕赵地域原始人类的原始文化,经过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大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发现了大批遗址,获得了众多的实物资料,从原始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各种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角器、陶器、玉器,乃至洞穴、灰坑、原始村落遗址等等。通过对这些实物遗存的分析研究,初步勾画出原始社会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风貌,不仅有力地说明了燕赵地域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呈现出燕赵原始文化具有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的鲜明特色。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燕赵地域在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众多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东谷坨、侯家窑、虎头梁遗址;山西雁北的许家窑、峙峪遗址;辽宁的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海城仙人洞和

丹东山城子洞遗址；内蒙古的“大窑”和“河套人”遗址等。上述各个遗址陆续出土的各类实物，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不断的探索，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早于“北京人”文化，而许家窑（侯家窑）文化晚于“北京人”文化，这三者之间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北京人”遗址和峙峪遗址出土的实物，可以构成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系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石器，从而成为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尤其是通过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科学家们推断这里应是人类更早的脚踏地。由于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使人们对燕赵地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可以大体看出一个轮廓和它的来龙去脉。

一、阳原泥河湾文化遗存

（一）自然地理概貌

阳原盆地地处冀西北，为东北向狭长的构造断陷盆地。北为熊耳山，主峰黄花梁，海拔 2036 米，南系恒山余脉，中部为广阔的湖积平原。桑干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整个盆地，至盆地东缘，穿越石匣口，经宣化、涿鹿，注入今怀来官厅水库。其支流壶流河经蔚县后，在盆地东部小渡口村附近汇入桑干河。在盆地东部边缘区，可见到元古代变质火山碎屑岩系，中生代侏罗系紫红色角砾岩和新生代上新统“三趾马红土”堆积；其他部位多为第四系泥河湾河湖相堆积物，泥河湾层常被晚更新世形成的黄土或全新世以来形成的松散砂砾层覆盖。在盆地边缘山前地带，存在着宽阔的洪积扇。盆地西部略平坦，东部地势差异较大，剥蚀严重，乃至裸露出基岩。

泥河湾位于阳原盆地桑干河上游，为一湖相堆积，由细砂和泥灰质土等组成。泥河湾第四系地层发育良好，以盛产哺乳动物化石闻名

于世,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三门马、梅氏犀、剑齿虎、中国鬣狗和低鼯鼠等。

(二) 华北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

从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第一个中国猿人的头盖骨算起,燕赵地域就是中国猿人的故乡了。人类学家把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按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段。考古学家把人类初始阶段的文化也分为三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晚期。与此相应,在地质年代上为更新世的早期、中期、晚期。

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前更原始的人类和文化存在何处?这是一个人类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重大问题。1924年,西方学者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等即在泥河湾和下沙沟一带进行地质考察和化石采集工作,从而确定了泥河湾层。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根据在下沙沟采集的似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和动物化石标本,首次提出泥河湾一带可能有过古人类生存。1948年,国际地质组织建议把欧洲的维拉方期归到早更新世。1954年,中国地质界采纳了这一建议,把“泥河湾层”也放到了早更新世,从此,“泥河湾层”就成了华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标准地层。1957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和王建发表论文《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论文从周口店中国猿人的石器、用火、猿人化石以及周口店第13地点的人类文化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论后,肯定“泥河湾期已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但我们无法说明泥河湾期的人类及其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而只能笼统地说,泥河湾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中国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更要原始得多”^①。这是一个有根有据,经过科学推论而提出的科学预言。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阳原盆地中部虎头梁找到了可靠的旧石器后,正式揭开了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研究的序幕。从1972年开始,中国古

^① 载《科学通报》1975年第10期。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阳原泥河湾一带,不断从事第四纪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1983年以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阳原盆地先后发现了30余处旧石器遗址,并从阳原盆地扩展到涿鹿怀来盆地。按旧石器早、中、晚分期,早期以小长梁、东谷坨为代表,中期以许家窑(侯家窑)为代表,晚期以虎头梁为代表。上下跨度近100万年。

(三) 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

小长梁位于阳原桑干河左岸大田洼官亭北500米,东谷坨位于小长梁东,文化遗物发现在下泥河湾组顶部的中粒砂层和粘土中。小长梁的石制品采用流纹质火山碎屑岩的燧石和石髓等作原料,器类有大小石核、使用石片、砍砸器、单刃复刃刮削器、尖状器、锥具、雕刻器等。其特点是器类较复杂,形体较小,打片采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哺乳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三门马、三趾马、披毛犀、羚羊、野牛、鬣狗、狼、中华鼯鼠、熊等。经考古工作者研究断定,“石器出自属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中,伴生的动物化石群属泥河湾动物群成员,文化层经古地磁测定距今100万年左右,大致相当于早更新世末期”^①。贾兰坡根据他多年的研究则认为,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是约160万年前人类使用的工具,属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从加工如此精细的石器来看,当时的人已具有相应的语言,否则,石器制造过程中,传授技术、模仿打制、改进提高,没有语言交流是不行的。小长梁出土近2000件石器,类型之多,年代之早,且加工打制技术如此进步,在世界上尚未见有记载。人类起源时间也将改写^②。尽管在小长梁遗址尚未发现人类化石,各项科学研究工作仍

^① 郑绍宗:《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春秋》1989年。

^② 详见1994年4月6日《人民日报》通讯:《考古学家贾兰坡一项研究认为,人类起源时间地点将改写》。

在进行中,但考古学家们大都认为,发现人类化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东谷坨在小长梁以东,与小长梁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贾兰坡研究认为:“东谷坨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和北京人的石器有相似之处,可以归于同一传统。从种种迹象看,东谷坨的时代无疑早于北京人的时代,从两个时代的石器的密切关系来看,北京人打制石器的技术很可能是来源于东谷坨。”^①

由于小长梁和东谷坨地点相近,特征相似,同处于泥河湾层的早期,考古学界统称为“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

(四) 许家窑(侯家窑)文化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东部梨益沟西侧断崖上,东南紧接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两地仅隔一条沟。据此,考古学家通称许家窑(侯家窑)文化。这里是中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分布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1974—1977年发掘的073113号地点属于山西阳高许家窑,0744093号地点属于阳原县侯家窑,两个地点共发现人类化石17件,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及近2万件石器。遗址埋藏在距地表8—12米深的阳原盆地河湖相沉积层中。已发现的17件人骨化石包括顶骨、枕骨、左上颌骨和单个牙齿,代表着1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人骨化石的特征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相比,脑壳异常厚重,顶骨宽处位置较靠上,上颌骨吻部前倾程度,没有“北京人”那样显著。牙齿粗大,齿冠嚼面纹饰复杂,其体质特征既有原始性又接近现代人。许家窑(侯家窑)文化的石器,在近2万件石器中,石工具占50.4%,刮削器中包括单刃、复刃、两刃、端刃组,尖状器有正尖形、角尖形,其他有石椎、雕刻器、砍砸器、石球等。石球可以作为投掷武器。粗大石器少见,几乎都是细小石器,与后来“细石器”有着传统的文化关系。

^①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1982年第7期。

贾兰坡认为：“许家窑文化在细石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桥梁。”^①除石器外，还发现有大量的骨器，其类有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工具、大小刮削器、雕刻器、角工具等。

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动物化石还原为动物群看，绝大部分是些适应寒冷条件的种类，其中野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赤鹿、原始牛等都是末次冰期常见的化石种。从动物生态来看，虎、野猪、赤鹿、鼠兔等，适应森林、灌木、野草丛生的自然环境；而鸵鸟、蒙古马、野驴、中华鼯鼠、似步氏田鼠、原羚、鹅喉羚等，则适应沙漠、草原或丘陵环境；还有些动物如葛氏梅花鹿、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却能够适应草原和森林边缘环境。综合起来看，当时这一带可能是森林、灌木丛、草原相交混的地带，甚至附近还可能有沙地存在。

许家窑(侯家窑)文化的年代，考古学家们根据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要晚于周口店 15 地点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晚期的后一阶段，即旧石器中期。采用铀系法测定许家窑 6 个动物牙齿化石样品，年代为距今 10 万年左右。

(五) 虎头梁文化

虎头梁位于阳原盆地中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代表性遗址。文化层位于Ⅰ级阶地砂质黄土层下部的沉积物中，石器原料以燧石和石英岩为主，有砍砸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锤、石钻、石核以及装饰品。虎头梁楔形石核，一种台平面呈三角形，另一种台面向石核隆起一面倾斜，这种打片方法是细石器制作技术的原始方法。楔形石核和尖状器是虎头梁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遗物，对于研究华北以至东北亚和北美洲的旧石器文化以及这一广大地域的细石器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虎头梁已经出现了穿孔贝壳、钻孔石珠等装

^①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饰品,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 73101 地点发现了三处篝火遗迹,附近有烧过的兽骨、鸵鸟蛋皮和大块砾石、石器。据考古学家分析研究,认定这里是一处当时猎人的宿营地和石器制作场。虎头梁有丰富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属华北黄土期草原动物,有鸵鸟蛋、布氏田鼠、中华鼯鼠、狼、野马、野驴、鹿、牛、普氏羚羊、转角羊、野猪、披毛犀、纳玛象等。从虎头梁的石器、动物化石群,可以分析出虎头梁的原始经济形态,是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当时还没有出现农业。虎头梁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之末,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碳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10500 年,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约略同时或稍晚一些。

综上所述,阳原泥河湾盆地大量动物化石群、大量石器和许家窑(侯家窑)人骨化石遗迹的被发现,在时代方面,已初步把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个阶段联结起来,虽然根据地貌与第四纪地层把它们和当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中间还缺少过渡的环节,但仍可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这样一个发展全过程,涉及到桑干河流域的阳原、大同盆地和壶流河流域的蔚县盆地,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阳原泥河湾盆地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基地。

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其文化

1929 年 12 月 2 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堆积层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60 多年来,经国内外数以百计的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由于周口店有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和良好的研究工作基础,它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口店同泥河湾的直线距离仅 90 公里,两处著名

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如此相近,紧密相连,是不多见的,确是燕赵原始文化的一大特色。

(一)“北京人”洞穴遗址

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形成于第三纪,东西长约140米,平均宽约20米,洞穴的顶部已坍塌。洞穴中的堆积物原达40米以上,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依据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分为13层。从地层堆积看,最先入洞的是鬣狗等野兽,在第13层和第11层底部留有鬣狗粪层。此后“北京人”进洞。科学家用古地磁、铀系法、氨基酸、热释光和裂变径迹等5种方法测定年代,判断“北京人”进洞不早于距今69万年,洞被填满弃洞而去,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在洞中断断续续生存了约50万年。从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可以看出,“北京人”洞穴遗址的性质是生活居住地兼石器制作场,因为在地层中不仅发现了已制作完成的石器,而且有原料、大量废片、断块以及第一类石器。

(二)“北京人”的体质特征

在“北京人”遗址里发现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含附连在上、下颌骨上的牙齿)、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段、月骨1段,这些人类化石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最低发现层位为11层,最高层位为第3层。

从“北京人”化石显示,“北京人”体格健壮、骨骼粗大、肌脊发达、身材较矮。整个脑颅较扁,最宽处在外耳门上方,头骨壁较厚,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小,成年人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头盖低平,额骨后倾,眉骨嵴粗大,左右两眉骨互相连接,向前突出,遮盖双眼。下颏骨最大特点为吻缘前伸,下颏缺乏,多颜孔。牙齿的构造复杂、硕大。上中门齿的舌面有发育的底突,分成几个指状突,上下大齿的齿冠和齿根粗大,齿冠从侧面看呈楔形,上下前臼齿和上下臼齿不仅比现代人的粗大,而且嚼面有相当多的皱纹。“北京人”的肱骨和股骨从形态

上看基本与现代人相似,但髓腔小,骨壁厚,股骨比肱骨更具原始性。若从整体上看,“北京人”的身体近于现代人,而头部则具有较多的猿的性状。

关于“北京人”的年龄,据张森水所求得的数据:死于14岁以下者占39.5%,死于30岁以下者占7%,死于40—50岁者占7.9%,死于50—60岁者占2.9%,死亡年龄不肯定者占43%。从鉴定头骨和肢骨上显示出来的年龄,成年者占78%,未成年者占22%。依牙齿测算,成年者占66.8%,未成年者占33.2%。总的看来,“北京人”寿命不长,夭折者多于长寿者,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界的侵害和疾病所造成的。^①

从“北京人”体质特征可以看出,他们的下肢骨基本具有现代人的形态,能够直立行走,上肢已发展成为能够制造工具的手;头骨脑膜语言区部位隆起,表明“北京人”已会说话,能够运用语言交流,且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北京人”被称之为“猿人”,但由于他们的两腿已能直立行走,双手能够劳动,用语言传递信息,表明“北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通过劳动,才最终从动物中分离出来。

(三) “北京人”的打制石器和骨器

“北京人”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遗物是石器。在洞穴遗址已发现10万多件石器,制作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为最多,绿色砂岩次之,燧石、水晶石和蛋白石最少。“北京人”制作石器在多数情况下分两道工序,先打出石片,而后从中选坯,进而加工成器。从石核和石片的打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打制石片使用三种方法: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并已初步懂得对不同石料采用不同的打片方法,用砸击法生产小型的石英片,用碰砧法打出大的砂岩石片,用锤击法生产各种大小

^① 张森水:《周口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周口店精神》,《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按:张森水所求年龄部分数据,加总为100.3%,而非100%。

不等的石片。

“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球形器等等。刮削器是“北京人”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主要用石片制成，多数从阴面向背面加工，有直刃、凹刃、凸刃、多边刃、盘形和圆头等种类，其尺寸一般都很小，长度以4厘米左右者最多。尖状器是“北京人”制作最精致的工具，其中有向一面加工的，特点是沿着石片的两侧边缘从阳面向背面把一端修成尖状；有向两面错向加工的，特点是先打击石片的一侧边缘，然后再从另一侧边缘向相反的一面打击，把一端打制成尖状，虽有直刃和斜尖之分，但加工方法是一致的。

关于“北京人”使用骨器的问题，自从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于1931年提出在遗址存在骨器以来，在学术界有人赞成，有人持异议。经过多年研究，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李济、张森水诸位均持肯定意见，“北京人”曾制作和使用过骨器，但数量不多。

（四）火的运用与管理

在“北京人”的洞穴遗址里已发现5个灰烬层和3个灰堆遗存，以及大量的烧骨、烧过的鹿角和朴树子，少量烧过的土块和木炭。灰烬层在第10层仅厚几十厘米，到第4—5层厚达6米，这说明“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火是有控制的，而非失控的自然火。灰烬成堆，表明已善于用火，能把火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不致蔓延。这表明“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已经具有管理火的能力。“北京人”能够用火和管理火，意义十分重大，有了火便可以熟食，熟食则利于体质的改善，促进肢体和大脑的发育，用火可以御寒和照明，有利于生存，在洞口生火，可防止野兽的侵袭，保障群体的安全。

从“北京人”所处的人类阶段来看，“北京人”还没有达到“钻木取火”自己制造火种，而是引自然火种为己用，因而在当时能够保存火种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周口店的自然环境

在周口店洞穴中所发现的大批古生物化石,有披毛犀、毛象、剑齿虎、赤鹿、水牛、野马、野猪、鬣狗、水獭及貂之类。这些不同的动物种属,生活于不同的地带,虎和象生活于高山、丘陵或树林间,而成群的赤鹿、羚羊、野马是以草原为生的,沼泽、河川是水牛、獭貂之属的寄生地。太古时代的周口店地区,西北有山和丘陵,自然会有成片的森林生长于丘陵山坡,东南是平原,为草原地带。当地的主要河流有大石河、拒马河、周口河与永定河,再往南延伸,还有易水。这些水系,在太古时都是长流不枯的。

另外,在猿人洞中发现有朴树果核壳和荆树木炭。朴树所结的果子与樱桃一般大小,这是在半干燥区域适宜生长的树木,古生物学家研究报告认为,这种植物在亚洲自上新世到更新世(更新世中期,相当于考古学年代中的旧石器时代初期)都有发现。由此可知,周口店洞穴堆积层中所含的大量的这一类植物种子,证明那时的气候是较寒的。关于荆树木炭,古植物学家鉴定认为,这类植物和现代豆科中的紫荆相近。紫荆树,在现今北京西山一带甚为繁多,属温带植物。总之,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绚丽多彩,山上有林木花果,坡地有洞穴石岩,平川有草原流水。北京人在这里穴居,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山坡洞穴,作为避风雨防野兽的栖息之所;山林、水泽、草原,可给他们提供味甜可食的肉果及猎物。他们拾取河滩的鹅卵石和山地的脉石英等坚硬的石料打制石器,艰难而勤劳地生活着。

三、周口店山顶洞人

(一) 山顶洞人化石

山顶洞是在1930年发现,1933—1934年发掘的。其洞是因位于周口店龙骨山顶而得名。从人骨化石看,其形态比“北京人”晚得多,故称“北京山顶洞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000年。在山顶

洞发现有人骨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骨器等遗物。山顶洞分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窖 4 部分。上室是当时人居住的地方,东西长约 12 米、南北宽约 8 米。下室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发现完整人骨架 3 具。下窖是自然形成的陷井,发现有许多完整的动物化石。在人骨化石处散存有赤铁砂粉粒和装饰品,尤其是发现了一根骨针,最能代表当时的文化技术水平,堆积中的黑灰土为烧烤遗存。从人骨化石的遗存看,大约代表 8 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其中 5 具属成年人,1 具为少年,2 具为儿童。成年个体中有 2 具为男性,3 具为女性。男性中有一例是超过 60 岁的老人。考古家推想:这保存在一处的人骨说明这男女大小 8 口大概是一家人。从三具头骨观察,老年男性头骨左侧颞骨上有骨折痕迹,一女性左顶骨有矛伤,另一骨上也有骨折痕迹。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这几个人或这一家庭的成员一同死于暴力?人类学家魏敦瑞曾推想说:周口店山顶洞所埋的这一家人,原属于外来的、流动的部落,攻击他们以及最后消灭他们的人实为周口店的土著。还有一女性头骨前额上部,显有一宽条浅槽形深入骨里的勒痕,民族学家考证,这是她经常把条带挂于前额,负物背载所留下的印痕。依这几个人的头骨化石与“北京人”作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化,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接近于现代人,消失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量逐渐增大,前额倾斜在减少,额部日趋丰满,眉骨由高突趋向薄平。他们取火烤食物,大大减轻了用嘴巴撕咬生肉时的用力,导致原来向前突出的嘴巴向后退缩,形成像现代人那样具有的下颏。

(二) 山顶洞人种属

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在三十年代曾有颇大的争议。六十年代初,中国专家对山顶洞人化石重新进行研究,集纳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这些头骨化石显示了黄种人特征,是早期蒙古人种。从人种本身的若干品质看,与现今的中国人、蒙古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接近。李济等考古家认为,这种黄皮肤的蒙古种人的形成,按理推说

应该就在东亚这个区域,完全是由这个区域发育出来的,是属于东方的。在地质史第四纪这一悠长的历史时期,东亚这个区域,尤其是中国这一部分地形的演变及动植物的变迁,形成了特有的中国一带气候的周期、土壤的品质、粮食的种类、矿质的分布以及自然环境中尚不知的若干成分的集结,自然生物界终于选择了这种黑发的、黄皮肤的人种作为这一地域的主人。有的古人类学者推说,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这三个黄种人的支系,可能是由周口店山顶洞人或比之更晚的、但在体质上与之相近的古人类,散布于各地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早期人类在旧大陆的移动,是相当自由的,沿适宜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他迁,是地球太古人类都有的事实。

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这时已学会取火,并能制作骨针和刮削毛皮的工具缝制兽皮,来度过北方的严冬了。位于亚洲东部和没有冰川的广阔的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在大多场合下可以在冬季的冰上横越过去,形成一条可以让人类和各种动物迁移的宽阔干燥的陆上通道。这样,东亚蒙古人种的猎人是能经过这条畅通的走廊源源不断地到达美洲平原的。

四、辽宁营口金牛山和内蒙古河套古人类

古燕赵大地向北延至内蒙古河套,向东北伸至辽宁,它是华北平原和辽河平原及内蒙古草原的衔接地。自远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各族祖先栖息和开发的地区。在这一广大区域里,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辽宁省的营口金牛山猿人洞穴遗址、本溪庙后山遗址、喀左鸽子洞遗址、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遗址;内蒙古自治区的大窑石器制造场遗址和萨拉乌苏地区“河套人”遗址。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

（一）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

金牛山猿人洞穴遗址，位于营口市大石桥南 8 公里外一个孤立的山丘上，1924 年开始发掘，1984 年在下层中发现了猿人化石，其中有牙齿、头骨、肋骨、脊椎骨、尺骨、髌骨、足骨和明显的用火痕迹，动物化石有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中国鬣狗、德氏猫、肿角鹿、梅氏犀、三门马等。还发现有多种打制石器和一些骨器。

本溪庙后山早期遗址发现人的牙齿化石，中期遗址发现两块儿童头顶骨和一根桡骨。

这两处遗址均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石器有砍砸器、圆刃刮削器、半圆刃刮削器等，体形较小，器形简单，多为以石的自然面为台面单向加工的石片石器，具有原始性。这些石器的特征，与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石器相近。从出土的动物化石看，是典型的中更新世时的华北动物群，其所处时代与北京猿人相当，显示这两处遗址与“北京人”遗址，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化遗存。

（二）喀左鸽子洞、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

喀左鸽子洞遗址位于大凌河上游西岸，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瓦房村西南汤山峭壁上，是距今约 15 万年左右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洞穴遗址，于 1965 年发现。洞内文化堆积很厚，发现有 400 多件打制石器，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出土的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石片、石核等，从石器的制作技术看虽仍较原始，但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采用错向加工和两面打制的新工艺。鸽子洞旧石器文化和“北京人”石器文化关系密切，有明显的共同点，是“北京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反映了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远古居民的最初联系，燕赵原始文化具有共同性。

海城仙人洞是 1981 年发现的，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掘出万余件用脉石英打制的石器、石片，还有披毛犀等 14 种晚更新世动物化石。特别是出土了一些用兽牙钻孔做的饰品，说明原始艺术开始萌

芽了。

丹东山城子洞,位于东沟县前阳山城子山上。洞内出土了两具旧石器时代晚期人骨化石,包括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下颚骨、股骨及6枚牙齿。这是辽宁也是整个燕赵大地滨海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点和地层关系的古人类化石。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第四纪的几次冰期中,渤海、黄海曾几度退海还陆,使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相连可通,以致中日两国旧石器文化有相似之处,引起两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城子洞古人类遗址具有重要意义。

(三) 内蒙古的“大窑文化”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东北30余公里处大青山南麓的大窑村和乃莫板村一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处石器制造场,命名为“大窑文化”。这里海拔1400米,岗峦起伏,沟壑纵横,大窑村附近的山顶、坡地,广泛露出着太古界花岗片麻岩、燧石的古老基岩,而这种燧石,质地坚硬,是制造石器的天然原料。在大窑一带堆积物的底部,厚达10米左右的更新世中期红色土层中,发现有距今50万年前相当于“北京人”时代的古人类打制石器28件,具有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2000余件,成为大窑石器制造场中时代最早的文化遗存。在红色土层上部,厚约6米左右的更新世晚期黄土与黑土层中,发掘到距今几万年前的石器400多件、石片1200多件。在最上部全新世的表土层中,埋藏、散布有大量的距今1万年前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石屑等。这表明大窑石器制造场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经中期、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50万年之久。

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大窑所发现的石器,大多属于初步加工的半成品,制作粗糙,使用痕迹极少,特别是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堆积很厚,显然是原始人类制造石器时所遗留下来的“下脚料”,因此断定为石器制造场,是一处全国已知的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的原始人类石器制造场。

(四) 河套人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西南约 80 公里的萨拉乌苏河谷大沟湾一带,是著名“河套人”的故乡。1922 年法人桑志华首次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在大沟湾采集到三件已经相当石化的人类肢骨,次年他又和德日进在小石桥畔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文化遗物和脊椎动物化石。在研究过程中,德日进从采集物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枚人的上门齿,后经北京协和医院步达生研究,定名为“河套牙齿”。中国考古家裴文中在他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用语。所谓“河套文化”,即指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尔后,考古家贾兰坡把桑志华于 1922 年在大沟湾采集到的三件肢骨也归入“河套人”的遗存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又在萨拉乌苏地区发现了“河套人”的顶骨和一段股骨化石,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又发现“河套人”化石 19 件,包括顶骨、额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特别重要的是 1978—1980 年,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在鄂尔多斯高原调查毛乌素沙漠期间,对萨拉乌苏河作了分层研究,在萨拉乌苏河下部地层里发现人类化石 4 件。1980 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又组织了一次考察,发现了人类化石 11 件和 100 多件石器。经放射性元素碳 14 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35000 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套人”同现代人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在性质上与蒙古人种接近,肢骨除骨壁较厚似为原始性质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和现代人一致。

在萨拉乌苏还发现了大量的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纳玛古菱齿象、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诺氏鸵等,计 45 种以上。其中在这里出土的野驴、披毛犀、水牛的完整骨架化石,是中国古

动物化石中的珍品。由于这一地区的化石种类繁多,科学上称之为“萨拉乌苏动物群”。它们是伴随“河套人”生存的古动物,也是“河套人”狩猎的主要对象。从动物化石推断,在35000年前,萨拉乌苏地区有较大的湖泊和河流,湖畔有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气候温暖而湿润,构成“河套人”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

萨拉乌苏出土的石器,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个体小而精致,均系打制而成。与石器一起还找到成堆的灰烬、烧骨以及大量被砸碎的兽骨,其中绝大多数是羚羊、鹿类的骨骼和角。这表明,萨拉乌苏地区是“河套人”狩猎、采集、生息、居住的营地。

由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及石器遗存而构成的“河套人”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是燕赵原始文化的重要篇章。

五、山西朔县峙峪文化遗址

峙峪遗址位于朔县城西北15公里处的峙峪村,处于桑干河的发源地——黑驼山的东麓。1963年发掘,开掘土方70立方米,获得人类枕骨1块,石片、石器15000多件,烧石、烧骨多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以及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等,经碳14测定,遗址距今约28000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经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峙峪的哺乳动物群和萨拉乌苏河哺乳动物群相比颇为相像,两地的动物群的主要成份相同,它们所反映的自然环境也比较相似,主要是草原环境。两个遗址的文化材料中都有细石器遗物,重要的石器类型也是相似的,如尖状器、雕刻器、小刮削器等。峙峪的动物化石中,初步统计至少有120匹野马,88头野驴,故“峙峪人”堪称为“猎马人”。在萨拉乌苏河的动物化石中发现有300多个羚羊角,至少代表着150多头普氏小羚羊,故“河套人”可称为“猎羊人”。这两个遗址的人类,看来都是以猎取草原动物为重要的生

活来源。^①

峙峪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贾兰坡和他的同事盖培、尤玉柱正是根据这个遗址的发现物,于1972年正式提出华北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至少有两个传统的学说。这两个传统:“一是以大型石器和三棱大尖状物为特征的‘匠河—丁村系’,另一个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 - 峙峪系。”^②峙峪遗址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石器文化向小型细石器文化发展,从考古出土物看,中国细石器文化以华北为先。细石器文化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产生了农业,人类学会了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生活变得比以前丰富多彩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次大突破,史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在燕赵大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广泛分布的,已发现有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富河文化、龙山文化等。各文化类型的分布,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具有南北文化交错的地域性特点。在华北平原拒马河至漳河间的滹沱河、滏阳河流域,是以磁山文化和含有磁山文化因素为主的古文化,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分布,从出土遗存看,这里的远古居民是以从事农作为主又兼营渔猎的;北部的永定河、潮白河、桑干河、洋河、壶流河诸流域,为

① 贾兰坡:《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1982年第7期。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燕山地区的滦河流域、七老图山的老哈河流域，是红山文化为主，兼有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分布；海河上游的永定河、拒马河、大清河流域，则是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交错分布区。

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 10000 年至 4000 多年。

一、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是中国北方较重要的原始文化类型之一。磁山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西南 18 公里处的磁山村东南的台地上，北依磁山，南临洛河，面积约 8 万平方米，考古部门自 1976—1987 年先后几次在这里发掘，出土文物 3873 件。在遗址中发现有各种形式的灰坑，房屋基址和储粮的窖穴，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多种家畜、家禽骨骼，炭化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 70 多个组合器物坑中，发现这些组合器物有成套的打制或磨制的石斧、石铲、石凿、石锤和敲砸器等；最具特征的是石磨棒和四足石磨盘。陶器的器形种类较多，有盂、支架、罐、壶、碗、钵、盘、豆、杯、鼎等，质料以粗陶为多，泥质陶次之，手制，均红褐色。上述石器、陶器中，以石磨棒、四足石磨盘、盂及其支架为磁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其他如大口深腹罐、双耳壶、假圈足碗、圆底钵和三足钵等，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陶器的装饰以素面为多，带纹饰的仅占三分之一，多为绳纹和细绳纹，篦点纹次之，其他有划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和席纹等。纺轮数量少，都是用陶片磨成的。骨器较多，有凿、锥、镞、网梭、鱼镖、匕、铲、针和笄等。其中镞、鱼镖和网梭的出现，表明当时磁山人还经营渔猎。大量朴树籽的出现，可说明采集经济的存在。在灰坑里发现的成堆腐朽粮食，经鉴定为粟类，结合农业工具的使用，可说明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禽、兽骨中有猎、狗、牛、鸡等，显然当时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家畜、家禽饲养。

从磁山文化遗物的性质上观察,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富有农业经济的色彩。出土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占有很大的数量,石斧、石铲、骨铲、石磨盘、磨棒等劳动工具已基本配套。石斧用于砍伐和土地垦种,石铲用于翻土播种,磨盘、磨棒用于粮食加工。这样,从土地的开垦到作物的种植再到对收获物的加工,清晰地显现了原始农业生产的序列过程。窖穴中炭化的粟,是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先人首先种植的,这与长江流域的古老稻作农业遗存,同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光辉史迹。家畜家禽的饲养,渔猎采集经济的存在,是磁山人农业经济的丰富和补充,河里的鱼,山野的兽,树上的果,都为磁山人所利用。

从磁山房基的遗存看,是半地穴式建筑,放眼展布达 8 万多平方米的高台地磁山遗址,可断定,这里是 7300 年前的一个较大的村落。

上述这些迹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 7000 多年前磁山人生活的图景——原始的、黄土地上的农业村落经济。

考古学者认定,位于黄河下游的磁山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距今 7000—5000 年)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联系到与其时代相近而又都分布于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文化、宝鸡北首岭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及辽河中下游的沈阳新乐文化,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斑斓色彩。这些迹象可说明,黄河中下游之间,中原和东北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近年的考古得知,在武安牛洼堡、西万年也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存,在保定以北的拒马河流域,容城上坡和涑水拒马河沿岸,一些新石器早期遗址中,也出土了与磁山陶器相近的靴形陶支架及筒形陶盂等。这说明磁山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已不限于冀南一带或其附近地区,已在华北大平原广为分布。

二、兴隆洼文化

1994 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出 8000 年前原始聚落

遗址,考古界命名为“兴隆洼文化”。该遗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丘陵地带的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一处低丘岗地上,考古工作者自1983—1993年,经11年间的6次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3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围沟、房址、灰坑等早期遗迹已全面显现,为目前国内已知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聚落四周有长约570米、宽约2米、深约1米的围沟,在其中共清理出不同阶段的房屋基址160余处,灰坑300多个,墓葬20多座,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兴隆洼文化遗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展现的是中国史前考古中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很带有燕赵地域北部的文化特色。第一,兴隆洼文化器物群特征鲜明,分布地域广阔。从石器看,有打制的石锄,磨制的石斧等;从陶器看,器皿壁厚,火候不高,质地松软,器形单一,以陶罐为主,面饰有交叉纹、之字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纹样组成的复合纹图案。经科学测定,该遗址距今约8000—7500年,时间跨度达数百年之久。兴隆洼文化遗存在内蒙古林西、巴林左旗、奈曼旗,辽宁阜新市及北京市等地也有发现,覆盖地域较广。第二,聚落以围沟相环绕,这种兴隆洼式的聚落模式,为史前聚落形态的一种新形式,不同于陕西半坡、姜寨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聚落西南部有一4.6米的缺口为通道,围沟环绕其内的房屋为单间成排布开,房屋面积很大,大者达140多平方米,中者60—70平方米,小者亦有50平方米。多人居卧其中,特点十分明显。第三,兴隆洼文化的确认,为其后的红山文化找到了历史的渊源,红山文化源于当地土著兴隆洼文化,长城东段地区,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第四,在这里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及兽骨、玉玦等大批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石器有锄、斧、镑、磨盘、磨棒等;陶器有罐、钵、碗、杯、盅及纹轮等;骨器有鏢、匕、锥等;兽骨有鹿骨、猪骨等,还发现有保存完好的鱼骨。在墓葬中发现有玉玦耳饰,分别置于墓主人左右耳部下方,这是目前国内已

知最早的玉器。两对玉玦分别呈淡黄和绿色,玉质优良,磨制光滑。墓主人右侧还有两头整猪骨架,这一葬俗反映了兴隆洼人什么样的习俗和信仰,尚待作深入的研究。

兴隆洼文化在燕赵大地的分布,以滦河中上游、西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中上游等之间的旧热河山地为多,尤以滦河、西辽河之间为其分布的中心,遗址多,内涵丰富。这一旧热河古文化,是沿河传播的,北面通过西辽河和大凌河,东面通过辽西走廊,南面通过滦河、潮白河穿过燕山顺流而下直达渤海湾,在燕山南北和辽西形成为古文化的摇篮。在燕山南麓和早期仰韶文化相对峙、交错、融汇,终于在这一带形成为赵宝沟类型——上宅、西寨文化,小山类型——安新庄文化。在燕山以北,则发展到牛河梁的高度红山文明。

7000多年前的兴隆洼人,以燕山和其南北的河流为依托,依山临水兴建村落,采石制器,捣砂制陶,从事着原始的农业、采集和渔猎生活。燕山有美玉,他们已知道采玉石做装饰品。这里是红山文化的源头,是道地的土著文化,由此也可以说,长城东段地区也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与兴隆洼文化相近且为同一时代的文化遗存,在辽宁阜新查海也有发现,在查海古人类文化遗址里,最先曾以发现龙纹陶片和玉匕、玉玦而闻名于世,后来又在一座较大房址的中央发现龙形石堆,整条龙的形体(长19.7米,腹宽1.5米)由大小相近的红褐色石块堆积而成,龙的头、身、腹、尾、爪清晰,呈东北—西南向侧卧式。对这一龙的重要文化遗存,考古专家认为:在距今8000—7600年古人类村落遗址中出土龙形堆石,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有龙的形体物存在,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历史极为悠久。炎黄子孙自称为龙的传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绵延久长而不衰,当可在对龙的崇拜中得到显现。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以 1935 年发现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下层文化遗存而命名的。新中国建立后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又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遗址,其大体分布范围是:北起内蒙古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和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与锦州地区。在这一方域内发掘的遗址有:赤峰水泉、蜘蛛山、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敖汉旗三道湾子、四棱山、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红山文化年代,经科学测定为距今 5000 年左右,属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从红山文化遗存看,当时红山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饲养家畜、狩猎与采集。其主要特征如下:

1. 村落多选在沿河高台地兴建,房屋多为方形、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内设带有火道的灶坑,这显然是为御北方的严寒而设。房内面积大小不等,小者一般为 4 平方米左右,大者几十平方米或近百平方米。房门开向东南,墙壁为土石垒砌。

2. 生产工具多为石器,有铲、锄、斧、刀、镰等,还有骨器与角器。

3. 陶器有各种形式的大口深腹平底罐,小口长颈深腹罐,直口折腹平底碗,筒形器,以及大口钵、小口高领瓮等。陶质以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伴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手制。器表饰压印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绘。彩陶纹饰花样繁多,显示了红山人艺术美的进步。器表的“之”字形纹,是红山文化富有的纹饰特征。

4. 陶窑比较进步,有窑室、火道、火膛。窑室形体不一,火道分隔,通体烧制布局比较合理。

5. 墓葬多为“积石墓”,用石块围成墓圈或盖顶,有石棺墓(先以石板铺底,尔后用石块垒砌或石板围砌),也有土坑墓。大墓随葬品较

多,在牛河梁积石墓群就出土了雕琢精致的璧、环、龙、虎、鸟、鱼、蝉、猪等玉器。

6. 祭祀建筑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色。祭祀遗址多位于村落或墓地的中间地带,反映了生者对死者的尊重,其布局分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几个部分。中心部分为大型方形建筑,前后两端和两翼,或墙,或台址,或人行道,布列有序。其建材多为山石,出土有陶塑人像、玉饰、石饰和陶器残片等,其中的小型孕妇裸体像、双龙首玉璜形饰、鄂形石饰等均是相当精美的工艺品。红山祭祀建筑,以东山嘴、牛河梁两处最为典型,布局有中轴线和对称建筑,两侧有附属建筑,既有南北方圆相对应的中心建筑,又有单元的对称建筑,祭室墙壁绘有彩色图案。在牛河梁基址出土的有泥塑人像、动物塑像和陶祭器,不仅工艺精美,且寄托着红山人对美的追求和宗教意识。在主室内出土的一件人头塑像,相当于真人大小,面施红色,颧骨高耸,面颊丰满,两耳长圆,嘴大而微咧,眼珠用圆玉片镶嵌,形象逼真。

在燕赵腹地的河北红山文化,内涵比较复杂,由于地理历史条件的影响,呈现的文化面貌自然不那么单一,显有南北文化交错特色。粗略划分,可以燕山为界,分南北两片,三种遗存。燕山北片属辽西、内蒙古红山文化型,在翁牛特旗出土有玉龙,在围场下伙房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猪龙形环饰与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石墓中出土的玉猪龙相同。在滦河、潮白河上游流域为一片,跨长城南北,是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中间地带,滦平金沟屯出土有“之”字形陶器文饰、男女青石雕像,兴隆杨树屯出土的青石雕裸体女像,与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雕像极相似,同为红山文化的艺术珍品。迁安安新庄遗址的出土物,则带有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双重因素,陶器纹饰复杂,器皿品种多,彩陶数量少,个别施以红衣或内彩。石器有石磨棒、磨盘、斧、铲等。从这些文化遗存看,比燕山以北的单一红山文化复杂。显现南北文化交错的地带,是潮白河下游和永定河

流域,在玉田、宝坻、三河均发现有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共存物。红山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在时代发展上可能是同步的。如果联系到西辽河上游的兴隆洼和冀南的磁山文化在这一地带接触之后,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中原后岗型的仰韶文化也在这个地带接触,这就足以说明,燕山南北是中原北方两种文化的交错融汇地带,这自然与这里的古自然地理、气候等环境有关,也可以立足于这一历史视角来观察北方古代早期民族的形成。

四、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以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的。这一文化遗存在燕赵大地也广有分布。在这个地域内,先于它的磁山文化对它有影响,后来又孕育发展成为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经历了2000年左右的发展阶段,距今约7000—5000年。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发达地区,豫西、晋南和关中一带为其中心。该文化在燕赵地域的分布,主要在太行山麓的华北平原上,由于持续的历史久长,加之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呈现为不同的文化类型。

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类型 属豫北安阳后岗一期仰韶文化,其特点是陶器中泥质红陶居多,其次为泥质陶,夹砂红陶较少。器表磨光,纹饰少。彩陶以黑彩为主,红彩次之,个别兼有黑红二彩。纹饰有平行、纵行或斜行的直线纹,器形以“红顶式”陶钵为多,另有碗、壶、盆、夹砂粗陶釜、鼎、灶、罐、瓮等。特别是马蹄形纹饰的陶支架极具特色。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子、陶窑、灶址,不同形制的灰坑和墓葬。文化内涵丰富,对临近各文化类型,尤其是冀中以北,影响较大。武安赵窑、磁县下潘汪和界段营、永年石北口和辛庄、平山西门外、藁城市故城、安新留村、蔚县四十里坡、涿鹿下水磨等地,都发现有相近的文化遗存。它是新石器时代华北平原上影响很大的一支文化,在华北顺河

流而传播到冀东北,不过燕山。

曲阳钓鱼台仰韶文化类型 与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类型相近,房屋为半地穴式,有灰坑。陶器常见泥质钵,彩绘以黑为主,兼用黑赭、黑红。纹饰为变体植物叶纹、宽带纹、并列直线纹等。这一类型文化分布偏西,显然受山西西阳村仰韶文化影响较大。

邯郸百家村仰韶文化类型 在这里发现长方形房基、窖穴、灰坑。陶器以灰陶为多。彩陶分红黑两彩,有钵、盆、杯等。

在冀北大清河流域一带,其文化类型和北方红山文化存有较多的联系,表现出南北两种文化相互吸收影响后所产生的共同因素。

五、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以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先后经历了千年左右,距今在 5000—4000 年之间。龙山文化遗址增多,这是人口繁殖与增长的反映,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出土的石铲、石刀和石镰,制作精致,刃部锋利,铲刀中部钻有圆孔,便于捆绑木柄。出现了骨铲和木耒等生产工具,陶酒器增多。从出土物看,家畜饲养、狩猎和捕鱼水平都比以前进步。居住区域由浅山区扩大到平原,有了城址和地面房屋建筑,村落内有灰坑、窖穴、水井和陶窑。陶器种类增多,器形多样,已进步到轮制,有了原始的瓷器。陶器中的精品为黑陶,胎壁薄,磨制发亮,称蛋壳陶,还有镂空花纹的陶器,是很好的艺术品。

龙山文化在燕赵腹地河北的传布,大体沿着两条线:一是从山东沿海经沧、津向北传布;一是在内陆顺太行山麓向北传布到长城。明显具有地方特点的是任丘哑叭庄文化遗存,在这里出土有盆形侈口高裆绳纹鬲、附鸡冠耳袋足鬲、侈口束颈深腹鬲,及种类繁多的黑陶盖缸、双耳盆等。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受龙山文化传布影响的产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燕赵大地上,磁山、仰韶、龙山文化是沿黄河流域中原古老文化发展演化而不断进步和提高的;兴隆洼、红山文化以至后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在燕山以北这一文化区延续发展的。石器工具从打制进步到磨制,陶器制作由手制进步到轮制,由素面进步到彩饰,有了村落、锄耕、谷物种植,有了家畜饲养、渔猎采集,有了原始的葬俗、祭祀、求美的意识形态。

六、细石器文化

原始人类社会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有逐渐缩小的趋向,在石器的制作方面,打制与琢制的加工工艺水平较之旧石器时代已有了很大提高,石器以细小石器为主,如石核、石叶、尖状器和刮削器等都开始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大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末叶,而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细石器的制作,是为了适应复合工具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工艺技术,其典型代表为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母体——细石核。石核有船底形、楔形、扁锥形、圆锥形、圆柱形等;石叶片多加工为刮削器——短刮器、圆头刮器、复刃刮器和双边刮器等。

细石器的起源,从世界考古来说,有欧洲说、西伯利亚说、蒙古说和中国华北说。以华北说最为有力。在华北旧石器时代遗址里,就发现有细石器的存在,如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遗址。其中的若干石器已具备了细石器的雏型。旧石器时代末叶的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都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后来形成一种主要的工艺传统。在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石器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文化,后又发展成不同的支系:一支即谓“细石器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并借东北走廊远播于东北亚和南北美

洲；一支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残留有细石器；一支分布在中国西南到华南一带。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自然显现于经济方式和文化面貌上，也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在细石器传统上，则可说同源于华北。如在赤峰古人类文化遗址中，除发现细石器外，还存有彩陶一类的遗物，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这说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导致出现了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中国北方古文化地域看，细石器文化所显现的经济生活是多方面的，出现了渔猎、畜牧狩猎和农业兼畜牧狩猎等方式，但无论以哪种经济为主，采集都占一定的比例。考古界一般认为，渔猎和畜牧是“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原文化北移的影响，长期定居的农业经济，在中国北方地区也发展起来，如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稠密的房址分布，就是这种长期定居并从事农耕的生活反映。

从燕赵的广大地域看，细石器文化在北部地区延续的时间较为久长，从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情况来看，在宁城南山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已属早商文化）中，仍发现有少量的细石器石片和刮削器，在小榆树林子遗址发现了刮削器，在北票丰下遗址发现了镞、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等，在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也发现了上述细小石器。这说明到了与中原商周相当的青铜器时代，这里的细石器传统仍然存在，这自然可视为以渔猎和畜牧经济的需要而保有的文化遗存。处于燕赵南部的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后来发展为辉煌的青铜文化，没有形成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细石器较快地消失了。

总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形成的细石器传统，最初源于华北，影响波及到中国广阔地区及东北亚、南北美一带，这一工艺传统，在古人类石器史上，代表了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共同财富，

反映了人类在文化交流上的密切联系。它的使用和发展在时空跨度上之所以那么悠久广阔,主要是适应渔猎、畜牧经济的存在和需要。

总观燕赵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考古学区分看,在河北平原,有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滦河流域有兴隆洼文化,辽西有红山文化,辽中有新乐文化等,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从经济形态上和自然区划联系起来,大体可分属于平行三大区域: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为原始的农耕兼渔猎经济,辅之以在山林中的采集,其代表文化为兴隆洼及其以晚的文化;冀中以北包括拒马河、洋河及永定河下游,原始经济是以农耕为主兼有南北混合农牧经济,代表文化是南阳庄文化(后岗一期仰韶文化);冀中冀南属中原新石器文化,为原始农业部落聚居区,其代表文化是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诸类型。这些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构成了8000—5500年前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环节。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距今7000多年的磁山人,是一从事以栽培粟为主的谷作文化原始部落,农业经济色彩十分明显,磁山文化遗址被农业史学家誉为谷子的故乡,它的影响之广大,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之突出,都是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的。

燕赵地域文化步入青铜时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其分布范围在辽西、旧热河区,直至冀中的拒马河、永定河流域。这一文化的早期与冀南龙山文化相近,晚期则进入到早商文化,中间包括了整个夏代,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了,中华古文明进入到奴隶制社会。这时燕山南北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兄弟民族在这里汇聚交融,在燕赵大地上,更创造出了辉煌的、灿烂多采的殷商和周燕文化。

第二章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显著特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发展和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域各民族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燕赵地域处于北方，辽阔广大，燕山南北，长城内外，自远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汇聚，因此，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汉族之间两种相互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融合。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奚，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契丹、沙陀、女真，元明清时期的蒙、满等族，都在北方这块土地上，有过形成、发展、壮大和相互融合的历史。“五胡”、辽金在这里有过割据称王的历史，元明清则在此建立国都，形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统治着全中国。因此，燕赵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浑成，不能不带有在这种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这是地域民族融合，互吸优长，共同发展的结果，从而使燕赵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处于全国中心地位

的京都文化的皇家气派相结合,相互影响,不仅显示出燕赵区域民族融合的特征,而且表明了其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节 先秦时期北方的戎狄

一、黄帝、尧、舜、禹与獫狁、荤粥

(一) 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獫狁(亦名狎狁、荤粥、獯鬻、薰育、狫允、荤允等,《史记》里獫狁与荤粥并提,《汉书》里则狫允与薰粥并提),为匈奴之先世,从远古的传说时代起,就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唐虞以上,荤粥就和山戎、獫狁“居于北蛮”。北蛮,即北边。他们是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活动中心方位。概而言之,今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燕山以北,东北辽河以西,大约为他们的活动范围。

黄帝部落由陕西渭水流域(一说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一带),迁至今河北涿鹿的山湾里。在涿鹿阪泉之野,先后和炎帝、蚩尤发生过战争。特别是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黄帝族借涿鹿一带的天候地形之利,加之“徵师诸侯”(实为联合各部落首领)的联合力量,大败蚩尤,奠定了尔后华夏族定居中原的基础,当时在中原以外的四周,北有荤粥、獫狁,西有戎族和羌族。

黄帝借助于战争,统一了不少氏族部落,成为中国历史上夏禹以前势力最大的共主。《史记》上说他“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阪泉、釜山,这三大与黄帝伟业相关的要地,均在今河北涿鹿县境内。釜山,地处涿鹿、蔚县间的协阳关要冲之地,这里的山谷

隘道,为古代南北的协阳关路。黄帝北逐荤粥后,在这里与各部族首领,结盟统一符契,这是众多部落结盟的大联合,也是众多部落屈尊于一个“共主”的初步统一。这一举措,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黄帝在涿鹿山湾所营之邑,可看作是他东迁后在这里立脚拓业的根据地。

(二) 尧、舜、禹与獫狁、荤粥

从古史记载看,黄帝之后先后践大位的天下共主是唐尧、虞舜和夏禹。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中国古代的冀州,后人记述他们的“帝都”均在冀州。《禹贡》未言冀州的四至,史学家顾颉刚在《禹贡注释》中曾说冀州的领域,约为今山西全部,河南的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及辽宁的西部。也有史家认为“冀州之北界当于阴山”。与唐虞夏在这一中土地地区相伴随的还有匈奴的先世獫狁、荤粥。史学家吕思勉在《读史札记》中说,其初獫狁、荤粥即在今河北、山西之腹部。梁启超在《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则说,黄帝至尧舜时,荤粥曾占有今陕西之全部及山西之大部,由于尧舜禹起而逐之,才使之受挫北迁,到了“夏殷之衰,国威不振”时,荤粥部族才渐复了唐虞之前的所占之地,这就是后来的戎狄。

尧舜禹既与獫狁、荤粥错居于冀州境内,自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会有往来、依存和互补的关系,宗亲方面也会存有婚姻的血缘关系。这在后来的古书记载中有所反映。《管子·揆度》就记有尧舜时曾使“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以中原的农产品,与北方山林狩猎者进行物资交流。《墨子·节葬》中则有“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之说,这可视为尧舜的教化,波及到獫狁、荤粥。《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曾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陵,即幽州。这说明,在尧舜时期,中原与北方在人文习俗方面,彼此都互相影响。

二、夏商与土方、舌方和鬼方

夏商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的氏族部落群体，除獫狁、荤粥外，还有土方、舌方和鬼方。

（一）夏与北边的方国部族

禹继尧舜，是许多部落联盟共同选举的大酋长，建都阳翟，曾南向征伐苗黎，追到长江流域，巩固了华夏族在中原的地位。他北来过没有呢？来过。《诗经·商颂》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有：“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注家解释这些话的意思为：是禹巡察土方之地，以敷治洪水。土方是当时居于北方的部落群体之一。郭沫若作土方考说：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内蒙古包头附近。史学家邹衡认为晚商时的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县。禹既巡察土方，不仅意味着中原华夏与土方的交往，也意蕴着一种统属关系。

禹和他的儿子启建立的夏王朝，是一次新的历史变革，是用奴隶制的国家代替氏族公社制度。这一奴隶制王朝的出现，是经过剧烈的斗争才完成并巩固下来的。这是一个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变时代，《礼记》把这时称之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时代。王权的建立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夏朝以启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奴隶和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在王朝领域内划为九州，“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把属民按居地分成九个区域进行统治。对领域外的四周部落也进行过长期战争，有时整个被征服的部落变成他们役使的对象。例如古本《竹书纪年》就记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的话，后芬，即夏后芬，御，古训为服侍。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先世荤粥和夏后氏有过接触和往来。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

淳维。”对这句话历代注家释解不一。唐司马贞《索隐》引乐彦《括地谱》是这么解说的：“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文中的獯粥，即荤粥，其子獯粥，即指夏桀的儿子淳维。他在夏末投奔荤粥，犹如商末箕子奔去朝鲜一样。）清代学者雷学淇在他的《介庵经说》一书中指出：“三代支庶亦有国于荒服者。”“三代支庶”，为夏商周三代的后裔；“荒服”，是指匈奴先世荤粥在内的戎狄。这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后裔，于国破家衰之际，多北奔到北方游牧部族那里去。这反映了中原和北方在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在民族关系上的彼此依存性。

（二）商与北方诸方国的关系

商王朝幅员辽阔，史有“邦畿千里”之说。商文化所及地域更广，南达江南的湘赣，北达辽宁、内蒙古等地。在商的周围，同时还交错存在着许多与商有联系的方国和部落，见于甲骨文记载的就多达几十个。其中著名的有：土方、舌方、鬼方、邛方、羌方、周、人方、孟方等。除人方地处东南外，其他方国都处在商的北方和西方。他们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据商代卜辞所显示，武丁之世，环绕于中原北方的方国部落为土方，西北方为鬼方，西方为羌方。这些族称的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是许多共处于一地的不同部落共同体的统称，有的则是一部分部落共同体的单称，极难具体划分。一般说，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代在今河北等地的方国和部落有：苏氏（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启氏、受氏（今河北磁县），朵氏、胆氏、鲜虞（今河北藁城一带），曼、鼓氏（今河北晋州市一带），有易、邶（今河北易县、涑水），蓟、燕、亳（今北京市一带），令支、无终、孤竹（今辽宁喀左和河北卢龙），亚氏（今河北丰宁），土方（约在今河北北部至辽西一带），还有邢台市附近的井方等。他们多居于商的疆域之内，自然是臣服于商的属

民，其国也为商的附庸，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无疑也比四周的方国更为密切。例如武丁之妻妇妁就是井方之女；燕，在甲骨文中的原始文貌为“晏”，这说明在西周势力到来之前的商时，这里就是古“晏”方国，甲骨文中“晏来”、“妇晏”契刻，晏来，指晏方人到殷商来，妇晏，指晏方之女嫁于商者；孤竹，是商的一个附属方国，《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是商汤三月所封，商周之际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相互让国，乃至周武王伐纣时，他们进谏罢兵，武王不纳，他们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可见他们与商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商朝是强盛的古代国家，以商王为首的王朝中央政权，统辖着相当广大的地区，在燕赵地域布立的大小方国部落，其边远强大者，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在商朝邦畿之内者，为臣服于商的附庸，对商王负有一定的贡纳、保卫等义务。这里的民族间的融合，体现着两种方式：军事征伐的强制性，和平交往的渐进性。

北方游牧氏族群体繁多而且复杂，他们的关系归属，或为豷豸、荤粥的后裔，或为与其并存的部落群体，由于历史久远，史料有限，今人是很难理清其来龙去脉了，一般来说，禹之前曰豷豸、荤粥，商曰方，周曰戎狄，秦曰匈奴。

三、西周与北方戎狄

周族历史悠久，从传说中的始祖后稷起，到周武王灭商，一直是从西向东迁徙，与西方的戎狄杂居有十余世之久。

武王灭商后，周族君临中原，追随周人的部分戎狄进入内地，也有不少仍留在边裔“荒服”。从燕赵地域看，西周的北方民族主要为戎狄，晋北有犬戎（也称严允），燕北有戎，偏东北有山戎、东胡、肃慎等；在周的邦畿之内，多有狄人。周代商后，以“中国”自居，为了巩固和发

展周朝的政治势力,扩展疆土,积极发展同四方诸民族的关系。在西周统治者的心目中,“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显然是把周围各族都包括到周朝的疆域之内。周边各族也先后向华夏族的“中土”、“中国”朝贡,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四、春秋战国时的北狄和东胡

春秋和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游徙,从而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以北方狄族来说,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太行东西、燕山南北多有分布,支系繁多,有赤狄、白狄、长狄三大支系。随着族系的繁衍和活动领域的扩大,支系中又出现许多分支,如赤狄有潞氏、甲氏和东山皋落氏等,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西境内。白狄则有鲜虞、肥、鼓等,在今河北境内。长狄有郟、瞒等,在今晋冀相邻地带。赤狄潞氏曾建立潞国与华夏族对抗,鲜虞、肥、鼓则屡屡遭晋所伐。春秋时由于晋国和齐国的崛起、强大,压抑和兼并了戎狄的势力,如晋灭赤狄,齐伐山戎、令支、孤竹等。到战国时,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仅有鲜虞族人建立的中山国了,其兴亡凡 118 年,其间一度被魏所攻灭,复国后一度强大,位列“七雄”之后,最后为赵所灭。周所分封的姬姓的燕国,是在齐、晋消灭和削弱了戎狄势力之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在这之前,燕夹于戎狄间,罹难颇多,燕桓侯时,受山戎威逼,曾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内)。燕庄公时,山戎侵燕,庄公向齐告急求救,始有齐桓公北破山戎之举。只是到了燕昭王招贤纳士力行改革之后,燕国才振兴强大起来,燕将秦开破东胡,向东北扩至辽东,拓地千余里,并修筑长城,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建都邯郸的赵国,除灭中山之外,还兼并了北狄人的代国,拓地至今山西代县、大同及河北宣化、蔚县一带。赵武灵王时,又北破林胡、

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原戎狄地置云中、九原等郡。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变革，在云中、原阳设置“骑邑”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又迁赵人于九原，这样在赵之北部，形成了多民族的错居融合区域。戎狄内迁中原，华夏族向北发展，相互交错杂居，自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史籍所载这方面的内容颇多。彼此之间联姻通婚方面，如晋公子重耳和赵衰娶狄女，赵襄子的姐姐嫁与北狄代王为妻，晋献公娶小戎之女为夫人，晋景公之妹嫁与赤狄潞子婴儿为夫人等。彼此之间都有向对方的逃亡和出奔，如晋公子重耳奔狄，晋将荀吴奔鲜虞等。戎狄上层贵族接受华夏文明，如潞子、肥子、鼓子、戎子、无终子等爵号，就是吸取了华夏族的公侯伯子男爵号称谓的。鲜虞中山国接受华夏文明更为显著，从出土的铜器铭文看，中山国君专行仁义，崇儒学，从其随葬器物、墓葬制度和文字方面看，虽保有某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但总体方面已和华夏文化大体一致了。

华夏文明也吸收了戎狄先进的东西，如畜牧生产的发展和骑射技术的提高，就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骑代车，以靴代履，以胡服代裘裳，以左衽代右衽等，无一不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燕赵优质的军马，驾驭和豢养的技术，也是从东胡、林胡、楼烦和代及中山等游牧民族那里得来的。在农业发展方面，“戎菽”（即大豆）和“冬葱”就是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传播到中原的。戎狄的内迁，也补充了中原劳力的不足，为华夏族增加了新鲜血液。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比如，从两汉直至金元之际，在燕赵之地的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一带），仍有白狄的后裔留名于史书，西汉的鲜于文宗、东汉的鲜于辅、北齐的鲜于世荣、元代的鲜于枢等，就都是范阳人。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匈奴、乌桓和鲜卑

一、秦与北方的匈奴

秦统一天下后,在全国初设 36 郡,在燕赵区域有不少郡是得之于北方民族的。从燕得手的上谷、渔阳等五郡,原本是东胡之地;从赵得手的巨鹿郡,原本是白狄中山之地,代郡,原本是代戎代翟人之地;九原郡,战国时先为林胡、楼烦托足之地,后为赵国所有,战国末又被匈奴所据,秦可说是直接得之于匈奴,间接得之于赵国。

匈奴崛起于战国后期,本是“百有余戎”(《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支。这一支强盛以后,征服其他各支,便以匈奴概称。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建立了奴隶制政权。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曾“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李牧列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 218 年派大将蒙恬率大军 30 万,征伐匈奴,头曼单于战败北遁 200 余里。此后匈奴畏秦,北徙 10 余年。为了防御匈奴,秦将原来秦、燕、赵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到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孟家湾),东沿河北北部围场、内蒙古赤峰、辽西的阜新一线到辽东,这就是著名的秦代万里长城,它是秦统一的象征。长城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虽是阻隔民族大融合的障碍,但长城又是民族交流的纽带。

二、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一) 西汉前期与匈奴间的“和亲”与战争

西汉政权建立后,匈奴的势力已延伸到现今的山西、河北北部。

公元前 201 年,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次年,刘邦亲率 32 万大军从晋阳出发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后用陈平之计,以厚礼重贿冒顿的阏氏,才得以解脱。从此,西汉政府迫于实力的虚弱,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嫁于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绣、锦、絮、缯、酒、食物等。又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以长城为界,以北为“引弓之国”为单于所领,以南为“冠带之室”为汉皇所统。双方还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保障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匈奴以其马匹和毛皮等特产换取所需的手工业品及盐、铁等,塞北的牛、羊、马、骡等大量进入中原,为中原提供了耕畜和食物。这种“和亲”政策,从高祖刘邦始行,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一直没有改变。

燕赵北部,时为汉人和胡人的错居之地,是匈奴和西汉的对峙地带。汉初刘邦多分封异姓王于燕赵之地,但从实际看来,这些异姓王,极易受汉和匈奴两强的作用而发生摇摆,或因失去西汉的信任而归降匈奴,或因受匈奴的胁迫而背汉。如刘邦初即位时,燕王臧荼、卢绾先后叛汉,逃亡匈奴,继尔代相陈豨反叛,也与他暗地里和匈奴联结有关。后来刘邦在燕赵之地改封同姓王,先是封其兄刘喜为代王,后又立子刘恒为代王、刘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等。西汉在燕赵之地郡国并存,封宗室子弟为王,就是基于汉匈对峙、既和又争这种形势的需要,在这里既展现了民族间经济文化融合的一面,也展现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冲突的一面。

(二) 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经过 70 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空前加强,基于这种国势,武帝对匈奴转而采取武装进攻,意在消灭其军事有生力量的政策。从武帝元光六年(前 129 年)到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的 10 年间,西汉与匈奴进行了

10 多次战争,其中大型的决战有 3 次。

其一,公元前 127 年,匈奴到上谷、渔阳(今怀来、密云一带)劫掠,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击,在河套地区大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等,夺回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并招募内地 10 万口迁居朔方从事建设和守卫,修缮了秦时蒙恬所置要塞和沿河军事工事。

其二,公元前 121 年,西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由陇西出击匈奴,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

其三,公元前 119 年,匈奴从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进攻西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分两路迎击。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在沙漠地带大败匈奴军,单于仅率数百骑逃往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塞外两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获 7 万余人。匈奴残部逃往漠北,西汉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10 万多马匹。这次决定性的战役,卫青、霍去病所率大军都是从燕赵地域出征的,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三) 匈奴隶属于西汉

西汉昭帝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统治权相互攻杀,至宣帝时形成五单于纷争局面。公元前 56 年,呼韩邪单于打败屠耆单于,屠耆单于的儿子率残部降汉;后不久,呼韩邪单于又被其兄郅支单于打败,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到五原塞向西汉称臣,郅支单于亦遣使入汉通好。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为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西域副使陈汤击杀。从此,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所统。公元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觐见汉帝,“赞谒称臣”,归附于汉,汉朝宠以殊礼,颁给他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正式确定了君臣关系。从此,塞北与中原归于一统,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之久,直至西汉末年,在中国广阔的北方,牛马广布旷野,几代都相安无事。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

役。”

呼韩邪附汉,是汉匈民族融合的一个大事件,它打开了汉族与匈奴族和平友好、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北方民族地方政权接受中原王朝领属的先河,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筑城、建屋、打井等)传入匈奴,加快了匈奴族的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术等传入中原,也促进了西汉政府与民间养马业的发展。北方人民获得了长达60多年的休养生息,为北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到长安,表示“愿婚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是西汉民族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东汉时匈奴、乌桓与鲜卑

西汉末到东汉初,燕赵地域北部的定襄、雁门、代、上谷、渔阳、涿郡、右北平及辽西诸郡的豪族官吏和割据势力,往往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上层相互联结,互为依托,与中原王朝相对峙。下面分述匈奴、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一地域的融合和冲突情况。

(一) 匈奴

东汉初,渔阳太守彭宠与涿郡太守张丰,联结匈奴,叛汉自立。彭宠攻幽州牧朱浮,并分兵攻占广阳、上谷、右北平。匈奴单于遣骑兵助彭宠,蓟城陷,朱浮逃走,彭宠自立为燕王。东汉世祖刘秀亲至卢奴(今河北定州市),指挥平叛,在良乡(今北京市南)、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与彭宠、匈奴联军激战,张丰被俘,彭宠败走,后为苍头(奴隶)子密所杀。刘秀平叛后,遣将屯守常山、涿郡、渔阳、上谷,并修治飞狐

道,以利燕赵应援边兵,沿边筑亭障,修烽燧。后又迁雁门、上谷、代郡吏民 6 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即飞狐口)以东,养民训兵为备。渔阳太守郭伋和继任的张堪,劝农耕稼以致富,训民为兵以备匈奴,匈奴未敢犯塞,边境诸郡比较平安。

建武二十二年(46 年),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于饥疫大半,单于畏汉乘其弊,遣使至渔阳求和亲,乌桓却乘匈奴饥疫之时击败匈奴,匈奴北迁,漠南地空。不久,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讧,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内附于汉。由于“久居塞内”杂居于汉族人民之间,逐渐“与编户大同”(《资治通鉴》卷六七),生活习俗也逐步汉化了。东汉政府为解决北匈奴南侵之患,于永平十六年(73 年)、永元元年(89 年),先后遣窦固、窦宪、耿秉等率军北伐,大败北匈奴。这样,南匈奴人和招降的北匈奴人,南迁定居于今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长城内外地区,同汉族人民错居相处,长期交往,经济文化相互沟通,相互吸收,共同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二) 乌桓内迁

东汉初年,辽西乌桓贵族郝旦等率族众内属,刘秀令其居塞内,布于幽、并二州沿边诸郡,为此东汉设置“护乌桓校尉”驻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进行管理,定期贸易,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安帝永初年间。此后,乌桓与东汉的关系有了变化,或因东汉官吏们压迫,或因乌桓贵族与匈奴联结,彼此间有过冲突和战争。东汉后期,由于统治政权的衰弱,对乌桓的控制也逐渐削弱。散居于沿边诸郡的乌桓族,也形成了几支割据为王的势力,如灵帝建宁元年(168 年),上谷部乌桓难楼,拥众 9000 余落自立,辽西部丘力居拥众 5000 余落称王,辽东部苏仆延有众千余落,右北平部乌延拥众 800 余落称汉鲁王。

(三) 鲜卑

东汉初,鲜卑族原从属于匈奴,建武二十一年(45 年),辽东

太守祭彤大败鲜卑人，其首领偏何率部降汉。不久，鲜卑族另一首领仇贲到洛阳朝见汉皇，刘秀封其为王，与宁城护乌桓校尉同辖鲜卑人。及至北匈奴被击溃，鲜卑人乘机进入匈奴故地，将当地人同化为鲜卑族人。东汉桓帝时，鲜卑人在其首领檀石槐领导下，制定了法令，发展了农牧、狩猎、捕鱼等业，并在仇水（今河北怀来）建立行政中心，自分其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以西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今河北承德地区南境为乌桓之地，其中部和北部概属鲜卑所辖。熹平六年（177年）鲜卑大举南下，大败东汉军，其兵马疾悍过于匈奴，东汉东、北、西三边地区皆有对峙和冲突。

（四）高句丽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高句丽王进犯右北平、渔阳等郡，不久，即因辽东太守祭彤处理了鲜卑问题而撤兵。高句丽在今河北东北地区与东汉形成的冲突，比匈奴、乌桓、鲜卑为轻。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族

公元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为其时代的特点。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中原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有的南迁长江流域，有的北迁关外少数民族地区。迁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先后完成了封建化过程。汉族也从少数民族那里吸收了有益的东西。这种民族间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也为隋朝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北方燕赵地区，是这一历史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最为显著的地区，它的历史作用具有全国意义。

一、曹魏与鲜卑、乌桓

东汉后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地处北方据有燕赵，而且实力最强。曹操在灭袁术、吕布、袁绍群雄之后又降乌桓，统一北方，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称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曹丕代汉立魏后，辖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境内除中原汉族外，还包括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西零等少数民族，其间的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

(一) 鲜卑人统一漠南

东汉末年，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在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建立了东、中、西三部的军事部落大联盟。延时不久，鲜卑又陷于诸部林立分散状态。曹操当权时，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影响大。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轲比能令其族人向汉人学汉语，学汉字，学兵器制造术，势力强大起来。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

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二) 曹操北征乌桓,乌桓人人关定居

东汉末汉献帝初平中,乌桓人蹋顿统一了辽东、右北平、辽西三郡乌桓,之后,上谷郡乌桓也归属为一。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公孙瓒争战时,袁绍在蹋顿的支援下,占领幽州,蹋顿因此也得到了袁绍的封赐。曹操败袁绍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胁迫幽冀军民10余万户投奔三郡乌桓,欲借蹋顿之势复图冀州,蹋顿也乘势入塞攻扰。曹操为消灭袁氏余部,安定边境,开凿平虏渠以通漕运,准备粮草。公元207年亲率大军,北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蜚山湮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杀蹋顿,破柳城,袁氏兄弟出逃到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送首级给曹操。曹操将被乌桓掳去和逃往塞外的汉族百姓10余万户接回。又迁10余万户乌桓人入居关内,并从中精选,组成骑兵,仍命乌桓的王、侯、大人率领,随同魏军南下征战,“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书·乌丸传》)。后来,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秋,又遣幽州刺史兼护乌桓校尉毋丘俭率军征讨右北平郡乌桓,先时曾随袁绍奔走辽西的“辽西乌丸都督”也率众5000归附魏国。曹魏政权对乌桓的征伐、迁居和重用,对民族的融合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乌桓逐渐与汉族融合为一。此外,曹操为巩固政权,稳定北方的统一,还对南匈奴施以征伐与招抚。他采取分化控制的策略,令其居住指定地区,分部立贵族为帅,并遣汉人为司马实行监督,从此,单于仅存虚号,“降同编户”,部落组织虽存,但已不能直接管辖其部众了,实权归于曹魏政权所委派的各部司马手中,加之一些安抚措施,匈奴部众编入户籍,与汉人长期杂居,学习农耕技术,出现了“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的安定环境。南匈奴由单一的游牧经济也兼营农业经济,南迁中原内地的一

些匈奴人,因没有土地,不少人也沦为汉族地主私家的田客。

二、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族建立的政权

(一) 北方各族建立的政权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族的统治者形成了纷争割据的局面,在 100 多年中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史书称“五胡十六国”,其实,建立政权的不只五个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割据政权也不只 16 个。在这 100 多年中,先后建立的政权计有:

匈奴族三个政权:前赵(原称汉,今陕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北凉(今甘肃大部)、夏(今陕西北部、甘肃一部、内蒙古一部分)。

羯族一个政权:后赵(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安徽、湖北、甘肃、辽宁的一部分)。

鲜卑族九个政权:辽西(今辽宁、河北一部)、代(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后改北魏,逐渐统一北方)、宇文(今河北北部)、前燕(今河北、山西、河南和辽宁一部分)、后燕(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一部分)、南燕(今山东、河南一部分)、西燕(今陕西、山西一部分)、西秦(今甘肃西南)、南凉(今甘肃西部、青海一部分)。

氐族三个政权:仇池(今甘肃东南)、前秦(都长安,曾一度统一北方)、后凉(今甘肃西北、新疆南部、青海一部分)。

巴氏一个政权:前蜀(原称成,后改称汉,今四川和云、贵一部分)。

羌族一个政权:后秦(今陕西、甘肃、河南)。

汉族五个政权:前凉(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南部、青海一部分)、冉魏(与后赵同)、西凉(今甘肃西部)、后蜀(今四川)、北燕(今河北东北部、辽宁)。

总计 7 族 23 个政权。

(二) 在燕赵地域民族政权间的纷争

1. 前赵、后赵的对峙与统治

西晋灭亡后,匈奴族统治者刘聪占有了北方大部分土地,公元318年刘聪死,刘曜乘内部变乱之机,夺取政权,迁都长安称帝,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19年,石勒反刘曜,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以河内等24郡为赵国,拥有民户29万,史称后赵。后赵羯族地位优越,时称“国人”。石勒为巩固其统治,重用汉族人赵郡张宾为谋主,采用汉族的一些统治政策,国力日强。公元321年,遣石虎进取幽州,俘刺史段匹磾,幽、冀、并三州皆归属后赵。不久,石虎又率军进讨鲜卑郁粥于离石,郁粥逃奔乌桓,石虎悉降其众,继而南下,尽收河南之地。前赵与后赵为争夺地盘,多次交战,公元329年,石勒攻灭前赵,并有关陇之地。后赵之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统治了北方广大地区,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形成北南对峙局面。石勒在位,实行过一些汉化政策。

2. 冉闵灭后赵,前燕灭冉魏

石勒死后,石虎继位,于公元335年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石虎荒淫残暴,任意迫害人民,在邺城大建宫室,筑楼台高阁,众役繁兴,加之征辽西、征东晋的穷兵黩武,终于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公元349年,梁犊率边兵起义,打击了后赵的统治者。石虎病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帝位,自相残杀,后赵大将军冉闵(汉族人)乘机利用民族矛盾,攻杀后赵皇帝石鉴,夺取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仍都邺城。

冉魏政权,排斥少数民族,大杀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史载杀死20多万人),引发了少数民族的联合反抗,公元352年,鲜卑族首领慕容儁从东北攻入冀州,冉闵兵败被杀,冉魏政权仅两年多就被灭亡了。

3. 前秦统一北方

慕容儁灭冉魏后,自称皇帝,迁都于邺,国号燕,史称前燕。前燕占据北方东部广大地区,但在北方西部又分裂为四个政权:氏族苻氏建立前秦,占据今陕西省;氏族杨氏建立仇池,占有今甘肃东南部;汉族张氏建立前凉,占据今甘肃西北;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代,占据今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

前秦苻氏政权,废除了石虎统治时的一些苛政,又以汉人王猛为谋主,整顿吏治,加强军备,发展生产,10余年间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从公元370年至376年间,先后攻灭前燕、仇池、前凉、代四个政权,统一了北方。

4. 淝水战后北方的大分裂

前秦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局面后,苻坚又于公元378年派军南向进攻东晋,企图统一全国,淝水之战为东晋谢玄所败。由于国力大伤,鲜卑和羌族上层分子,乘机脱离前秦控制,各自建立政权,3年间相继出现了后燕、后秦、西燕、西秦、北魏、后凉六个政权。分裂林立的各个政权,经过10年左右的相互战争,后燕灭西燕,拥有北方东部地区;后秦灭前秦、后凉,拥有北方西部地区;后燕与后秦东西相对。公元395年,后燕攻北魏,惨遭失败而衰落,分裂为南燕、北燕,北魏则强盛起来。北方西部,匈奴、鲜卑、汉族上层分子又扩张势力,先后建立了南凉、西凉、北凉、夏四个政权。北方又呈现分裂割据局面。各政权统治者纷争战乱50多年,使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受到极大破坏,是历史上北方各族人民极度痛苦的时期,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三) 北朝时期北方民族间的融合统一与分裂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与南朝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公元534年,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又灭北齐,至公元581年北周为隋所代。北方这140多年,历史上称之为北朝。

1. 北魏的强大及其统一北方

鲜卑拓跋部在三国西晋时期,居于今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以游牧射猎为生。公元338年,首领什翼犍建立代政权,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376年,前秦苻坚攻代,什翼犍战死,代灭。

淝水战后,前秦统治瓦解。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什翼犍之孙)恢复代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公元395年,后燕攻北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夺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要城镇,拥有黄河以北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之一。

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称皇帝——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奖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拓跋珪死后,其子拓跋嗣(魏明元帝)、孙拓跋焘(魏太武帝)承其前业,擢用汉族大地主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人担任官职,形成了拓跋贵族与汉人世家豪族的联合封建政权,国势大盛,于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使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于统一。

2.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进行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实行均田制和改革鲜卑旧俗、实行汉化政策。

均田制政策。北方广大地区由于战乱,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北魏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颁行均田制。先审定户籍,再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新的租调制。奴婢和牛都可受田。均田制在当时地旷人稀的前提下施行,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既

得利益的前提下施行,是有益于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北方大量的荒地
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业的发展,使养蚕、牧畜、酿造等农
村副业也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汉化政策。北魏统治下的中原,以汉族为主,具有较高的封建文
化,魏孝文帝在政治和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消除鲜卑与汉
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即封建化,在服饰、
语言、丧葬、通婚、吏治、门阀等制度方面都有相关的汉化规定。这些
改革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
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
用。

3. 北魏的分裂与北齐北周的建立

北魏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动摇了统治者的基础,内部发生变乱。公
元530年,魏孝庄帝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兆(尔朱荣弟)又杀死
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又为尔朱氏所握。后来尔朱氏又为其部将
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灭,高欢杀元恭,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
修为摆脱高欢所控,从洛阳出逃,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此后,
北魏分裂为两个政权;高欢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
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

公元547年高欢死,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执政,550年高洋废魏
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都邺。

西魏在汉化很深的鲜卑人宇文泰执政下,国势日盛,公元557
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
周。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采取了一些经济政治的重大举措,国
势日渐强大。

4. 北周统一北方

北齐与北周东西对峙。公元576年,北周发兵攻北齐,先占晋阳,
继又东进,577年攻陷北齐邺城,北齐亡,北方归于统一。周武帝灭北

齐后,又进军南方的陈朝,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北周领域扩大,为后来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四) 民族大融合与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

从西晋末年到隋朝初立的 270 年间,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间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民族融合,先是为北魏、后又为北周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北周的统一又为隋朝的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东汉以来陆续移居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反抗西晋的统治,但随着西晋政权的瓦解,各民族间又展开了割据称王互相攻伐的斗争,战乱不已,经济破坏,当各族人民不能生活下去时,又联合举行起义,在这种长期共同的斗争中,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或成见。同时,各族人民在生产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但又保有各自的习尚,这是民族间一种进步的自然融合过程。到北齐、北周后期,鲜卑族及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和语言风俗习惯方面,在和汉族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中已显不出多大差别了。如北魏统一北方后,中原只通行汉语和鲜卑语,孝文帝改制后,汉语就成为北方各族通行语言,北齐虽一度提倡鲜卑语,但北周统一后,汉语又成了流行语言。又如在民族习俗方面,内迁胡族的许多特点多半消失,匈奴的结发、乌桓的剃发、鲜卑的索发、羌人披发及服饰的左衽等大部消失。

另外,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割据称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也大量吸纳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作为他们建国兴业的参谋,实行一些变革,推进了汉化和封建化的进程,使胡汉民族间的界限日渐淡薄,趋于消失,为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契丹、女真、蒙古的崛起

一、契丹的兴起和辽朝的建立

(一) 耶律阿保机建国

契丹族原居于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人民以游牧和渔猎为生。唐代在这里设有松漠都督府,以组织和协调他们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当时的契丹还保有氏族社会的基本形态,分八部,王位(实为部落联盟长)由八部推选。

唐朝末年,北方战乱,许多汉人逃亡塞外,契丹也乘机入塞,俘掠汉人,这不仅意味着契丹族劳力的增加,汉人带去的农业、纺织、冶铁等生产技术,也促进了契丹经济的发展。由于契丹社会内部的发展,加上和高度发展的汉族封建经济、文化接触的结果,契丹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氏族制瓦解,向阶级社会转化。

阿保机出自契丹耶律氏贵族家庭,他俘获了大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财富增加,势力强大,击败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于公元916年,自立为帝,是为辽太祖。阿保机建国后,使用了从燕赵俘虏去的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为契丹制定一些封建的典章制度。后来又灭掉了东北方面的渤海国,拓地2500公里,获兵数十万,为南进中原准备了条件。

(二) 契丹占领河北

1. 契丹占领幽云十六州

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契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与其相邻的后唐政权实力一度强盛,遏制了辽向中原的南侵。

辽天显十一年(936年)五月,石敬瑭在晋阳叛唐,结契丹为援。

七月,石敬瑭称臣于契丹,以父事之,甘当儿皇帝。十一月,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奉送于契丹,并许岁贡帛 30 万匹。十六州为: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寰、朔、应、蔚,大部为今河北(包括京津)之地,部分为晋北之地。

2. 建燕京后的南向拓展

太宗占领幽云十六州后,诏以皇都为上京,改原南京(今辽阳)为东京,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亦称燕京,以此作为统治汉人的政治中心。辽代经营的南京城是当时辽治下的第一大城,多民族聚居,宏大而壮丽,繁富而秀美,为以后的金朝中都城和元朝大都城奠定了基础。

石敬瑭死,其子石重贵继位。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兵入大梁(今开封),在崇元殿改着汉族皇帝服饰接受百官朝贺,后晋灭亡。当太宗从大梁撤军北返时,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却在晋阳称帝,建立汉国,史称后汉,旋又进入开封。辽太宗在北返路上死于栾城。辽太宗死后,辽内部争皇位激烈,辽世宗在消除内患之后,又乘后汉藩镇内争,于天禄三年(949年)举兵南下,陷贝州,达邺都北境大肆掳掠。公元950年,后汉邺都留守、枢密使郭威举兵南下开封,灭后汉,自立称帝建后周。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六年(959年)举兵伐辽,想收复幽云十六州,只收取了瀛、莫、易三州和瓦桥、淤口、益津三关。世宗死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自立,建立宋朝。

(三) 辽与北宋争夺幽云十六州

宋太祖灭南唐统一江南后,于开宝九年(976年)九月,命党进、潘美分道进军北汉太原,由于辽军援北汉,宋军受损。十月,宋太祖死,赵光义即帝位,是为太宗,改元太平兴国,命党进等撤兵。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击败辽的援军,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汉亡。

宋太宗乘战胜北汉的威势,移师河北,意在收取幽蓟,一度包围

辽南京。辽景宗遣大军往救，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而返。经过几年准备，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再度遣军伐辽，曹彬、米信率主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田重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潘美、杨继业出雁门(今山西代县北)，宋、辽在涿州西南歧沟关和飞狐口大战，宋军败北。

两次伐辽失败，宋军已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改对辽取守势，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至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450公里、南北30—35公里的地带，疏通原有河水塘泊蓄水设寨以阻契丹。

宋朝的消极防御，未能阻止辽的南侵，统和十七年(999年)、十九年(1001年)，辽两次南征伐宋，各有胜负。公元1003年，辽倾全部兵力南伐，连克宋朝重镇。次年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北，威胁宋都开封。宋、辽议和，宋输岁币银绢30万给辽，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在燕赵形成以白沟为界长期并立的局势。

二、女真与中原

(一) 女真族建立金朝

女真族原居于中国东北，历史悠久，与肃慎、挹娄、靺鞨有历史渊源关系，是黑水靺鞨的后裔。辽灭掉靺鞨人建立的渤海政权后，黑水靺鞨改称女真。为了分而治之，削弱女真族的力量，辽统治者把一部分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留居故地的女真人，未入辽籍，称为“生女真”。建立金朝的生女真，包括几十个部落，其中完颜部较大，金朝的创建者阿骨打就出自这一部落。辽末，阿骨打起兵反辽，于1115年建立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中国北部封建王朝。公元1234年被蒙古灭亡。金朝灭辽后，于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金宣宗贞祐

二年(1214年)蒙古骑兵围困中都,金迁都开封。金以中都为国都共61年。女真崛起,迅速而猛烈,从组成部落联盟到建立王朝,只有70余年;从起兵反辽到挥师攻陷开封,只有12年。从僻处东北的一隅到拥有中原的半壁河山,只花了这么短的时间,这是历史上仅见的一例,有金一代,是中国北方的许多民族在取长补短的发展中融汇合流的一代。

(二) 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

1. 金初对奴隶的掠夺和人口迁徙

金初,女真社会处在奴隶制上升期,随着金军对辽、宋的用兵,往往把战俘分赐给有功将士作为奴隶,女真将领还经常私掠敌方的兵民为奴隶,因而激起了民族间的一些冲突。

金太祖时期为了加强金朝的统治和削弱宋、辽两朝的力量,还实行了民族间的人口交流迁徙。先是把一部分女真人迁至泰州(今吉林大安县东南)至宁江州(今吉林大余县东)一带,把准备交给宋朝的燕京等六州的汉人(尤其是豪族、工匠)迁到女真地区。后来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大,又将河南直至淮汉一带的汉人北迁河北,而把更多的河北、山西的汉人,北迁到女真地区,女真人则大量南迁。这样的人口对流,自然带给人民许多苦难,但却为民族间的合作、发展以至融合,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人口的对流迁徙中,金朝还收罗了大部分汉族官僚和豪强,争取了不少汉族文人为其效力。

2. 金代中期,女真人和汉人在摩擦和交流中实现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结合

金代中期主政的金熙宗,是在汉人文士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帝王。他于天眷元年(1138年)革新官制,揉辽、宋两朝的官制而自成一体,制定了以经义、词赋取士的制度,在依靠女真官的同时,又为汉官的起用开辟了途径,还把女真、契丹、汉人所用三种文字作为金朝的通用文字。这些改革,反映了女真族和汉族官僚合作的愿望,政

权向一元化趋势发展,这是民族间融合的结果。

金熙宗废刘豫后,金军重占燕南大片地区,直至河南、陕西,屯田而扎。金朝怕汉民谋反,于是又迁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到燕京以南地区,与屯田军结合筑垒于汉人村落之间。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又把原上京的宗室迁至中原。这样,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杂处在一起,自然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后来朝廷还提倡女真人与汉人通婚,认为这是“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3. 金宋间贸易往来密切了民族关系

金宋间在贸易方面,凡不禁者,都在沿边榷场公开进行商贸,在铜和茶方面,宋对金却控制流通,可金人通过私购,套贩了宋朝的大量铜钱,用以冶化造器和铸钱,宋对茶的北流,禁止虽严,但“民亡犯法者自若也”,茶经私贩之手仍往金流,这种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密切了相互关系。

(三) 女真和金朝对民族合作的贡献

1. 对东北地区的开发

金朝时期,搞了相向的移民运动,把北方的汉人、契丹人迁到东北,以在经济上充实女真人原居地;把女真人移到北方和中原地区,利于在政治上加强统治。阿骨打把缴获的辽朝的耕具几千件给女真人使用,大批汉人迁到东北,和当地人共同开发那里的土地。还带去了先进的冶铁、农具制造等技术,建筑了上京城,设立女真府学,在“白山黑水”间建设自己的家乡。

2. 迁都燕京,重视中原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金在完颜亮主政后,于1152年迁都燕京,称为中都(今北京)。从1150年便征集诸路民夫工匠修筑宫殿园林,使之成为北方的行政中心。明昌三年(1192年),在中都西南郊外建筑了芦沟桥,为11孔联拱的大石桥,是金代的传世建筑杰作。重建于天眷三年(1140年)的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为国内佛殿中稀有的建筑。

金代的陶瓷,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和辽的传统,曲阳的定窑、邯郸的观台窑、禹县的钧窑、铜川的耀州窑,为当时的四大名窑,所出瓷器多为精品。

印书业发达,当时印书业的中心有河东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河北的宁晋和中都等。书写、雕镂之精,纸、墨之美,都是第一流的,可见金人入主中原后文化发展提高之快。

绘画方面,张瑄的《文姬归汉图》、山西繁峙岩上寺金代壁画,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品。

金代的杂剧开元代杂剧之先河,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金章宗时问世之作,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

三、蒙古族与中原

十三世纪初,住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兴起,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时,建元朝,灭南宋,统一南北,这是自汉唐以来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

(一) 蒙古灭金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南向西夏和金展开了大规模进攻,1227年灭亡西夏。

1211—1216年间,蒙古军队攻占了金朝所辖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1214年,金被迫自燕京迁都到汴京(开封),1233年,蒙古攻陷开封,金亡。1279年南宋亡。

(二) 蒙古统一后的民族关系

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燕赵地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除了大肆抢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掠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河北赵州在战乱中“焚陷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元好问:《遗山文集·赵州学记》)。蒙古统治者把

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以为“投下”(即封地),封地内的人民,成为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移让,贡赋极其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而要收黄金。元世祖至元时,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同时又极力拉拢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他们的地位和待遇同蒙古贵族相差无几。而草原上的蒙古族贫苦牧人,则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到元中期,常有大批蒙古族贫民流亡到大都、通州等地。因此,在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甚至出现了向奴隶制逆转的现象。

南宋灭亡后,中国在元朝统治下统一了,各民族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东北的女真人、契丹人,漠北的蒙古人,西北的维吾尔人,西南的藏、彝、白、僮(壮)、苗、瑶等各族人民,都处在这个统一政权范围内。最高统治阶级所属的蒙古族,过去只局限于在大漠南北游牧生存,同中原来往不多,现在则通过驻防、分封、屯田、从政等关系,大量迁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原来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于辽金两朝的会聚融合,多数都已汉化,元朝也称他们为汉人。这时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族。他们原是居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部分维吾尔、波斯和阿拉伯人,自唐代以来就有东迁者,蒙古西征后,中西交通大开,加之元朝和中亚、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他们就大批来到中国内地,在和汉族人的多种交往中,他们仍保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汉族和其他族的新民族——回回族。回回族在燕赵地域也多有分布。

元朝统一全国后,消除了人为的政治藩篱,以大都(北京)为中心,逐渐产生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大都话。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记载,当时的大都话是把入声字分平、上、去三声,平声分阴平、阳平,从

而奠定以后燕京话的基础。同时,建立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驿站,仅漠北地区与中原间的驿站即达 119 处之多,南北大运河的重新开通,海上航运的发展,都大有益于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不少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都会聚于此,成为东方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大都会。

元朝统一政令推行于全国,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为“腹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立行中书省,开创了以行省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建制,东北三省、西南三省、内蒙古、新疆、两湖、两广、海南等地都划入有关行省的管辖之内,并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为日后中国版图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北方民族

一、明代在北方的移民与蒙古族的关系

(一) 明初对北平地区的移民

1. 洪武时期的移民

明自洪武开国到永乐十五年的 50 年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移民,这是为适应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军事上的防卫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明初对北平的移民,首先是从北部地区开始的,洪武三年(1370 年)明军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后,守将就曾上书朱元璋,请画久便之计,朱元璋下诏徙其民于固安、永清、顺义等县,废宣德府,改设宣府镇,遣将卒驻守。洪武四年三月,明将徐达迁顺宁(今河北宣化一带)、宜兴(今河北滦平县)二州之民户 17274、人口 93878 入北平州

县屯戍。同年六月,徐达驻师北平,又迁山后(指今宣化东南至辽阳这一广阔地带)民 3.58 万户、19.7 万余口,迁“沙漠遗民”(“沙漠”是当时对今晋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习惯称呼,“沙漠遗民”指北退后留下的吏民)3.28 万余户,散居北平各处屯种。这几次小规模移民,意在稳定新收复地区的局势,割断故元势力同居民间的关系,无疑也有恢复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的经济目的。

明朝对北平地区移民的扩大,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以后。这年九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疏说:“今河北(指黄河以北地区)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但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治今晋城)、潞(治今长治)二州之民往河北真定及河南彰德、山东临清等地。洪武二十三年又迁山西贫民徙居河北大名、广平及山东东昌府。

2. 永乐时期的移民

北平是朱棣起兵的根据地,即位后又定北平为京都,这就促使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迁外省居民来北平地区,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元年(1403 年)朱棣仿朱元璋“培植根本”的做法,从南直隶苏州等 18 郡和浙江等 9 省简选 3000 殷实大户,充当宛平、大兴厢长;次年,迁江南富户于永平、河间二府屯种。这一迁江南大姓事,在河间府属州县方志中多有记载。

对一般贫苦农民的迁移,次数更多,规模也大。建文四年(1402 年),朱棣刚即位就迁山西民以实北京,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万户来北京地区。在《明实录》和地方志中所记的还有:永乐五年迁山西、山东民 5000 户往上林苑监;七年,迁青州民 800 余户往冀州;十四年,迁山东、山西、湖广流民 2300 余户往保安州;十五年,迁山西民于清河、南宫等地。永乐年间,因犯罪而遣发到顺天、永平、卢龙等地的人户也不少。

(二) 明朝政府与蒙古族的关系

1. 明初的民族政策

元朝崩溃后,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留居中原广大地区,朱元璋对蒙古族的上层分子,采取任官安抚的政策,令其在政府中任职为官,对蒙古官兵,或“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或“分补侍卫”授为蒙古卫所“百户”、“镇抚”等官。对蒙古人民,则把他们迁到北京附近屯种,如上文提到的迁徙“沙漠遗民”。他们和汉人一起从事耕种,互通婚姻。

元亡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几次打击,内部分裂为三部:兀良哈部居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北部为鞑靼部;西部为瓦剌部。朱棣时又五次远征蒙古,使明王朝北边的统治得以巩固。

2. “土木之败”和“庚戌之变”

明代英宗正统时(1436—1449年)国势转弱,而蒙古实力却有发展。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率蒙军南下,明英宗带兵50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被蒙军打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败”。也先乘胜挟英宗南下抵北京城外,明臣于谦率师列阵于九门外抵御,蒙军退走。

1455年,也先为部下所杀,瓦剌部衰落,鞑靼部兴起,统一了大漠南北,其首领俺答屡次率兵南下骚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兵犯大同,继之移兵东去从古北口南下,越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明嘉靖帝向俺答求和,俺答在城外掳掠男女金帛财物而去。俺答这次进围北京,在京畿之地骚扰达八日之久,使京畿人民蒙受巨大损害,明史上称为“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

3. 明朝与蒙古关系的好转

明代隆庆时(1567—1572年),整顿了军队,多次击退了蒙古贵族的骚扰,俺答不得已转为与明朝讲和。这时明朝在张居正的主持

下,也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地方政权的关系,封俺答为“顺义王”,称他为“中国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国赤子”,俺答妻三娘子也力主维护与明朝的贡市贸易关系。至此,明政府东自辽东、西至甘肃设立了许多贸易场所(名“官市”)全部通商,此外还有蒙古族与各族民间的“私市”也设立开通。著名的马市,从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设立。马市市期为一个月,于每年末举行。马市完毕,在原地开放民市,由汉族商民与蒙古部民自由交易。马市开放后,蒙古输入的马匹数量迅速增加,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市之初的4年,宣府共贸易马匹25206匹,大同21839匹,山西14107匹,马价按等而论,分别为白银12两、10两、8两,以中马计,平均每年马价银须50万两以上。马市是官市,而民市上贸易的牲畜数量比上述官市的数量要大得多。蒙古族人民用牲畜和皮张换取内地的帛、布、米、盐、糖、茶和铁锅等生活用品。北部边境数千里地区“无烽火警”、“贸易不绝”。蒙古族与内地联系加强了,许多汉民进入蒙古草原,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与蒙古人民一起开发。俺答和三娘子允许汉人筑板升(房屋)居住。万历时,俺答和三娘子筑板升建城郭,明朝政府赐名“归化”,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

二、清朝时期的满、蒙、汉族

清代是以满族封建统治者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通过清政府的经营,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东南等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管辖的民族包括50多个,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在诸多民族关系中,北方的满、蒙、汉族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一) 圈地和投充

清朝定都北京后,满州贵族、官员、八旗将士及其家小、奴仆等涌进关内,与满族同时进关的还有从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征发

的士兵。清初，八旗士兵没有薪饷，为了安置这些人，清廷借口无主田地甚多，把近京各州县的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是无代价的掠夺京畿地区汉族农民的田地。八旗贵族为了保持和扩大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满足他们奢侈享乐生活的需要，自然渴望获取大量的土地和占有更多的奴婢。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下令，不论有主无主土地，悉行圈占。此后，圈地范围逐年扩大，借口原圈地满，又不断拨换新圈地，直到公元1669年康熙亲政后，圈地才基本停止。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总共圈占田地166838顷之多。这些田地一部分为清帝、八旗贵族、官僚所占，成为封建农奴制庄园，另一部分按丁分给八旗兵丁，作为兵丁的“旗地”。

清政府在直隶大规模圈地，并诱使、胁迫汉人带地投充入旗，给京畿地区的汉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近畿42府州县丰腴之地，一律圈入旗下，仅见于地方史志所载的被圈府、州、县就有河间、滦州、遵化、易州、安肃(今河北徐水)、满城、庆都(今望都)、良乡、涿州等。

通过圈占土地，一大批满族封建主出现，而京畿地区的汉族农民却成为“无田无家”的流民。于是，清统治者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使他们依附于满族封建主，役使壮丁编庄生产，这些投充人及其子孙丧失了平民身份，变成了满族封建主的农奴。这自然激起了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逃亡，形成流民这一严重社会问题。

(二) 北方汉族流民

由于八旗贵族的圈地占田、逼民投充，直隶等地的汉族农民只好逃荒外流出塞，成为塞外的垦荒居民。从清代初年起，就不断有内地汉族农民流入蒙古地区，开荒种地，至康熙年间，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达数十万之多。乾隆时逃荒出塞的更多，真个是“中原无旷土，提挈走乌桓”，据《承德府志》载，当时热河地区“岁偶歉，饿殍出关，流滞者踵相连”，清政府在古北口至木兰围场一带，招民垦荒

输粮。

这个巨大的流民潮,使大批中原和京畿汉族农民在塞外定籍,安家落户,与当地各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劳动,发展生产,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第三章 都城建筑

中国历史古都建置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商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市),是燕赵大地上第一个都城。西周时,蓟城(今北京市)始为燕国都城。发展到战国时代,先后建立的都城又有赵国的赵王城(今河北邯郸市)和中山国的灵寿古城(今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时间长于统一,征伐四出,王朝屡易,当时在燕赵地域建立的都城有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等。其中,邺都由曹魏首创,其形制和布局是中国都城建筑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唐长安城也吸取了邺城设计的精华。盛唐以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又一次分裂的历史,到辽宋金元时期,中国由分裂重新走向大一统,都城的发展也出现一个由西边的长安,经洛阳、开封,向南移至杭州,再向北转移到今北京的过程。辽朝设五京,定都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南京(今北京市)仅是陪都;以后占据北半个中国的金朝设五京,但国都选定在燕京(今北京市);元王朝实现中国再次统一,至元九年(1272年)把国家政治中心最终南移到大都(今北京市)。从此,直到明、清两朝皆以北京为帝都。

都城的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城邑,布局严整,气势宏伟,以帝王听政、居住的宫殿为中心,分为罗城、皇城、宫城三重,庞大的宫殿群巍

峨壮丽,城内道路纵横如棋局,王宫城四周有又厚又高的城墙,其上城楼高耸,雄浑壮丽。早在先秦科技著作《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建造国都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制、理论体系,足见中国都城建筑历史之悠久。中国的古都建筑经过历代的发展逐步周密和完善,明清两朝的都城北京和紫禁城,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都 and 宫殿群。历史古都的变迁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兴衰的反映,古都建筑则体现了中国历代生产、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燕、赵、中山国都

一、燕三都

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灭商,西周建立。周初大分封,《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其中重要的封国有卫、鲁、齐、宋、晋、燕,燕国就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燕山山地两侧,东北方已达到辽西大凌河流域,是周朝在北方重要的诸侯国。

(一) 董家林燕都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封召公奭于燕。周初燕国的都城位于今房山县琉璃河镇东面的董家林村周围,距北京 50 公里,琉璃河(古称圣水)自北而南流,又蜿蜒向东流去,燕都就建在这个河湾地带的高平台上。经考古发掘已弄清了古城的规模、结构,古都基址东西长 850 米,南北宽 600 米,呈长方形,城墙由黄土在平地上版筑而成,其结构分为主城墙(厚 3 米)、内附墙和城外平台三部分,东、西、北三面的护城沟濠也隐约可辨。在古城内还发现建造宫殿和贵族高房大厦用的板瓦。董家林燕国古都是燕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燕侯就在这座都城内统治整个封地,经营开发周朝的北方。在董家林古遗址东南半公里的黄土城村是燕侯和贵族的墓地,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有的器物上带有“匱侯”的铭文,“匱”与“燕”相通,证实了《史记》关于周初封召公奭于燕的记载。

(二) 蓟 都

随着燕国势力向东北方向的扩展,为防备山戎侵犯,约在春秋中期燕襄公时(前 657—前 618 年)已向北迁都于蓟城了。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周武王灭商后,把帝尧(一说黄帝)的后裔分封到这里,后来“燕盛而并蓟”。蓟城古称蓟丘,是由原始聚落发展而成的都邑,据《水经注》解释,城内西北角有一个突出地面的丘阜(小山岗),“因丘以名邑”。考古发掘证实,蓟城在今北京市广安门一带,这里出土过战国时期燕国建筑宫殿用的构件材料及生活用具,如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特别是饕餮纹半瓦当,均非一般居民所用之物。由北京外城西北角,东经宣武门至和平门,广安门内外,法源寺东北,陶然亭公园一带,还发现密集的汲水用的瓦井,这些遗迹标示出了蓟城的大致范围。以地理形势而言,蓟城处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端,三面群山环抱,北枕燕山、西依太行山、西北有军都山,平原沃野延展于东南面,永定河、潮白河蜿蜒穿过东西两侧,由于北有天险可守,南有水陆交通之便,于此立都无疑比董家林燕都更为理想。

(三) 燕 下 都

战国时期是七雄争霸的时代,燕国是七雄之一,为了加强南部的军事防御以扼强赵,公元前四世纪,约当战国中期,燕国又在易水旁营建武阳城,作为下都,习称燕下都,蓟城为上都。

燕下都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城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是燕国通向齐、赵的咽喉地带,整座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 8300 米、南北宽 400 米,一条 4700 米长的古河道(相传为“运粮河”)在城中部纵贯南北。在河道东岸有一道城墙,把都城分成

东城、西城两部分。西城即外城，可能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是附城，南、北、西三面有城墙遗存，南面的一段高 6.8 米，外侧有明显的穿棍、穿绳和夹版夯筑的痕迹。这些遗存为研究战国时期城墙的建筑方法提供了实证。东城即内城，近似方形，在中间偏北处有一道东西向 4460 米长的隔墙，把东城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出土丰富的文化遗物表明，东城是都城的中心，内分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和墓区。内城东北部是宫殿区，位于中心的大型主体建筑是武阳台，宫殿台基遗址高 11 米，分上下两层，夯筑而成。东西最长处 140 米，南北最宽处 110 米，是燕下都夯土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武阳台以北，依次还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构成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宫殿建在高台上有防潮防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势，宫殿高台化成为中国封建宫殿建筑的传统特点。中轴线的设计起源于人类择中对称的观念，《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种布局，不仅在宫城中如此，秦汉以后发展成整座都城的规划方式，充分体现了皇权的集中以及封建制度严格的统属关系。

燕下都是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燕昭王曾在此筑黄金台广召天下贤才，形成“士争凑燕”的局面。燕国强盛起来后，曾大败齐国，“尽取齐宝”，“雪先王之耻”，报了破燕之仇。

燕三都的建立和发展是燕国历史发展的缩影，燕都的建筑也充分体现了战国中期都城建筑的特点。

二、赵国都城邯郸

晋国是周初分封的重要侯国之一，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赵、魏、韩三国都属于战国

七雄。

赵氏政治中心最早在晋阳,赵敬侯元年(前 386 年)迁都邯郸。邯郸作为地名在商纣王时已存在,到春秋时期,是晋国东部地区的大都邑。它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平原上,不仅土地肥沃,地利宜农,而且处于南北交通大路上,并与太行山东西径道相连,既可四方交汇,又可攻可守。由于附近铁矿、山林等自然资源丰富,邯郸冶铁业也十分发达,与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韩国的棠溪(今河南西平县一带)同是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铁冶中心。邯郸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具备了作一国之都的基本条件。

赵邯郸都城分为两大部分:赵王宫城区(位于今邯郸市西南约 4 公里的大屯村)和手工业商业繁荣的居民区(位于今邯郸市区西部),总面积 1887.6 万平方米。

宫城区又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构成,平面是“品”字形。西城区近似方形,南北长 1416 米、东西宽 1392 米。城址中部有一座俗称“龙台”的高大土台,是王城主体宫殿的台基。现存地面部分呈方形,南北 288 米、东西 267 米;顶部平坦,南北 132 米、东西 102 米,高出地面 19 米。由龙台往北,还有两座夯土台,形成一条南北向中轴线,两侧又各有一座土台,当年是一个“十”字形的宫殿建筑群,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据考察,这就是赵王城的王宫。东城位于西城东侧,南北最宽处 1434 米,东西最宽处 935 米,呈长方形。东、西两城之间有城墙相隔,又有城门相通,在城门附近,南北各有夯土台一座,俗称“南将台”、“北将台”,与其他夯土建筑遗址构成另一组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北城平面形状不甚规则,在东、西城的北面,因规模小,又称小北城,东西宽 1326 米、南北长 1557 米,城内有两座高大夯土台,是宫殿建筑基址。整个王宫区出土的遗物有布纹或方格纹瓦片、斜绳纹筒瓦、素面平瓦当、四叶走兽纹圆瓦等,这些都是宫殿式建筑所用的材料。

战国时期的邯郸是北方最大的都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上说:“邯郸郭纵以铁冶为业,与王者埒富。”一些成语典故如“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完璧归赵”、“胡服骑射”等,其素材都源于邯郸,留下了古都的印记。

三、中山国灵寿故城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一个小国,初建都于中人城(今河北唐县境内),夹居于燕、齐、赵之间,疆域不大,而武力强盛,前 323 年称王。“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于前 408 年发动了兼并中山的战争,《战国策·秦策》记载,魏“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中山武公时亡国,下一代中山桓公时又复国,重新振兴,并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北)。

灵寿故城在太行山东麓,北依东林山、牛山,南临滹沱河,距今灵寿县城约 10 公里。城址呈不甚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约 4.5 公里、东西宽约 4 公里,城墙依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地面已无遗迹可寻,从地下夯土情况分析,城址分东城、西城两部分,其间有一道隔墙,城墙最宽处为 35 米,隔墙最宽处为 25 米。

东城区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发现有制陶、铸铜、冶铁和制骨、石、玉器的作坊遗址。西城区中部偏北另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北为中山王墓区,南为商业区、居民区。在墓区已发掘迁都后第三代国君王𪚩的陵墓,出土很多金、银、铜器物以及陶器,在一件铜圆壶上还记有制器年代、督造官吏及工匠的名字。同时,制器的造型优美、生动,铭文构字清晰秀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第二节 古都邺城、平城

一、曹操始建邺都

曹操，字孟德，是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曾领兵镇压黄巾起义，不断扩充个人势力。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于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大破世族军阀袁绍以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二十年（216年）封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邺城遗址在今临漳县西南部邺镇附近的漳河两岸，西北距县城约20公里。春秋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始筑邺城，汉时是魏郡的治所，曹操始都于此。经过前几代的建筑，邺城已具有一定规模，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又徙汉中民8万余口分别安置于洛阳和邺城，使邺城人口得到充实。在建筑上也不断发展，建安十三年开掘“玄武池”以教习水军；十五年起在城西北相继修筑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并凿渠引漳水入白沟通黄河，以方便邺城交通，充足水源，灌溉农田；建安十八年又始建宗庙。都邺之后曹操继续修造楼阁殿宇、苑囿池榭，同时发展手工业、商业，并设府衙机构，加强都城的政治功能。邺城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城内一条东西向街道将城区一分为二：北区集中了宫殿、衙署、苑囿及皇戚贵族的府宅等大型建筑，南区是手工业、商业和一般居民区。城四周共有7座城门：正南3门、正东1门、正西1门、正北2门。

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记载，邺都宫内建筑以文昌殿规模最大，是朝会宾客、享群臣、正大礼的场所。殿前东西有钟楼、鼓楼，文昌殿东边修筑听政殿，殿外列有听政阁、纳言阁、尚书台、升贤署、谒

者台阁、符节台阁、御史台阁、丞相诸曹等衙署。听政殿后有鸣鹤堂、高石堂、楸梓坊、木兰坊等建筑，皆属后宫掖庭。

城内有街渠、里间、府寺之设。东西南北城门之间有通衢，街巷间整齐划分若干闾里，如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戚里等，这些里坊都是官宦显贵的府第所在。衙署府曹设有相国府、御史大夫府、少府寺、奉帝寺、大农寺、太仆寺、中尉寺、大理寺、太社、郎中令府、宗正寺、卫尉寺等。虎贲、羽林、五营兵士驻扎城南。秦汉时，官署多布列在宫城外与民居杂处，自曹魏邺都起，都城内的衙署开始出现集中的趋向。

在城外，有多处囿苑、池台，如玄武苑、玄武池、芳林园、灵芝园等，主要分布在城西。

古邺城在漳水南岸，早在战国时魏国西门豹、史起引漳水灌田，曾促进了农业的进步。曹魏以邺城为“王业之本基”，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左思作《魏都赋》描述邺都的农业是：“澄流十二，……畜为云屯，泄为行雨，水澍梗稌，陆蒔稷黍。黝黝桑板，油油麻纴，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邺城的工商业也繁盛：“廓三市而开厘，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闾闾以襟带。”左思的赋不免铺陈，但也绝非虚构，反映出了邺都的繁荣。

220年，曹操长子曹丕正式建立魏国，定都于洛阳，遂称邺城为北都，史称邺北城。

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邺都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而北方自西晋末，各族人民起义交乘迭起，匈奴、羯、氐、鲜卑族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乘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邺城虽经几度兴毁，却一直未衰落，仍作列国都城。

(一) 后赵都邺

羯族人石勒在公元 319 年称王建国,史称后赵,是十六国之一。石勒先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市)立都,其继承者石虎迁都于邺。据《晋书》记载,汉人谋士张宾曾指出,“邺有三台之固”,“有喉衿之势”,是建都之地,石勒遂令少府、都水使“监营邺宫”。石虎称帝后,继续大兴土木,工程浩大,在邺北城进行大规模建筑,起台观 40 余所,并营造东、西二宫,共动用民力 40 万,为扩建芳林园及邺城北长墙,调发民男民女 16 万,车 10 万乘。

后赵时邺北城基本格局没有明显变化,改建新建较多,据《历代宅京记·邺》记载,原外城门有 3 座南门,石虎特别“崇饰”其中的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作层观于其上。又于楼置二铜凤,头高一丈六尺,穷高极侈,尽天下巧”,“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足见其高大壮观。同时,在东城上新建东明观,在北城上建齐斗楼。在宫内,营造东西二宫,原文昌殿已焚毁,在故址上营建东、西太武殿,这是正殿,帝王朝会宴享群臣都在这里举行。在两座太武殿后面又建有东堂、西堂、东阁、西阁,属宫寝便殿。这组宫殿建筑群构成了东宫。太武殿台基高 2 丈 8 尺,东西 70 步、南北 65 步,以纹石砌造,下穿伏室,可置守兵 500 人。殿皆“金漆图饰”,檐角挂金铃,银楹金柱,以铸铜为柱基。殿内陈设更为豪华,白玉黄金、珠帘玉璧比比皆是。后赵在铜雀台的东北又营建西宫,名九华宫。宫中正殿称显阳殿,大殿后又有灵凤台 9 座殿,宫嫔居于其中,故总名九华宫。宫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余人,女鼓吹、羽仪、杂使、工巧众多。九华宫北建逍遥楼,登楼北望漳水,极目游嬉。逍遥楼北又建披云楼,“绣栏凌云,彤梁接雾,故曰披云”。

在城外,后赵也大兴扩建。在城外西部,扩建芳林园,改称华林苑,新建观台、戏马台,用以操练军马。在城外南部建桑梓苑,内多桑木,石虎耕籍田于此。苑内建临漳宫。在城外北部新建永乐宫、赤桥

宫等,皆为游猎而设。在城外西北 2.5 公里还修渠灌田。战国西门豹为邺令时作 12 渠,石虎修西门旧迹,其流 10 公里,世号“天井渠”。

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王朝,吸取中原之制,以邺为都 19 年,邺北城又有了很大发展,宫殿台阁林立,高楼连云,比曹魏时更加巍峨宏伟。以后,北魏王朝建都平城也模仿了邺城建筑。351 年后赵亡,部分宫室被焚毁,邺城的再度辉煌,起自东魏。

(二) 东魏、北齐的邺南城

北朝时期,北魏鲜卑化汉人高欢事权极重,534 年废孝武帝,由洛阳迁都于邺,立孝静帝,史称东魏,拥有洛阳以东原北魏之领地。因邺北城窄隘,残破狭小,故增筑邺南城,北齐也因循续建。

邺南城建筑兼取洛阳、邺北城之制,而“规模密于曹魏,奢侈甚于石赵”。城东西长 3 公里、南北 4 公里,城周环 12.5 公里,以邺北城南城墙为邺南城的北城墙,有城门相通。其他 3 面共设 11 座城门:南 3 门、西 4 门、东 4 门。

宫城内以太极殿为主建筑,殿周环 120 柱,台基高 9 尺,门窗以金银为饰,椽栿斗拱,尽以沉香木造就,椽端饰以金兽头,台阶石面刻“千秋万岁”字样及奇禽异兽图形,殿瓦涂胡桃油,光辉夺目。大殿东西各有配殿,名太极东堂、太极西堂。在太极殿后又建昭阳殿,殿东西有长廊,廊上置楼。大殿周环 72 柱,基高 9 尺,以纹石砌造,门窗饰以镂金,栏杆皆用沉香木。梁拱间刻画奇禽异兽,或蹲或踞,或腾逐往来,椽首雕以金兽。大殿的东、西两侧有阁,由长廊相通,东阁内建含光殿,西阁内建凉风殿。以上两大殿是朝会群臣、接见外国客使的场所。后宫妃嫔则居于昭阳殿后面的宫院,通过“永巷”,跨过五楼门就进入后宫,内设显阳殿、宣光殿、镜殿、修文殿、偃武殿、圣寿堂、玳瑁楼、后园等建筑,装饰豪华,凡殿皆用玉石点缀,大小铜镜万枚,又以曲镜抱柱,入夜数十步之外犹可见光。四壁丁香末涂抹,殿顶以胡桃油漆瓦,四面垂金铃万余枚,风起铃声响彻方圆 10 里。

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 400 余坊,“四民辐凑,里闾闾溢”,达官显贵宅第星罗棋布,大司马府、御史台等衙署主要分布在宫阙之南,市场分设于东部曰东市、西部曰西市。苑囿建筑也奢于后赵,在铜雀台西、漳水之南筑游豫园,“为射马之所”,南城外建清风园,为官用蔬圃。旧华林园重加增饰,若神仙所居,更名为仙都苑。苑中土山以五岳名之,五岳之间,分流四渎为四海,汇入大池,曰大海,水深可行船,周游 12.5 公里。池中建有水殿,周环 12 间,基高 2 尺 4 寸,广 2 丈 9 尺,殿脚船两支,各长 5 丈 2 尺,上建步廊,周环 44 间,梁枋皆彩画。

邺都建筑毁于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从 1958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邺都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并分别绘出了《曹魏邺城复原图》、《后赵邺城复原图》和《东魏北齐邺南城复原图》。考古证实,城址范围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邺城的形制、布局在曹魏时已形成,城建以中轴线为基准,对称均匀,呈棋盘格形状的封闭式规划,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都城建筑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从皇宫布局看,在邺北城听政殿后、邺南城昭阳殿后都是后宫所在,这种前朝后寝的定制在邺都已经形成。所有这些重要成果,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建筑规划、建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北魏建都平城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王朝,初称代国,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 年)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天兴元年(398 年)始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叫代都。随着国势的发展,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 年)迁都洛阳,因平城在其北,故为北京,平城与洛阳并称“二都”。

北魏道武帝初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地当游牧地区,适应了鲜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习俗和国力尚处单弱的初期状况。后因向农业区拓土的需要,国都也向南迁徙,但又不能远离发

祥之地,故处于半农半牧地带的平城是最理想的地方。平城在今大同市东北部附近,位于山西省北部,北拒阴山,南控太行,桑干河流经其南,地势平坦,既宜农耕又宜游牧。西汉在这里置平城,北魏新建的平城在汉平城的西北,其建筑布局、形制仿中原之制,《魏书·莫题传》载,北魏初“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雒阳(洛阳)、长安之制”。这是北魏进一步封建化的一个体现。当时,还有大批山东六州汉民和精工技巧徙居平城及其附近,参与了都城的建设。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转引《魏书》、《水经注》的记载,平城是经几代皇帝陆续修建而成,载于史书的殿堂楼台就有四五十座。天兴元年(398年)始建宫室、修文庙、立社稷,次年宫城四周筑城门12座。皇帝临政朝会的正殿有天文殿、永安殿、太极殿等。孝文帝为修建自己的听政大殿——太极殿,特派汉族画家、工程学家蒋少游到古都洛阳,“量准魏、晋基址”回平城营造。太极殿左右有东、西堂,太和殿东接东堂,殿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是皇信堂。孝文帝时期,一部分封建化改革措施是由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冯氏主持推行的,而皇信堂就是太和七年(484年)专为冯太后建立的坐朝听政之所,殿内有壁画,“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是北魏以孝文帝为首的改革派为推行其汉化政策而作的。《魏书·高祖记》:“太和十六年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皇信堂及其壁画,在宫城中具有不寻常的政治意义。

宫城南接郭城。北魏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这是一般居民区,也是手工业、商业区。《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城内筑坊是汉制,坊与坊间有封闭式围墙,并有巡逻士兵“司察盗贼”,以维护统治秩序。平城原是北方边城,北魏时期是古都平城最繁荣的时期,这一带人口增加很快,鲜卑、匈奴、羯、高车、汉等各族人民相互杂居,成为北方各族人民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古都的宏伟建筑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晶。

第三节 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

自秦汉以来，活动于西北方的匈奴人、突厥人或远迁，或与其他民族融合，唐末五代以来，契丹族崛起于东北，以后又有女真族、蒙古族人相继强大起来，并浸寻南下，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随之由西北逐步转移到东北方。

一、辽朝陪都——南京城

契丹族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之一，是鲜卑族的一支，最初生活在潢河（今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早在六世纪前后，契丹就与幽州地区发生经济关系，916年阿保机正式登基，立国号名契丹，是为辽太祖，辽太宗时又改国号名辽。938年，辽从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手中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地，遂升幽州城为辽朝陪都——南京。

幽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蓟城自为燕国都城后，城址并无变化，秦汉以后是北方重镇，隋唐称之为幽州城。据《元和郡县志·补志》记载，城南北7里，东西9里，周长32里，东城墙在今宣武门西侧，南城墙在今白纸坊大街以南，西城墙在今莲花池东岸，北城墙在今新文化街一线偏南，四面城门共12座。辽就在此基础上扩建为南京城。

辽朝先后设五京府，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这是维系其政治、军事统治的重要措施。辽帝有四季以帷帐为行宫，巡幸行猎、处理朝政的传统，谓之“捺钵”，南京

虽是四时“捺钵”中的一个地点,但它是辽朝势力范围中政治、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它的地理位置也具备易守难攻,便于继续进取中原的条件。南京自 938 年建立到 1125 年辽亡,在长达 187 年的历史中,一直是辽国南境的政治中心,它在推动辽朝封建化,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辽南京总体位置在今北京市广安门和宣武区一带,北垣在今白云观后,南垣在今白纸坊,东垣在今烂面胡同至法源寺之间,西垣在会城门至莲花河东岸。《辽史·地理志》记载,城高 3 丈,周 36 里(据今考证,实 11.5 公里),衡广 1 丈 5 尺,有敌楼、战櫓具(一种侦察或攻防用的高台),城门 8 座,东名安东、迎春,南名开阳、丹凤,西名显西、清晋,北名通天、拱辰。皇城在都城的西南部,这是古燕都的宫殿区,方圆 5 里,设 4 门,独南门两侧有左右掖门(即旁门)。皇城内紫微殿、元和殿、永兴宫、积庆宫、延昌宫等 10 余座宫殿,其中元和殿是朝会大典的场所。皇城东北隅有燕角楼,城西南隅有凉殿,殿身三面敞开,是一座独具民族风格的高层建筑。塞北契丹人不习中原酷暑,故建凉殿以纳凉,同时还可登高眺望城郊景色,或阅兵操练,或观望南城外毬场比试的场面,凉殿为中原其他都城所未见。城内有四通八达的街道,居民住宅分布在 26 个坊内,名称沿用唐时旧称,多带民族地方性,如“鬲宾坊”是唐代西域国名,“肃慎坊”是东北女真族的古老称呼,“归化坊”取“四夷”归顺教化之意等等,反映出辽南京城处于多民族地区的特点。宋使臣路振写的《乘轺录》载“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上署其额”,王曾的《上契丹事》载“城中坊门皆有楼”,可知南京城的里坊规划严整,标记鲜明。

市场设在城的北部,《契丹国志》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都市商业很繁华。早在唐时,幽州城已是各族商品的集散地,在城北部有固定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称为“幽州市”,行业繁多,如大米行、肉行、果子行、炭行、铁行、油行、染行、绢行、杂货行等。辽南京

的北市仍是沟通关内外经济交流的聚散点,并有新的发展,市场上通行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钱币。

辽朝笃信佛教,南京佛教之盛又为五京之首,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说,燕京大的寺院“三十有六”,小的难以计数。南京比其他京城更具备发展佛教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城内著名佛寺如延寿寺、延洪寺、悯忠寺等都是皇帝及太后、后妃们经常素服饭僧的地方。在城西南的大房山云居寺有辽代雕刻的石经数千方,至今保存完好。

辽南京还是使节、客商频繁往来的地方,馆驿建筑也较多,辽最高统治者在这里接见过高丽、日本及西域诸国的使者,这种扩大到海外的友好交往在北京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二、辽朝上京、中京、东京、西京

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是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其建筑多参照南京规制。天显元年(926年)用汉人工匠“展郭郭、建宫室”,太宗时又依汉制于殿中行登基之礼,改皇都为上京。《辽史·地理志》记载,外城高2丈,幅员27里,东门3座,西门2座,全城分南北两部,皇城位于北城区,城高3丈,有楼橹,四面各设1门,大内设东、西、南门,主要宫殿有开皇、安德、五鸾。“南城谓之汉城”,城中一条大街,阁楼左右对峙,下列井肆,是一般手工业、商业区和居民区,城内汉人“并、汾、幽、蓟为多”,这是一座各民族杂居的都城。据考古发掘,上京周围约14公里,皇城位于北半部,宫殿遗址仍较清楚,大内之南有大道直通汉城,官署、佛寺、作坊等建筑分布在大内之东和东南。汉城建筑则显得卑陋,城内多民用住宅和作坊。出土文物有中原地区产品及上京仿中原制品,如仿白定瓷,还有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如辽三彩、鸡腿瓶等。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是由辽太祖挑选的能工巧匠建造,所有

“郭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辽史·地理志》）。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实以汉户，号曰中京”。都城由外城、内城、皇城三部分组成，外城南北长 3500 米、东西宽约 4200 米，周长 15400 米，考古发掘与《乘辂录》所载“幅员三十里”之数大致相符。外城的南部为坊市，有长廊式建筑，是集市贸易场所，一条宽 64 米的笔直大道贯穿于外城南墙正中的朱夏门至内城南门正中的阳德门之间。此外还有经路 3 条、纬路 5 条，东西两侧布局对称，井然有序。皇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宫殿遗址尚存。这座辽中期建筑的都城完全模仿北宋都城开封府制度，是辽圣宗在辽宋“澶渊之盟”之后用宋朝提供的资财和燕云的工匠建筑的。

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城墙上设敌楼、棚橹具，周 20 里，城门 4 座，城内中心建筑仍是位于城北部的原北魏宫殿，新建筑主要有华严寺、天王寺等。

东京（今辽阳）是辽太祖修葺辽阳故城而建。城有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高 3 丈，有楼橹，幅员 30 里，每面城墙有两座门。宫殿区在内城的东北隅，高 3 丈，具敌楼，南面设 3 门，上建楼观，四隅有角楼，大内有二殿，不置宫嫔。“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有看楼，晨集在南市，夕集在北市。

辽所设五京为金朝京府的设置和建筑打下了基础。

三、承前启后的金中都

1115 年女真族建立金朝，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称上京。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位时，金朝已经拥有富庶的中原地区，经济上呈现“春风北卷燕赵，无处不桑麻”的景象（金文学家蔡松年诗）。为摆脱上京女真族守旧势力的束缚，进一步推行汉化，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并继续南下扩大领土，金海陵王于贞元六年（1153 年）

决定迁都于燕。因“燕”是春秋古国名，故改称中都，寓介于东京与西京之中的意思。定都之后，海陵王惟恐本部宗室“图己”，遂将诸亲王、宗室贵戚尽行由上京徙燕，形成了又一次女真人“比屋连屯”浩浩荡荡的大规模内迁活动。中都是当时北半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它在都城建设史上是从作为辽朝的陪都向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元大都的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都于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开始在辽的基础上“增广燕城”，建筑材木取于正定风景园林潭园，筑城用涿州土，每人持一筐，一字排开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几十万民夫日夜劳役，不胜其苦，致使疾疫流行，金廷令燕京周围500里内所有医师赴京，但民工仍不免大批死亡。中都城以及历代都城的修建，不知付出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生命。

中都是在辽旧址的基础上，仿北宋制度扩建新建的，迁都之前，金海陵王已遣画工去汴京描画宫室图样，并命左丞相张浩按图修造，历时3年建成。整座都城分大城、皇城、宫城三部分，最外是大城，在东、西、南三个方面比辽南京城大大扩展，唯北城墙未变，城周约17.5公里，大体位置相当于今北京市城区的西南部，即宣武区西大半部，略呈方形。城门12座，每面3座，东名施仁、宣曜、阳春，南名景风、丰宣、端礼，西名丽泽、灏华、彰仪，北名会城、通玄、崇智，至今北京仍有会城门的地名。皇城位于大城中部的前方，周围约4.5公里，故址在今广安门以南，呈长方形，城门4座，南门名宣阳，北门名拱辰门，东门名宣华门，西门名玉华门。全城共分62个坊，中都西南为园林寺观，东北为商业区。宫城又在皇城之中，正门为应天门，城内有宫殿9重，楼36座，金碧交辉，宏伟华丽。其中大安殿是大内主殿，为举行重要仪式、庆典活动的地方。殿坐落在3层露台上，殿面阔11间，东西两侧各有小亭，两旁各有朵殿5间。东西朵殿旁各有行廊4间，与东西侧的行廊相连。殿中设宝座，后照壁画龙，顶有金龙盘绕。殿后是

便殿,即香阁,为单独召见大臣议事处。大安殿北是仁政殿,面阔9间,两廊各30间,殿两旁各有朵殿,金皇帝常在仁政殿临朝听政。都城外有日月天地4坛,坐落在东西南北四方,据《金史·地理志》载,城外大路夹道植柳,延伸百里。金中都比辽南京更富有帝都的宏伟气魄。

金世宗、章宗热心离宫别苑,建多处皇宫花园,其中在东北郊外的大宁离宫是仿北宋的艮岳(位于汴京东北隅的叠山园林)而建的,主要建筑在湖中的琼华岛上(今北海公园白塔山),顶部有广寒殿,以后元大都的宫殿就是环绕琼华岛建筑的。中都的西南有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上,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突出了中都在南北交通上的意义。

除中都外,金朝前期都城是上京,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其他还有东京(今辽宁辽阳市)、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这些京城比旧城稍有增益,基本保持了原有规模。

自唐末以来,幽燕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价值愈加显著,金保大军节度使梁襄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金史·梁襄传》)其后,元朝兵马都元帅霸突鲁也曾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元史·霸突鲁传》)北京作为京都就从金元起连续沿袭下来,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都城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建筑也更加辉煌壮丽。

四、元上都和元大都

蒙古族在唐代称“蒙兀室韦”,约八世纪时游牧于斡难河、怯绿连

河之间,1206年由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正式建国。1235年建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东哈尔和林),蒙古大汗用从汉地带回的精工良匠从事设计建筑,宫室、邸宅全仿汉族式样,这在漠北的历史上是空前的。随着蒙古势力日益深入中原,汉地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元朝的立国根本,其都城也随之南迁。

(一) 元上都

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命皇弟忽必烈治理漠南汉地,汉族儒士刘秉忠等支持忽必烈将政治中心南移,在恒州东、滦水之北的龙岗修筑城郭宫室,三年竣工,初称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为元世祖,以开平作临时都城,在至元元年(1264年)又加号“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忽必烈此举意在重用汉人行汉法,以巩固新附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考古发掘上都遗址,城墙、街市、宫殿、寺院、官署、苑囿、民居等建筑遗迹都明显可见,在内城有整齐的道路,正南街为中心线,左右各有小街,大街宽25米,小街宽15米,街两旁建筑台基很多,当年店铺毗连,市井繁华,《元史·廉希宪传》记载,上都经常发生火灾,“延烧民居”,说明人口和建筑的密集。在外城的东、南、北三面有关厢,街巷随地势起伏向外伸延,东关外居民区连绵800米。

上都主要继承了中原之制,也具有地方民族特征,如在城墙以内设置大面积的苑囿,是元代首创,宫城前面布置广场,也是城建史上所少见,尤以城区内遍布毡帐、板屋,随需而迁,更是独特之处。以后,元世祖及其继承者移政于元大都,上都仍是巡幸之所,元帝每年在此避暑处理军国政务。

(二) 元大都

元世祖即位的第二年就准备将政治中心进一步南移,着手修复被兵火所毁的金中都。至元元年(1264年)称之为中都,暂作都城,至元四年(1267年)决定在中都旧城的东北方营建新都,这是元世祖革

新政治,进一步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建立全国统一王朝的重要步骤,此时,南宋政权已难支撑,而蒙古军兵威正盛,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宣布建“大元”国号,至元九年(1272年)定都,改中都为大都,元王朝的政治中心终于完成了从山遥水远的北方深入到中原地区的历史过程,中国古都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今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地位,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

元大都的设计者是刘秉忠,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少为僧,后得忽必烈重用,“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①。他对天文、地理、经学、律历、工程各学无不精通,规划元大都按《周礼》古制,参照长安、开封等古都的营建经验,并有所创新。自1267年始建,1285年告成,历时18年,是唐长安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宏伟都城。《周礼·考工记》对都城的理想设计,到元朝才第一次得到比较完整的实现,为以后明、清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

1. 新都的选址和外城范围

元朝放弃金中都旧城,而另建大都新城,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金中都宫室因战乱已荡然无存,难以修复,而且规模不够宏大;二是旧城的东北郊有比较充足的水源,湖泊相连,有积水潭、太液池,金朝已在此辟建琼华岛,造大宁宫作离宫别苑,更重要的是能为新都的水运提供有利的条件。

金中都的供水主要来自今北京西南郊的莲花池水系,水源有限,不能满足水运的需要,通州(今北京东)的漕粮始终靠陆运至都。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不久,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就提出改造中都水利,别引玉泉山水通过瓮山泊、高粱河以通漕运的建议。郭守敬,元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少年受教于刘秉忠,习天文水利,以后作出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

了重大贡献。元大都就是利用高粱河水系,以大宁宫的湖泊为中心,营造新宫室规划大都城,这一选择直接关系到大都的方位和建筑的布局。

大都城坐南朝北,呈规则的长方形。据考古证实,它的南墙在今北京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城墙及东西城墙的北段在安定门外2500米的小关一线,东西城墙的南段与明清两朝城墙一致,周长实测约为28600米,墙体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24米,底、高、顶的比例为3:2:1。在夯土中使用“永定柱”(竖柱)和“纆木”(横木)加固,为防雨水冲刷,在土城顶部中心置半圆形瓦管,墙表不包砖,用芦苇铺盖,故又称“蓑城”。城门11座:南门3座,正南中央名丽正门(今天安门南),南右门名顺承门(今西单),南左门名文明门(今东单);北门2座,东名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西名健德门(今德胜门);东门3座,正中央名崇仁门(今东直门),东右门名齐化门(今朝阳门),东左门名光熙门(今和平里);西门3座,正中央名和义门(今西直门),西右门名肃清门(今北师大西),西左门名平则门(今阜成门)。大都的四角建有巨大的角楼,城外部建有加强防御的“马面”(又叫墩台)以及护城河。1969年在拆除西直门时,发现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这座门洞已不是木构的“过梁式”,而是砖券门洞,在当时属于新技术。

2. 宫城和主要宫殿

大都的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偏西,宫城偏居皇城的东部,周长8800米,它的南门即崇天门,是宫城正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北门即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东边和西边的城墙在今故宫东、西两城垣附近。4座门以崇天门最宽阔,11间,各门全是朱户、丹楹、藻绘、彤壁,以琉璃瓦饰檐脊。宫城西角耸立角楼,蔚为壮观。宫殿群分布在琼华岛和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周围。池西有两组辉煌的新宫殿,偏南是隆福宫,内有光天

殿、文德殿、偏北是兴圣宫，宫内有奎章阁、延华阁、畏吾儿殿，分别为太子和皇太后住所。岛的东面，是元大都的“大内”，即今北京紫禁城的前身，从午门进入大明门，主要建筑是以大明殿为主的一组宫殿群。大明殿 11 间，殿基 3 级，绕置雕有龙凤图案的汉白玉阑干，殿楹的四面皆有方形大柱，装饰金龙、花卉和云朵图案。殿内装饰也极华丽，这是元帝登基、正旦、寿节、朝会之所，殿中设七室云龙御榻，并有帝后的宝位，这在中国唯元朝有帝后与皇帝并坐临朝之仪。殿后有柱廊 7 间，柱廊后是寝宫 5 间，后连香阁 3 间。大明殿东有文思殿，西有紫檀殿，以紫檀构筑而得名。大明殿寝宫之后有宝云殿，殿左是钟楼，殿右是鼓楼，又称文、武楼。

历代都城皆设宫廷广场，位于宫城正前方。元大都突破这一传统，将广场移建在皇城的正前方，加长了广场与宫殿间的距离，收到了增强层次感，突出巍峨的宫阙，使气氛更加森严的效果，为都城建筑开创了一个新格局。

妃嫔住所的主建筑是延春阁，位于宝云殿后面，9 间，东西 150 尺，进深 90 尺，高百尺。阁后有柱廊 7 间，柱廊后是寝殿，7 间，殿后有香阁。毗邻的还有延春宫、文思殿、清宁殿、宣文殿。元代寝殿逢冬季在殿外用皮帐围护起来，夏季改用黄油绢帷幃，以使寝殿冬暖夏凉，四季宜人。香阁设楠木寝床，阁东有慈福殿、东暖阁，阁西有明仁殿、西暖阁，另有玉德殿、东香殿、西香殿、宸庆殿等相互连属，群殿宏伟壮丽，规制严整，豪华精饰。

元代宫殿建筑的特点是前后两组宫殿构成一个单元，每组各有独立的院落，而每一座宫殿又分前后两部分，中间用穿廊连为“工”字形，前为朝会之所，后为居住之所，殿后往往建有香阁。宫殿建筑穷极奢侈，使用如紫檀、楠木和各种彩色的琉璃等贵重材料。在装饰上，用方柱，朱色绘金龙，四壁吊挂毡毯、毛皮或丝质帷帐，这是游牧生活习俗在宫中的反映，也是受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影响的结果。宫城内

还有盪顶殿、畏吾尔殿、棕毛殿(用棕毛代陶瓦),为以往历代宫殿所未有。^①

在皇城北有海子,又名积水潭(今北京市什刹海一带),西北诸水皆汇流于此,构成高粱河一带的天然湖泊。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运河工程,从昌平神山引白浮泉水导入积水潭,然后东流至通州白河,全长80余公里,元世祖赐名“通惠河”。从此由杭州至大都的南北水路大动脉畅通无阻,漕船可直抵大都,每年漕米500万石。在海子东岸有中心阁,一块有“中心之台”四个字的刻石立在一个一亩见方的台座上,其位置正是大都城的几何中心。中心台之设充分证实,大都城确是预先有图样,按规划兴建的。宫城有一条中轴线,延伸到全城,构成了从外城的正南门(丽正门)到中心阁的一条南北中轴线。大明殿、延春阁两组主要宫殿正建在这条线上,其他殿宇建在轴线的两侧,形成左右对称的布局。统观大都城布局,宫城位于中央,宫城正东有太庙,正西有社稷台,宫城正北中心阁周围是商业集中的地区,完全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说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古制,这是元大都在总体规划上最为突出的一点。

3. 街道坊巷和市场

大都城内的街巷如棋盘式笔直纵横交叉,这是由城内的中轴线和各城门间加辟的南北、东西各9条干道构成的。由于中轴线是南北向,所以南北干道占主导地位,两侧排列的东西向街道和胡同都是平行的,一般大街宽24米,胡同宽6—7米,只有从中心台向西,沿积水潭东北岸是一条全城唯一的斜街。居民住宅则分布在胡同的南北两侧。胡同自元朝开始出现在中国北方城市,尤以大都为最多、最典型,起着沟通居民院落和交通道路的作用,并且具有社会性功能,便于政府的控制,胡同历经明、清、民国,乃至今日,构成北京城一大特色。元

^①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1984年版。

大都全城划分为 50 个坊,这个规定出自元奎章阁侍学士虞集,取“易经大衍五十义”的内涵。坊的名称也有寓意,如“日中坊”,指日中为市的地方;“金台坊”,指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之意;“澄清坊”,因地近御史台,故有澄清世间的含义。元代的坊与隋唐以前的坊已有不同。比如隋唐的坊有围墙封闭,中国古代这种制度发展到宋朝时,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取消了宵禁,封闭的坊墙渐渐不复存在。元大都的坊就不再建坊墙,以街道作主要界限,呈敞开式,坊已成为行政管理上的地段名称,直属左右警巡院管辖。元代的中央衙署也散布在全城的坊区,体现了传统的五行及形胜观念。到明朝,中央衙署改为集中在宫廷广场上,则又象征中央集权的强化。

市场主要分布在三处:一是积水潭东北岸的斜街,属日中坊,因是大运河的终点,水运便利,故商业繁荣,市场一直延伸到鼓楼一带;二是十字街,即今北京东四(牌楼)西南,在明照坊内,正位于东城的适中地方;三是西城的适中地方,即今北京西四(牌楼)附近,有羊角市,是羊、马、牛、驴骡、骆驼集中交易的场所。此外,在丽正门有菜市,和义门有果市,文明门有穷汉市,其他还有米面市、杂货市、鹅鸭市,不可胜数。

元大都还是一座科学、文化繁荣的国际性大都市。元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坐落在皇城的东北部;代表元朝天文科学最高成就的“授时历”由郭守敬创制,所筑“司天台”位于城的东南部;元曲大家关汉卿的创作生活绝大部分是在大都度过的;佛教、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及教派在大都可以并存,元廷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不同风格的庙宇在城内耸立争辉;来自欧洲、中亚、南亚、非洲的使节、客商不仅带来了各国的商品,也把医学、天文学、数学、音乐、舞蹈及多种精湛手工业技术传到大都,由尼泊尔人阿尼多设计建造的白塔寺至今屹立在北京西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凡世界上最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

这里找到。”他盛赞元大都是“一个又大又繁华的古城”，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汗之城”。

元大都在建筑上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技术和风格。气势雄伟的元大都是民族融合的优秀成果，是强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象征。

第四节 明清的京师——北京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辉煌壮美，它继承了历代都城建筑的丰富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都城中心的紫禁城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宫阙，在世界现存的宫殿建筑群中也是少有的。

一、北京城的兴建

(一) 永乐帝迁都北京和内城的迁移

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王朝在前一年已开国立基于南京，遂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府。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曾打算建都北平（今北京市），但北方兵祸连年，地旷人稀，运河不畅，漕船不通，北平尚处萧条。1398年，明太祖死，传位给嫡长孙朱允炆，是为惠帝，以1399年为建文元年。明太祖先已封诸子在外地为王，各带护卫甲士数千至万余人，势力强大。惠帝为稳固帝位，用齐泰、黄子澄的削藩之策，先后废掉周、齐、湘、代、岷五王。太祖第四子、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乘时起兵“靖难”，以讨齐、黄为名，带兵南下，于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夺取帝位，次年改元永乐，庙号明成祖。永乐皇帝登基后决定迁都北平，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改北平为北京，随即

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大兴土木,营建城池宫室。迁都前,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等鼓舌阻挠,永乐帝怒斩萧仪,下狱时勉,表现了迁都的决心。北平本元大都,有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都城的基础,这里距蒙古和东北地区较近,便于维系统治,特别蒙古势力不时侵扰内地,对明朝北边是严重的威胁。永乐帝曾“就封北平,屡经出塞,天险地利,筹之已熟”,在北平建都“非近虑者所可及”(《日下旧闻考·京畿·昌平》)。永乐十九年(1422年)正式迁都,从此,明朝以北京为京师。

在北京正式新建之前,有一项大规模的拆建工程实际上是对元大都进行改造的开始。1368年明朝大将军徐达克定大都后,首先放弃了大都城的北部。这里经过多年战乱,人口百不存一,并落空虚。同时,故元势力仍伺机南侵,收缩防卫也是必要的。于是拆除了北面城墙,在以南2.5公里处另筑一道东西向新城墙,其西段在穿过积水潭最狭窄的地方后,转向西南,成一斜角,使积水潭西端一部分被隔在城外。北城墙原有的两座城门健德门改名德胜门,安贞门改名安定门。同时,东城墙的崇仁门改名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改名西直门。

永乐十七年(1419年)即北京兴建工程的第13年,又把南城墙向南推移2里,仍开3门,名称依元大都之旧。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修建9座城门的城楼,经4年完工,改丽正门名正阳门,文明门名崇文门,顺承门名宣武门。同时,将东西城墙的齐化门改称朝阳门,平则门改称阜城门。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其中正阳门是北京最重要、最宏大的城门,仅供皇帝出入,因之称“国门”,习称“前门”。经过改建,北京内城东西长6650米,南北5350米,南面3门,东、北、西各2座城门,这些城门都有瓮城,建有城楼、箭楼。东南、西南两个城角还建有角楼。

(二) 外罗城、皇城和紫禁城的修建

塞外蒙古势力分三个部分,鞑靼居蒙古高原中部,西是瓦剌部,东是兀良哈部,各部之间不仅互相争斗,而且不断南下掠夺骚扰内地。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明政府计划环绕京城四周加筑外垣,但因国用不足,只完成了南部一面。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动工,10年后建成,北京从此有了包揽南郊一面的外罗城,在平面城建图上构成一个“凸”字形,明廷把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南部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永乐迁都后已经建成了天坛、山川坛(先农坛),这是皇帝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地方;二是这一带居民稠密,也是商业繁荣的地区。原金中部的居民有一部分早已圈入了元大都,未迁入的也逐渐向元大都南门外移居,集中住在丽正门与顺承门关厢一带,新建的罗城正好把这部分居民圈入城内。外罗城东西长7950米,南北3100米,南面3门,正南名永定门,南之东名左安门,南之西名右安门,东、西各1门,东名广渠门,西名广宁门(清时称广安门)。东北面,除通往内城的3座城门外,东、西两角还有通向城外的两座门,即东便门、西便门。在永定门内有天坛,先农坛,这是外城中最重要的建筑物。天坛是明清两朝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许多精美的建筑物如圜丘、皇穹宇、祈年殿、皇乾殿、斋宫等,都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天的认识,即“天圆地方”之说。因此,建筑造型以圆为主,以蓝色作基调。圜丘是主要祭祀场所,它的坛石都是九的倍数,以表现天象,天坛的魅力给人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

与元大都不同,明北京城把内城的土墙全部用砖包砌,外罗城一开始就是砖造,城门洞也完全改为砖券。城门外护城河上旧有的木桥在正统初年也改建成石桥,护城河水“皆玉泉山水”,由城西北隅分水环城,从城东南隅入通惠河。明代北京城的坚固性显然超过元大都。

城垣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历代对城墙建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考古发现,明代

北京内城的南城墙在崇文门到宣武门一线,墙基下有几处深达 5 米的流沙层,为确保城墙坚固,在沙层中横顺排列 15 层长 6—8 米的厚松木,每层六七十根,每根松木之间用扒钉固定,连成一个整体。这种克服流沙层的技术在当时是先进的,具有科学的价值。

皇城位于内城的中心偏南,东西长 2500 米,南北 2750 米,呈不规则的方形。皇城四向开门,正南门名承天门(清时天安门),其东侧是太庙,西侧是社稷坛。承天门前是“T”字形宫廷广场,东、西、南三面筑城墙将广场封闭起来。东西两翼以及南端的一面各开一门,东门名长安左门,西名长安右门,正南名大明门,千步廊位于大明门内。明代中央官署分列广场两侧,东有吏、户、礼、兵、工各部及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西有前、后、中、左、右都督府,简称五军都督府,以及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这种安排是明朝皇权集中的表现。

太庙和社稷坛是皇城中的主要建筑。根据左祖右社的规制,皇家祖庙位于皇城东侧,庙内大殿是重檐庑殿式黄琉璃瓦为顶,下以三层汉白玉须弥座为台基,殿内供奉祖宗神主木牌,东配殿供奉有功的皇族,西配殿供奉有功的文武大臣。中殿和后殿规模略小,此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建筑,每逢皇帝登基、亲政、大婚、册立、奉安梓宫及传统祭祀节日都在这里举行祭祖活动。与太庙相对应的是皇城西侧的社稷坛,社所指是土神,稷是谷神,中心建筑是社稷坛,呈方形三层,白石栏杆圈绕,祭坛地基全部用汉白玉石。社稷坛最上层为五色土,是全国领土的象征,皇帝来这里主祭,为祈求五谷丰登。

皇城于民国初被毁,现在北京仍有东皇城根、东安门、西安门的地名,就是皇城的界限。

紫禁城是京城的核心,庞大的宫殿群矗立城中。明初,元代宫殿全部被拆毁。明成祖迁京后,重建皇宫,城南北长 960 米,东西 760 米,其平面位置与元大内基本吻合,东西两墙就在元大内旧址,只是

南北两面墙分别向南推移了近 400 米和 500 米,这是明代在全城平面设计上作出的最重要的一项改进,新宫城比元遗址略微向南的移动,使紫禁城南正门的午门与北正门的玄武门,以及宫城内的前三殿、后三殿依次建筑在中轴线上,并将这条轴线延伸到外城。

新宫城四面城门:东名东华门、西名西华门、南名午门、北名玄武门(清朝改名神武门)。城的四隅建有角楼,连城台通高 27.5 米,平面呈十字曲尺形,楼身三层出檐,顶部为十字交叉大脊歇山式,上覆黄色琉璃瓦,鎏金大宝顶。三层檐共 10 面山花、28 个窝角、28 个翼角、56 个坡面、72 条脊,造型异常优美,为中国古代楼阁之冠。出宫城的北门玄武门,迎面是万岁山,习称煤山(清初改景山),主峰是元大都延春阁的旧址,旧址之上堆筑土山,意在压胜前朝,所以又称“镇山”。从建筑布局上看,万岁山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制高点上,具有唯这里是封建帝王统治中心的象征意义。登山俯瞰,看到一片金黄色的琉璃海,点缀着苍松翠柏,整座都城充满帝王之气。

明代北京城分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外罗城 4 重,在整体布局上有一条鲜明的南北向中轴线贯穿整座都城,自外罗城正中的永定门向北,经正阳门、大明门,穿越皇城的承天门、紫禁城,直至北端的钟鼓楼,全长 8 公里,十分雄伟壮观,这是按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意图设计的,以此充分体现封建帝王的神圣尊严。

中轴线的南端是永定门,初建时辟 7 门,嘉靖四十年(1562 年),又在门外加筑瓮城,以加强防卫,清代乾隆时重修。城楼宽 19.8 米,进深 6.1 米,通高 26 米,重檐歇山顶。瓮城呈方形,箭楼也是重檐歇山顶,两侧箭窗 2 层共 26 个,门楼造型威武,难攻易守。

鼓楼是中轴线上北端的著名建筑物,钟楼在鼓楼北,相对屹立。楼翘角飞檐,高耸云表,气势雄伟。始建于元朝,明永乐营建北京时,将宫城南移,鼓楼随之南迁,位于元代中心阁旧址上,每逢报时,钟鼓声响彻云霄,更增添了都城肃穆威严的气氛。

二、殿阁巍峨,气象万千的宫殿群

紫禁城从明永乐四年(1406年)始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后经几次重修、扩建,但始终保持着初建时的布局。全城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殿宇九千余间,四周环有高10米的城墙,52米宽的护城河。这座庞大的宫殿群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

(一) 主要建筑

午门是紫禁城正门,平面呈“凹”形,城台上覆崇楼五座,又称五凤楼,连城台通高38米,正门专由皇帝出入,文武百官和皇室王公走左右掖门,凡颁读诏书、百官常朝多于此举行仪式,遇凯旋献俘,皇帝也登午门受礼。跨过金水河上的玉带桥是前朝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最前奉天殿(初名奉天殿,嘉靖时易名皇极殿,清朝顺治时改称太和殿),东西两庑各32间,殿前庭场3万平方米,正中为御道,殿建在3层重叠的“工”字形须弥座上,台基高8.13米,汉白玉雕造,下层台阶21级,中上层各9级。明王朝裁撤相权,将兵刑大权集皇帝于一身,奉天殿高筑多层的台基烘托大殿,正突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威严。殿高35米,东西63米,南北进深33米,重檐庑殿式,是宫殿建筑中最高等级,朱红殿柱,殿顶覆黄色琉璃瓦,金光灿烂。殿内设金漆雕龙宝座,两旁有蟠龙金柱,座顶正中的金龙藻井倒垂着圆形轩辕镜(是正统皇帝的象征),辉煌富丽。殿外左右列18鼎,放置铜龟、铜鹤,象征“龟鹤千秋”,陈设日晷、嘉量象征皇权公正平允。每当新皇帝登基,都在这里宣读“即位诏书”,接受臣僚的祝贺。华盖殿(初名华盖殿,嘉靖时易名中极殿,清朝顺治时改称中和殿),在奉天殿后,殿为单檐四角攒尖式,走廊列柱,金扉锁窗,遇宫中大典,皇帝事前在此休息,也在殿中接朝臣贺礼。谨身殿(初名谨身殿,嘉靖时易名

建极殿,清朝顺治时改称保和殿)在华盖殿后,殿为重檐歇山顶,广9间,深5间,殿后阶陛中间有一块云龙石雕,为紫禁城内最大石雕,殿中设宝座,是皇帝受贺或宴请大臣之处。三大殿也是明清两朝殿试的地方。鼎甲三名是状元、榜眼、探花,为封建科举中最高的荣誉。

中国封建社会的宫殿建筑在汉代已形成独特体系,经过盛唐的发展,到明清时已经程式化、定型化,这是建筑师们积累经验、继承传统和锤炼艺术的结果。三大殿占据紫禁城最突出的空间,加上斗拱、飞檐、彩画、红墙黄瓦,把宫殿衬托得既金碧辉煌又和谐统一,造型既雄浑,气势又凝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三大殿后面的宫殿群是后妃、太子居住生活的地方,是紫禁城的后廷。通过乾清门和广场,迎面是内廷正殿乾清宫,广9间,深5间,殿前丹陛上排列龟鹤、日晷、嘉量、宝鼎,殿中设宝座,殿内有暖阁,这是皇帝的寝宫,皇帝也常在此批阅奏报,处理政务。乾清宫后面是交泰殿,形制与华盖殿相同,是皇后的住所。坤宁宫位于交泰殿之后,是皇后的正宫,也是受贺礼的地方。殿内东部有东暖阁,内设龙凤喜床,为皇帝大婚之所。

紫禁宫的后苑即御花园在宫区的北端,东西长130米,南北90米,占地1.2万平方米。苑中主建筑是钦安殿,内供玄天上帝,即道教真武大帝,也是水神,皇帝祈求免除火灾,保佑皇宫。殿东有石山,名堆秀,殿西有清望楼,园内珍石罗布,红墙碧瓦,嘉木郁葱,是帝王后妃平日赏心悦目、游览休息的地方。

前后三大殿皆在中轴线上,两侧还有成群的殿宇楼阁。前三大殿的东翼主要有文华殿,是皇帝斋居或举行经筵的地方。殿后的文渊阁是藏书楼,明《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先后藏于此。三大殿西翼主要有武英殿,与文华殿同,皇帝间或于此与大臣商讨国事。

在后廷中轴线东侧有一组6个形式相同的院落构成的东六宫,即延祺宫、景仁宫、永和宫、承乾宫、景阳宫、钟粹宫,其他还有御书

房、斋宫等。中轴线西侧也有一组与东六宫对称的宫殿群,名西六宫,即永寿宫、启祥宫、翊坤宫、长春宫、储秀宫、咸福宫,其他还有重华宫、养心殿等。在东、西六宫之后各有五组同式宫殿,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以上宫殿群,即所谓的“三宫六院”。《周礼》注疏记载,周制“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实际上历朝都远远超过此数,成百成千的后妃、宫人秀女住满三宫六院,历代皇帝都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

在东六宫以东,西六宫以西还各有一组宫殿群和花园,即紫禁城的外东路、外西路,这里是皇帝、后妃们起居生活、读书娱乐或修身养性的地方,花园中古木参天,绿荫铺地,给人以怡静肃穆之感。

(二) 建筑的风格特色

紫禁城的建筑特色和风格是极其鲜明的,它融汇了历代宫殿建筑的艺术成就,是中国宫殿建筑艺术最优秀的成果。在布局上它继承传统,尊重古制,突出皇权。按《周礼》之制,天子立都要“辨方正位”,王者居中。紫禁城总体布局就反映了这种方位,奉天殿是明宫的核心,殿名取“奉天承命”之意,象征着封建帝王是代天行使统治权。中心定位之后,规划布局要求“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三朝五门”,紫禁城体现最为完备。为充分体现皇权,把皇帝临政和生活的前三殿、后三殿全部安置在南北中轴线上,次要建筑则对称排列在六大殿两旁,这条中轴线比历代宫城都更严格、更规整,而且中轴线无处不在,连御花园内也有轴线控制布局,充分显示了帝王之居的尊严神圣和皇权统治的绝对权威。同时,也表明各种封建制度在明清两朝更加完备了。

紫禁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在建筑布局、名称设计、装饰处理等各方面都极力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意境深邃,充分反映出天子至尊至贵、天人合一、富贵吉祥、万寿无疆等君主意识。紫禁城其名就来自我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星官名。古人把上天分

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十一天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而位居中央的紫微垣是天帝所在，又称紫宫，封建皇帝至尊至圣，自比天帝，皇宫也就相当人间紫宫了。早在秦汉时，皇宫被称为“禁中”，即禁卫森严之意，所以就叫紫禁城。有的宫殿的名字也如是，如后宫的交泰殿，有天地交感之意，又象征帝、后的和睦。在建筑布局上，前三殿与后三殿的气势有鲜明差别，按阴阳五行学说，一切事物都有相互依存的阴阳两面，紫禁城的前朝为阳，后廷为阴，前朝占地宽阔，环境疏朗，气势雄伟，体现了阳刚之美，内廷则显得布局严谨，内檐装饰纤巧精美，富有后宫生活气息，从数字上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有“三朝五门”之制，大殿台基为3层，开间为9，进深为5，连台阶也多用奇数，诸如此类。紫禁城在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上，也表现出高超精湛的艺术造诣，达到极高境界，这与宫城的建筑受中国传统的风水“形势”之说有密切关系。所谓“形势”是讲究形象、态势，注重环境景观艺术，达到高下大小、远近离合、主从虚实、整体局部、动静阴阳的视觉和谐统一，紫禁城在这些方面都体现出了最佳效果。举例来说，为增加紫禁城前肃穆深邃的意境，在午门与正阳门之间又兴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从大明门步入宫殿区，足下是向北延伸的御路，两旁是连檐通脊的千步廊，远望承天门，金水桥上的汉白玉栏板及河岸栏杆若缭绕的白云，承托着宏伟壮丽的皇城大门，气魄非凡，如飘渺的仙境。紫禁城凝聚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建筑宏伟，技艺精湛，产生出了撼动人心的气势和魅力。

三、北京的街巷和坊市

明代北京的街巷由横平竖直的大街构成整个都城的交通骨架，其他小街和胡同随之或经或纬，纵横交错如棋盘格。宽阔的大街有30条，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遍布内城、外城。北京街巷胡同的

名称有多种来源,有因城门命名的,如西直门大街;或因衙署机构所在地得名,如太仆寺街;或以某些人物居住地取名,如三不老胡同(明三保太监郑和称三保老爷);或因市集交易商品得名,如煤市街、米市大街等;或以寺庙作地名,如护国寺街;还有因地形命名的如骑河楼街。此外,因花草树木、湖泊水井、历史事件等等情况得名的,各有其渊源。

明初在北京设 33 坊,以后在外罗城又增加了一些新坊名,如白纸坊就是以当地造纸作坊而得名。元明时代的坊都不具有封闭的形式了,坊门由街头巷尾的栅栏门逐渐变为敞开式的牌坊,又名牌楼,成为点缀性的建筑物。这种街巷道路的牌楼是古老都市中的特殊建筑,如北京的东、西四牌楼,东、西长安街牌楼等等,通常是 3 间 4 柱 7 楼的木结构形式,油漆彩画,造型优美典雅,雕饰精丽,北京的牌楼美化了都城的文化艺术风貌,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一个象征。

北京建都后,永乐帝继明初的移民政策,连续迁山西民充实京师,增加都城人口。在京的皇族勋戚以及官宦地主,大批驻军更促进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北京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因大运河的畅通,全国各地商品物资也源源不断输送京师。明政府先后在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朝阳门、安定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附近“召民居住”、“召商居货”,这一带是商业最繁华的地方。与元大都相比,昔日积水潭东北岸的商业到明朝时,因水面缩小而无复元代盛况了。城内店铺鳞次栉比,按行业划分有 132 行。明中叶以后,外罗城是新的商业区,全国各地客商云居于此,正阳门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皇都积胜图》描绘的正是其繁荣盛况。

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兴盛的城市。明永乐帝命解缙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就藏在紫禁城的文渊阁内。副本藏于皇史宬,这是一座石结构宫殿式皇家档案库,内设雕龙鎏金铜皮大柜,是历史上的所谓金匱石室的典型建筑。适应京城宫廷和豪富贵

人的需要,北京雕漆、景泰兰等精美手工艺品,几百年来一直驰名中外。被誉为钟王的永乐大钟通高 6.75 米,最大直径 3.67 米,重约 4650 千克,钟体内外铸有 23 万多字佛经铭文,它既是朝钟又是佛钟,把神权与皇权糅合在一起。匠人制造时采用泥范法,一铸而成,钟声频率丰富,悠长宏亮,可远闻四五十里,充分体现了京师冶铸工艺和中国声学研究的科学水平,至今大钟完好,存放于大钟寺(今北京魏公村)。

明代的北京城经过对元大都的改建和新建,布局之严谨、气魄之宏伟、建筑之精美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都城。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历史考古、社会风俗文化、建筑美学、科学技术等等多方面的历史价值,是历代古都中的杰作。

清朝对北京城和紫禁城的宫殿都没有大的改动,基本保持了原貌。城内宫殿也都得到过重修或局部改饰,小有增建。

终清一代,历代皇帝以巨大的财力、难以数计的劳力,投入到北京西郊风景园林的开发建设上,著名的如颐和园、圆明园等,有“三山五园”之称,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作,举世罕有,使北京城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北京是中国古都建筑的最后结晶,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座古都里达到光辉灿烂、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丽奇观。

四、清朝的关外三都

十六世纪后期,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族建州部逐渐强大起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部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割据辽东。天命七年(1622年)迁都东京。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盛京(今辽宁

沈阳市),翌年战死。1626年其子皇太极即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年)改后金国号名大清,并完成统一东北大业。崇德八年(1643年)太宗死,传位给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皇帝,庙号世祖。次年,清军进占北京,并定为都城。清王朝初建国时先后在关外三地建都,故有三都之称,即兴京、东京和盛京。

兴京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时的第一个国都,原是一座小城,满语为赫图阿拉(横岗之意),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改称兴京,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街东八里苏子河与二道河会合处的北岸,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外城周围4.5公里,四面各一门,城上环置“射箭穴窠”。城中有手工业如制造铠甲、弓矢的作坊和仓贮之设。内城周围2.5公里,南、北、东各设一门,皇帝及贵戚居其中。考古发现了正殿遗址,位居城中央,望楼楼址二座,城东南角一处,旁有魁星楼和文庙,城西北角一处,旁有昭公祠。寺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位于南门大道左右。八旗衙署遗址多处,散布城内。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作根本之地,不断扩充实力,建都后第三年就在萨尔浒一战大败明军,动摇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

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随军事斗争的发展又迁都东京(今辽宁辽阳),位于今太子河东、距辽阳城2.5公里的新城村。这里依山临水,形势险要,是清初第二个都城。城周3公里,每面城门两座,东之左名“抚近”、右名“内治”;西之左名“怀远”,右名“外攘”;南之左名“德盛”,右名“天祐”;北之左名“福盛”、右名“地载”。这些城门名称是努尔哈赤锐意图治、内修国政、外拓疆宇的思想反映。

盛京是在明朝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自清太祖始建都城,直到康、乾两朝续建,宫城体系更臻完备。全城分东路、中路、西路三部分构成,占地6万多平方米,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皇宫建筑群体。

东路宫殿以大政殿和十王亭为主,是清太祖时所建。殿为八角重

檐攒尖式，覆黄色琉璃瓦镶绿剪边。殿身周围出廊，朱漆圆柱，坐落在1.5米高的须弥台基上。殿中设宝座，这是皇帝听政之所。大殿正南有“十王亭”，10座方形亭分列大殿前东西两侧，呈八字形排开，皇帝召集八旗大臣于此商讨国事。大政殿与十王亭是清初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

中路宫殿以崇政殿为主。清太宗即位后，废除了八贝勒(满语亲王)“共治国政”的制度，削减旗主权力，提高皇权地位，并仿汉制设“三院八衙门”，标志国家权力向集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这次变革在宫殿建筑布局上充分体现出来。进入大清门，一条御道直通清太宗的临政殿——崇政殿。从大清门到后廷的清宁宫是一条笔直的中轴线，其它东西配殿对称建于两侧，布局也是前朝后寝，与传统汉制相仿。

西路以文溯阁为主体，仿浙江范氏天一阁的建筑形式，为收藏《四库全书》营造。

盛京的宫廷建筑把汉、蒙、满三族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是清朝多民族统一政权不断巩固发展的象征，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

1644年，清顺治皇帝入关，定都北京，盛京作为陪都对巩固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历代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极其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包括长达数千公里的高大城墙,连接数以千万计的墙台敌楼、关城隘口、烽墩堡障等,构成纵深递次的整体防御体系,总称为长城。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国历史上战国时的诸侯国和后来的秦、汉、西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等封建王朝都时间长短规模不等的修筑过长城,遍布中国东西南北的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长度相加超过5万公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长城则在北方。

长城不仅是一项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中国古代草原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的一条有形的分界线,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融合的纽带。长城在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为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军事效用。同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交流、人口迁徙、自然生态环境、民族融合、中外交通和经贸往来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远溯中国古代先民,“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周礼·大司徒》),或用“土墉”、“壕沟”以防御。古有传说“鲧作城郭”(《世本·作篇》)。夏商时期,已使用石砌或夯土版筑技术筑墙。周初,武王分封诸侯,《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史书相传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

之时,已出现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

春秋战国,列强纷争,伴随着铁器生产工具的兴起和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战争,各诸侯国相继大兴土木筑长城以设防。据《春秋》僖公四年(前656年)，“楚国方城以为城”。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长城(列城)。此后,齐亦筑长城。至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燕、赵、秦、魏、韩以及中山诸国相继沿边防线修筑长城。

战国长城以燕、赵长城修筑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燕筑南、北界两道长城,赵亦筑南、西北、北界三道长城。燕、赵长城南界都位于河北平原,利用河堤筑长城设防;北界则位于农耕、游牧区域分界线,沿燕山、阴山山脉依险分别筑长城,后为秦、汉至明朝历代修筑长城所沿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利用燕、赵、秦三国长城的旧址,在中国北部扩建修筑了第一道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秦至明,各朝代不仅汉民族统治者所建的王朝修筑长城,而且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亦均修筑、增建长城,或利用长城的关隘,屯兵守险,检查商旅。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象征。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燕赵地域就是中华各民族相互争斗和融合的重要地区,而自辽、金、元、明建都北京,周边成为京畿重地。因此,在燕赵地域修筑长城费时最久,次数最为频繁,耗用人力、物力规模最大,修筑总长度最长,建筑形式复杂多样,地形地貌最为险要,所设重关要隘最多。至今,不仅留有了战国燕、赵长城,秦、汉、北魏、北齐、北周、隋、金各代长城遗迹,而且保存最为完整的明长城精华,大部分都在燕赵地域,成为燕赵文化极为宝贵、最具特色的部分。

长城凝聚着中国古代各民族人民的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象征,而且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被誉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节 燕、赵、中山长城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诸侯争雄、割据兼并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期。地处中国北方的燕、赵、中山国,为了互防和防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先后构筑了上百公里或上千公里的长城,距今已有 2300 多年漫长的历史。

燕、赵、中山长城对此后各封建王朝所修建的长城,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燕长城

燕国,春秋时建都于薊(今北京城西南)。战国时,参与大国的兼并战争,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又在武阳(今河北易县南)营建下都。为防御强邻的入侵,保国安民,防止战乱对经济文化发展的破坏,燕国先后修筑了南界易水长城和上谷至辽东的北界长城。

(一) 燕南界长城

燕南界长城,大致是沿易水而建的,利用当时的古易水堤防作基础,与筑墙相结合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一项国防工程,所以又称“易水长城”。其修筑年代,历史文献无明确记载。

《史记·张仪列传》载,燕昭王元年(前 311 年),张仪说六国连横时,向燕昭王说:“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由此可知,此时燕已有易水长城。以此推算,燕南界长城修建年代,当在苏秦说文公合纵(前 334 年)至公元前 311 年之间。燕昭王时又进行了增修。

燕南界长城是用于防齐、防赵和御秦的,并保卫易水之南的燕下

都武阳城的安全。《水经注》易水条记其位置甚详：“易水又东，屈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屈迳长城西，又东流南经武隧县南，新城县北。……又东，梁门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门，东入长城，东北入陂。”《水经注》滹水条记载：“滹水又东北，迳阿陵县故城东。……滹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也记载有燕易水长城的情况。

酈道元，北魏地理学家，今河北涿州市人，他在《水经注》中对易水长城的记载当是可靠的。由此可知，北魏时期尚有较多的易水长城遗址。

据今人考，燕南界长城的大致位置在冀中平原保定以北，西起今河北省易县西南的太行山下，沿着易水南支流北岸而行，又折向东南经定兴、徐水、安新、任丘等市县，从东北入文安县至东南，即滹水入易水、易水入滹沱河一带之地，全长约 250 公里。现今尚有遗迹可寻。

徐水县遂城村北的瀑河（为易水下游），隔河可望古长城遗址，溯河而上至孔山，这一带尚存三段长城墙址，总长不足 50 公里。城墙因地势而异，底宽 6—20 米不等，最高处约 10 米，为泥土夯筑。其位置、走向、建筑形制均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当为燕南界长城部分遗址。

（二）燕北界长城

燕北界长城系战国时，各诸侯国中最晚修筑的一条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按：今河北怀来县大古城）至襄平（按：今辽宁辽阳市附近），置上谷（按：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按：治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右北平（按：治今河北平泉县境）、辽西（按：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按：治今辽宁辽阳市）郡以拒胡。”

燕北长城修筑年代,因历史文献对秦开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后人根据“秦舞阳者,开之孙也”推算,当始于燕昭王,而在燕孝王和燕王喜时,又可能继续增建完善,设令疵塞(今河北迁安县西)、居庸关塞(今北京昌平区西北)。

据考,燕北长城的位置在明长城以北,西起今河北怀来县大古城,往东北入内蒙古化德县,经正蓝旗、多伦县,沿燕山北麓折入河北围场县,再东入内蒙古赤峰北,经敖汉旗、奈曼旗跨越努鲁儿虎山,进入辽宁朝阳,经阜新穿过辽河到开原,向南折沿长白山西麓,经抚顺、辽阳东、鸭绿江,直达于朝鲜人民共和国清川江北岸的博川一带。全长 1200 余公里。

燕北长城沿燕山山脉和辽东丘陵建造,位于阻遏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东胡与林胡进入燕国都所在的冀中平原战略要地。在筑造技术和地形选择上,既很有特点,又因地制宜。土筑长城,大多修在土质较厚、地势平缓的地区;石筑长城,一般是内外两侧用较规整的大块天然石垒砌,中间充塞碎石块或砂砾;也有以石为基,上用黄沙土夯筑的土石混筑。燕北长城被沿线的当地人很形象地称为“土龙”、“石龙”或“沙龙”,至今这些地区仍保存有不少遗址。

河北丰宁县至内蒙古多伦县的燕长城遗址,每隔 250 米筑有一墙台,河北丰宁、围场县境内有大小不等的土城址,平面为正方或长方形,城垣保存较好,小土城址边长不到 250 米。据考,这些小城是燕国屯兵驻守的城、障、亭、燧等防御设施。

辽宁建平县境内的燕长城遗址,东段在烧锅营子乡的唐土沟梁;中段在老官地乡羊场沟南山;西段在热水乡小马家湾,蜿蜒百余里,系土筑,当地称为“土龙”。张家村南山至蛤蟆沟脑北山之间的燕长城,为高 2—2.5 米的石砌墙基遗址,与文献所载“长城无土处,累石为固”相吻合。

内蒙古昭盟境内的燕长城,大部分地段的墙基至今仍很完整,其

实际走向断断续续约有 300 公里,赤峰一带的老爷庙西山顶上,北台子东端,杨家营子山燕长城沿线上,均筑有望楼。望楼址直径 3、4、2 米不等,附近陶片散乱,还发现有战国式绳文板瓦和长方形鬲铁斧残片。敖汉旗老虎河上游北岸,在长城北侧约 0.5 公里处的遗城址内,地表层存有大量的陶片、筒瓦、板瓦和红陶锅片,并出土了很多钱币,有燕明刀币、秦“半两”铜钱和重 60 余市斤的秦代铁权。从中可知,这一带燕长城在秦代又被沿用。

燕北长城经过燕山山脉、辽东丘陵地区,燕山以北是温带草原以牧业为主,以南是温带落叶植被区域以农耕为主。这条自然分界是中国历史上古燕、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活动,与华夏民族交往融合的区域。特别是燕北界长城所要防御的东胡族系的人民,对开发中国北部、东北部疆土,发展游牧业经济和草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内蒙古赤峰一带出土了东胡民族的青铜器,燕长城沿线亦发现东胡的遗迹。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东胡语言,又为燕长城以外,大漠南北的许多少数民族相袭使用。今蒙古语亦源自于东胡语。

二、赵长城

赵国,战国七雄之一。赵敬侯元年(前 386 年),迁都于邯郸。

赵肃侯十七年(前 333 年),以漳水、滏水的堤防为基础,修筑赵南界长城,以防魏。又为防止北部的东胡族南下侵袭,筑赵西北界长城。赵武灵王时,修筑了一条“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的赵北界长城。

(一) 赵南界长城

赵南界长城,建于赵肃侯在位时,又称赵肃侯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又载:“(武灵王)十

九年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因长城在漳水之北，因此，称为赵南界长城。

战国时期，古漳河河道在河北临漳县邺镇以下的河段，位于今漳河以北，斜向东北流，左会滏水汇流于黄河。赵南界长城是在漳滏流域一带沿漳水故道的北岸，利用漳滏堤防相连扩筑而成的，“以阻漳滏之险”，故又称漳滏长城。其大致位置，起自今河北省西南太行山麓涉县东，东行经武安，缘漳河北岸迤东南行经磁县、临漳、成安至肥乡县境，形成外凸的弓形走向，全长约 200 公里。今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尚存遗迹。

邯郸是战国名城，前有漳滏，右倚常山，左邻河间，北通燕涿，关天下之形胜，为当时黄河以北最大城市之一。既是赵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华北商业、冶铁中心。但邯郸地处冀南平原，是四战之地。公元前 353 年，魏惠王救卫伐赵，围邯郸。次年十月，都城邯郸被魏攻占。魏惠王十九年（前 351 年），赵魏盟于漳水，魏归邯郸于赵。

公元前 349 年，赵肃侯即位，重视发展生产，国力大增，有条件动用大批人力、物力修筑赵南界长城。这主要是保护京都邯郸，以防魏兼而防齐，同时因秦驱魏攻赵，也可以起防秦的作用。

（二）赵西北界长城

公元前 333 年，赵肃侯听苏秦游说参加合纵抗秦，在漳河北岸修筑南长城的同时，又在西北部飞狐口、雁门关一带筑起一道西北界长城，以御戎狄。

《盐铁论·险固》篇记载：“赵结飞狐（按：今河北蔚县南）、句注（按：今山西代县西北的雁门）、孟门（按：今山西离石县境西），以存荆、代。”飞狐、句注、孟门为赵西北边防要冲关塞，地处山高谷狭、雄关据险的太行山，乃兵家必争之地。飞狐口（飞狐径）是著名的太行八径之一，位于今河北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口之北口，两崖峭立，蜿蜒百

余里,控扼山西高原通向河北平原交通要路飞狐道的咽喉。雁门山古称为句注山,位于今山西代县西北 20 公里,山峦重叠,谷深路狭,山势险要。赵国是最早在飞狐至雁门一带修筑长城的,以后历代均在此据守关隘,固筑长城。

赵西北界长城位置,东起今河北省涿源县飞狐口一线,北界蔚县,南界三飞狐上以东地区,穿越恒山西行入山西灵丘县北部,复西入繁峙县北,经应县、山阴至代县西北的雁门山,折向西南行入宁武县东南,到阳方口复西南向行经五寨、崞岚与岚县交界处至兴县,再折向西北达保德县黄河岸上。在山西省境内即长达 350 多公里。今仍有遗迹可寻。

赵西北界长城东起点今蔚县代王城南,有一道长约 75 公里的石垣,除个别处保存尚好,其余仅存一道高 1 米的石埂。其示警的烽火台数量少,且间距大,大部分已倒塌为一圆石堆状。在山西省境内的赵西北长城,今尚存长 50 余公里的遗迹,大部分地段是石头砌筑,少许部分为黄土夯筑,城垣残高已不足 1 米。

代,原是北戎建立的国家,居赵之北部,相隔恒山为邻,是屯兵养兵又可牧马、农耕的重地,且与赵氏有婚姻之好。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北登夏屋”借宴请代王之机,“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赵灭代,北置代郡,至赵肃侯筑赵西北长城,代始终是赵国的战略重地。

(三) 赵北界长城

赵北界长城为赵武灵王时所筑,故又称赵武灵王长城。

公元前 325 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雍即位。为拒周边之强敌,赵武灵王实行改革,变法易民,胡服骑射,引起军事技术与战略战术的一系列变化,使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对外用兵接连取胜。赵北界长城大约是在武灵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前 306—前 300 年)间,击败东胡之后,向北拓进,为巩固新略取的国土而修筑的。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从此一跃跻身为战国末期能与秦国抗衡天下的军事强国。

赵武灵王长城的位置，依山势、走向划分南北两列。北列西起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沿黄河上游后套平原及前套平原北缘，即阴山南麓向东，行经五原、固阳县北境，至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北麓。《水经注》卷三记载：“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南列西起乌拉特前旗黄河东岸，傍大青山南麓蜿蜒东行，经包头、呼和浩特市、卓资县、察右中旗、集宁市、察右后旗、商都、化德县，进入山西高原东北部的云中、雁门，向东至代，全长约 650 公里。

今考古发现，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之间，有不少赵武灵王长城遗址。其城垣多系夯土所筑，用两版相夹，内填粘土或灰石，分层用杵夯实，底宽而顶窄，顶为墙宽的 $1/4$ 或 $1/5$ ，具有相当的承载力。有的地段因地制宜，或石筑或利用峭壁劈筑城墙。

内蒙古卓资县油葫芦湾村北赵长城内侧，有一座俗名城卜子的古城堡遗址，呈方形，正边长 142 米，关城东墙残高 1.3 米，为戍军遗址。长城附近地面上残留着许多战国陶制绳纹残片。古城北有一座筑在长城上的方形墙台，正边长 17 米，高 1.4 米，系用洪水淤积的黄黑色土，夯筑为 13 层，每层厚 10 厘米。这座墙台应是赵边防戍卒了望敌情和防御用的。

包头市赵长城遗址，东起大庙村以东，西至哈叶脑包的哈德门沟口，约长 45 公里，最高处 4—5 米，最低 1—2 米不等，夯土层厚 10 厘米，犹如长龙起伏盘亘在群山峻岭。大庙村东 1 公里处修筑了一座烽燧，位于土山高顶之上，数公里内的景物尽在目力所及范围。“南面长河（按：黄河），北背连山，连峰刺天”（《水经注》）。赵北长城实扼内蒙古高原山川险胜。

赵武灵王北长城,是为了保护新开拓的北疆农牧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不受游牧民族侵袭,安定边境而修筑的。其后,匈奴骑兵亦常“驱驰于楼烦(按:今山西宁武、崞岚等地)之下”,扰赵边境。赵成王元年(前265年),派大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褕,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进赵边城”(《通典·匈奴上》)。

赵国的疆域扩展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平原及河套平原后,赵武灵王一面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北长城,一面向北方大量移民,以实边地。《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载,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年),“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向新开辟的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增加边地戍屯兵民,目的是开发边地农牧业经济,增加戍边兵员,稳固边疆。此际,在呼和浩特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城市云中(故址在今托克托县),为在畜牧业区域播撒中原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础。

赵国移民九原,开长城史上移民屯边之先河。同时,也是赵文化的构成核心——中原农耕文化与大漠南北游牧文化,交汇融合飞跃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白起大败赵括军,坑降卒45万,赵国势由此骤然衰落,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保留和利用了赵北界长城、赵西北界长城的部分旧址。

三、中山长城

春秋中叶,鲜虞族(属白狄别支)在今河北正定、石家庄西北一带,建立了一个强悍的诸侯小国——中山国。

早期中山国,据史书记载两次亡国。中山立国后,屡遭晋师伐,因国弱民散,一度在先秦典籍中消失。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

立”(《史记·赵世家》),迁都于顾(今河北定州市)。公元前406年,中山又被魏攻灭,遂沦为史称的“魏属中山”。

约公元前381年,中山又再度复国,“桓公迁徙灵寿”(《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定中山国都城于北倚灵山、牛山,南临滹沱河的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北)。

公元前369年,魏国内乱,赵韩乘机攻魏。复国不久的中山,假其天时,趁机调征民力、物力,在中山国西南部构起一条全长250多公里的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在先秦文献中,这也是中山复国后第一件有记载可考的重大事件。足见当时在华夏诸侯国林立争雄之间,少数民族鲜虞中山国在山西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分界的太行山,今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省东部交界地带修筑长城,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外交上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据《汉书·地理志》、《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等记载,中山长城的大致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地区,北段纵贯恒山,沿太行山脉南下,经龙泉、倒马、井陘、娘子关、固关,最后至于今邢台西北的黄泽关以南的明水岭大岭口,全长约250多公里。^①

“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战国策·秦策》)。地处燕南赵北之间的鲜虞中山国,东有水大湍流的薄洛水与宁晋泊,相邻齐国;北有滹水蜿蜒为屏障,东北邻燕国,中山与齐、燕修好,边事平安。西北部与西部为太行山险,重山西峙,群川东汇,中山扼守着易守难攻的鸿上塞、井陘关。南部是冀南平原,与赵接壤。中山国域阻隔了赵都邯郸一带与太行山以西的晋阳、西北的代地之间的联系。中山国的存在限制了赵国的内外防御和向北部的领土扩张,一直被视为腹心之患,欲图兼并。所以,赵成侯六年(前369年),由北方鲜虞游牧民族为主、

^① 罗哲文、刘文渊:《世界奇迹——长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杂居华夏民族的中山国国君，命在中山国西南边界修筑了防御赵国入侵的中山长城。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中山筑长城以后，在地处南北要冲的古槐水北岸鄗邑（今河北柏乡县北），“中山负齐之强兵，……引水围鄗”，打败了万乘之国的赵国，致使赵武灵王哀叹：“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

中山筑长城至鄗之战，证明中山国的重新复兴。公元前 323 年，中山终以“千乘之国”，继秦之后，与韩、魏、燕、赵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

战国前期，鲜虞依靠本民族的力量，经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军事方面的胜利，创造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在燕赵地域的腹地，以游牧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修筑起中山长城。其所经龙泉、倒马、井陘、娘子关、固关，均是控扼山西高原通向河北平原的咽喉要冲，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山凭此屏障，稳定了边陲，防止赵对中山的入侵，中山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相对稳定发展时期。1974—1978 年，在河北平山县发掘的中山国都城遗址和墓群，除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一些铁镢、铤、铲、锄、镰等生产工具，灵寿故城址有制铁作坊遗址。据《吕氏春秋·贵卒》载，赵攻中山时，中山人吾丘鹤“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说明战国时期，中山与中原地区一样普遍使用了铁器，并且据此有了在太行山险穿山越岭伐木、凿石修筑长城的生产技术和条件。

中山“至五叶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武灵王袭而灭之”（《太平寰宇记·定州》）。公元前 296 年，赵破中山，翌年中山亡，历 210 多年。明代在河北、山西交界处修建内三关长城，今学术界有说是即建在中山长城的故基上。

第二节 秦汉长城

秦朝在中国北部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扩建了历史上第一条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汉承秦制，修筑了长城史上最长的1万公里的汉长城。秦汉长城相当长的部分修筑在燕赵区域。

一、秦始皇长城

战国时，秦修筑了涇洛长城和西北边地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并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在秦国南方统一了诸越，并在北方的边域征集巨大的人力修筑防御匈奴、东胡，横贯秦国北部边地的“万里长城”。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按：《汉书》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秦始皇长城是中国多民族统一的中央封建集权制国家的历史产物，起到了保护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它是在战国燕北长城、赵北长城、秦西北边长城的基础上，修筑增扩而成的。大体分西、中、东三段。

西段：自西而东从今甘肃岷县，行经临洮、宁夏，沿贺兰山至内蒙古的高阙。沿用了秦昭王西北边长城。

中段：东起今内蒙古兴和县，经集宁市，沿大青山西行，至固阳县北依阴山，南障黄河河套地区，经五原、杭锦后旗，西入乌兰布和漠北。这是蒙恬北逐匈奴后，利用赵北长城的基础，率兵修缮增筑而成的。中段秦始皇长城，主要是石头砌筑，一般高5—6米，比大青山南麓土夯筑的赵北长城气势更为宏大。沿长城内外“因地形，用险制塞”，在山峰、狭谷处设烽燧关城，凭险据守，形成纵深防卫建筑群，为后世所沿袭。

东段：西起今内蒙古化德县，向东行经河北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复入河北丰宁、围场县北，再折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库伦旗南境，进入辽宁阜新市北，向东行经开原，越过辽河至宽甸，过鸭绿江止于碣石。《通鉴地理志今释》记载：“秦筑长城起自碣石，在今高丽界。”最远达到今朝鲜平壤大同江的北岸。东段秦始皇长城利用了一部分燕北长城旧基。自内蒙古化德县至河北围场县，复入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一段秦始皇长城，即是在燕东北长城的旧基上加以修缮而成的。这一带秦长城大多蜿蜒于山峦河谷，山地为石筑，平地则夯土筑。相隔20公里左右筑一城塞，一般仅开南门供通行。间距0.5公里设置烽火台，为土筑或石砌的圆墩，直径约10米。现存遗迹保存较好的石垣高4—5米，基宽4米，而土垣则底宽5.6米。1752年，清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秋狩，发现今河北围场山湾子乡半壁店前梁至老窝铺乡干梁沟一带，约190公里长的秦始皇长城。为此，乾隆亲笔御书《古长城说》一文，并立碑于达颜德基围场，铭志其事。在秦始皇长城沿线的围场、赤峰、敖汉旗还发现秦代重要遗址和遗物，有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文的铜权、铁权、陶量残器和“半两”铜钱等文物。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原战国燕、赵等国的北部地区虽已设郡，但人口稀少，生产亦相对落后，为促进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沿长城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

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12 郡，分段防御。除陇西、北地、上郡外，其余 9 郡均在燕赵地域。同时徙民实边，开发长城沿线的农牧业生产。还沿着 12 郡长城沿线修了宽大的直道，以便利交通，活跃贸易关市。此时，“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十多年不敢南下而牧马。

公元前 215 年，秦始皇第四次巡幸天下，至河北秦皇岛刻碣石门，“碣石铭”曰：“……威并诸侯，初一太平。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已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记载了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秦始皇还下令拆除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互防所筑的内地长城，以维护全国的统一，并从客观上有助于经济和商业的流通与发展。

在燕、赵、秦三国长城基础上修筑的秦始皇长城，其工程规模之大，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数量之巨，和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备功能，都是诸侯国长城所无法相比的。这一时期，包括燕赵地域在内的中国北部长城内外地区，政治上相对统一稳定，经济上有所发展和提高。加强和巩固了边防，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下焚书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即在面上刺字涂墨罚配边地修长城。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因发卒五十万（按：占全国男劳力的 10%），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刺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秦始皇修筑长城既有其历史功绩，又是人间暴政。秦始皇征发民工修筑长城，民间便有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传说。时至今日，山海关长城与孟姜女庙共存一地，虽非秦时所建，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形象地告诉后世，历代长城都是人民的血肉建筑而成的。秦末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首义者陈胜、吴广便是征调去渔阳的闾左戍卒。秦朝二世而亡，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汉长城

汉代是汉民族文化形成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自汉高祖以后的百余年间,为防匈奴,汉王朝在修缮利用秦始皇长城的同时,不断构筑新的长城,修筑列城、亭障、烽墩,筑起东起辽东,西至新疆罗布泊,总长度达1万公里以上的汉长城。今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都可见到汉长城、烽墩遗址。汉长城大体可分为西、中、东段。

西段:东起内蒙古额济纳旗苏古诺尔湖畔,西南向入甘肃,经敦煌玉门关,西至新疆罗布泊一带。

中段:在今内蒙古商都县以西至额济纳旗苏古诺尔东湖之间。汉武帝太初年间,在秦长城的北面草原上,筑起两条南北平行相距5—50公里的外长城。南外长城起于内蒙古武川县,北外长城东起于达茂联合旗,相继延伸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复入内蒙古至苏古诺尔湖东北。这段长城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狼山以北,石峰重峙,多系石筑墙,采用比较规则的片石,上下两层石块勾缝,墙高5米,拔地而起,比之战国长城前进了一步。大青山后地势平坦,则多系夯土城垣。

东段:北线,为汉武帝和昭帝时缮治。西起今内蒙古卓资县,经商都、兴和入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又进入内蒙古宁城县,经喀拉沁旗东南折入辽宁建平县,行经阜新向东至开原,折而向南至宽甸,达于朝鲜境内的浪水。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浪水为界(按:今朝鲜清川江)。”南线,从河套以东经今山西左云县,向东南至雁门,越恒山沿太行山脉至今河北临漳境

内,这条内层防线,为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时所修筑。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为大规模出击匈奴,“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即大规模修缮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家口一带的长城。汉昭帝时,修筑了自西而至辽东的汉东段长城;元凤六年(前75年),“募郡国徙治辽东玄菟城”(《汉书·昭帝纪》)。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命骠骑大将军杜茂“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十三年(公元37年),又命王霸、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按:今山西阳高)至平城(按:今山西大同东北),三百余里”。十四年(38年),命杜茂、马成“缮筑障塞,自西河(按:今山西离石)至渭桥(按:今陕西咸阳东),河上(按:今陕西高陵)至安邑(按:今山西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邺(按:今河北临漳西南),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今河北承德地区汉长城遗址,位于秦、燕长城以南,明长城以北。自内蒙古宁城县大营子一带至河北承德县三道沟门乡、志云乡汉长城遗址,残长约15公里,高1.5米,宽8—10米,大部分地段为土筑,间有以石为基,上部夯土,长城与墩台相连。承德地区汉代墩台遗址有上百余座,墩台为方形,底宽顶窄,一般存高3米以下,每边长8—12米不等,多修建在交通要道的山口或河川交汇的三角地带。当地群众俗称为“馒头包”或“炮台山”。在墩台附近发现大量属西汉早期特征的绳纹瓦片、瓮、罐等陶器残片和陶纺轮等遗物。

今辽宁境内汉长城遗迹附近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均具战国燕国和汉代特征,当是在燕长城基础上,汉代又加以修缮利用。

汉代边塞承秦制,且更趋完备。据已出土的汉代简牍记载,汉沿长城修筑“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烽台“高四丈二尺,广丈六尺,积六百七十二尺,率人二百二十三尺”。亭燧为管理烽燧传递边警的驻地,每燧卒三至五六十人不等,了望敌情,传递消息,“边塞卒,不得离去亭尺寸”。《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

“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迅速达军情于京都，可知其防备之甚严。汉亭燧还兼有邮递之功能，遇有紧急军情，专用“羽檄”来快速传递。

汉文帝十一年（前 169 年），在“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募民实边的对策，“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汉书·晁错传》）。至西汉末时，汉北边凉、并、幽 3 州和朔方等 28 郡，在编人口近 800 万。东汉建武十五年（39 年），又徙雁门、代、上谷郡吏民 6 万余人，置居庸、常山关以东。在长城北部荒原偏地，开垦田地，兴修水利，“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汉书·晁错传》）。汉长城屯垦戍守制度，集生产、生活、战斗三位一体，既极大限度地发挥了长城御敌之功能，又促进了北疆长城沿线的经济开发和各民族间贸易流通。汉封建文明也越过长城辐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广泛的民族交流与融合。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匈奴冒顿单于以来，汉长城关市一直对匈奴开放，“匈奴贫，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汉书·匈奴传》记载：“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初，中原牲畜奇缺，至武帝时，互市交往，长城以南已是“马牛放纵，蓄积布野”。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传入游牧民族地区，“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书·西域传》）。而大批畜力投入长城以南地区的农耕、运输，也使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吸引了各民族不断进入汉长城带与汉民族杂居交往和融合。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 年），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遣使至汉奉蕃称臣；二十六年（50 年），南单于部众沿代、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 8 郡驻守，包括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陕西省北部、甘肃省东北部。两汉时期，分布在上

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广阳、代、雁门和太原、朔方、五原等汉长城内外沿边郡县的东胡分支乌桓族，长期与汉民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东汉光武帝采纳班彪的建议，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复置护乌桓校尉，专责管理乌桓、鲜卑两族的事务。两汉以后，乌桓族的历史活动，从历史文献中逐渐消失，再不见于记载。

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在两汉时期，燕赵处于封建王朝的北方，汉长城对发展北部边疆的农牧业生产，巩固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融合，特别是成为发展中国与欧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主干道“丝绸之路”的安全保障，起了重大久远的历史作用。东汉末期，北方诸部少数民族纷纷占据长城沿线地区，后至三国两晋十六国时，均未大规模修缮和利用长城。

第三节 西晋、北魏至元代的长城

在长城发展史上，西晋、北魏以后的东魏、北齐、北周，这几个王朝时期，虽然只居于北方的一隅，且时间不长，但也修筑过长城。隋朝统一全国，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唐、宋、辽时期，长城基本上处于修筑工程停息期。金朝统一了北方，又定中都于北京，与南宋对峙，曾修筑过长城，其中金内长城有很大一部分在燕赵区域内。元朝灭金与南宋，统一全中国，建大都于北京。这时燕赵的大部分地域，已是“腹里”地区，元朝只对原有长城关隘，加以修缮，没有大规模地修筑长城。

一、西晋长城

西晋王朝，为期短暂。自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至愍帝建兴四

年(316年),总共51年,而且在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即爆发了“八王之乱”,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也修筑过长城。

西晋所修长城,《晋书》帝纪、《资治通鉴》均未作记载。据《晋书·唐彬传》载:“北虏侵掠北平,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虜、撻何等并遣侍子入贡。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埃相望。由是边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这里所说的“复秦长城塞”、“绵亘山谷三千里”便是西晋修筑的长城。

西晋时幽州统辖7郡国34县。北平郡为其辖郡之一,领4县,治徐无县(今河北遵化市东)。《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二年(281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资治通鉴》卷八一武帝太康二年载:“冬十月,涉归始寇昌黎。”并在《考异》中指出《晋书》帝纪误以慕容涉归为慕容廆。两书所指的昌黎,均为今辽宁省义县地,而非今河北省昌黎县。

西晋长城已无遗迹可考。大体上是在今河北省承德至辽宁朝阳一线的汉长城旧址上增修而成。西晋时的北平、昌黎,均在燕赵地域的东北地段。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均很少,对《晋书·唐彬传》的记载,学术界尚有不同解释。

二、北魏长城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89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即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北魏王朝统治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商贸、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

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国力大强,统一了北方。为防止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北部蒙古草原柔然族、东北部的契丹族南下侵扰,解除北边的威胁,北魏开始修筑长城。以此,缓和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直接冲突,成为拓跋氏开始汉化的标志。

据《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按:今河北属县)、西至五原(按:今内蒙古属县),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这道长城东起河北赤城县,向西行经张北、尚义县,入内蒙古集宁市、武川、固阳县,至河套地区的五原县以北,趋没阴山。

魏太武帝神䴥二年(429年),北魏大破柔然,降30万余落,把降众迁徙至北魏长城沿线,从事农耕畜牧生产。同时,又相继设置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武川县西)、抚冥(今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兴和)、怀荒(今河北张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北)六镇。并于通川险隘处设立关塞,建长城门。北魏先后沿长城共建九镇,以此组成北边防线,拱卫京师。明代复承其制。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发司、幽、定、冀四州四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按:今北京居庸关),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魏书·世祖纪》),历时一年八个月,始告完工。这道环绕京都平城的畿上塞围,从东至西,由南至北,纵横各上千里之长。主要在今山西境内,东西长400多公里,南北亦长400多公里。北环线由居庸关向北,经河北、山西、内蒙古达黄河东岸;南环线从居庸关向南至山西灵丘,向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行至偏关丫角山接外塞。明代修筑内、外三关长城时,沿用了北魏长城的部分基址。

今河北赤城县境起自后城乡滴水崖,西经雕鹗、龙门关至大尖山,有一段北魏长城遗址。雕鹗以东长55公里,石头砌筑,现存高1米左右的埂状遗迹。雕鹗以西长25公里,夯土筑,城垣残高3米,底宽约3.5米。

今内蒙古化德至固阳尚存断断续续的北魏长城遗迹,为现存于地表最窄和最低的长城。一般宽3—5米,高30—60余厘米,系夯土筑。在北魏长城沿线,察右后旗赵家房子村三道湾还发现了鲜卑古墓群,出上了金马驹、金轿车等金银陪葬品。各地大量出土的文物表明,长期生活在北魏长城内外的鲜卑人民,为促进北方文化的发展,推动长城内外的各民族融合,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三、东魏长城

公元534年,北魏丞相鲜卑化了的汉族人高欢用兵洛阳,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后,修筑了东魏长城,以防西魏和柔然的联合进犯。

据《魏书·孝静帝纪》记载:武定元年(543年),丞相高欢“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陞。四十日罢。”这段长城西起今山西静乐县,东至代县崞阳镇,全长75公里。据考,是在北魏“畿上塞围”南长城跨越吕梁山一带的旧基上,加以修缮补筑的。

四、北齐长城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欢子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称帝,改国号齐,都邺,史称北齐。立国仅27年的北齐,却大规模修筑了防突厥、柔然、契丹的北部长城,防西魏、北周的西部长城。

(一) 北齐北部长城

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年),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北齐书·文宣帝纪》)。这是北齐第一次征发人力修筑的长城。南起今山西汾阳西北的黄栌岭,向北至五寨县境,长200余公里。

天保六年(555年)，“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按：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恒州(按：今山西大同市)九百余里，命定州刺史赵郡王叡将兵监之”(《资治通鉴》卷一六六)。这条长城是利用北魏“畿上塞围”长城的北环，短期内加以修缮补筑而成的，共动用劳力180万人。这在长城建筑史上是很少有的。

天保七年(556年)，“齐自西河(按：今山西汾阳)总秦戍(按：今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按：今山西朔县境)而东至于坞纒戍(按：今山西繁峙县平型关)，凡四百余里”(《北齐书·文宣帝纪》)。河清三年(564年)，又修葺库堆戍至山海关间1000余公里长城，“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北史·斛律羨传》)。

(二) 北齐西部长城

北齐河清二年(563年)，武成帝“诏司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轹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这道长城沿太行山修筑，南起今河南济源市北的轹关，即太行八陉的第一陉，向北经尤关、广昌至今河北阜平县止，全长100公里，以御北周东进。

据今人考察，北齐长城的位置大体与明长城相仿，被明长城覆盖，可见遗迹很少。从总体上看，北齐长城经过多次修建，最终形成两条主线，其一道为北外边，起于今山西西北芦芽山、管涔山向东北延伸，经大同、阳高、天镇北境进入河北张家口、赤城，沿燕山山脉东南行经至居庸关东，入天津黄崖关东行，复入河北达抚宁县榆关镇渤海岸边。另一道为重城即内长城，从山西西北的偏关一带东南行，至宁武县北向东北行，沿恒山山脉经雁门关、平型关，从下关入河北沿太行山北上，在北京西北的居庸关与外边长城相连，长约千里。今天津、河北、山西的一些地方尚有北齐长城遗址可寻。

今天津蓟县黄崖关一带,北齐长城遗址与明长城时断时续相连。北齐长城系纯石筑,为白色,墙身低窄,呈内低外高,最窄处顶宽仅2米,女墙高1.14米,垛口宽0.5米。山西偏关老营镇南尚存一段长约25公里的遗迹,最高3米,宽4米,顶宽约0.5米。其中一段2.5公里长的石筑长城,是用比较规格的自然石块垒砌而成,并勾石缝,划一整齐,强于秦代石筑的城垣。后世的隋长城、明内、外边长城,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北齐长城的基址。

五、北周长城

公元557年,北周灭掉西魏,公元577年,周兵入邺,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防御北边突厥、契丹南侵,北周承袭前朝之制,继续修筑长城,但工程规模不大。

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征发山东诸州人民修长城。据《周书·于翼传》记载:“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北周长城主要是对北齐长城的修接,间有新筑。据今人勘察,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渤海乡杨东庄至长城乡馒头山,有一段保存较完好的呈东南至西北走向的北周长城,墙垣系发红色的土夯筑,当地称为“红墙子”。

六、隋长城

公元589年,隋攻克建康,至此,隋文帝实现了中国南北方的统一,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400年间的封建割据分裂局面。为防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侵犯边境,隋王朝在前代原有长城的基础上,多次修缮补筑长城。尽管征发劳力数量很大,但工期短促,鲜有增筑,因此远远不及秦汉长城修建的规模宏大。

隋代在燕赵地域修筑的长城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开皇元年（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所谓稽胡，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指住在汾州的胡人。隋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县。这段长城的修建只20天，可能只是对北齐黄栌岭长城的修缮。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又修竣了北齐北边至海的一段长城。开皇三年（583年）又在临渝镇改筑关城，称为临渝关或渝关，故址即今河北山海关。开皇六年（586年），发丁15万，于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以东，缘边险地筑数十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发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东至紫河（今山西大同市西北），二旬而毕。同时，西起榆林东至今天津蓟县，还修起一条宽百米、长约1000公里的御道。

隋长城西段起宁夏，经陕西北部至内蒙古的榆林，到黄河西岸止。东段在山西偏关分内、外长城。内长城是沿用北齐长城，起偏关向东南沿恒山山脉的雁门关、平型关，至太行山入河北，经倒马关、紫荆关，至燕山山脉的居庸关，与外长城衔接。外长城是沿用北魏长城，起山西偏关向东北至紫河，入河北张家口、独石口，经古北口、木兰峪直至临渝关（今山海关）。

今山西境内，存有隋代所筑石州长城、岚州长城，长达500余公里，其遗址有的墙垣高为4米，顶宽3米，不少地段是沿用北齐长城旧基。明代筑次边长城和重立关城时亦沿用了隋长城旧迹。

七、唐、宋、辽时期

唐、宋、辽时期长城基本处在修筑工程停息阶段。

盛唐时，疆域北达贝尔加湖和叶塞尼河上游，长城带基本上已是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相互和平融合区域，失去前代戍守防边作用。

北宋，北部疆域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州市、山西雁门山一带与

辽接壤,宋朝只有在秦汉长城以南,营建城堡,防范辽、夏的入侵。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在今山西代县一带的雁门、句注修筑城堡,以防御辽的南进。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代州刺史杨业,率数千兵,在雁门关北口出击,击败来攻的10万辽军。时称杨业为“杨无敌”。后人据此演绎为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小说和戏曲。

公元988年,北宋又开凿了一条举世无二的“水长城”。这条水长城,是沟通河北平原的易水、白洋淀、文安洼,至今天津静海县贾口洼通往渤海口入海的水道。全长400余公里,水面最宽处为30公里,备战船百艘,间筑碉堡26座。水长城当年即开凿完工,公元989年,就成功地阻挡了辽军骑兵在河北平原的南侵。此后,又在历次宋辽战争中发挥作用。同时,在水长城边屯田,大量种植水稻,促进了燕赵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辽代,燕赵地域的长城已在其辖境内。因此,修筑长城的工程很少,规模也小。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908年),“筑长城于镇东海口”。经调查,在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南关岭,存有辽城墙遗迹,并采集有辽代铁镞等遗物。据此考证,辽代镇东海口长城即建于此地。

八、金代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明代之前,由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金王朝,修筑长城的规模最大。金长城遗迹(含堑壕和副线)长近5000公里,为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据史籍记载,为防御漠北的蒙古族,金朝先后数次动工修起两道长城,后人称其为明昌旧城、明昌新城。

明昌新城,远在明昌旧城以内,又称金内长城,西起静州(今陕西省北部),经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东达黑龙江省的松花江畔,长

达 1500 余公里^①。其中有很大部分在燕赵区域内。

金长城是由长城界壕和边堡关隘构成较历代更趋完备和适用的防御体系。界壕系就地掘土成壕，土石方都堆积壕南垒筑成一道不很高的长墙，可阻碍战马冲越。其主、副墙并列，墙上附筑马面和烽燧，内侧配置戍堡、关堡，可大量屯兵，增强了前沿和纵深防御能力，攻守相应，建筑布局和设计更为合理，为后世明长城所效法。

今河北、内蒙古交界处的金长城遗址，由内蒙古多伦县至河北沽源县，向北入内蒙古太卜寺旗南境，复入河北康保县，向西再折入内蒙古化德县境。这一带为燕山西脉与阴山相连的塞外草原地形。河北沽源境内遗迹长 15 公里，康保县境长 65 公里。在金长城遗址内侧，考古发现两座屯兵戍守的古城，为正边长 200 米的方城，出土了金代白瓷碗、绿釉缸、六耳铁锅等戍卒日常生活用品。

九、元 代

元建大都于今北京，对于一直在长城以北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统治者而言，燕赵成为“腹里”地区，长城已无防御作用。元代对长城关隘加以修缮，设兵据守，主要是检查行旅客商，防止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和反抗。

第四节 明 长 城

明初，大多数的蒙古族人仍然留居内地，他们已从事农业生产，少数蒙古贵族率众返回漠北旧地，分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

^① 罗哲文、刘文渊：《世界奇迹——长城》，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 页。

仍时常南下侵扰。明中期,东北的女真族兴起,伺机南下中原,又对明王朝构成威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当时形势下,迁都北京有利于抗击从北边来袭的蒙古骑兵,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这对维护全国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为巩固北边防务,保卫京师安全,从明初至明末的200多年,明王朝一直不间断地修筑长城、经营边防,成为中国历史上修建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完善的一个朝代。

明长城在工程设计、建筑施工、防御体系和结构完善等方面,远远超过历代长城,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燕赵地域的蓟镇长城,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誉的山海关,则是至今保存最完整、最有特色的明长城建筑技艺的杰作。

一、明长城的修建

明长城,西起今甘肃省嘉峪关,行经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止于鸭绿江畔的虎山,总长约6700公里,合13400华里。

明长城大体经历了明前期的缮治、明中叶的大规模兴筑、明后期的重建与改线三个阶段而成。明长城亦称“边”或“边墙”。以规模和功能划分为“大边”、“小边”、“主边”、“次边”。自居庸关以西,又分内、外长城。它们相结为一体,构成拱卫京师和京畿之地的坚固军事防线。由此,体现出明王朝的治国方针和军事战略思想,也为明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勃兴,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明前期(1368—1447年),修缮长城工程主要是沿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旧基,缮治居庸关至山海关沿边关隘、今山西大同至北京西

北的外边长城。“峻垣深壕，烽墩相接”，“自长安岭（按：今河北宣化境）迤西，至洗马林（按：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边防》）。洪武六年（1373年），修筑自北京东北、西北部燕山山脉至军都山的关塞隘口。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率兵修筑界岭、永平、山海关一带等32关。即增建墩台烽墩，堡堑关城，把前代土垣边墙改为“皆筑石垣”。明成祖永乐中，筑辽河一带边墙，起广宁（今辽宁锦州市）东至开原，长350公里。

明初，修缮长城是为了积极备战。洪武二十至二十九年（1387—1396年），明太祖对蒙古族各部发动6次较大规模的征战，平定北边。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明成祖先后5次发兵，并亲征漠北，迫使瓦剌、鞑靼接受明廷的册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北京是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的封地，又为辽金元之故都，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北京成为燕赵地域的精华所在。

明永乐以后国势渐衰。明中叶（1448—1566年），明王朝在“土木之变”后，面对蒙古族不断南下掳掠，只得尽倾国力修筑长城，广筑堡障，以加强北边纵深防御，拱卫京师的安全。自黄河上游以西修了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重镇长城，黄河中游以东至渤海、东北至鸭绿江，修筑了大同、宣府、山西、蓟、辽东五重镇长城。

据《全辽志》等史书记载，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修筑辽西边墙；明成化（1465—1487年）年间，修筑辽东边墙。而至明正德（1506—1521年）年间，沿辽河东西两岸，始筑成辽河套边墙。至此，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边，长上千华里的辽东边墙，总体完工。今辽东镇长城保存下来的遗迹很少。

明外长城属宣府、大同镇辖，西起北京延庆县四海冶与内长城分岔，经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入内蒙古兴河，西抵黄河，全长650余公里。自明正统十四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449—1547年），近百年间多次修筑宣、大边墙。

明中叶长城建筑结构大为改进,在宣、大边墙修筑时尤为显著。其一是在城墙上筑实心敌台,城垣下置暗门;其二是在长城内外遍设戍堡,构成城墙、敌台、关隘、堡障、烽墩相连一体的纵深防御工程。今宣大长城砖墙多毁,夯土城墙尚存完整。

明内长城与外长城分岔后,经居庸关西南,行至河北紫荆关、倒马关,进入山西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西抵偏关丫角山复与外长城相衔,全长 1025 公里。主要部分隶属山西镇治的内长城,自明成化二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466—1544 年),增修为数重长城,构成防卫甚严的一至四边。嘉靖(1522—1566 年)年间,增修自紫荆关以南沿太行山麓而下经娘子关、马岭关、黄榆关、峻极关,抵黄泽关的一道内长城。系土石混筑,沿线设关城、敌台。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内三关城始完备。外三关之一的雁门关敌楼遗址,券门上今仍清晰可辨明代垂花门罩砖雕,其雕刻艺术精美富丽,是明长城建筑艺术众多瑰宝中的一枝奇葩。

明后期(1567—1620 年),自山海关至嘉峪关,长城主要工程是对城墙加以重建或改线。大部分采用砖墙、石墙、夯土墙。蓟镇长城则全部用条石作基础,至 1 米高处上砌青砖,中填碎石土,两侧墙身白灰勾缝。城墙呈梯形上小下大。墙顶为“十人同行,五马并骑”之制;内砌女儿墙和垛口,用以了望和射击;并开券门供通行,筑排水沟和吐水石槽,以保护墙身免受侵蚀。骑墙上修建大量空心敌台,以加强防御功能。这也是长城建筑史上最具特色、最为完备的一个阶段。

明万历(1573—1619 年)年间,山西、大同、宣府镇的长城、关城、敌台、屯堡,相继易以包砖。

蓟镇长城在谭纶、戚继光主持下增筑砖石空心敌台 3000 座。据《明史·戚继光传》所载:“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至隆庆五年(1571 年),蓟

镇边墙砌筑砖石和空心敌台工程完工,自居庸关至山海关“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组成一道坚固的军事防线。

又据戚继光《练兵实记·杂集》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戚继光还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攻防战术,“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边事”(《明史·戚继光传》)。

二、明长城的九镇

明代实行“兵卫所制”,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史·兵志》)。每镇设总兵官统辖,亦使“九边联络,建师屯田”。

明长城的九镇中在燕赵地域的有五镇:

(一) 辽东镇

永乐七年(1409年)置,镇初治广宁卫(今辽宁北镇),后移治东宁卫(今辽宁辽阳市),是九镇最东的一镇。“辽东全镇延袤千余里,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福余真番之境,实为神京左臂”(《九边图说·辽东》)。管辖长城西起山海关北吾名口,东至今辽宁丹东鸭绿江畔江沿台,总长975公里。鸦鹞关、抚顺关、广顺关、镇北关为其著名关隘。辽东边墙“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烽燧斥堠,珠连璧贯”(《皇明从信录》)。其建筑结构形式多样为明长城之最,计有土墙、石墙、石垛墙、柞木栅、木板墙、劈山墙、山险墙等7种形式,均因地制宜。

（二）蓟 镇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置,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三营屯镇),是九镇战略位置最重要的一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谷,抵昌镇慕田峪界,边一千余里,分十二路辖以三协”(《长安客话》),为京都左辅。管辖长城东起山海关长城入海口老龙头,西抵居庸关灰岭口,南至黄榆关(今河北邢台市西北太行山岭),全长1500多公里。嘉靖三十年(1552年)为加强对皇陵和京师的防卫,又析宣蓟二镇,增置昌镇和真保镇,归蓟镇管辖。著名的雄关隘口包括山海关、居庸关、黄崖关、紫荆关、倒马关、龙泉关、固关、古北口、喜峰口。现存八达岭、金山岭、慕田峪、山海关长城,建筑结构以砖石为主,形式独特,造型精湛,是明长城精华荟萃之处。

（三）宣 府 镇

永乐七年(1409年)置,镇治宣府卫(今河北宣化),是兵家必争之边陲重镇。“南屏京师,后控沙漠,左扼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读史方輿纪要》)。管辖长城东起慕田峪渤海所和四海冶所分界处,西达西阳河(今河北怀安县境)与大同镇接界处,总长558公里。宣府镇分六路防守,有卫城15座,重要的关口有张家口、独石口、新河口、马市口等,为明代汉蒙互市的关市、马市和民市等重要贸易交流地区。据明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

（四）大 同 镇

永乐七年(1409年)置,镇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为边塞军事重镇。“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塞,归京师之藩屏”(《读史方輿纪要》)。管辖长城东起天成卫(今山西天镇)平远堡界,西至丫角山(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口子上村东山)与山西镇接界,总长335公里。大同镇自西而东分八路管辖,边境贸易特别

是马市十分活跃。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月市”记载，万历十年（1582年），三镇每月易马5万匹以上。

（五）山西镇（亦称太原镇）

镇初治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后移治宁武所（今山西宁武县），是畿辅京师的重镇。“偏关、宁武、雁门，自西迤东三关并列，西尽黄河东岸，东抵大同”（《九边图考》）。管辖长城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旧县城）东岸，经偏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至河北阜平县的龙泉关，南行至山西和顺县东太行山脉黄榆岭与蓟镇长城重合。山西镇长城为内长城，城墙多重，有的地方石墙多达20余重。偏头、宁武、雁门为著名的外三关，有“天下第九关”之称的娘子关和平型关亦为名关险塞。山西镇长城遗迹经修复，今尚连贯，雁门关外白草口至新广武一段是其精华之处。

随着火器的兴起和广泛运用，冷兵器被逐渐取代，城防战略战术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有清一代虽然在某些地段修筑过长城，但从整体上讲长城已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保存了。清康熙时，下令停止修建长城。康熙至东海巡视时，写下了著名的《长城》一诗：“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抒发了他效法儒家“治国在德不在险”的政治主张。有明一代，也就成为2000多年长城史上，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封建王朝。

雄关存旧迹，形胜壮山河。长城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应，熔铸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勤奋、聪明智慧、坚韧刚毅、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

第五章 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

燕赵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萌芽于原始社会,在战国时期,已初具规模。魏晋十六国北朝时,燕赵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发展较快。唐宋金元时期,燕赵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进入全面迅速发展时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工艺技术精品层出不穷。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燕赵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缓慢发展。

燕赵古代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的发展成就,充分体现了燕赵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特色。

燕赵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燕赵的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在中国科技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古代享誉世界的八大科学家,燕赵独占其三。燕赵天文学、医学上的成就,在全国首屈一指。

燕赵平原广阔,农业成为燕赵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燕赵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的成就,多与农业有关。天文、历法与数学,自其诞生之日便为农业提供直接服务。冶金所造铁农具,为农业发展开辟道路。农田改造与水利技术,成为农业科技的重要内容。发达的农桑业又为丝织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燕赵自古便为四战之地,连年战争刺激了燕赵冶铸技术的发

展。青铜兵器、铁兵器铸造颇为发达。残酷的战争造成巨大伤亡，战后往往瘟疫流行，辽金元时期燕赵医学的飞速发展，便与连年战争有关。

燕赵活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是民族融合之地，民族特点成为燕赵工艺技术的一大特色。鄂尔多斯式青铜兵器、辽鎡铁、金银器、瓷器、元“纳失失”锦，都是颇具民族特色工艺的当世珍品。它们的工艺技术成为燕赵工艺技术史上颇具特色的重要部分。

第一节 天文、历法与数学

在天文观测与历法创制史上，燕赵儿女作出了杰出贡献。北周时期，中山毋极（今河北无极县）人甄鸾所作《天和历》，在天和元年（566年）颁行北周；东魏河间信都芳所编《灵宪历》，推算出月有大频、小频，食必以朔；隋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人刘焯作《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内插法以计算日月视运动速度。在众多科研成果中，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对天文观测所作贡献和他们先后所创《大明历》、《大衍历》、《授时历》，在中外天文历法史上享有盛誉。

天文历法与数学关系密切，天文观测与历法创制需要复杂的数学推算，天文历法的进步刺激数学的发展，发达的数学为天文观测与历法推算的精确提供保证。祖冲之父子的数学成就领先世界，其所制《大明历》也以推算精确著称。僧一行、郭守敬为提高天文历法推算精确度所创立的不等距二次内插法、招差术、弧矢割圆术，成为数学史上的重大发明。

一、祖冲之父子的数学、历法成就

祖冲之、祖暅之父子，祖籍范阳县(今河北涿水县)。祖冲之的祖父祖召、父亲祖溯之，颇通数学。祖冲之、祖暅之继其遗业，在数学、历法上创出辉煌成就，成为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科学家。

祖冲之生于宋元嘉六年(429年)，卒于齐永元二年(500年)，他推算的圆周率，被后人称为“祖率”。他应用刘徽的割圆术，在此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 $3.1415926 < \pi < 3.1415927$ 。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000年后才算出了比此更精确的数值，这个数值正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为方便计算，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一个是 $355/113$ ，称为密率；一个是 $22/7$ ，称为约率。约率与阿基米德结果相同，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进分数。在欧洲，十六世纪数学家安托尼兹(Anthonis Zoon, Adriaen)才得出这个数值。

在球体体积计算上，祖暅之继承刘徽的成就，应用“缘冥势既同，则积不容异”(《九章算术》李淳风注引“祖暅之开立圆术”)，即“等高处横截面积常相等的两个立体，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巧妙地完成了刘徽的未竟之业，得出球体体积 $=\pi D^3/6$ (D 为球体直径)的正确公式，这便是著名的“祖暅公理”，它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里(Cava Lieria)公理，但它的发现比祖暅之迟约1000年。

祖冲之还研究过“开差幂”与“开差立”，这是解决二次方程、三次方程求解正根的问题。祖冲之父子的数学成就汇集在《缀术》一书中，此书唐初曾被列入“十部算经”之中，规定学生学习时间为4年。流传到朝鲜、日本后，此书也被列为学校教材。

在历法方面，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此历法第一次应用“岁

差”，提高了历法推算的精确度。虽然此岁差常数比较粗略，但自此以后，回归年和恒星年两个概念成为制定历法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大明历》中，祖冲之提出在 341 年设置 144 个闰月；推算一回归年长度为 365.24281481 日，误差只有 46 秒左右；推算出太阳系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其中水星与木星的会合周期接近现代数值。此外，祖冲之还第一次算出月交点（月亮连续两次经过黄道和白道的同一交点所需时间）的长度为 27.21223 日，与现代推算相比，只有 1/100000 的误差。祖冲之在天文历法学上的成就，代表中国观测技术和推算方法在此时期的最高水平。

二、子午线测量与《大衍历》

唐朝，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僧一行在天文观测上的贡献和他制定的《大衍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僧一行（673—727 年），俗名张遂，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唐开元五年（717 年），一行受诏入京，“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旧唐书·一行传》）。为使所撰历法与实际天象相合，一行组织一批天文学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

首先，一行和当时的机械制造家梁令瓚一起，共同研制了黄道游仪，用它重新测定 150 余颗恒星的位置和月球的运行。经观测，一行发现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自行”现象。因此，在编撰新历时，一行放弃了沿用 800 多年的二十八宿距度数据，采用了新的数值，使新历法的精确度大大提高。为了使所撰新历适合于全国各地，一行在全国选择了 12 处观测地点，并制造了一种名为“复矩图”的测量仪，供观测使用。经实际观察与测算，一行得出南北相距 129.22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 1° 的结果，

这实际上就是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这个结果虽然误差较大，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子午线进行的实测。

开元十三年（725年），一行着手编制新历，开元十五年（727年），他所编修的《大衍历》草稿问世。此历以隋时刘焯《皇极历》为基础，加以发展，分为7篇（步中朔术、发敛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交会术、步轨漏术、步五星术），内容和结构都很有系统，这标志着中国的历法体系已经完全成熟，此种历法结构一直沿用到明末西方历法引进之前。在《大衍历》中，一行根据实测材料，对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作了比北齐张子信、隋代刘焯更合乎实际的描述，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定气”概念。《大衍历》中的太阳运动表，即日躔表就是根据定气编纂的。一行把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所走的度数平分为24等分，太阳每到一个分点就是一个节气，由于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两个节气之间所需时间各不相同，太阳从冬至点运动到春分，时间为88.89日，从春分到夏至时间为93.73日，夏至到秋分，秋分到冬至，情况相同。为了从数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行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成为数学史上的一大进步。此运算方法使《大衍历》的运算更加精确。《大衍历》在日月食和五星运行计算方面也都有较大进步，如它考虑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创立了一套计算视差影响的经验公式。宋人欧阳修称：“自太初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新唐书·历志三》）《大衍历》行用后，经天文观测证明，非常精密，堪称当时最好的历法。

三、辽“中外合璧”星象图

1974年，在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发掘的辽代张世卿墓

色，中绘金乌；其余八颗，朱蓝二色各占一半。最外的一层，分布着黄道十二宫图形。各图形分别绘在直径 21 厘米的圆圈中。它们的位置，白羊宫和娄宿相对，其余各宫顺着钟针动向依次排列一周（见插图）。

此图以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为主，同时吸收了巴比伦天文体系中用人、兽形表示“黄道十二宫”的内容，用中国特色的彩色绘画法描绘而成。二十八宿创立于战国时代，黄道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由希腊传入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中国和西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生产实践经验，分别创立的划分天球的两个体系。此图的发现，为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增加了新内容，同时也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①

四、郭守敬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

元朝定都北京，燕赵大地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外围。邢台人郭守敬（1231—1316 年）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杰出代表。

至元十三年（1276 年），元政府设局修定历法，郭守敬、王恂等负责天文观测与历法推算。为了提高历法的精确度，郭守敬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观点，先后改进创制了简仪、高表（即圭表）、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等 10 多种仪器。简仪由传统浑仪发展而来，精确度大为提高，使用方便。它的赤道坐标装置，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仪，这比西方著名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类似仪器早 300 年。简仪上还装置了滚动轴承，减少了主要轮子的转动磨擦，这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所创的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博物馆：《河北宣化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8 期。

滚筒轴承早两个多世纪。高表高度为传统高表的5倍,测量的精确度在±2毫米之内。仰仪可以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的时间、时分。郭守敬的仪器仪表制造,将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组织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在北京、太原、成都等地设立27处观测所,组织17支观测队,对夏至日日影长度和昼夜长短进行观测,同时对二十八宿距星度数等天文常数进行测量。根据观测结果,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恒星测量,测出了前人未曾命名的1000余颗恒星,使记录星数从传统的1464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了星表。西欧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前观测星数是1022颗。郭守敬对恒星观测的业绩,体现了当时恒星位置测量的先进水平。

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为历法的制定创造了条件。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郭守敬在吸收前人历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创新,编制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授时历》确定每年为365.2425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这与现今世界通用的格里历所用值同,而它比格里历的产生早300年。

《授时历》在日、月、五星运动的推算中创造应用了招差术和弧矢割圆术。所谓招差术,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高阶等差级数的规律导出的一种内插法,《授时历》在计算中用到三次内插法。弧矢割圆术即是将圆弧线段化成弦、矢等直线线段来计算的一种方法,在它们的化算中使用了若干和球面三角术相合的公式。这两种方法的应用使《授时历》在数学计算上超过前人。在计算方法上,《授时历》的突出成就还有废弃繁杂的上元积年法,既使计算趋于简便,又提高了计算的精度;改平气为定气以及采用万分法,避免了复杂的分数运算。

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恂去世。当时新历虽已颁行,但许多材料尚未整理出来,郭守敬继续整理定稿。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完成了《推步》、《立成》等长篇天文著作。《授时历》颁行后,在中国实际上施行了36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它传到高丽、日本后,对朝鲜和日本的历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天文学会等组织为纪念郭守敬的贡献,决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和太阳系一颗国际编号为2012的小行星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

五、天元术

天元术是解决列方程问题的一项成就。在金元之际燕赵出现了一批有关天元术的著作,可惜大多已亡佚了。现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有关天元术的著作,便是金元之际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数学家李冶(1192—1279年)所著《测海圆镜》与《益古演段》。《测海圆镜》共12卷,收入170多个问题,都是已知直角三角形中各线段进而求内切圆和旁切圆的直径问题。《益古演段》是天元术的入门著作。在《测海圆镜》序中,李冶认为:“自然之数”正是自然之理的反映,它们是可以探求明白的。在《益古演段》序中,李冶还对轻视数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天元术中“立天元一为某某”正是“设 x 为某某”的意思,其方法和现今代数列方程方法相同,只是排列符号不同。天元术的出现,解决了一元高次方程列方程的问题。李冶因其在天元术方面的贡献,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第二节 地理学

一、《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州市)酈道元所著的地理名著。全书约30余万言,共14卷。名义上是注释三国时桑钦所撰地理学专著《水经》,实际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造。《水经注》文字比《水经》增加了20多倍,内容非常丰富翔实。

酈道元,字善长。他的出生年月,史无明文,卒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年约60岁左右。他一生勤奋好学,注重实地考察。少年时他便随父遍游山东,出任山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后,遍游河南、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游览名胜古迹,“导图访蹟”,“访渎搜渠”,勘察水流地势,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参阅前人著作437种,写出世界名著《水经注》。

《水经注》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地理巨著。它集北魏以前中国舆地图籍之大全,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学术成果。酈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裂的时代,但他视野开阔,眼光远大而又饱含爱国之情,把整个中国不分华夷地作为一个总体对象记述,十分可贵。

《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古河道变迁等情况,以北方诸水记述最为详细、生动。除记述国内主要河流外,《水经注》还记述了朝鲜的溟水(大同江)、印度的新头河(印度河)等外国河流。这样大范围的河流记述,在当时堪称规模空前。除河流之外,《水经注》对古代的城邑、著名的建筑和水利工程的历史变迁作了详细记载。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城邑从勘测设计直到建筑竣工的完整资料,尤以平城、洛阳和邺城等大都会的资料为详。

《水经注》对历史地名、自然地理也多有记述。书中记载了水名、山名、湖泊名、城邑名等各类地名 2 万多个,著录温泉 41 处。书中还对自然地理学中的伏流现象作了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

《水经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例新颖。在地理考察和研究中,酈道元深切感到《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等著作因体裁所限,失之简略,且不能畅达其意。《水经》只记水道,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酈道元以水系为纲,作《水经注》,详细记述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等,尤其对河流分布、渠堰灌溉和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概念。《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这种综合性描述,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许多历史事件增加了具体空间的真实感,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现今的城市规划、运河选线、寻找地下水源以及研究气候波动、海岸变迁、港口选择等仍具有现实意义。

《水经注》以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水经注》也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山水游记。《水经注》问世以后,人们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探讨,以至后来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酈学”。著名学者如全祖望、戴震、杨守敬、王国维等在“酈学”的研究中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贾耽的地理学成就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29—805年),字敦诗,河北沧州南皮人。一生嗜读地理著作,重视实地考察,注意搜集资料。他在出任鸿胪卿期间,见到域外使者和出使外域的人,总是热心地向他们询问和搜集各地风俗人情、山川河流、城镇物产和地势关隘等情况。经过 30 年的学习调查,“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旧唐

书·贾耽传》)。贾耽凭着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爱国热情,先后绘制了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图和《海内华夷图》,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越南河内市)、中亚、印度、巴格达的交通图,并撰成《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皇华四达记》1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这些著作大多已失传,《海内华夷图》在1137年被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于西安碑林。

《海内华夷图》是贾耽奉唐德宗命令所制的一幅有很大影响的全国性地图,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此图注重外域,因此名为华夷图,对边疆地理的研究颇有贡献。全图宽3丈,高3丈3尺,绘在网格上,一寸相当50公里(即1:1800000)。图的画法师承裴秀“六体”。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以红色书写当时地名,使“今古殊文,执习简易”,这是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为后世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国势日趋衰落,当时的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曾被吐蕃侵占,贾耽竭力维护国土的完整,绘制了关中、陇中、山南九州图,“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察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旧唐书·贾耽传》)。在《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中,贾耽纠正了以往史书中的许多错误,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他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他则改入康居等,表明贾耽治学严谨,不愧为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三、《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赵州(今河北赞皇)人李吉甫所著的地理名著。此书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镇,40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有目录两卷,共42卷。图后代佚失。

李吉甫(758—814年),宪宗朝大臣,官至宰相。他学识渊博,鉴

于以往地理学著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自序》),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的需要出发,撰成《元和郡县图志》。此书记述了当时全国 10 道所属州县的沿革、通道、山川、户口、贡赋和古迹等,成为“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自序》)的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地理学著作。

《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魏晋以来所著述的全国性地理书。它所创图、志配合的体例,是周隋以来志记图经的发展,它与《括地志》的有志无图不同,与《郡国道县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为地图附录而成书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它继承和发扬了《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地理学体系,对后世全国性地志的编纂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第三节 医药学

燕赵医药学发展较早。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植物种子 30 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在台西 14 号墓中发现一件装在漆盒中的石镰,此石镰是当时的医疗器具砭镰。

燕赵医药学贡献突出。战国时期出现了被称为神医的扁鹊。金元时期,出现“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河间刘完素与真定李杲因其独到的理论与妙手医术,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王清任对中国现代解剖学有创始之功。

燕赵医学家们的医学思想颇有革新精神。扁鹊反对巫术,王清任冲破礼教解剖尸体,在医学思想上颇有贡献。

一、扁鹊的医学成就

战国时渤海(今河北任丘市)人扁鹊(姓秦名越人)的医药学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由于他医术高明,技艺专精,被后人尊称为“神医”。扁鹊在医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初步建立医学体系。此体系包括:医学分科专门化;诊断方法上使用“四诊法”;治疗上采用综合治疗法。

医学分科专门化。扁鹊在行医实践中,根据各地人民的实际需要,创立了小儿科、五官科、妇科。扁鹊行医到邯郸,邯郸风俗重视妇女,且有许多名妓娼优,扁鹊便专门研究妇科疾病,使自己成为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创立妇科。到洛阳时,扁鹊针对周人爱老人,而老人多五官科疾病,便为“耳目痹医”,创立五官科。行医至秦,扁鹊看到秦人偏爱小孩儿,便为“小儿医”,创立小儿科。医学分科专门化,为医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诊法。在诊断方法上,扁鹊创立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据《史记》记载,扁鹊初次见到齐桓侯,便用望色法诊断出齐桓侯有病,“不治将深”,后扁鹊几次用此法诊断桓侯病情,并提出忠告,桓侯不听,最后如扁鹊所言病亡。至于脉诊法,《盐铁论》说:“扁鹊抚息而知疾病所由生。”《史记·扁鹊列传》载,赵简子“五日不知人”,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三天后赵简子病愈。《史记》评价:“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四诊法创立后,成为中医诊断的基本方法,沿用至今。

综合治疗法。在治疗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具体治疗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治疗法。扁鹊在魏国行

医时,遇魏太子得假死之症,他先后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使准备下葬的太子起死回生。综合疗法的使用,收到极佳效果,“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

在医学思想上,扁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在和当时盛行的巫医的斗争中,提出“信巫不信医”为病之六不治之一。在巫与医的斗争中,扁鹊使医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据史书记载,扁鹊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多部著作,对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代表当时全国医学的最高水平。

二、河间学派

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市)人刘完素(约1120-1200年)以其独到的医学理论和高明的医术,创立了河间学派。

刘完素自幼耽嗜医学,25岁时开始研究《内经》,他把《内经》理论和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学说相结合,对火热病证详加阐述,提出了“火热论”的学术主张。

火热论是探讨人体病因的理论,火热是导致人体多种疾病的原因。刘完素采用比物立象的验证方法,发挥《内经》运气学中亢则害、承乃则、制则生化的理论,把《内经》病机19条中有关火热病证的范围,由10多种扩大到50多种;并提出“六气都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理论。他认为“风可化火”,“热甚生风”,“热能生湿”,“湿可化热”,燥病的形成,也是风热所致,是“风能胜温,热能耗液”的结果。寒病除了“中寒”之外,也可热化。刘完素“六气都从火化”的论点,阐明了火热之邪在各种疾病中的主要地位和对人体的危害。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刘完素将惊、躁、扰、狂、越、妄、谵、郁等证,都列为火热之变。针对情志过甚则热的情况,联系水火、心肾之间的关系,提出

“润万物者莫泽乎水”的治则,在治疗上注重“养肾水,胜心火”,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根据火热致病的特点,刘完素突破《伤寒论》温药解表,先表后里,下不厌迟的成规,在治疗上善用寒凉之剂,提出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清热养阴等法;他还自制了不少新药方,开创了温病论治的先河。对各种外感火热病证,进行分类,主要分为表证、表里同病、里病三种类型,对各种病证,辨证施治。故后世有“外感法仲景,热病法完素”之说。刘完素对热性病的治疗,善用寒凉药,强调“须知寒凉之味”,后人因此称之为“寒凉派”。刘完素虽以善用寒凉药物著称,但他在临症时则注重辨证论治,寒热温凉攻补之法随证而施。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指出:“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六气同法,泻实补虚,除邪养正,平则守常,医之道也。”辨证施治,使刘完素突破了寒凉药物的限制,走向医学更高境界。

刘完素生平著有《内经运气要旨论》(已佚)、《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三消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伤寒心要》、《保童秘要》等著作。他对火热病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直接师承刘完素,浮屠传罗知悌,罗知悌再传朱震亨。张从正、葛雍等人的学术思想也是继承刘完素而来。他们不断丰富刘完素的理论,由金元到明代,从北方到南方,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河间学派”。

三、易水学派

(一) 张元素“脏腑辨证说”与易水学派的创立

金代易州(今河北易县)著名医学家张元素(1151—1234年),因科举不第,弃仕途而学医,精究《内经》,学习张仲景的药法,撷取王叔

和、孙思邈、钱乙和《中藏经》之说,经过多年实践,创立了独具特点的理论原则和治疗方法,开创了金元时期的“易水学派”。

据《金史》记载,张元素与刘完素交往甚密,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受到河间学派的一定影响。张元素反对当时医界过份泥守古方之风,强调疾病应因时因地因人而治。他在《素问》、《灵枢》、《素问玄机原病式》和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汇集成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和以“归经”、“引经”为基础的药性药理理论。

张元素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他创立的“脏腑辨证说”。此说比较系统地论述脏腑的生理和病理,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的辨证,以及脏腑病的演变和预告。在脏腑之中,张元素对脾胃颇为重视,认为“脾者土也,……消磨五谷,寄在胸中,养于四旁”;“胃者脾之腑也,……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毕壮也”。张元素用“补气”、“补血”法治疗脾土虚弱,对后人论治有很大启发。

在药理药法上,张元素深研“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李时珍:《本草纲目》),倡导药物归经学与“引经极使”说。认为药物只有归经,制方必须“引经极使”,才能发挥药力。他所拟定的制方五原则:风、湿、暑、燥、寒,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

张元素根据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具体制定“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把每一脏腑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都规定出来,为后世脏腑辨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药式给后世处方用药带来不少便利,因而受到李时珍的重视,被采录入《本草纲目》。

张元素的代表作有《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他的学说后传于李杲、王好古,李杲传罗天益。李杲等人在张元素理论的启发下,着重阐述脾胃的生理病理,形成温补派。温补派始于张元素,故又被称为易水学派。张元素被后人奉为易水学派创

始人。

（二）李杲与《脾胃论》

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李杲（1180—1251年），师事张元素，尽得其传，并多有阐发。他重视脏腑辨证，精于制方遣药，尤其注重脾胃功能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脾胃论”学术主张。他善用甘温补脾的方法治疗内伤诸病，故被后世誉为“补土派”。

李杲脾胃论的中心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此学说发挥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不仅“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而且人身其他诸气也都由胃气所化。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生，把“土为万物之母”的论点引向更加广泛的范畴。李杲还把升降沉浮作为人体元气活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升已而降，降已而生，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并指出人体元气升降的枢纽在脾胃。脾胃不但将水谷精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在内伤诸病中，李杲重点论述了阴火病证。他认为元气与阴火相互制约。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独盛；反之，元气足则阴火降，“阴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等都是李杲的著名论点。在“脾胃论”中，李杲对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主要原因：即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作了详细论述，在形成内伤病的过程中，三者往往错综交织。李杲根据自己所创脾胃理论，在治疗上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对中气不足所致的阴火病证，特意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火热。李杲所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是甘温除热的代表方剂。李杲虽以补气升阳作主法，但在阴火亢盛时，也常借苦寒药从权施治。

李杲的著作主要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李杲所创脾胃论，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鲁斋：“东垣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脾

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王清任与《医林改错》

关于人体解剖的知识,在《黄帝内经》等早期医学典籍中已有论述,但存在不少错误。清代玉田(今河北玉田县)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年)著《医林改错》2卷,补充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中国的解剖学和医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清任,字勋臣。20岁左右开始学医,在行医过程中,深感解剖知识的重要,“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否则“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他研究了一些脏腑书籍和图形后,发现里面存在不少错误。古人的错误,“皆由未尝亲见”(《医林改错》上卷)所致,于是他下决心通过自己亲自解剖观察,纠正这些错误。

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观察人体脏腑结构极为不易。1787年夏季,在滦州稻地镇(今河北丰南县稻地镇),王清任用十几天时间亲自观察了30多具因传染病而死的小儿尸体,此后他又多次去刑场观察受刑人的内脏,并多方请教。没有尸体解剖时,王清任使用比较解剖实验法,解剖自己饲养的一些动物进行观察。经过42年的苦心钻研,著成《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一书包括王清任所绘“亲见改正脏腑图”,他的临床心得及其他有关医学论述。此书共有图版25幅。王清任把古人画错的和自己改正的作了对照,对解剖学的许多问题作了新补充,同时弄清了过去医书上从未提及的许多重要器官。他正确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横隔膜之上只有心脏和肺脏,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隔膜之下。记述了气管和由气管分至肺两叶的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纠正了前人所称肺有六叶两耳“行气之二十四孔”的错误。受西学影响,王清任对“脑髓”进行了研究,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纠正了“医书论

病言灵机发于心”的传统错误。

王清任注重实体内脏,富于创新,对中国解剖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医林改错》被认为是理精识卓的稀世之宝,一些西方人将它译成外文,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王清任的医学革新精神和他提倡的逐瘀活血法,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第四节 农业科技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大要素,它以物化的形式、集中地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燕赵最早的农业生产工具为石器时代所出石工具。夏商周时期,青铜农具在燕赵大地也有出土,只是青铜较贵重,很少用作农具制造,故出土量较少^①。战国时期,燕赵钢铁冶铸技术发展迅速,铁农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石家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一批农具,铁农具占65%^②;兴隆大副将沟出土铁农具铸范有耒、锄、镰、斧、凿等^③,天津北仓砖厂、辽宁抚顺莲花堡、鞍山羊草庄、宽甸双山子和敖汉老虎山等战国遗址都有多种类型的铁农具出土。汉代,燕赵广泛使用的铁农具比较先进,在今保定和满城出土了耙地松土三齿耙和双齿耙。在满城汉墓和石家庄市东岗头村,出土铁铧,大型铧锐利而厚重,适用于开垦

① 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7页。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会:《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③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生地；小而轻巧的铍适用于翻耕熟地。在辽阳三道壕遗址的房址内，出土了成套铁农具，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西汉时期辽东郡农业生产面貌^①。东汉时，一头牛挽的短辕犁出现，缩小了原来的V型铁犁的刃端角度，起土省力，便于深耕。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代，燕赵耕犁有较大改进。唐以前燕赵使用笨重的长辕犁，回转不灵，使用不便。贞观年间，河北定州一带出现制造曲辕犁的工匠，燕赵农业上开始使用曲辕犁。曲辕犁犁辕短而弯曲，耕地深浅自如。曲辕犁出现后，中国农业生产所用耕犁基本定型。辽金时期，为适宜山区播种的需要，燕赵人民创造了瓠种器。河北滦平县出土的瓠形器由一个葫芦和一根木杆组成，葫芦内装种子，中上部有孔，木杆首端有凹槽，穿出葫芦，为引播槽，此种瓠种器可使种子均匀地撒播到田地。辽宁昌图八面城、阜新红帽子古城和内蒙古赤峰等地出土的辽代铁锄，由锄钩和锄板两部分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元代，燕赵铁农具种类繁多，天津西郊元代遗址出土有犁铧、耨铧、犁镜、铲等。有的犁铧刃部和铧身分铸套合，既使铸造较易，又可以在刃部用坏后换新刃。犁镜可系在犁架上，视土质而调节角度。

二、耕作技术的发展

燕赵的农田耕作技术，秦以前缺乏较明确的记载。汉代，畜力耕作在河北已相当普遍。汉武帝时赵过推广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北朝时期，燕赵人民掌握了耕田耙地保墒、土壤改良、调茬、轮种、施肥、灌溉、中耕等田间耕作技术。辽时，在多风沙的燕赵北部地区，人民为防止吹沙壅塞田地，创立了因地势高下在垆上作垆田的独特耕

^①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作方法。汉代,河北中南部已是“四年而五获”,用复种的方法提高土地使用率。清代前期,河北农田普遍采用一年两熟制,收麦后种晚秋作物,收秋后接种小麦。不少地方还实行间作套种方法,“民之种五谷、棉花之畦,多种菜及豆,以附于畛”。此种耕作方法,对各种作物“不惟不相妨,而反相益,浇菜则禾根润,锄菜则谷地松,五谷熟而菜可继发”(黄可润:《畿辅见闻录》)。两熟制和田间套作技术,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为增加农作物产量开辟了新途径。

三、农作物品种优化、引进与推广

燕赵农作物品种,两汉以前以粟麦为主。从考古发现看,两汉时期就有稷、粳稻、大豆、麻、高粱等作物。北朝时期,燕赵人民已掌握了选种技术,农产品种类增长很快。辽代,契丹人攻破回鹘,得西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西瓜从此引入燕赵,后传入中原内地。明代,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在燕赵发展很快。经燕赵人民的长期精心培育,棉花品种日趋优好,在徐光启所列举的全国著名棉花品种中,其中“北花出自畿辅、山东,柔细中纺织,棉稍轻,二十而得四,或得五”(徐光启:《农政全书·木棉》)。天启二年(1622年),玉米种传入燕赵^①。清代前期,高产作物水稻在燕赵大地大规模扩种,仅雍正年间便扩种700余顷。乾隆年间,红薯由南方传入燕赵。黄可润在直隶无极县任职时,从南方运来数筐红薯藤,仿效南方种植方法,将红薯藤剪为一尺有余的小段,用土压埋,生根发芽,然后便结出许多红薯。方观承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在正定、保定以及京东通州等地,“饬各属劝农种植,以佐食用”^②,当时人称为“方薯”。乾隆以后,玉米在燕赵

① 见孙承宗纂修《高阳县志》和明末《兴济县志》。

② 乾隆《行唐县志》卷五《种植》;光绪《保定府志》卷二七《物产》。

大地广泛引种。红薯与玉米引入,不仅丰富了燕赵的农作物种类,也提高了粮食产量,对燕赵农业有深远影响。

四、农学著作与农学试验

燕赵农学上的成就,主要是编写了《劝农书》、《国脉民天》等农书,此外还有徐光启在燕赵北部进行农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就。

《劝农书》又名《宝坻农书》,明袁黄撰。袁黄曾任宝坻县令,他根据当地情况,写成这部地域性农书。书中包括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 8 篇,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关技术记述甚详。此书强调了改造盐碱地的重要性,提出实施方案:首先在潮水浸渍的地方“排沟筑岸,或树立桩橛”,阻拦潮水,继而开出“中间高,两边下”的田,并且相隔“数十丈即为小沟,百数丈即为中沟,千数丈即为大沟,以注雨潦”,“使淡水冲制咸卤,气尽便可种稼矣”。最初可以种水稗,数年以后,“斥卤既尽”,就可以种稻。他的方案是当地人民长期实践的总结,对于燕赵滨河地区改造盐碱地、推广水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国脉民天》,明灵寿进士耿荫楼撰。书中包括区田、新田、养种、晒种、蓄粪、治旱、备荒 7 款,提出区田、亲田等主要宗旨是倡导精耕细作,“锄不厌频,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所种之物)要仔细精拣肥实者方堪作种,用此地比别地粪力耕锄俱加数倍,愈多愈妙”。此书所述耕作技术,是耿荫楼吸收前人经验,并经本人亲自试验所取得的结论。

明末,徐光启曾在燕赵北部地区从事农学实验,进行实地考察。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他在天津经营水田,“三年大获其利”(《农政全书》凡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他写成《粪壅规则》一书,对天津、永平、真定等地的施肥经验进行了总结。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注重水利,特别主张首先发展北方水利,以改良土壤。他详细介绍了正定凿井灌田的打井方法和灌溉工具,并对燕赵北部地区的农田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第五节 矿冶铸造技术

一、铜矿冶炼工艺技术

燕赵大地铜矿产量较少,因此冶铸非常注重工艺技术。燕赵各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民俗风格,冶铸了颇具民族特色的青铜器。

(一) 商周时期冶铜工艺

商周时期,中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燕赵青铜冶铸在此时期开始发展。活动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燕山以南的燕赵人所铸铜器主要是工艺精美的礼器,其风格主要是中原农业民族风格,同时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罍、爵、觚、钺、匕等多件青铜器,非常精美。其铁刃青铜钺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色。北京黄土坡所出伯矩鬲等青铜器,造型庄重、华丽,工艺精美。在燕山以北,游牧民族铸造了大量颇具特色的青铜武器。他们所铸礼器虽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在昌平白浮西周墓中,发现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青铜兵器 60 多件,其中不少是鹰首和马首青铜短剑。在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北方草原民族所铸青铜器:羊首曲柄短剑、鹿首、铃首、环首刀等。唐县南伏城出土的凤纹贯耳壶、三足匜、绳纹鬲、蝉纹匜等铜器,既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又融有中原民族风格,是鲜虞族的早期遗物。在辽宁敖汉大甸子墓中出土的铜器,有的已使用了合范和内范。在赤峰四分地出土的一件陶范,有合范的母榫和刻划符号,这些出土物表明了燕赵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水平。

在西喇木伦河以北 30 公里大兴安岭余脉的一个平缓山坡上,发现了建平林西商周大井铜矿。在 2 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露天开采的矿坑 40 余个。遗址内发现一排炼炉址,有炼炉 8 座,炉壁为烧红的草拌泥,炉址旁有鼓风管、炼渣和铸小件器物的陶范。泥质红褐陶鼓风管长 40 厘米,管径 8 厘米。从烧结的炼渣分析,冶炼温度至少在千度以上。这是一个包括露天初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套工序,规模很大的古代铜矿山遗址。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冶技术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燕赵青铜冶铸工艺水平较高。1977 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冢墓出土战国晚期镶嵌金银 4 鹿 4 凤 4 龙青铜方案,最下部是 4 只梅花鹿,承托一圆圈,上面立有 4 龙 4 凤,交错盘绕成半球形,龙顶斗拱承一方案。4 鹿神态温顺,4 龙姿态雄健有力,4 凤展翅引颈长鸣,表现了巧妙的工艺构思。此墓还出土了错金银铜版“兆域图”、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灯等精美青铜器,“兆域图”用金银镶出了宫垣、墓葬位置,虎噬鹿器座生动展现了虎吞鹿的凶猛和鹿挣扎欲逃的情状。十五连盏灯高 84.5 厘米,由大小八节连接而成,每节皆有榫卯,榫口各异,移动时便于安装和拆卸。灯的中心柱上部有夔龙盘绕,灯枝上有群猴戏游,金鸟啼鸣。底盘上有两个穿短裳、上身裸露的男子在抛食逗猴。此灯工艺精美,十分罕见。此墓还出土一件用铜铁合铸工艺铸造的中山王冢铁足铜鼎,此鼎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较大的铜铁合铸器物。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原本春秋时期的鲜虞,是戎狄部落的一支,但从墓葬等文物反映的各方面情况看,中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接近赵国文字。同时大型山字型铜器、随葬帐具和大批错金银兽型器又显出地方和族属特征,同草原文化保持着一定联系。燕下都高陌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铜人像、老姆台出土的大型青铜铺首、东贯城出土的人物鸟兽阙形铜饰,都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战国时,燕赵北部活动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所铸铜器颇有民族风格。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出土一批精美铜器,罐、鼎造型美观,作工精细,工艺水平很高。墓中出土两件铜罐,器壁很薄,非青铜铸造,为锤胎,腹部有凸棱一周,系于器身上下部焊接处,器有极为精细、流利的针刻蟠龙纹,工艺水平很高,十分罕见,此墓所出兽首扁茎直刃剑、空鏃剑和兽形垂饰,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风格,这类器物在沿长城地带多有发现,内蒙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战国墓也出土了形制相同的青铜短剑,可见分布地域之广。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所出鹤嘴镞、锥等小件青铜器,也都具有“鄂尔多斯”风格。

战国时赵人荀子在《强兵》篇中对青铜工艺做了研究,总结出“刑范正,合锡美,工冶巧,火齐得”的工艺要点,对青铜冶铸的刑范、铜锡配比、冶铸工艺、冶铸火候等进行了概括,反映了赵国青铜工艺的发展水平。

(三) 汉代青铜工艺

汉代,燕赵青铜冶铸工艺发展水平很高。在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了“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以及大批带有“中山内府”纪年铭刻的精美青铜器。这些器物不仅造型美,装饰华丽,而且设计灵巧,铸工精练,是汉代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长信宫”灯作宫女跪坐持灯状,通体鎏金。全器6部分分别铸造,然后组成整体。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够随意调整灯光照射方向和角度的大小。宫女的右臂和身躯中空,烛光的烟炱通过右臂进入体内,从而保持室内清洁。此灯设计灵便合理,宫女造型生动逼真,其艺术水平之高,在汉代铜灯中首屈一指。铜错金博山炉,炉座透雕龙纹,炉身上部和炉盖铸出峰峦起伏的群山,山间点缀猎人和野兽。通体饰错金花纹。其造型之美、铸造技术之精,在同类器物中颇为罕见。鸟篆文铜壶的器身和盖都用纤细的金、银丝错出鸟篆文

吉祥语,纹饰精致,别具风格,表现了当时在金银镶嵌细工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

(四) 北宋正定铜佛像

北宋时,燕赵出现大型铜铸件。北宋初年所造正定隆兴寺佛像,高 24.33 米,重 5 万公斤,采用分 6 次铸接工艺,经 7 次铸冶而成;铜像当中用 7 条熟铁柱,高 21.33 米,每条铁柱用 7 条“铁笋合就”,上面用铁蛇固定,铸造技术水平很高(《正定县志》卷一五)。

二、铁矿冶炼技术

燕赵大地铁矿资源丰富,燕赵先民创造使用了许多颇具特色的铁器铸造技术。商代,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制造器物,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了铁刃青铜钺,铁刃为陨铁锻制而成。陨铁锻制和铁刃与青铜浇铸在一起的包套技术的掌握应用,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大进步。春秋时期,“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此事说明,燕赵已能用较大“铸型”来浇铸有铭文的铁器,冶炼、浇铸“铸铁”量很大。战国时期,邯郸成为著名冶铁中心,赵国出现了郭纵和卓氏为代表的因冶铁致富的大商人。在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平山县中山国遗址、邯郸赵王城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战国时的冶铁遗址,燕赵冶铁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直到辽金时期,燕赵冶铁技术在中国冶铁业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一) 战国时期的冶铁技术

战国时期,燕赵冶铁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石家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大量铁农具,兴隆大副将沟出土了 40 副 87 件铁制农具铸范,抚顺莲花堡、鞍山羊草庄、宽甸双山子和敖汉老虎山等地都出土成批铁农具。通过化学分析,测知它们均为高温液体还原法制造。易

县燕下都出土几百件铁制兵器,通过对 9 件进行金相分析,其中 6 件为纯铁或钢制品,3 件为经柔化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战国时期,燕赵已广泛使用块炼法,并掌握了将海绵铁增碳制造高碳钢和淬火技术。《汉书》记载:“巧冶铸干将之朴,清火淬其锋。”燕下都所出淬火钢剑,比《汉书》所记时代早两个世纪。

战国时期,燕赵冶铁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铁范的使用上。兴隆燕国遗址所发现的铁范,都是精美的白口铁铸件。范有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和双型腔,范的外形轮廓和铸件形状相似,壁厚均匀,收缩一致,可以增长铁范的使用寿命。铁范还采用了防止铸件变形的加强结构——金属型蕊。就是在现代,这也是不太容易处理的技术问题。铁范可以连续使用,有的可以同时浇铸两个铁件,这就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战国时期能用铁范铸出壁厚仅 3 毫米不到的薄壁铸铁件,技术成就十分卓越。在欧洲,十六世纪才开始用金属型蕊制造生铁炮弹,比中国晚 1900 年。

(二) 汉魏冶铁技术

汉代,燕赵冶铁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满城 1 号汉墓出土铁锭,经检验是含低硅、中磷、低硫元素的灰口优质铁;此墓所出轴承则为灰口铸铁,具有承载能力强、润滑耐腐蚀性能好等特点。灰口优质铁性能优良,它是炼炉巨型化、鼓风设施强的产物。此墓还出土一副铁甲和配剑,铁甲使用 2800 多片细小铁片编成,极为精致。佩剑使用“百炼钢”工艺,此工艺是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经加热反复锻打,挤出夹杂物而成。北京大葆台西汉墓葬出土具有钢的金属组织的铸铁件,它残存着少量细石墨,经过了脱碳热处理,熔铸时经过液态,杂质很少。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唐县灌城、保定壁阳城等几处古城址出土了大批铁器,其中铁齿轮的发现证明在当时某些工具已使用了简单的机械原理。

曹魏时,燕赵开始用煤作冶铁燃料。在邺城冰井台下,储藏有碳

数十万市斤。煤的使用,提高了冶铁质量,减少了原料消耗。

(三) “灌钢冶炼法”与“分节叠铸法”

北齐时期,燕赵出现非常先进的灌钢冶炼法。北齐綦毋怀文在广平郡县南干子城的干将铸剑处,使用灌钢法,利用“其土可以莹刃”,造出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背,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北齐书·綦毋怀文传》)。冶铸时,他把生铁烧成溶液,注入熟铁中,炼出灌钢,用熟铁为刀背,灌钢为刃,刀既锋利,又不易折断。

五代后周时,燕赵人民使用“分节叠铸法”,铸造出沧州铁狮子。此狮高 5.3 米,长 6.8 米,重 5 万公斤以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特大铸件。铸造时,以整块内模为蕊,使用 400 多块泥范拼接,反映了当时造范和铸造技术的进步。

(四) 宋辽金时的百炼钢、镔铁和坑冶法

宋辽金时,燕赵冶铁业发展到兴盛时期。邢州、磁州、相州、辽东等地成为重要的冶铁基地。磁州锻坊的百炼钢与辽东的镔铁是这一时期的技术精品。百炼钢生产技术由灌钢发展而来,“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量不减,则纯钢也”。这种纯钢,“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梦溪笔谈》卷三)。镔铁是契丹冶铁精品,坚韧似钢,经多次冶炼锻打而成,与磁州的百炼钢非常相似。镔铁制品成为辽向宋皇帝馈赠的礼品。契丹的冶铁技术,在阿保机时引进唐、室韦的坑冶法。辽灭渤海后,渤海成为辽的铁冶中心。坑冶法利用了渤海一带铁矿石的特性,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冶炼方法。

(五) 明代冶铁炉

明代,燕赵冶铁规模居全国之首。在技术上,采用巨大的炼铁炉进行冶炼。遵化铁场的大鉴炉高 4 米,前宽 0.83 米,一炉可容矿砂 1 吨多。河北武安县发掘的明代炼炉高 6.33 米,内径 2.33 米,外径

0.33米。使用大铁炉冶炼,产品入炉后,“用炭火置二橐(鼓风)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工部》)。

第六节 制瓷工艺技术

一、青瓷、邢州白瓷

商周时期,燕赵出现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瓷器出现,河北安平遼家庄东汉墓出土有瓷制品。三国到西晋,燕赵瓷器极少发现。北朝时期,燕赵青瓷大量出土。河北景县封氏墓中发现的瓷器,是北朝青釉瓷器的典型作品。此墓出土瓷器100多件,有绿釉陶、栗壳黄釉,还有很多浅青釉和淡黄釉的杯碗,一件豆青杂釉高脚盘,4个高约3尺的堆雕莲花青釉大尊。莲花尊造型奇特、雄伟。受佛教影响,尊上堆雕两朵大莲花,一仰一覆,颈部贴着浮雕飞天和飞龙,上加宝珠形顶盖。制造精美,施釉均匀,装饰瑰丽,集中运用印贴、刻划、堆雕等艺术手法,工艺水平相当先进。隋代,青瓷仍为燕赵瓷器的主流。在河北磁县贾壁村,发现隋代青瓷窑,此窑瓷器的瓷质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一层透明青绿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贾壁瓷器以轮制成形为主,只有少数附件如碗足、罐系等用模印、手捏好之后再粘接上去。^①

唐朝初期,燕赵白瓷的制作技术已非常先进,其工艺技术已可与青瓷平分秋色。唐代邢窑所制白瓷,成为燕赵白瓷制品的代表作。皮日休《茶瓿诗》云:“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段安节《乐府杂录》

^① 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代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第10期。

记,乐师郭道原“用越瓿、邢瓿十二,施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邢窑白瓷质量很好,胎骨坚实、致密,故叩击有金石之声。现存邢窑所出瓷器胎土色白而细洁,坯体极坚硬。釉白而润泽,有微微闪黄,带一点儿乳白色,胎釉之间有一层下釉,俗称护胎釉,烧成温度已达 1000℃ 以上,器物造型有浑厚凝重之感。邢窑白瓷产量极大,“天下无贵贱皆用之”(李肇:《国史补》),类雪的邢窑白瓷与越州青瓷齐名,当时远销海外。在埃及福斯塔特、印度勃拉名巴古代遗址中,都发现邢窑白瓷。在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唐代白瓷中也有邢窑制品。^①

二、定窑

宋代是中国瓷器全面发展时期,当时全国有五大名窑,燕赵定窑产品名列瓷中之冠。

定窑位于河北曲阳县涧磁村,窑址遍布村东、北、西三面,面积 11.7 万平方米。此处瓷土、釉土品质优良,为定窑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定窑出现于唐,兴盛于宋。它继承了邢窑的工艺技术,在此基础上由单色釉发展到多色釉,由素瓷发展为各种刻花、印花、贴花和剔花瓷器,甚至出现彩绘和模仿木纹或犀皮漆纹的纹釉器。

定窑的生产采用覆烧法,凡有纹饰、质地高的器物,均系覆烧而成。出土的“支圈”即是覆烧时的一种工具。配釉以白云石代替石灰石,釉中三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的成分与明清瓷器接近。施釉很薄,一般只有 0.1 毫米左右。定窑白瓷有镀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样既表明了使用者身份尊贵,显示了豪华,又弥补了覆烧法器口无釉的

^① 参见《文物》1981 年第 9 期。

缺陷,用包镶口的办法把漏釉部位包了起来。

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此外还烧颜色釉。由于定窑地位很高,仿造者颇多。仅定窑白瓷便孳乳出土定、粉定、紫定、黑定等。新中国成立后,还发现有绿定。

定窑器物花纹也颇突出,“定窑花瓷瓿”、“定州花瓷琢红玉”,都是对定窑花纹的称颂。定窑划花、刻花用刀或竹片划刻,印花用模,花纹多作牡丹、萱草、飞凤之形。印花工艺过程特别精细,艺术效果极强。划花虽逸笔草草,艺术水平却很高。定窑还有金彩描花器,制作时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工艺水平很高。时人称“定窑器珍于天下”。

三、磁州窑

宋代,在青瓷、白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以磁州窑为代表的黑釉瓷器也得到发展。成就最卓越者,便是开始使用瓷器釉上用笔彩绘的装饰方法。在白釉上面用黑色、赭色、茶色等色料作画,运用新的技巧,创造刻花兼绘画、剔花、刻填等种种技法。这种别开生面的艺术装饰成为北方各民窑装饰艺术的主流,此种装饰风格被称为“磁州窑风”。

磁州窑广泛分布在漳河两岸,其中以观台窑最为有名。磁州窑以磁石泥为坯,此种磁石“非吸铁引针之磁石,亦非烧料为磁粉之类,乃另一种石,其色光滑而白,其性埴而松,其器美而不致,实与瓷土异,惟磁州、许州有之”(郑廷桂:《陶录余证》)。磁州窑生产白瓷与黑瓷,其黑瓷的黑釉与定窑黑瓷有别,呈铁砂色,其中多有铁锈花。其白釉纯白如牛乳,有开片与不开片两种。磁州窑烧制的白地绘划黑花、白地绘划制酱花、绿地黑花、白釉剔花、白地赭花、黑地白花、黄地黑花、珍珠划花器物,代表了磁州窑的工艺技术水平。

磁州窑的赭色、茶色、绿色等彩绘,是在小窑中用低温再烧而成,

属釉上彩,俗称“宋加彩”,是在唐三彩、贴花、剔花基础上发展而成。磁州窑在中国瓷器装饰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彩绘技术为以后元明青花、五彩瓷绘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辽 瓷

辽代,契丹和汉族工匠继承了唐、五代制瓷技术并加以发展,创造出著名的辽瓷。在辽南京、中京、上京、东京等地,出土大量辽瓷,发现许多辽代陶窑遗址,反映了辽瓷的工艺特点和技术水平。

辽白瓷胎质很细,色纯白,不透明,瓷化程度高。辽瓷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高温细胎白黑瓷器,一种是高温缸胎茶绿、黑、赭杂色大型瓷器。另外还有一种低温釉陶器,称“辽三彩”,上有多种印花,形象逼真传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辽瓷的造型体现了契丹族的民族风格。各地出土的代表性作品鸡冠壶、扁背壶、杯口长颈瓶、鸡腿坛之类,都适应了契丹人的生活需要。以鸡冠壶为例,它是从利于马上携带的皮囊演化而来,充分体现了契丹人以车马为家的生活需要,极具独创性。

辽瓷的另一特点便是素胎装饰上普遍使用堆花。有的将印好或塑好的花堆贴在器身上,如蟠龙、牡丹、人物、小象等,形象甚为逼真,艺术水平颇高。

第七节 纺织工艺技术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纺织技术

燕赵纺织业出现较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燕赵大地发现众多

的陶纺轮和石制蚕,原始丝织业当已发生。商代,燕赵丝织技术发展很快,纺织工具有很大改进^①。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用作加捻工具的两只锭轮,经王若愚先生鉴定,它们是纺织用的纺锭,由此可见,此时手摇纺车已具雏形。台西商墓中出土几块丝织物,经科学鉴定,有平纹的“纨”、平纹纱类、平纹绉丝的“縠”、绞纱类的纱罗等。縠质地轻薄,丝缕纤细,表面起绉纹,经丝由两根丝并捻而成,捻度为2500—3000捻/米,纬丝则由多根丝并捻而成,捻度为2100—2500捻/米,均属强度捻丝^②。此縠片是首次发现的商代丝织品,縠的纺制是丝织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纱罗与平纹纱比较,具有织物结构稳定的优点,是织造技术新发展的产物。

西周时,燕赵出现织锦技术,丝织品出现经二重和纬二重组织。1970年在辽宁朝阳西周墓中出土了20多层丝织品,其中多层属于经二重组织的丝织品,正反面均为三上一下的经重平组织^③。这种丝织物便是当时的锦。经二重组织和纬二重组织的出现,表明燕赵丝织物组织方面已突破了简单组织的框框,迈进了复杂组织的行列。朝阳西周墓丝织品中的丝线均呈扁平状,可能是使用研光整理技术时碾压所致。

两汉时期,燕赵蚕丝生产较兴盛,丝织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据《西京杂记》载,巨鹿陈宝光妻创造一部高级提花机,复杂至120蹀,须60日方成一匹,所织蒲桃锦、散光绫匹值万钱,成为当地名品。何晏《九州论》、左思《魏都赋》都将清河(今河北属县)的缣和房子(今河北高邑)的锦,列为丝织品中的精品。

汉代,燕赵丝织品图案花样非常精美,蒲桃(葡萄)刚刚传入中

① 唐云明:《浅述河北纺织业上的几项考古发现》,载《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5辑。

② 高汉玉等:《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③ 赵承泽等:《关于西周丝织品的初步探讨》,《北京纺织》1979年第2期。

国，便被燕赵人民引作锦绣中的最新图案。河北怀安五鹿充墓出土汉绣残片，有飘缈的卷云、翱翔的凤鸟、奔驰的猛兽、层叠的群山，狩猎和供养的人物及秦汉铜镜上常见的带状花纹，非常精美。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纺织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蚕桑业发达，为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邺城成为北方纺织中心。“河北妇人，织经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颜氏家训·治家》）。陆翽《邺中记》载，邺都设有织锦署，产品很多，“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稻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绋、或白绋、或黄绋、或绿绋、或紫绋、或蜀绋，工巧百端，不可尽名。”

三、唐代燕赵纺织贡品

唐代，燕赵盛产蚕丝，丝织业非常发达，“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①，颇似一个大型手工作坊。据《通典》所载，博陵郡（定州）每年向朝廷贡细绫 1270 匹，两窠细绫 15 匹，瑞绫 255 匹，大独窠绫 25 匹，独窠绫 10 匹，总数多达 1575 匹。丝织品贡数居全国第一，定州成为当时北方的丝织中心。燕赵其他丝织贡物还有范阳绫、二包绫、熟线绫、春罗、孔雀罗、瓜子罗、白縠、平纱、花绉等。这些贡品工艺精美，质地精良，技术精湛，均为当时丝织物中的佳品。

^①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治生》“何明远”条引《朝野金载》。

四、宋辽金丝织工艺

宋金时,真定所出锦绫、透背,大名所产绉縠,相州所产纈,河间府所产无缝锦,都是当时名品。定州所产刻丝,更是天下珍品,它是用各色丝线交织而成,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形象如雕刻一般。庄季裕《鸡肋编》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由于定州刻丝使用纬线非通梭所织的技法,因此收到随心所欲的效果。定州刻丝在技巧与图案上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传统,丝纹粗细杂用,纹样结构既对称而又富于变化。北宋著名作品缂丝紫天鹿(故宫藏)、紫鸾鹊(辽宁博物馆藏)和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均为定州刻丝产品。

契丹族非常重视丝织业,尤其在夺取幽云十六州以后,辽的丝织业得到空前发展,质量之高非常惊人,辽之析津府“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①。辽廷赠宋丝织品有:刻丝花罗御样透背御衣、细锦透背清平内制御样合线缕机制品、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押金线绣方鞞、红罗金银线绣云龙红锦器杖、细锦刻丝透背合线御绫罗纱縠^②,这些名贵丝织品的工艺技术已与中原无异。

在辽宁叶茂台7号辽墓中,出土辽代丝织品用金的实物多件,有片金刻丝、描金、捻金数种。此墓还出土一件长约2米的刻丝衿被,以

^① 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大金国志校证》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六,《契丹国志》卷二一《契丹每次回赐物件》。

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它是早期刻丝的典型标本。

解放营子辽木槨墓所出织锦、绫、罗、刺绣中，除刻丝工艺外，有用“夹缬”和“腊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工艺水平较高^①。山西佛宫寺发现燕京所产南无释迦牟尼丝织佛像，是十分典型的夹缬加彩绘的印花织物，印制时需要三套缬版套印，色彩分为红、黄、蓝，以阴阳相同雕版两块夹而染之，最后在细部用彩笔略为勾划而成^②。以上精美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辽代燕赵丝织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实证。

辽代，燕赵出现毛纺业。辽畜牧业发达，盛产羊毛、驼毛等。用毛线织成的毯、用羊毛压成的毡等，成为燕赵北方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用驼毛织成的“驼尼”，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成为当时的高级名品。

五、元代“纳失失”锦

蒙元时期，弘州（今河北阳原）、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所产“纳失失”，是燕赵所产颇具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元史》卷一二〇载：蒙古太宗时期，“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皆分隶弘州”，弘州开始织金锦的生产。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火匠织制‘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纳失失是一种金绮，由西域工匠传入燕赵，先用金线织成，再嵌大小明珠，十分华贵。

^①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95页。

^②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第6期。

六、明清时期的棉纺技术

明朝,棉花在北方广泛种植,燕赵棉纺业随之发展起来。“北方之布,肃宁为盛”(章鸣鹤:《谷水旧闻》)。《农政全书》记载:“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密密,几与松之中品埒矣。”棉布纺织时只有保持一定湿度,纺线才能紧密,织布才能坚实。为克服燕赵气候的“风气高燥”,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作窗椽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紧实,与南土无异”(徐光启:《农政全书·木棉》)。

清代,燕赵棉纺业发展较快,保定府属束鹿县,所织棉绒、棉布远近驰名,“而辛集一带如织绒、劓绒等物,皆能仿其所产之地为之”(嘉庆年修《束鹿县志·风土》)。河间景州所产布匹,享有“在景州以布著”的声誉,“景州之布称龙华,……洁白细好,比于吴中”(乾隆年修《河间府志·物产》)。永平府“家机布诸邑皆有,乐亭杨各庄为盛,亦细于他处”(乾隆年修《永平府志·物产》)。清代,燕赵棉纺技术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南织有纳文绉积之巧,畿人弗重也,惟以缜密匀细为贵”。此时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郡“所出布多细好”,“其织之精亦与松娄匹”(方观承:《棉花图·织布》跋语)。

由于明清时期,北方广泛种植棉花,封建社会农村经济传统的“男耕女织”,已从广泛的丝织转向棉织,最终,棉织取代了丝织。

第六章 学术与教育

燕赵文化圈定型于战国后期。被称为“儒之别宗”的荀子集大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燕赵学术与教育的文化内涵和倾向,对燕赵后来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规定了基本的格调。

燕赵地近齐鲁,受孔子儒学影响较大,但燕赵儒学又同齐鲁儒学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通过荀子和孟子的比较而看出来。荀子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而孟子则是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荀子的学说作用于汉学,而孟子的学说则作用于宋学。

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儒学,而不涉及心性哲理。因此,在玄学和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就遇到了困难,未能产生出有全国影响的大儒及其学说。而且,以宣讲理学为特色的书院也难以发展。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使燕赵的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然呈现出了地域特色。它强调经世致用而忽视纯哲理的思辩,追求渊综广博而不尚清通简要,崇尚汉学而鄙夷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穷其枝叶,长于训诂考据而疑经惑古。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产生了不少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荀子、崔浩、孔颖达、纪昀等人可为其典型代表。而他们的涌现则又使燕赵学术在儒学经典的整理、文献的编纂上成就斐然。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的学术成就明显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和后期上。因为在这两段时期,汉学都占据着学术主导地位。

对燕赵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的问题。燕赵地区北部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连。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南进,燕赵首当其冲。每当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燕赵地区时,燕赵的学术与教育便会相应地产生若干新的成就。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争正朔”的斗争,就使燕赵地区原本不太发达的史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官方控制的减弱,经学和私学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均定都北京。这一政治格局使燕赵地区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而带有“京畿文化”的色彩。由于人文荟萃,燕赵地区的学术与教育也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清燕赵地区地方志的大量编修、近代新型学校的大量兴建,都是“京畿文化”的体现。

第一节 哲学

一、战国后期的赵国诸子

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时期,由于赵国在“合纵”抗秦阵线中地位的提高,“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卷五),赵国诸子异常活跃。兵家庞煖,名家公孙龙、桓团、綦母子、毛公,法家剧子、慎到,儒家荀子往来于赵、齐、楚、魏等地,积极宣讲自家学说,鸣胜一时,与齐鲁学者分庭抗礼。其中,慎到、公孙龙、荀子尤为著名。

慎到(约前 340—约前 270 年),赵国人。齐宣王时期,他在稷下讲学,负有盛名。齐湣王时,他离开齐国,“为韩大夫”(《风俗通义·姓氏》)。不久,他转赴楚国,为太子傅相。太子即位为王(楚襄王)后,他继续留在楚国参预政治谋划。赵惠文王二十年(前 279 年)左右,他告老归赵。其后,大概死于赵国。慎到著有《慎子》一书^①,现仅存残本 5 篇,《群书治要》卷三七保存有 2 篇节本。慎到早年与齐人田骈、接子及楚人环渊一起“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后,他从道家中分离出来,成为著名的法家人物。慎到尽管从“大道”包容万物的思想出发,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但同时又极力提倡法制,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在慎子的学说中,“势治”是其理论核心。《韩非子·难势》引用慎子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他极力反对“尊贤”,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所引《慎子》)慎到的“势治”理论,既是战国后期专制主义政治加强的反映,也是他对专制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概括,对后来的法家理论体系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孙龙(约前 330—约前 240 年),字子秉,赵国人。他长期在平原君家中做门客,曾一度赴燕,劝说燕昭王停止进攻齐国。著有《公孙龙子》一书,传说有 14 篇,实际只有 6 篇^②,即《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除《迹府》系后人编纂外,另外五篇均系公孙龙的名辩论题。公孙龙以倡说“白马非马”、创

① 《汉书·艺文志》说《慎子》为 42 篇,《风俗通义·姓氏篇》说《慎子》为 30 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集解》说《慎子》有 41 篇。

② 参见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建“离坚白”学派而著名,与惠施的“合同异”学派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公孙龙在逻辑学上的贡献是首先对命题作了相当精致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主语和述语的不同。例如,他在《白马论》中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在《坚白论》中,他分析人们对于“坚白石”的视觉和触觉的不同时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但是,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把一般和特殊的差别加以片面夸大,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结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因此,《庄子·天下》说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荀子(约前 325—约前 235 年),名况,字卿。因系西周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赵国人。荀子长期生活在赵国。齐襄王时,年“五十”的荀子“始来游学于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其后,因受齐人排挤,荀子前往楚国,被黄歇(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遂在兰陵落户安居,死后也葬在兰陵。荀子的学问兴趣极其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教育都是他所留意和研究对象。他的著述原有 300 余篇,后经汉代刘向校阅整理,编为 32 篇,名为《孙卿新书》。唐代杨倞又将其重新编排,定名为《荀子》。

荀子对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墨家、名家、道家、前期法家,乃至儒家各派,除孔子、子弓等少数人以外,几乎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广泛批判。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批判,荀子才批判地接受了各家学派中他所认为合理的思想内核,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创立了庞大而精深的荀学思想体系。荀子的思想是独具特色的。他吸收了老子和宋尹学派自然天道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肯定了“天”是物质性的自然,其运行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

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子不同，更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道德不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而是社会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隆礼”与“重法”相结合的政治观，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学说，强调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主张“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荀子·儒效》）；从而提出了“王道”兼采“霸道”的政治思想，使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韩非、李斯是法家巨擘，也是荀子的学生。由此可见，尽管荀子思想的基点仍然是“仁”、“义”、“礼”，但却突破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思孟学派尖锐对立，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富于强烈的时代特色。

此外，在认识论、逻辑学、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领域，荀子也有重大建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燕赵地区的学术和教育都赋予了深刻的影响。

二、董仲舒与西汉新儒学

董仲舒（前 179—前 104 年）为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中年以前一直在家乡治学和讲学。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尽乎游夏。”（《汉书·董仲舒传》）正因为如此，董仲舒虽与齐人胡毋生同为汉初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师，但其思想体系却完全不同于齐鲁儒学。董仲舒很崇拜荀子，曾作书赞美他。荀子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确实也对董仲舒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发挥《公羊春秋》关于封建大一统的主张，创立了西汉的新儒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

应”学说,由此而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汉景帝时,董仲舒被任命为朝廷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从“天人感应”出发,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充分论证,最后归结性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创了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此外,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在外在规范方面对燕赵的学术发展倾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对策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相。不久,因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异事,董仲舒被逮捕下狱,后被赦免。其后,董仲舒又曾一度担任过胶西王相,因担心获罪而称病归家,“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三、刘劭及其《人物志》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三国曹魏时期。年青时曾长期在家乡担任地方官吏。东汉献帝建安(196—220年)末年,受御史大夫郗虑举荐,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其后,历任尚书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等职,赐爵关内侯。刘劭多才多艺,著有《皇览》、《律略论》、《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都官考课》及《说略》、《乐论》、《法论》、《人物志》等,在经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尤以《人物志》最为著名。

在《人物志》中,刘劭从“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全面探讨了人的才能与性格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才主要有帝王之才和大臣之才两大类,而大臣之才则有十二种类型,即清节(道德高尚)、法家、术家、国体(德、法、术三才皆

备)、器能(三材皆微)、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他又按照性格特征,把人的性格也分为十二类型,即坚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辩博、弘普、狷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讷,并对其特征和优劣作了概括说明。刘劭认为才性既可分离,又可结合,从而组成三种基本人才类型,即兼德、偏材、兼材。

刘劭特别考察了才性的鉴定问题,提出了“八观”、“五视”等才性的鉴定方法,开启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人物志》共3卷11篇。1937年,美国学者J. K. 斯莱奥克将它译为英文出版,将其书名改为《人类能力的研究》。

四、元代理学家刘因

刘因(1249—1298年),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人。早年曾在真定跟随真定府学教授砚弥坚学习。曾一度接受元世祖征召,任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但不久便辞官归乡。其后,拒绝征召,以教授、著述为业。

刘因早年研究经学,但对训诂疏释的方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元史·刘因传》)其后,他得到了由赵复所传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等人的著作,由此而转入理学,推崇朱熹。他认为邵雍的学说为最大,周敦颐的学说为最精,程颐的学说为最正,但朱熹的学说却能“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元史·刘因传》)。然而,刘因在服膺朱熹的同时,却在认识论上夹杂了陆学反求诸己、直求本心的主观唯心思想,强调“主静”。

刘因与许衡、吴澄齐名,为元朝三大儒之一。著有《四书精要》30卷、《丁亥集》(诗集)5卷。门人将其诗文合编为《静修集》,又将其语录集为《小学四书语录》。

五、孙奇逢与清初“北学”的开创

清初的理学呈现着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李颙为代表的关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明代度过的。明朝灭亡后,他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隐居不仕,潜心治学和讲学。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四书近指》、《尚书近指》、《圣学录》等。孙奇逢“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碑传集》卷一二七);早年宗奉陆(九渊)、王(守仁),晚年倾慕朱熹,调和两派。他曾在《夏峰歌》中咏叹道:“说什么程朱陆王,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孙奇逢:《三贤集》卷四)

孙奇逢在清初的北方学术界享有盛誉。他死后,河南、河北的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在容城,他“与刘因、杨继盛同祠”;在保定,他与孙承宗、鹿善继“并祀学宫”(《碑传集》卷一二七)。北方学术界的佼佼者,大都出自他门下。而后来的河北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更进一步发展了孙奇逢的“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在孙奇逢开创的北学基础上衍变出了注重躬行实践、提倡学以致用用的颜李学派。

六、颜李学派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理学的衰微以及实学思潮的影响,颜李学派异军突起,在学术思想中独领风骚,几近半个世纪。其中心人物是颜元和李塨。

颜元(1635—1704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其父颜昶为蠡县朱九祚养子,颜元也在朱家长大,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颜元年青时最初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又笃信程颐、朱熹的学说,受孙奇逢后学彭通、王之征、王余佑、张罗喆等人的影响很深。中年以后,他逐步认识到了僵化理学的危害,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由此而摆脱了孙奇逢北学调和朱王学术思想的羁绊,走上了与理学彻底决裂的道路。为了批判程朱理学,颜元把程朱与孔孟对立起来,以恢复孔孟之道为旗帜,极力宣扬“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习斋记余》)的观点,强调“习行”和“务实”,主张“实文、实行、实礼、实用”。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颜元提出“以七字富天下”,即“垦荒、均田、兴水利”;“以九字安天下”,即“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以六字强天下”,即“人皆兵、官皆将”。这22个字是颜元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的凝炼和概括。

颜元终生不仕,以行医、讲学为业。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习斋记余》、《辟异录》、《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其学问虽不精深,但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却对当时的实学思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李塉(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河北属县)人。他21岁时拜颜元为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中举人,60岁时被选授通州学政,但未及三月便辞官返乡,著述终老。

李塉一生以张大颜学为己任,但又不死守师说。他学习刻苦,兴趣广泛,曾向刘见田学过数学,向张函白学过琴,向赵锡之、郭金城学过骑射,向王余佑学过兵法,向彭能学过书法。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后,李塉又数次前往江浙,向毛奇龄等江南考据大师学习训诂考据。李塉遍注群经,转入考据,使颜李学派的学说更为精致,影响延及江南。但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已改变了颜元学说的原貌。对此,著

名学者钱穆作了精当的概括：“习斋之学，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变。”（《清儒学案·序》）

由于兼收并蓄，李塉一生著述丰富，撰有《小学稽业》、《大学辩业》、《圣经学规传》、《论学》、《学礼录》、《学乐录》、《学射录》、《田赋考辩》、《周易传注》、《论语传注》、《恕谷后集》等，学术成就大大超过颜元。

第二节 经 学

一、《韩诗》与《毛诗》

西汉时期，《诗经》的承传授受有今文和古文的区分。今文《诗经》有鲁、齐、韩三家，称《鲁诗》、《齐诗》、《韩诗》。古文《诗经》则仅有毛氏一家，称《毛诗》。《鲁诗》、《齐诗》、《韩诗》被立于学官，而《毛诗》因河间献王刘德立有博士，故不被立于朝廷。

《韩诗》始创于燕人韩婴。韩婴在汉文帝时曾为博士，汉景帝时曾任常山太傅，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进行过御前辩论。他既治《诗经》，也治《周易》。韩婴对《诗经》的原旨作自由发挥，“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韩婴传》）。韩婴之后，《韩诗》形成王吉、食子公、第孙顺三大派，辗转相传。到东汉时，《韩诗》的地位便超过了《鲁诗》，大为流行。但到西晋时，由于《毛诗》独盛，《韩诗》便遭到冷遇，无人问津。南宋以后，《韩诗》散佚，仅存《外传》。

《毛诗》相传始创于毛公。《汉书·儒林传》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王博士。”郑玄在其《六艺论》中也说：“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但郑玄却在其《诗谱》中又分出了大小毛公，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

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孙吴时,陆玕又说大毛公为鲁人毛亨,小毛公为赵人毛萸。但与陆玕同时的徐整却说大毛公为河间人。其实,大小毛公之说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汉书》所说的毛公才是可信的。

《毛诗》在西汉时为 29 卷,有《毛诗故训传》30 卷。东汉时,因郑玄、贾逵、马融等大儒都致力于《毛诗》的研究,郑玄又兼收众家之说,撰《毛诗笺》,故《毛诗》逐渐被学者所推重,魏晋以后,《鲁诗》、《齐诗》《韩诗》或散亡、或无传者,《毛诗》遂一家独尊,为后世所崇尚。

二、崔浩统一“六经”的努力

崔浩(?—450 年),字伯渊,祖籍清河东武城(治今山东武城西北)。他从小即随作官的父亲崔宏在冀州(治今河北冀州市)、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等地生活。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他参与军国大事,官至司徒。

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传》)。明元帝即位之初,他被任命为博士祭酒,常教授明元帝经书。明元帝敕令他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他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崔浩的“解”,主要是辅导明元帝学习的,自然比较浅显。其后,他又在“解”的基础上为诸经作注。

崔浩治学十分认真,自称“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魏书·崔浩传》)。他注《周易》,在《叙》中说:“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魏书·张湛传》)由此可见,崔浩注经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太武帝末年,崔浩已注完《诗经》、《论语》、《尚书》、《周易》。太平

真君十一年(450年),著作令史闵湛、郗𪔐上疏太武帝,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注述“六经”,都有许多疏谬,不如崔浩精微。建议朝廷下令,收缴境内诸书,藏之秘府;颁行崔浩所注经书,“命天下习业”;再敕令崔浩注《礼记》、《左传》,“令后生得观正义”(《魏书·高允传》)。然而,崔浩不久即因《国史》案而被太武帝诛杀。统一经典注疏遂告终结,直到唐代《五经正义》问世后,经典注疏才有了统一的标准。

三、隋朝经学家刘焯和刘炫

刘焯(544—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市)人。刘炫(546—613年),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两人少年结盟为友,一道学习。曾向信都刘轨思学《诗经》,向广平郭茂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礼记》,但均未曾卒業便离师而去。武强刘智海家中富有藏书,二人结伴前往,“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北史·刘炫传》)。隋文帝开皇初年,二人奉敕与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参预律历修订,并值门下省以备顾问。开皇六年(586年),二人又一同考定《洛阳石经》。因刘炫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二人同被除名返乡,以教授著述为业。其后,隋文帝诏令二人奉事蜀王杨秀,但二人迁延不往,被枷送蜀地,配隶军籍。不久,被蜀王宽恕,改为典校书史。蜀王被废后,二人又返回朝廷,修订礼、律。隋炀帝即位后,二人同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因官品卑微,二人又辞官返乡。数年后,刘焯被征召到朝廷,以备顾问,但一直到死也郁郁不得志。刘炫则在隋末动乱中,因冻饿而死。

刘焯治经不迷信汉儒,认为“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隋书·刘焯传》),而且精通天文。著有《稽极》10卷、《皇极历》10卷,以及《五经述议》(已佚)。

刘炫学识渊博,自称除《周易》、《仪礼》、《穀梁传》用功少差外,《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郑、王、何、服、杜等十三家注“并堪讲授”(《隋书·刘炫传》)。著有《论语述议》10卷、《春秋攻昧》10卷、《五经正名》12卷、《尚书述议》20卷、《毛诗述议》40卷、《注诗序》1卷、《算术》1卷。

“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北史·刘炫传》)尽管二人恃才傲物,命乖时蹇,学术繁杂多伪,但时人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隋书·刘炫传》),对他们予以很高的评价。

四、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孔颖达(574—648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熟读《三礼义宗》,成年后专攻服虔《春秋传》和郑玄《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周易》。曾从刘焯问学。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新唐书·孔颖达传》)。入唐后,历任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给事中、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

为了解决南北经学版本不一、注释分歧,以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唐太宗诏令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编定“五经”,定名为《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共180卷,折衷“南学”和“北学”,《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经》用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右传》用杜预注。

孔颖达《五经正义》包贯异家,折衷南北,不免繁冗谬误。后经进一步修订,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正式颁行天下,用于科举取士,使经学在版本和经义上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促进了儒学的普及。

五、疑经惑古的啖助

啖助(724—770年),字叔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唐玄宗天宝末年;曾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满后归家著述,用10年时间撰成《春秋集传》一书。其后,又撰有《春秋统例》。

啖助长于《春秋》之学。通过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考察比对,啖助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而“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新唐书·啖助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虽有穿凿、繁碎之嫌,但在“大义”上却比《左传》细密。啖助这种研究方法别具一格。后经其学生赵匡、陆质的修订和发挥,遂开宋儒怀疑经传的风气。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这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春秋》)。

第三节 史 学

一、《战国策》中的《赵策》、《燕策》、《中山策》

《战国策》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汉宫中所藏《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这六种战国杂史,按国别重新分类而编校成书的,共有33篇。其中,《赵策》有4篇、《燕策》有3篇、《中山策》有1篇。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其底本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史策。其中史料,不仅为《史记》所大量采用,而且也被战国诸子之书所零星征引。因此,《赵策》、《燕策》、《中山策》不仅保存了战国时期燕赵地区的宝贵史料,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赵国、燕国、中山国的史学成就。

二、十六国时期的燕赵史学

十六国时期,后赵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后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冉魏也建都邺城;前燕建都龙城(今辽宁辽阳市),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再迁都于邺城;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此外,北燕虽定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但其辖境却包括今辽宁西南部和河北东北部;南燕虽定都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但却系后燕余绪;前秦统一北方时,燕赵地区也一度被前秦统治。

以上政权,除冉魏外,均为羯、鲜卑、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魏晋以来,他们长期在边地与汉族杂处,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明,所以当它们进入燕赵地区后,对编纂自己政权的历史具有较高的热情。

后赵在襄国设置史学祭酒,以任播、崔潜领任,并命徐光、宗历、傅畅、郑悱等人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王兰、陈宴、程明、徐机等人又相继编纂赵国历史。中大夫傅彪等人撰有《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等人撰有《大单于志》。

前燕时,曾仕后赵的王度撰写有《二石伪治时事》、《二石传》各2卷。前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有《赵书》10卷;杜辅还撰有《燕记》一书,专记前燕历史。范亨则撰有《燕书》21卷,专记慕容儁时期的历史。

后燕的董统撰有《后燕书》30卷,崔逞撰有《燕记》,封懿撰有《燕书》。南燕的张诠撰有《南燕录》5卷,王景暉撰有《南燕录》6卷,游览先生撰有《南燕书》7卷。其中,《后燕书》有本纪及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史通·古今正史》)。

另外,北魏时期的韩显宗又撰写叙述北燕历史的《燕志》10卷(《魏书·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补充了十六国时期除冉魏政权外燕赵地区各割据政权的历史记载。

三、北魏史的编撰

北魏立国之初,出于政治需要,道武帝拓跋珪即诏令尚书郎邓渊编撰国纪。邓渊撰写了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魏书·邓渊传》)。这是北魏史编撰的开端。太武帝拓跋焘时,崔浩、高允又受命撰述国书,按《春秋》体例,“编年序录”,将“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的北魏历史汇编为编年史。孝文帝拓跋宏时,李彪又将这部编年史按《史记》和《汉书》的体例子以重编,“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魏书·李彪传》)。在此基础上,北齐的魏收、隋朝的魏澹、唐朝的张太素等人便分别编撰了三部魏史。

魏收(506—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人。北魏、东魏、北齐间,历任太学博士、秘书监、中书令等职。北齐初年,他奉诏与高隆之、房延佑、裴昂之等人编撰《魏书》。仅用4年时间,便完成了初稿。其后,又经过三次修改,编定为130卷。

魏澹(生卒年待考),字彦渊。巨鹿下曲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任殿中侍御史、纳言中士、行台礼部侍郎、太子舍人等职。隋文帝杨坚认为魏收所撰《魏书》褒贬失实,遂命魏澹与颜之推等人重修《魏书》。魏澹等人在魏收《魏书》的基础上,撰成《魏书》92卷。

张太素(生卒年待考),魏州繁水(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人。唐高宗时曾任东台舍人、兼修国史。张太素著述颇丰,著有文集10卷、《策府》582卷、《说林》20卷、《敦煌张氏家传》20卷、《隋书》30卷、《隋后略》10卷,并撰有《魏书》100卷。

这三部《魏书》各有其特色。到北宋时,魏收《魏书》已残缺39卷,范祖禹等人校定该书,便采取了魏澹《魏书》的《太宗纪》、张太素《魏书》的《天象志》以及《北史》等书的材料,补齐了魏收《魏书》的残缺部分。其后,魏澹、张太素的《魏书》均已佚失,仅有魏收《魏书》传世。魏

收《魏书》首创《释老志》，在体例上有创新；《官氏志》、《天象志》、《食货志》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加之保存史料丰富，在二十四史中虽称不上良史，但也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四、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与《北齐书》

李德林(531—591年)，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属县)人。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朝。幼年时居住定州，“留心典籍”(《北史·李德林传》)。北齐时历任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职，受诏编修齐史，撰成纪、传27卷。北周、隋时历任内史上士、御正下大夫、内史令、怀州刺史等职。隋初，奉诏续修齐史，在27卷的基础上增写至38卷。

李百药(565—648年)，字重规。隋文帝时历任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礼部员外郎等职。隋炀帝即位后，被出为桂州司马。其后，因罢州置郡而解职还乡。大业五年(609年)复官。唐初，被流放涇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召拜中书舍人，受诏撰《齐书》。李百药在父亲旧稿的基础上，采用了王劭《齐志》及其他有关材料，花了10年时间，终于撰成《北齐书》。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集中保存了东魏、北齐的主要史料。

五、元代真定籍的史学家

元代的真定路(治今河北正定)是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在史学研究上名家辈出。王约、瞻思、苏天爵等真定籍的史学家在百年间以个人撰述的形式写出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扬名文坛。

王约(1252—1333年)，字彦博。年青时跟随金末名士魏璠的从

孙、弘州顺圣(今河北阳原县东)魏初游学,博览经史。至元十三年(1276年),被翰林学士王磐举荐为从事。其后,历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集贤大学士、枢密副使等职。元成宗时,王约曾出使高丽,对高丽王距以前的高丽历史进行了研究。回国后,撰写了《高丽志》4卷(已佚)。王约还撰有《史论》30卷(已佚)、《潜丘稿》30卷(已佚),并参与制定了《大元通制》。

瞻思(1278—1351年),字得之。其先为大食国人,其祖父鲁坤始定居真定。瞻思年青时曾拜元好问的弟子、获鹿人王思廉为师,博览群书,“为乡邦所推重”(《元史·瞻思传》)。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52岁的瞻思被征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向元文宗献上自己所著的《帝王心法》一书。元文宗诏令他参预编修《经世大典》,但他因与同事意见不合而辞官归家。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其后,历任金浙西、浙东肃政廉访司事,江东肃政廉访副使等职。瞻思兴趣广泛,研究领域广阔。经史、法律、天文、地理、水利、算术无不精通。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以及文集30卷。其中,《镇阳风土记》为真定地方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则介绍了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体现了回族历史学家的写作特色。

苏天爵(1294—1352年),字伯修,学者称为滋溪先生。年青时,他曾在藁城人安熙门下学习程朱理学(《元史·安熙传》),后入国子监读书,公试名列第一,历任大都路蓟州判官、翰林国史院典籍官、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吏部尚书、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等职。苏天爵精通文史,长于记述。曾参预编修《武宗实录》、《文宗实录》;著有诗稿7卷、文稿30卷、《松厅章疏》5卷、《春风亭笔记》2卷、《国朝名臣事略》15卷、《文类》70卷;还撰有《辽金纪年》、《黄河原委》(均未

脱稿)。后人将其诗文集为《滋溪文稿》。

《国朝名臣事略》汇集元初至元仁宗时期 47 位元朝大臣的碑铭、行状、家传等材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原始材料。《文类》则收录了元朝前期至中期著名文人的作品,按文体分为 43 类。该书是苏天爵自己花了 20 年的时间才编成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可以与《唐文粹》、《宋文鉴》鼎足而立;而从史学的角度看,因为它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所以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六、古史学家崔述

崔述(1740—1816 年),字武承,号东璧。清朝直隶大名(今河北属县)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举人,嘉庆初曾任福建罗源和上杭知县,后以老病退休,归家著述。

崔述在其父怀疑汉学、崇尚宋学的影响下,以治经入史,以怀疑、辨伪、考信而致力于上古史研究。他先是用了 8 年时间写成《洙泗考信录》4 卷,对孔子的事迹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其后,又陆续写成了《考信录提要》2 卷、《补上古考信录》2 卷、《唐虞考信录》4 卷、《夏考信录》2 卷、《商考信录》2 卷、《丰镐考信录》8 卷、《丰镐考信别录》3 卷、《洙泗考信余录》3 卷、《孟子事实录》2 卷、《考古续说》2 卷、《考信附录》2 卷,完成了自己的从上古到战国的信史体系,澄清了两汉以来古史真面目。

崔述一生贫寒,治学原则和方法又与乾嘉学派异趣,因此默默无闻于当时。直到二十世纪初,其疑经惑古的学说才昌明于世。顾颉刚搜罗崔述遗稿,除《考信录》36 卷外,还有《山梓文献志》2 卷、《水土本源志》2 卷、《杂著》16 卷、《存篋书》4 卷、《余编》6 卷、《赘编》6 卷、《文集》16 卷,将其汇编为《崔东璧遗书》。

第四节 文献编纂

一、唐代编纂家魏征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人,一说是魏州曲城(今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兵败降唐;不久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兵败后,又再度入唐,任太子洗马。唐太宗即位后,历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

魏征“通贯书术”(《新唐书·魏征传》),长于编纂。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政府开馆重修“唐前五代史”,魏征担任总监,全面主持《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的编修,并主编《隋书》。魏征还修订和撰有《隋书》的序、论,以及《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

魏征又奉唐太宗之命,与虞世南、萧德言等人一道,从六经、诸子、诸史中辑录出关于治道政术的内容,汇编为《群书治要》50卷。该书保存了不少现已失传的古书梗概,难能可贵。魏征另撰有《自古诸侯王善恶录》2卷、《时务策》5卷、《谏事五卷》,但均已佚失。

二、宋代文献编纂家李昉

李昉(925—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属县)人。后汉乾祐进士,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时,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入宋后,历任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等职。

宋太宗时期,李昉主持编纂了《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太平广记》分92大类,将汉初至宋初

的笔记小说和稗官野史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汇编成书。《太平御览》分 55 部,录入经史百家诸书的有关内容,保存了大量的亡佚古书。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所载,该书所征引的书目多达 1690 余种,还不包括诗赋箴铭及小说杂书。《文苑英华》则分 38 类,选录了上起南朝梁末、下至晚唐五代的诗文约 2 万篇。

李昉还参与了《旧五代史》及《宋太祖实录》的编修,并撰有《南行记》1 卷、《内制》10 卷、《历代年号》1 卷、《历代宫殿名》1 卷、《文集》50 卷,但均已失传。

三、宋绶、宋敏求与《唐大诏令集》

宋绶(991—1048 年),字公垂。北宋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宋敏求(1019—1070 年),字次道。宋绶之子。

宋绶历任集贤校理、知制诰、参知政事等职,“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讎,博通经史百家”(《宋史·宋绶传》),曾参预编修《真宗实录》。精通唐史,搜罗唐代诏令,编辑《唐大诏令集》,但未及成书便因病去世。

宋敏求曾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知制诰等职。受父亲影响,喜好文献编纂,熟悉唐史,精通朝廷典故,“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宋史·宋敏求传》)。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将《唐大诏令集》编定成书。

《唐大诏令集》汇集了唐朝各代诏令,共 130 卷,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可补订《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缺漏和歧异。特别是 83 卷以后的《政事》和《蕃夷》两大类,直接涉及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以及周边各民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唐史者所不可忽略。

宋敏求还补有唐武宗以后五世实录,有《宣宗实录》30 卷、《懿宗实录》25 卷、《僖宗实录》30 卷、《昭宗实录》30 卷、《哀帝实录》8

卷,并撰有《春明退朝录》3卷、《长安志》20卷。

四、纪昀与《四库全书》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号春帆,又号石云,晚年号观奕道人。清代直隶献县(今河北属县)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纪昀与陆锡熊被任命为总纂官。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书编成。由于陆锡熊后入馆而先歿,所以全书的编纂,纪昀出力最多。

在十年的编纂过程中,纪昀等人又将各书的提要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3461种,并著录未被收入的图书存目6793种。提要对每部书作者的生平事迹、著述渊源以及内容、特色、版本、文字等方面都作了简要介绍、考证和评论,堪称版本目录学的巨擘。纪昀独撰经部诸书提要。史部、子部、集部诸书的提要撰述,虽由邵晋涵、戴震、周书昌等人分任,但最后均由纪昀一手裁定。

纪昀博学多识,有极高的组织能力。除《四库全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清开国方略》、《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清会典》、《河源纪略》等书的总裁,在文献编纂上有着空前的贡献。

五、徐松与《宋会要辑稿》

徐松(1781—1848年),字星伯。清代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嘉庆十四年(1809),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

宋代编纂的本朝会要共有10种,总计2200余卷,但到明朝万历

年间(1573—1620年),除《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的内容按事类分隶于各韵被编入《永乐大典》外,其余均已佚失。

徐松利用职务之便,将馆存《永乐大典》中的各种《宋会要》的条文一一抄出,共得500卷。由于这项辑佚工作迁延日久,徐松还未来得及整理编排,便因病去世了。

徐松的这部辑稿后几经辗转,经他人增补删并,合为366卷,1935年被影印出版,定名为《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由于《永乐大典》的佚失,这部辑稿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典籍。

徐松在历史地理等领域也有建树,著有《新疆识略》、《新疆赋》、《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唐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书。

六、王灏与《畿辅丛书》

王灏(1823—1888年),字文泉,号坦圃。清代直隶定州(今属河北)人。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会试不第,落榜而归。

王灏系地方豪强,富有资财,喜好搜集图书,家中藏书有10218卷、名人字迹金石千余种。他一向倾慕明代汲古阁毛氏和知不足斋鲍氏,搜集了燕赵地区“二千余载名贤遗籍,博延方闻缀学之士,校讎编订”^①,辑编《畿辅丛书》,并于光绪五年(1879年)用“定州王氏谦德堂”的名号开始刊刻。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王灏因病去世。《畿辅丛书》尚未全部刊成。后经武进陶湘重为编订,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成书。《畿辅丛书》按四部分类,共收入书籍173种。经部22种,

^① 民国《定县志》卷一三《文献志》。

史部 22 种,子部 31 种,集部 39 种;另收入永年申氏、颜习斋、李恕谷、孙夏峰、尹健余、崔东壁六家遗书 59 种。

王灏嗜书如命。凡自己所无之书,“必求之,不较直”。凡卖给他“异书”,他均予以重酬。“闻有善本,使人赍重金,不远千里,必得而后已”(《畿辅先哲传·师儒六》)。因此,《畿辅丛书》收录诸书中,多有流传较少之书,加上校雠精审,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丛书。王灏本人也被李鸿章誉为“畿南文献”。

第五节 地方志

一、燕赵古方志

燕赵地区最早的古方志,见于记载的有东汉章帝时李恂的《幽州山川屯田聚落》、东汉末年卢植的《冀州风土记》。《幽州山川屯田聚落》系山川、屯田、聚落的分布图,“图写山川屯田聚落”(《后汉书·李恂传》),共百余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为“图经”、“记”、“地记”、“论”之类的燕赵地区古方志数量明显增多,见于记载的有魏国卢毓《冀州论》、何晏《冀州论》、晋代裴秀《冀州论》、荀绰《冀州记》、乔潭《冀州记》、陆翊《邺中记》、张曜《中山记》;北齐李公绪《赵记》、邢子励《赵记》、虞氏《赵地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以及未著撰人的《幽州图经》、《冀州图经》等。

唐宋时期,地方编修图经方志已经形成定制。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图经方志有《上谷郡图经》、《固安图经》、《河北记》、《河北路图经》、《新州记》、《河北险要图》、《河北图》、《咸平河北东路地图》、《河间图经》、《河北三十四州军地图》、《常山图经》、《相台志》、《临漳志》、《信

都记》等。

金元时期,见于记载的燕赵地区方志有《碣石志》、《清州志》、《献州记》、《相台续志》、《保定路志》、《燕京志》、《析津志》等。

《析津志》是元代熊自得编纂的关于北京历史的最早的一部方志,也是燕赵地区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方志。

《析津志》原本早已散佚,今仅存有后人从《永乐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中辑录出的辑本。《析津志》门类有户口、田粮、额外钱粮、军屯、乡社、坛场、廨宇、寺观、风俗、土产、山川、关隘、文庙、学校、人物、孝行、仙释、艺文等。在宛平、大兴各县下,则有各县建置沿革、县境、至到、民屯、闸河等项。体例颇为完备。明朝永乐年间修《顺天府志》时,从体例和内容上,多沿袭和征引了《析津志》。

二、明清直隶地区的方志

明代方志的编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例也较前代更为完备。现存明代直隶地区的方志约百种左右。现存最早的一部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永乐《顺天府志》,其次为正统《大名府志》。但明代方志编纂的水平普遍不高,缺少上乘佳作。

清代方志的数量急剧增加,光绪直隶各地方志总数达 500 部左右。更有不少名人参预修志,故产生了不少影响颇大的方志。其中,以光绪《畿辅通志》、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天津府志》、乾隆《永清县志》最为著名。

(一) 光绪《畿辅通志》

有清一代,曾三次纂修《畿辅通志》。康熙时,由于成龙、格尔古德主持,郭棻主笔,纂成《畿辅通志》46 卷。由于时间仓促,草率成书,康熙《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明显不高。雍正时,由唐执玉、刘与义、李卫相继主持,陈仪承主笔,纂成《畿辅通志》120 卷并图 1 卷。同治、光

绪间,由李鸿章主持,黄彭年主笔,又纂成光绪《畿辅通志》300卷(卷首1卷)。

三部《畿辅通志》中,以光绪《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为最好。它以“纪”统包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以“表”统并府厅州县沿革、封建、职官、选举,以“略”统记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以“传”统叙人物,并辅以“识余”、“叙录”,较好地汇集了各类资料,全面地反映了畿辅地区情况。在有清一代的各省通志中,它以资料丰富、体例完备而被推为巨擘。

(二) 光绪《顺天府志》

张之洞、缪荃荪等编纂。始修于光绪五年(1879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书,130卷。全书共分京师、地理、河渠、食货、经政、故事、官师、人物、艺文、金石等10志,志下分目。该志因编写人员多系名流,编纂精良,故被誉为近世方志之冠。

(三) 光绪《天津府志》

天津方志的编修始于明代。当时,有嘉靖《蓟州志》、正德和万历两部《天津三卫志》。清乾隆时,程风文、吴廷华等撰有《天津府志》40卷,分为天章、地舆、星土、形胜疆域、风俗物产、山川、城池公署、乡都户口、学校、古迹、田赋、盐法、驿递、兵制、河渠、祥异等24目。光绪时,沈家本等又在旧志的基础上再修《天津府志》54卷(卷首1卷、卷末1卷),增入诏谕、圣制、恤政、经政等目,并增添了地图。与旧志相比,光绪《天津府志》更为完善。

(四) 乾隆《永清县志》

在乾隆《永清县志》之前,永清县曾有四部县志,即《文渊阁书目旧志》中所载的《永清县图志》、《文渊阁书目新志》中所载的《永清县志》、明朝万历《永清县志》、清代康熙《永清县志》。除康熙《永清县志》外,其他三部均已佚失。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永清知县周震荣延请著名学者章学诚

为总裁,编修《永清县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永清县志》修成,共25篇(不分卷)。

乾隆《永清县志》是章学诚在《和州志》后编纂的第二部方志。章学诚在编纂体例上有不少创新:用“记”来记述“皇言”和“恩泽”;用“阙访列传”来记述“传闻异同”、事实难征之事;用“前志列传”来历述旧志;又改“考”为“书”,用来叙述典章制度;改“艺文”为“文征”,用来辑录诗文。另外,章学诚较为重视社会经济活动,在“户书”中特意对当时永清县的“见行物价及市易流通”作了专门记载。

乾隆《永清县志》系章学诚方志体例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的作品,因此显得有些芜杂繁赘。但瑕不掩瑜,乾隆《永清县志》在当时刊出后,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被誉为方志的上乘之作,其编纂体例甚至成为不少地方志的模式。

第六节 教育

一、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著名思想家,其教育思想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和“解蔽”,而教育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全民施教而培养出“士”、“君子”,乃至“圣人”。这与他的“制天命”和“善伪”思想是一致的。

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荀子主张务实和启发诱导,强调“学”、“行”、“思”三者的辩证统一。他说:“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荀子·儒效》)反对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他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认为“行”是学习和认识的最终目

的。他还用“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作比喻，强调“专心一致、思虑熟察”（《荀子·性恶》）的学习态度。

荀子主张学习应循序渐进，“锲而不舍”（《荀子·劝学》），持之以恒，并且要“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荀子·非十二子》），“无留善，无宿问”（《荀子·大略》）。荀子注重教师的社会地位，常把“师”与“君”并称，说：“天地者，先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他认为教师的任务主要有三，即“正礼”、“卫道”、“楷模”。他同时也强调教师的素质，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

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格言式的表述，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在今天，也闪现着睿智的光芒。其博大精深，不仅“比孔子的见解要高明得多，就是和孟子、墨子作比，由于荀子融合了诸家教育思想，显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①。

二、南北朝时期的私学

北魏中期以后，由于天下安定，私学蓬勃发展，“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传》）。特别是燕赵地区，私学尤为盛行。当时，勃海（治今河北南皮县北）程玄、清河（治今山东临清县东北）监伯阳、渔阳（治今北京怀柔县东）鲜于灵馥、饶阳刘献之、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张吾贵与王保安、武邑（治今河北武强县西南）刘兰、范阳（治今河北涿州市）孙买德、赵郡（治今河北赵县）梁祚等人均在家乡聚徒讲学。其中，张吾贵与刘献之最有名气，“海内皆曰儒宗”（《魏书·刘献之传》）。

^① 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3页。

张吾贵曾在郾谿门下学习《礼经》，在牛天祐门下学习《周易》。其后，他又曾向刘兰学习《春秋左传》，揉合杜预和服虔的注解，标新立异，“好为诡说”（《魏书·张吾贵传》）。张吾贵一生没有著述，学问没有根基。尽管学生众多，“每一讲唱，门徒千数”（《魏书·刘献之传》），但在他的学生中却没有产生什么著名学者。

刘献之曾受业于程玄，精通《毛诗》，撰有《三礼大义》4卷、《三传略例》3卷、《注毛诗序义》1卷、《章句疏》3卷。他的著录弟子只有几百人，但却都是“经通之士”（《魏书·刘献之传》）。曾受业于徐遵明的李周仁也曾向刘献之学习《毛诗》，得其精微。李周仁又向董令度、勃海程归则传授《毛诗》。程归则再传《毛诗》于渤海刘敬和、乐城张思伯、勃海刘轨思。“二刘”均为治《毛诗》的大家，“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北史·儒林上》）。

在张吾贵、刘献之之后，擅名燕赵、“海内莫不宗仰”（《北史·徐遵明传》）的经师当属徐遵明。

徐遵明（474—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属县）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17岁的徐遵明与同乡毛灵和等人结伴赴燕赵求学。先后拜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等人为师。学成之后，开馆授徒，长期在赵地一带讲学。孝明帝孝昌末年（527年），他南渡黄河，先后在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兖州住了两年，后死于乱兵，终年55岁。徐遵明在燕赵求学、讲学30年，培养了一大批燕赵学者。他向范阳卢景裕、清河崔瑾传授《周易》，向浮阳（治今河北沧州市东南）李仁周、勃海张文敬与李铉、河间权会传授《尚书》，向李铉、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传授《三礼》，向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与邢峙、乐城张思伯与张奉礼、中山北平张彫武及阜城刘昼、鲍长宣、王元则传授《春秋》。在他的弟子中，卢景裕、李铉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卢景裕的弟子郭茂、李铉的弟子熊安生后来又成为治《周易》、治《三礼》的大家。《北史·儒林传》称：“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

茂之门”；“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其影响直至唐初。

北齐时期，燕赵私学依然保持了昌盛的局面。《北史·儒林传》称在这一时期，“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这与衰微的官学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北朝燕赵地区的私学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全国，其活动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三、宋元明清的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聚徒讲学、交流学术的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末。燕赵地区最先出现的书院是五代后期建立在河北省元氏县封龙山的中溪书院。

中溪书院座落在封龙山龙首峰下。宋太宗时的名臣李昉（925—996年）年青时曾在中溪书院读过书。元人安熙在其《封龙十咏·序》中说：“山长张蟠叟等数人相与聚徒，常过百人。”可见中溪书院有一定的规模。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左周曾为中溪书院撰写《夫子堂记》。其后，大约在宋金战争中，中溪书院“废于兵”。元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年），李冶修复中溪书院，聚徒讲学。但为时不长，书院又废。30年后，安熙游封龙山，在《封龙十咏·序》中记载：“蒙泉、书龕、吟台皆在中溪书院，而敬斋（李冶之号）置祠其间。今亦皆芜废，几为樵牧区矣。”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安熙重修书院，并改名为封龙书院，聚徒讲学。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李冶的曾孙李慎言“为司农”，“符下其道廉访”，重修封龙书院，“丹漆木甃，悉撤以新”（袁楠：《封龙山书院重修记》）。

在封龙山还有一所书院——西溪书院。西溪书院座落在龙首峰西侧，原为唐朝隐士姚敬等人隐居的地方，宋初，张著修建书院，担任山长，“聚徒百人”，讲学进修。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以后，在宋辽战争中，“废于兵火”（安熙：《封龙十咏·序》）。

元时,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增至17所。除中溪(封龙)书院外,还有燕京太极书院、昌平谏议书院、新安静修书院、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宣府景贤书院、开州崇义书院、深泽乐善书院、房山文靖书院、霸州益津书院、完县忠孝书院、获鹿太行书院、新乐滋阳书院、内丘林公书院、蔚州暖泉书院、新乐璧里书院。这在北方地区是首屈一指的。

明代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有所增加,分布也有所扩大。先后建有锦州辽右和辽左书院、宣府上谷书院、京师首善书院、大名元城和应龙书院、献县献陵书院、任丘珍谟书院、卢龙北平书院、磁州滏阳书院、沧州天门书院、广平漳川书院等数十所书院。

清代燕赵地区的书院数量猛增,迄至清末,先后建有怀来绿荫和二贤书院、龙门西关书院、云州书院、保安独石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容城正学书院、正定风动书院、无极资川书院、井陘陘山书院、昌黎向往书院、乐亭集英书院、献县万春和日华书院、京师金台书院、通州潞河书院、天津问津和三取书院、静海瀛海书院、盐山香鱼书院、南和和阳书院、卢龙敬胜书院、安肃古遂书院、完县燕平书院等200余所。

在这些书院中,一些是官方创建的,一些是私人创建的,一些是初由私人创建、后由官方管理的。官方书院以元代大都太极书院和清代保定莲池书院较为有名。

太极书院创建于蒙古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是蒙古政权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第一所书院。在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以及姚枢等人的倡导下,被俘的宋儒赵复等人被延请为师,在太极书院中宣讲程朱理学。在程朱理学北传中原的过程中,太极书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史·赵复传》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尽管有夸大之嫌,但元初的北方理学家,如姚枢、窦默、许衡、刘因等人都与太极书院和赵复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莲池书院建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根据

清世宗在各省城建立书院的命令,在元朝大臣张柔的莲花池故址上“修建讲堂,延师课诵,名莲池书院”(《大清一统志·保定府》)。乾隆十五年(1750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又加以修葺。清高宗弘历出巡五台山时,曾以莲池书院作为行宫,并对其景物赋诗咏叹,使莲池书院名声大振。

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也有一定规模。例如元朝新乐永寿乡的璧里书院,原为赵士廉兄弟所建。“中为礼殿,以祀夫子,颜曾思孟十哲列焉;前树仪门,翼以两庑;后讲艺之堂,东西栖士之舍;合五十楹”;并“割侠神里田三百亩以廩师生”(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监察御使杨俊民为书院命名,祭酒苏天爵为书院作记,州县为书院蠲除差役,并上请朝廷,建议为书院设立学官。其规模和实力比一些州学还要大得多。

这一时期的燕赵各地书院,大体可分三类,或以讲求理学为主,或以博习经史诗文为主,或以八股举业为主。最普遍的还是后一类。由于缺少名师大儒,燕赵书院虽多,但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书院却为数不多。

四、颜元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改革

清朝初期的杰出思想家颜元一生以著述教学为业,在教育思想及教育改革上,他也有不少建树。

颜元早年自设家塾,教授生徒。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在博野县杨村的家塾中,制订了《习斋教条》二十则,提出“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勤赴学、慎威仪、肃衣冠、重诗书、敬字纸、习书、讲书、作文、习六艺、行学仪、序出入、轮班当值、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颜元应郝公函的礼聘,到肥乡县主持

漳南书院。为了改变书院修心养性和专习八股文的学风,颜元在漳南书院实施了“分斋教学”法。设“文事斋”,学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设“武备斋”,学习黄帝、太公、孙武、孙臆、吴起五家兵法,以及攻守、营阵、水陆战法;设“经史斋”,学习经史诗文;设“艺能斋”,学习“水学”、“火学”、“工学”、“象数”;设“理学斋”,学习理学;设“帖括斋”,学习八股举业(《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

从康熙十四年到三十五年这 20 余年间,从《习斋教条》到“分斋教学”,尽管颜元所主张的“实学”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教学活动中,但其间也产生了质的飞跃。教育的社会作用在颜元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的主张已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的内容,迈入近代教育的边缘。

五、近代直隶学校的兴建

近代直隶的新型学校,产生于洋务运动中。同治元年(1862年)由总理衙门奏请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直隶地区的第一所近代学校。

同文馆是一所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外语学校。开馆之初,仅设有英文馆,后来又相继添设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日文)馆、算学馆等。其学制为 8 年,学生“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岁上下者,各旗保送二、三名”^①。同文馆的教师,除汉文教师和算学馆的李善兰外,都是外国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甚至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 25 年之久。

除外语学校外,洋务派还兴建了一批新型的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截至到十九世纪末,直隶地区前后兴建了天津北洋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19 页。

天津北洋医学堂(1894年)、开平武备学堂(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堂(1895年)、山海关铁路官学堂(1897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等。其中,北洋西学学堂由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它与上海南洋公学一道成为全国最早的两所公立普通新式学校。

二十世纪初,直隶地区又陆续建立了保定直隶农务学堂(1902年)、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天津北洋工艺学堂(1903年)、南开学校(1904)、保定医学堂(1904年)、京师贵胄学堂(1905年)、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热河速成法政学堂(1907年)、京师铁道管理传习所(1909年)、清华学校(1909年)等一批新型学校。清廷并以诏令形式宣布改书院为学校,宣布废除了科举制。1906年,英美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还在北京联合创办了协和医学校。

在这些学校中,京师大学堂是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保定直隶农务学堂是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北洋大学堂是今天津大学前身;山海关铁路官学堂是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南开学校是今南开大学前身;京师铁道管理传习所是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协和医学校是今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清华学校则是今清华大学前身。这些新型学校的兴办,对全国近现代的教育都有着重大影响。

第七章 文学与艺术

燕赵的文学与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成就，其独特的艺术结构和艺术精神在反映不同时代风貌的同时，突出地展现了燕赵文化的地域特色。

燕赵地区的诗歌素来兴盛，天下闻名。“悲歌慷慨”，甚至被后人概括为“燕赵风骨”，产生了高亢激越的美学蕴含。大众化、通俗性的燕赵民歌在燕赵文学和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西汉的《陌上桑》、北朝的《敕勒歌》、明代的《数落山坡羊》小曲，都是燕赵民歌中的杰作。

燕赵音乐具有明快、整齐的强烈节奏感，而民歌则不仅长于抒情，而且长于叙事，它们的结合便滋生出说唱艺术。荀子的《成相》、北宋燕山的《蓬蓬花》、明清的大鼓书，即清楚地标示着燕赵说唱艺术的递进演变。

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以参军戏为代表的其他曲艺形式也得以发展起来。到金元时期，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戏剧在有着良好表演艺术基础的燕赵地区迅速崛起，蓬勃发展。借助大都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燕赵地区成为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产生了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剧作家。明清两代，燕赵作为京畿地区，戏剧曲艺更加兴盛，四大声腔系统都在这里汇聚演变。这不

仅促进了燕赵地区地方戏和曲艺的发展，而且产生出了作为国剧的京剧艺术。燕赵地区杂技的发展也与这种表演艺术的发达息息相关。

这种艺术结构的戏剧模式对燕赵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缺乏音乐性和戏剧程式的散文，在荀子之后并未在燕赵地区得到较好的发展。相反，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诗词和散曲在燕赵文学中却占有相当的地位。剧本的创作使这类文学体裁有着辉煌的成就，而且在情节的构思和整体布局上对小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艺术具有社会审美的属性。燕赵地区的北部地带呈扇形地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相接，为边塞地区，曾发生过多次数国内的民族战争。因此，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在燕赵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晋诗人张协的《杂诗》之八即为燕赵早期边塞诗的代表作。隋唐时期的诗人卢思道、高适把燕赵边塞诗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另外，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民歌和作品在燕赵文学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在绘画艺术中也有体现。在燕赵古代为数不多的著名画家中，胡瓌、高益、张勣都是以善画胡人蕃马而独步一时的。

燕赵的造型艺术具有强烈的民间造型艺术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纯朴自然，装饰性较强。从汉墓壁画到杨柳青年画，从云岗石窟到曲阳石雕，从寺庙塑像到“泥人张”彩塑，古代燕赵的造型艺术都表现了这种明显的倾向。

明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居于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首位，代表了古代燕赵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高峰，并在全世界享有盛誉。

第一节 文学

一、先秦时期燕赵的诗歌与散文

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部分地反映了古燕赵南部地区的民歌特色。《邶风·静女》、《鄘风·桑中》、《卫风·氓》等诗都是《诗经》中有名的恋歌,情真意切,细腻传神。

战国后期,燕赵地区的民间小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创作的《成相》,即是后世弹唱艺术的滥觞。它大体是“三三七四七”的句式,如“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依依!”整齐而富有变化。

燕王喜二十八年(前 227 年),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赴秦刺秦王。易水相别时,他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后来被称为《易水歌》的诗,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吟咏不衰。

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汉书·艺文志》)的赋体也产生在燕赵地区。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不仅是写作曲艺辞体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写作赋体作品的大家。荀子著有《礼》、《知》、《云》、《蚕》、《针》五篇赋以及《俛诗》、《小歌》两篇以“诗”和“歌”命名的“骚体赋”。

荀子的赋,字句整齐,有韵,具有半诗半文的气质,是一种说理、铺陈的散文赋,缺乏《离骚》、《九辩》等南方抒情新诗体的情感和韵律美。它与汉代的散文赋,形式已很接近^①。可以说,荀子的赋与其《成相》一样,是源于燕赵民间文学俗体的。在文体上,它又给汉赋以直接影响。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9 页。

荀子还是一位散文大师。荀子的散文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多用比喻、排比,浑厚雄奇,简洁明快。例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劝学》)。“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

在荀子之前,无论《论语》、《孟子》,还是《墨子》、《庄子》,其散文每篇标题都是不完整的,多取文章的开头几字做篇名,例如《学而》、《尧曰》、《秋水》、《天下》等。但荀子的散文,每篇都有一个完备的标题,概括其中心思想,例如《劝学》、《王霸》、《议兵》、《天论》等。标题的完备,是散文固定成形的标志。因此,荀子在散文文体上的建树是具有开创性的。

二、汉乐府中的燕赵民歌及《陌上桑》

乐府是中国古代专掌音乐的官署,早在秦朝就已设置。汉武帝时,重设乐府,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集。在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除吴、楚、齐、郑等地民歌外,还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以及“邯郸、河间歌诗四篇”(《汉书·艺文志》)。燕代讴以及邯郸、河间歌诗即燕赵民歌。

尽管汉武帝时期乐府所采集的民歌后来大部分已经佚失,但少数燕赵民歌却因脍炙人口而得以保存下来。《陌上桑》就是其代表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细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

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鬋鬋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是一篇优秀的叙事体民歌，源自民间传说。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箏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陌上桑》当然不是罗敷所作《陌上桑歌》，而是民间诗人根据罗敷的传说创作出来的。

《陌上桑》在继承和发展《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用高度的夸张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情节的叙述上也较为成熟，特别注意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一位英勇机智、反抗强暴的美丽妇女形象，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邺下文人集团及西晋燕赵文学

自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起，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东)就成为曹魏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以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一大批文人聚集在邺城，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掀起了建安文学的高潮。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古

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死后被其子曹丕追封为魏武帝。他的诗歌今仅存 20 余首,全都是乐府歌辞。其中,《苦寒行》表现了军旅生活的艰险,格调悲凉沉郁,带有建安诗歌的典型特征。《观沧海》是《步出夏门行》的第一首,全诗情景交融,境界高远,场面壮阔: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除曹操外,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都对建安文学的兴盛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然,在邺下文人集团中,除曹丕夫人甄氏、刘劭、李康等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文人都不是燕赵籍贯。然而,燕赵风物却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海》即是如此。另外,他们的文学活动反过来又对燕赵地区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造就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张华、张协等西晋著名的燕赵籍作家,就是在邺下文人集团所造成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其父张平,曾任曹魏渔阳太守。张华少年丧父,陷入孤贫境地。他痛感怀才不遇,写出了《鹪鹩赋》。《鹪鹩赋》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赋,与曹植的《鹞雀赋》、阮籍的《猕猴赋》齐名,极受“竹林名士”之一的阮籍称许。

西晋建立后,张华飞黄腾达,历任中书令、散骑常侍、侍中、中书监、司空等职。他凭借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学识渊博,曾作《博物志》10卷;擅长作赋,善作五言诗。张华的诗,今存 30 余首,其中有 10 余首拟乐府诗。这些诗代表了张华的最高文学成就,也影响了西晋一代的文风。

张协(约 255—307 年),字景阳,西晋安平(今河北属县)人。历任秘书郎、华阴令、中书侍郎、河间内史等职。著有《洛褰赋》、《关邛赋》、《七命》等文以及《杂诗》等。《杂诗》十首是张协的代表作。

《杂诗》十首从不同的方面抒情述志,既有闺情、乡恋,又有怀才不遇之叹;或叹世途多艰,或高歌固穷守志,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杂诗》之八:

述职投边城,羁束戎旅间。下车如昨日,望舒四五圆。借问此何时?蝴蝶飞南园。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闽越衣文蛇,胡马愿度燕。土风安所习,由来有固然。

借物抒情,时空交替,空灵清靡,很能代表张协的诗风。钟嵘称赞张协的诗“文体华净,又巧构形似之言”(《诗品》卷上)。王船山则说:“诗中透脱语,自景阳开先”;“‘蝴蝶飞南园’,真不似人间得矣”;“景中宾主,意中融合,无不尽者。”(《古诗评选》卷四)

四、北朝的燕赵民歌

北朝时期燕赵文学最具特色的是民歌。当时,随着鲜卑政权入主中原,有相当数量的鲜卑族民歌便传入燕赵地区。在民族大融合中,它们又被译为汉语而广泛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种苍劲自然的风格与燕赵汉族民歌的慷慨激昂的情调有机地结合后,扩大了燕赵民歌题材的广泛性,增强了燕赵民歌情感的表现性,使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爽朗刚劲、反映现实生活的燕赵民歌。

如《幽州马客吟》反映了人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激愤:

快马常苦瘦,勦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如《李波小妹歌》则是歌颂敢于反抗官府残暴统治的女英雄: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五、隋唐燕赵的边塞诗

(一) 边塞诗人卢思道及其《从军行》

卢思道(约532—583年),字子行,范阳涿(今河北涿州市)人。初仕北齐,历任司空行参军、直中书省、司徒录事参军等职,后仕北周,历任掌教上士、武阳太守等职。入隋后,任散骑侍郎,于隋文帝开皇三年病逝。

卢思道善作边塞诗,并游历过蓟北,对边塞风物比较熟悉。其代表作作为《从军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河合,又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上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首诗自然流畅,情感真实,雄劲而悲凉,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它已具七言歌行之体,可以视为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声之作。因此,它历来为人推重,对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有相当的影响。

(二) 唐代边塞诗人高适

高适(702—765年),字达夫,一字神武,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少年时贫穷落魄,狂放不羁。青年时西游长安,漫游梁宋。中年时又北上蓟门,想效力边庭,但未能如愿。48岁时,始任汴州封丘县尉。后弃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他晚年得志,历任侍御史、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刑部侍郎等职,进封渤海县侯。

高适慷慨有大志,务功名而尚气节,出入军旅,深入边塞,有着丰富的情感和阅历,因此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出类拔萃,与岑参齐名,成为唐代第一流的边塞诗人。

《全唐诗》收入高适的诗约有 230 余首,其中有不少优秀的边塞诗,如《营州歌》、《听塞上吹笛》、《燕歌行》等。其中,《燕歌行》最著名,堪称唐代边塞诗的典范: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拟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何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全诗雄浑苍凉,格调高远,气势磅礴,立意别致。征夫怨妇、汉军胡骑、战士美人、血战歌舞、孤城大漠、铁衣玉箸、皇恩死节纵横交织,与边塞景物构成了一幅悲壮的战争画卷,凸现出了各种矛盾的复杂关系。

燕赵傍近边地,边塞诗是唐代燕赵诗人主要创作题材之一。不少燕赵诗人,如张仲素、卢汝珍等在边塞诗创作上也很有特色。

六、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开

柳开(948—1001年),河北大名人。原名不详,后因推崇韩愈,决心继承韩愈古文传统,遂改名为肩愈,字绍先。不久,他又改名为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进士,

历任宋州司寇参军、右赞善大夫、知常州、殿中侍御史、知宁边军、知沧州等职。著有《河东集》等。

针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绮丽文风,柳开在宋初最先提出了“复古”、“尊道”的主张,强调“文统”与“道统”合一。他在《应责》一文中明确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从而揭开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序幕。

宋人对柳开在古文革新运动中的开创之功有着很高的评价。员兴宗说:“国初深于道者,其惟柳子乎!(柳)开之自名曰:吾将开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于时也,一代之文开于今也。故柳之文一传而为穆修,穆修传于尹洙,尹洙传于先正欧阳公(欧阳修)。”(员兴宗:《九华集·陈子昂、韩退之策》)另外,范仲淹、韩琦等人对柳开也有很高评价。

柳开在《应责》中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者,是谓古文也。”这对当时盛行的骈俪文风无疑是当头棒喝。但是,柳开在古文写作上却没有重大的建树。除《游天平山记》和《塞上曲》外,柳开的诗文多是辞涩言苦之作。加上他的古文理论也有偏颇的缺陷,以及当时由杨億、刘筠、钱惟演等人倡导的专讲艳丽工整的“西昆体”还极为盛行,因此柳开在宋初文坛上陷入了遭排挤的境地,最终无重大建树,仅起到了激烈呼号的先驱作用。

七、元杂剧与散曲的著名作家

(一) 元杂剧著名作家

关汉卿,号已斋(一作一斋),约生活在金末至元太宗大德初年(约1225—1302年)。《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说他是燕人,《元史补遗》说他是解州(治今山西运城)人,《乾隆祁州志》则说他是

祁州(治今河北安国市)伍仁村人。

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大都,晚年曾南游杭州、扬州等地。著有杂剧 67 部,现存 18 部:《诈妮子调风月》、《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大王单刀会》、《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闺怨佳人拜月亭》、《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关张双赴西蜀梦》、《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温太真玉镜台》、《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感天动地窦娥冤》、《尉迟恭单鞭夺槊》、《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山神庙裴度还带》、《状元堂陈母教子》、《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还擅长散曲,今存有 13 个套曲、2 个残套、57 支小令^①。

关汉卿是最伟大的元曲作家。明人贾仲明在《凌波仙·吊词》中赞誉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近人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中也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马致远(约 1250—1323 年),号东篱,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官吏,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杂剧 15 种,今存 7 种:《破幽梦孤燕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开坛阐教黄粱梦》、《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马致远又是散曲大家,现存其《东篱乐府》(辑本)1 卷,加上其他辑佚,共有散曲 130 余首。

《破幽梦孤燕汉宫秋》是马致远杂剧的代表作,《越调·天净沙·秋思》则是马致远小令的代表作。马致远擅长悲剧性抒情,曲词典雅清丽,情调悲凉,风格豪放,散曲成就高于杂剧。而这种才情又使他的剧词隽永洒落,使其杂剧作品别具特色。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创作活动主要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年)。著有杂剧 14 种,今存 3

^①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6 页。

种:《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压卷之作,语言优美,人物性格内涵丰富,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具有很高成就。

杨显之,大都人。因长于修改剧作,被称为“杨补丁”。著有杂剧8种,今存2种:《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临江驿潇湘秋夜雨》。张国宾(一作张国宝),艺名喜时营,绰号张酷贫,大都人。著有杂剧4种,今存2种:《相国寺公孙合汗衫》、《薛仁贵荣归故里》。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人。著有杂剧8种,今存《赵氏孤儿》一种。秦简夫,大都人。著有杂剧5种,今存3种:《孝义士赵礼让肥》、《东堂老劝破家子弟》、《陶贤母剪发待宾》。李文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著有杂剧12种,今存3种:《同乐园燕青博鱼》、《破苻坚蒋神灵应》、《张子房圯桥进履》。尚仲贤,真定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著有杂剧10种,今存4种:《洞庭湖柳毅传书》、《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尉迟恭三夺槊》、《十样锦诸葛论功》。以《柳毅传书》最为著名。戴善夫(一作戴善甫),真定人。曾任江浙行省官吏。著有杂剧5种,今仅存《陶学士醉写风光好》一种。李直夫,女真族人,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寄居德兴府(治今河北涿鹿),曾任湖南肃政廉访使。著有杂剧12种,今仅存《便宜行事虎头牌》一种。王伯成,涿州人。著有杂剧3种,今仅存《李太白贬夜郎》一种。费唐臣,大都人。其父费君祥也是杂剧作家,著有《菊花会》一种。费唐臣著有杂剧3种,今仅存《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一种。

以上十位作家的杂剧都极有特色。《临江驿潇湘秋夜雨》、《赵氏孤儿》、《同乐园燕青博鱼》、《洞庭湖柳毅传书》等剧系杂剧中的名作,在戏剧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便宜行事虎头牌》运用“阿忽那”、“唐兀歹”等女真乐曲曲牌,并描写了不少女真族生活习俗,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陶学士醉写风光好》、《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剧则或以抒情见长,或以曲文优美取胜。

(二) 元散曲著名作家

杨果(1197—1269年),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市)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进士,历官至偃师(今河南属县)县令。金亡后仕元,历任北京宣抚使、参知政事等职。著有《西庵集》(已佚)。现存小令[小桃红]11首、套曲5个。其[小桃红]11首均以采莲女为题材,情调和意境与词相近,民歌味较淡。其套曲《春情》情调欢快,笔法细腻,可称佳作。

胡祇遹(1227—1295年),字绍闻(一作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历任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等职。著有《紫山大全集》。今存小令11首。《阳春曲·春景二》较为有名:

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绿窗春睡觉来迟,谁唤起?窗外晓莺啼。

王和卿,大名人。生平事迹不详。《辍耕录》说他“滑稽桃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和卿)赋‘醉中天’……,由是其名益著”。其《醉中天·咏大蝴蝶》是他的代表作:

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买花人扇过桥东。

八、明代燕赵的文学创作

(一) 马中锡及其《中山狼传》

马中锡(约1446—1512年),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河北属县)人。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历任刑科给事中、兵部侍郎、右都御史等职,后遭弹劾下狱,死于狱中。著有《东田文集》、《东田奏疏》等。

寓言体小说《中山狼传》是马中锡的杰作。它以民间传说为蓝本,

加以艺术创造,成功地刻画了滥施仁慈、迂腐的东郭先生和恩将仇报、凶残的狼这两个典型的艺术形象。

《中山狼传》问世后,明代著名的作家康海便根据它创作了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使《中山狼传》享誉文坛。其后,明代作家王九思、陈与郊、汪廷讷等人都以中山狼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内容相同、文词结构不同的《中山狼院本》、《中山狼》、《中山救狼》等杂剧。

(二) “茶陵派”领袖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茶陵(今湖南属县),自曾祖李文祥起,定居北京。明英宗天顺七年(1464年)进士。次年,殿试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等职。著有《怀麓堂集》。

李东阳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特别强调诗歌的声调格律,特别推崇盛唐时期的诗风,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因此,他的诗大多典雅工丽、平正沉稳。

李东阳也擅长散文。其文笔简洁,叙述生动,议论精辟。《移树说》、《医戒》、《记女医》、《记女巫》等文,都写得比较精采。但李东阳的散文不如他的诗歌影响大。

李东阳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显赫的政治人物,门生满朝。因此,“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这在当时颇有影响。李东阳为首的文人群体,被称为“茶陵派”。作为“茶陵派”领袖的李东阳,其文学主张和拟古习气则为后来李梦阳、何景明的拟古派开启了文学流变的门户,对明代文学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 散曲作家薛论道

薛论道(约1531—1600年),字谈德(一作谈道),号青莲居士,定

兴(今河北属县)人。因一足残废,人称“刖先生”。中年投笔从戎,立有军功,官至神枢参将加副将。后辞官归乡,以读书写作为乐。著有《林石逸兴》,收其所作散曲千首。

薛论道是明代重要的散曲作家之一。他的散曲题材广泛,有描写军旅生活、战场景色的,有抒发个人感慨的,有批判现实、讽喻世情的。《古山坡羊·吊战场》是其散曲杰作:

拥旌麾鳞鳞队队,度胡天昏昏昧昧。战场一吊,多少征人泪。英魂归未归,黄泉谁是谁?森森白骨,塞月常常会。冢冢碛堆,朔风日日吹。云迷,惊沙带雪风。风催,人随战角悲。

这首散曲苍凉悲壮,风格雄浑,在明人散曲中堪称一时之绝唱,别具特色。

九、清代燕赵文学的成就

(一) 清初词人梁清标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号蕉林,又号苍岩,真定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顺治元年(1644年),降清,补原官。累迁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事,拜保和殿大学士。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词》、《棠村随笔》等。

梁清标在政治上略无建树,但擅长诗词。清人徐珂说:“明崇祯之季,诗余盛行,人沿竟陵一派入国朝。合肥龚鼎孳、真定梁清标,皆负盛名。”(徐珂:《近词丛话》)梁清标的词,浓艳清丽,意境深远。如《柳梢青》:

小雨才收,平沙细草,绿满西畴。柳眼青归,桃腮红晕,人倚高楼。家家绣钩帘,春不管斜阳旅愁。罗绮风前,秋千影里,马上墙头。

清人陆蕙思评价说：“棠村极浓艳，而无绮罗芴泽之态。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国朝词综》卷一）因此，梁清标以其雍容闲雅的词风，在清初享有盛誉，“领袖词林数十年”（《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一），成为一代巨擘。

（二）纳兰性德及其诗词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原名成德，后避太子嫌名而改名。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权臣、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授乾清门侍卫。性德曾扈从康熙帝“幸海子、沙河、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刺”，“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徐乾学：《纳兰性德基志铭》），饱览山川风物，见多识广。这对他的诗词成就有着重要影响。

性德工诗，尤长填词。他的词清婉凄艳，“其品格在晏叔原（殊）、贺方回（铸）间”（《近词丛话》）。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三）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约1715—1764年），名霁，字芹圃，号芹溪、梦阮、雪芹。远祖曹锡远曾任明朝沈阳中卫的地方官，被清军俘虏后沦为奴隶，后代被编入旗籍。清军入关后，曹家开始飞黄腾达。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颀、叔父曹頔连任江宁织造，世居南京，声名赫赫。雍正五年（1727年），曹頔被落职抄家。次年，曹雪芹随叔父颀及祖母、母亲等人迁到北京居住。其后，因生活拮据，曹雪芹又迁到北京西郊的西山居住，直到逝世。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精通经史、擅长诗词。曹雪芹自幼便受到了优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精通六艺，才华横溢。少年时的家道中衰，造成了他的傲岸不羁、愤世嫉俗，激起了他创作《红楼梦》的激情。在创作

《红楼梦》之前，曹雪芹曾写过一部名叫《风月宝鉴》的戒淫劝世之书（也有人认为《风月宝鉴》系曹雪芹之弟棠村所作）。《红楼梦》即是在《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红楼梦》共 120 回。一般认为前 80 回为曹雪芹创作，后 40 回为高鹗续写。在艺术结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语言艺术上，《红楼梦》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以贾府为特定环境，以封建盛世为特定背景，成功地塑造了 400 位左右血肉丰满的人物，并巧妙地将他们和众多的事件有条不紊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腐朽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红楼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 多年以来，它传遍了世界。曹雪芹的名字，也被列入了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

（四）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李汝珍（约 1763—1830 年），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属县）人。精通音韵，性喜杂学，鄙夷时文，故于科举功名，无所成就，仅在嘉庆五年至十年（1801—1805 年）间，在河南任过县丞。《镜花缘》是其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镜花缘》全书 100 回，以女皇武则天时代为背景，编写出百花女神被贬下凡，降为百位才女，后在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时，百人全部及第的故事。小说以秀才唐敖随妻弟林之洋去海外经商遨游、唐敖之女唐小山（百花仙子托生）出海寻父为线索，借用虚幻的海外风土人情，一方面对现实社会进行讽刺批判，一方面创造出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来表达作者憧憬新社会、新人生、新男女的“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愿望。

《镜花缘》在艺术上也别具风格。许多海外奇谈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书中穿插的一些警辟的笑语和隽永的谜语也富于智慧巧思。但

是,由于李汝珍在书中过多地表现自己经学和小学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镜花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第二节 戏剧曲艺

一、“金院本”与元杂剧

我国古代戏剧作为一种较完备的综合艺术形式出现,其标志为公元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初产生的宋杂剧。北宋灭亡后,由于南宋与金朝的南北对峙,宋杂剧开始南北分流。在南方,产生了被称为“永嘉杂剧”(也称温州杂剧)的南戏;在北方,则产生了被称为“金院本”的北方杂剧。

两河地区——河东和河北,是北方杂剧产生和形成的地区。河东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和河北的真定,是北方杂剧最早的两大表演中心。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后,中都于是成为“金院本”的表演中心。

“金院本”同宋杂剧一样,在演出体制上仍是“一场两段”。五种角色——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也与宋杂剧相同。然而,在演唱上,“金院本”与宋杂剧却有很大不同。它的不少唱段是“用当时流行于燕京和冀州一带的曲调来唱的”^①。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诸宫调”等说唱艺术以及北方各民族的民间歌舞表演艺术后形成的。其剧本体裁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则另加入“楔子”。其角色有正末、正旦、净等。其演出体制与“金院本”大致

^①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相同,即以正旦和正末为主演,每折通常由正末或正旦一种角色一唱到底;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大都是元杂剧的演出中心。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等人都长期居住在大都。著名演员,如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司燕奴等人都经常在大都演出。平阳、真定等地区的艺人也纷纷聚集到了大都。元朝末年,北方杂剧开始衰落,南方的南戏逐渐兴起,风靡全国。但是,北方杂剧的优秀传统并未中断。在燕赵地区,缓慢发展起来的民间戏剧曲艺新的艺术形式,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到了北方杂剧的影响。

二、丝弦戏、板腔、北昆

从元代后期到清代中叶,流行在燕赵地区的戏曲声腔主要有丝弦戏、板腔、北昆三种。

丝弦戏又称弦子腔、弦索腔、丝弦腔、姑娘腔、罗罗腔等。主要流行于河北中部地区。相传是元代弦索调的遗音,因当时北曲清唱时,是用一种名叫弦索的乐器(类似琵琶)来伴奏的,故而得名^①。清人李调元在其《剧话》中说线弦戏的唱腔特点是“音似弋腔,而尾声不用人和,以弦索和之”,直到今天,丝弦腔的句尾依然是这种特点。

板腔源于南方剧种弋阳腔。明朝中期以后,弋阳腔流行于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弋阳腔在燕赵地域流行的同时,它也逐渐北方化了。因此,它又被称作“京腔”、“高阳高腔”等,在演出风格上与早先的弋阳腔有了明显差异。

北昆源于昆曲。昆曲产生于江苏昆山,明朝中叶传入北京,并逐渐流行于燕赵地区。明末清初之际,它又取代了板腔,成为燕赵地区

^① 马文龙等:《河北梆子简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最受欢迎的剧种,并对后起的京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流行于燕赵的昆曲在咬字吐音和风格上与流行于江南的昆曲略有差异,因此被称为“北昆”。

到清朝中叶以后,由于河北梆子、京剧等新剧种的兴起,板腔、北昆逐渐趋于衰落。而丝弦戏却分为东、南、中、北、西五路,仍在今河北中部地区广泛流传,并与老调梆子同台演出。

三、京 剧

京剧属皮黄声腔系统,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剧种,曾一度因北京改称北平而称“平剧”。

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秦腔艺人魏长生和“四大徽班”先后入京,导致了徽调(二黄调)和秦腔(西皮调)的合流,使皮黄声腔独尊京师剧坛。而在南方的湖北楚调也大约在此前后,完成了西皮二黄的合流。道光年间(1821—1850年),湖北楚调演员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人入京演出,又导致了徽汉(楚调)合流,给京师剧坛带来了新气象,“楚调新声”风靡北京。燕赵籍艺人一香“学而兼其长”,“郢曲声声妙,燕言字字清”(粟海庵居士:《燕台湾爪集》),开了“概用京音”(观剧道人:《极乐世界·凡例》)演唱皮黄的先声。而用京音演唱皮黄,则是京剧诞生的主要标志^①。其后,经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不断革新改造,京剧艺术构成了一套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日臻完美,成为传统戏剧艺术的集大成者,风靡全国。

京剧的传统剧目约有千余个,广泛流行的约有《宇宙锋》、《霸王别姬》、《打渔杀家》、《三岔口》、《群英会》、《空城计》等 200 余个。

^① 陈义敏:《京剧形成之我见》,《百科知识》1991年第5期。

四、河北梆子、老调、武安平调

清朝中叶以后,产生于晋秦豫交界地区的蒲州、大荔、平阳一带的山陕梆子流入燕赵地区。经过数十年的逐渐衍变,于道光年间形成了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早年又称京梆子、直隶梆子等。除净生行外,角色行当分类及其表演程式,大体与京剧相同。早期唱词及念白的发音杂有秦音,后逐渐改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念白与京剧近似。以梆子按节拍,音调高亢,表演细腻。

光绪初年,河北梆子蓬勃兴起,与皮黄(京剧)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轰动了北京剧坛,流行于今河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河北梆子的代表性剧目有《秦香莲》、《拾玉镯》、《打金枝》、《宝莲灯》等。著名演员有侯俊山(十三旦)、郭宝臣(元元红)、田际云(响九霄)、崔德荣(灵芝草)、赵佩云(小香水)、刘喜奎、王莹仙(金刚钻)、梁宗旺(达子红)等。

老调又名老调梆子,流行于今河北省中部的保定、沧州、衡水、石家庄一带,以保定为中心,分东、西、南三路。清朝末年由“河西调”演变而成,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河北梆子的影响。其生、净分行不分腔,都由老生扮演,同唱老生调。并与以演生、旦戏见长的丝弦戏合班演出,又被称为“老调丝弦”。代表剧目有《潘杨讼》、《忠烈千秋》、《下河东》等。

武安平调也属梆子声腔系统,约在清朝中叶由河南“怀调”演变而成,并受到“越调”影响。流行于河北南部武安一带以及豫北、晋东南地区。代表剧目有《两狼山》、《天仙配》、《下陈州》等。

五、评剧及其他秧歌戏

评剧是在民间说唱“莲花落”和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朝末年,产生于冀东一带。民国初年,它经过著名艺人成兆才等人的改革,先后吸收了河北梆子、京剧、滦州皮影戏的剧目、音乐和表演形式,在对口莲花落、唐山落子、奉天(今辽宁省)落子的基础上创建而成。因此,它早年又叫“蹦蹦戏”、“落子戏”、“平腔梆子戏”。在北京也有其支派,俗称“北京蹦蹦”。评剧流行于北京、天津、华北和东北各省。虽有京剧化倾向,但仍保持了民间秧歌戏活泼自然的特点。《杨三姐告状》是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

河北定县秧歌、武安落子也是有代表性的民间秧歌戏。武安落子尤其有特色。它是在清朝末年由高跷舞曲“花唱”演变而来的,至今尚有传统剧目 100 余个,流行于冀南、豫北、晋东南地区。

六、滦州皮影戏

滦州皮影戏是我国众多皮影戏中的一个剧种,大约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滦州(今河北滦县)形成,并流行于冀东一带。皮影戏形成于北宋,最初是用纸雕刻而成。滦州皮影则使用驴皮制作,因此也叫“驴皮影”。其音乐唱腔综合板腔、京剧以及滦州一带的民间曲艺变化而成,对评剧及后来的影调剧有一定的影响。

七、参军戏与相声艺术

参军戏是在西周“优”戏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滑稽问答为主的一种表演形式。《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说: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乐。

这是参军戏起源的最早记载。参军戏一般由两人表演，一名叫参军，一名叫苍鹅。而参军这个角色，据说就是源于周延的官职——参军。石勒的后赵政权定都邺城，而馆陶即今河北馆陶，由此可见，燕赵地区是参军戏最早产生的地区。

参军戏与后起的相声艺术有着渊源关系。尽管现代形式的相声形成时代难以确考，但它至迟不会晚于清朝中叶。而且，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也最早产生于北京、天津两地。清代著名的相声艺人是北京人朱少文（艺名“穷不怕”）。他常演的节目有《字象》、《拆十字》等。

八、子弟书

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渊源于清代八旗军中流行的巫歌和俗曲。乾隆年间，北京的满洲八旗子弟吸收民间鼓词的形式，在原曲调的基础上创造了子弟书。子弟书的书词以七言为体，曲调较为简单，演唱时以八角鼓击节，没有说白。早期以北京的东城和西城为区别，分为东城调和西城调两种流派，后又出现了南城调和北城调，并传入东北和天津。清代末年，即已衰亡。

子弟书重视书词创作。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著录，约有书词400余种。较有影响的书词有《红拂私奔》、《杜丽娘寻梦》、《长坂坡》、《凤仪亭》等。

九、八角鼓和单弦

八角鼓系一种打击乐器,鼓身为八角形,单面蒙以蟒皮,周围嵌有响铃。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已流行北京。《宛署杂记》称艺人刘雄“击八角鼓,擅绝一时”。清代乾隆年间,八角鼓与一种叫“岔曲”的小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坐唱形式的曲艺,在满族旗籍子弟中开始流行。其后,又逐渐流行于民间。八角鼓包括岔曲、群曲、拆唱八角鼓、单弦、双头人等5种演唱形式。还有一种叫“全堂八角鼓”的,分为鼓(八角鼓、北极梅花大鼓、联珠快书等)、溜(马头调等小曲)、彩(古彩戏法、相声、双簧等)三种表演形式,与其他曲艺、杂技结合起来表演。清代嘉庆以后,八角鼓逐渐衰落,岔曲、单弦开始盛行。其后,岔曲渐与单弦合流,其基本曲调被拆为单弦的曲头和曲尾。

单弦又叫“单弦牌子曲”、“牌子曲”,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的曲艺形式,曲牌众多,曲调丰富。有两种演出方式,一是自弹自唱,一是一人站唱,以八角鼓敲击节拍,另一人操三弦伴奏。单弦曲目早期有长篇大书,后均为演唱短篇。常用曲调有《太平年》、《云苏调》、《怯快书》、《南城调》等。

十、燕赵地区的大鼓

大鼓也叫大鼓书,由一人击鼓、板演唱,一至数人用三弦等乐器伴奏。清初形成于燕赵和齐鲁地区,清末盛行于中国北方及长江、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有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山东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湖北大鼓、太原大鼓、广西大鼓、长沙大鼓、淮南大鼓、苏北大鼓等30余种。其中,西河大鼓、梨花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系影响较大的5种大鼓。除梨花大鼓外,其

余 4 种都是流行于燕赵地区的大鼓。

西河大鼓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当时,高阳艺人马三峰在木板大鼓、弦子书唱腔的基础上,吸收戏曲、民歌的曲调,用冀中方音演唱,并用铁板和大三弦伴奏,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唱腔。西河大鼓原名“河间大鼓”、“梅花调”,艺人全都出自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由于天津人通称大清河和子牙河为“西河”或“下西河”,所以在天津演出时,它开始便被称为“西河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艺人赵玉峰等人把它正式命名为西河大鼓。西河大鼓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基本曲调有头板、二板、三板等。传统曲目有中、长篇 150 余部,小段、书帽 370 余篇。《杨家将》、《呼家将》、《闹天宫》、《小姑贤》等曲目影响较广,流行于河北、京、津、山东、河南以及东北、西北的部分地区。

京韵大鼓产生于清末,是由艺人胡十(北京人)、宋五、霍明亮等人在木板大鼓和清音子弟书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后逐渐形成的。其后,经著名艺人刘宝全(河北深州市人)、张小轩(北京人)、白云鹏(河北霸州市人)的进一步改造加工,形成了京韵大鼓的三大流派。京韵大鼓主要演唱短篇,只唱不说。主要唱腔有起板、平腔、垛板、快板等,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传统曲目有 105 段,《长坂坡》、《战长沙》、《黛玉焚稿》、《闹江州》等曲目影响较大。主要流行在京、津、河北及东北、华东的部分地区。

乐亭大鼓也叫“乐亭调”,于清朝中叶产生于乐亭(今河北属县)地区。它是在竹板书及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乐亭民歌、影戏调的曲调唱腔而逐步形成的。清末,乐亭大鼓艺人温荣(温铁板)又吸收梨花大鼓的演出形式,用左手击铁板,右手击鼓,使乐亭大鼓的演出形式趋于定型。乐亭大鼓以唱为主,唱词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因流行地区不同而分为三派:流入天津的又叫铁板大鼓,流入北京的因改用扬琴伴奏而叫单琴大鼓(后改名北京琴书),流行在唐山地区的又叫

唐山大鼓。乐亭大鼓有中、长篇说唱和短篇唱段两种形式。《杨家将演义》、《呼家将》、《包公案》、《大闹天宫》、《拷红》是其优秀传统曲目。

梅花大鼓也叫“梅花调”、“清口大鼓”。清末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华北各地。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新编曲目也可以二人对唱)，两三人用三弦、琵琶、四胡等乐器伴奏。唱词基本是七字句。长于在叙事中抒情。优秀传统曲目有《探晴雯》、《劝黛玉》、《摔镜架》、《目莲救母》等。

第三节 绘画书法雕塑

一、燕赵绘画艺术

(一) 古代墓室壁画和寺院壁画

目前所能见到的燕赵最早的墓室壁画，是汉墓壁画。其中，河北望都的汉墓壁画是最为重要的。该墓壁画绘在前室(附二侧室)四壁和前室通往中室的过道两侧，在敷有白灰的砖壁上用毛笔勾线着色。从壁画的内容看，墓主为高级官员，因此躬身迎接的“寺门卒”、“门亭长”、“门下小吏”、“辟本伍佰”、“门下功曹”、“门下贼曹”、“槌鼓掾”等僚属以及鸳鸯、白兔、羊等动物便成为壁画的主体，摆放得井井有序。人物的姿态动作自然，衣褶简单而合乎运动规律。面部、特别是眼睛都描绘得很精神。画中色彩不多，却能以笔墨渲染衣褶及动物身体，企图表现明暗及体积^①。白兔形象逼真而传神，体现了画师写实的高超技艺。

安平汉墓壁画也很著名。该墓有“熹平五年”(176年)的题记，在

^① 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中室及其南耳室、前室的南耳室内均有壁画。中室四壁绘有墓主出行的图画,分上下四层,场面宏大,共有车马 60 余辆(匹)。中室北壁绘有墓主宅院全图,南壁绘有“侍奉图”,两耳室绘有“守门卒”、“侍卫”。

辽宁辽阳、金州以及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地的汉墓壁画,处在当时燕赵文化圈的外围,也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燕赵绘画艺术。这些汉墓壁画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为题材,如车骑出行、祭奠、宴饮、燕乐等,注重表现细节。在绘画技法上,有白描、有没骨法,用色有平涂、有浓淡的渲染,有些画面的色彩还较为复杂,有朱、黄、青、绿、紫、黑等多种颜色。在布局上,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有较好的照应,讲究细节的精细和整体气势的壮阔,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井陘宋墓壁画、宣化辽墓壁画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有些十分精美,堪称壁画中的上乘之作,如茹茹公主墓壁画;有些则显朴拙,反映了普通民间的绘画技艺,如井陘宋墓壁画。

石家庄毗卢寺元代壁画、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壁画、承德普宁寺清代壁画属寺院壁画的杰作。其中,毗卢寺壁画中的释道儒合流水陆画共绘有三教九流人物 500 余位,形象逼真,各尽其态。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帝释梵天画则在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上有精湛技艺,把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聪慧、诃利帝母的慈祥、毕哩孕迦的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而传神。

(二) 著名画家及其作品

燕赵地区第一位著名画家是隋代画家展子虔。展子虔(约 550—604 年)系勃海(今河北沧州一带)人,历北齐、北周,仕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擅画人物、车马,亦工台阁、山水。其作品《北齐后主幸晋阳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等均佚,仅存《游春图》一卷。《游春图》为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青绿设色,金线钩斫,景物浓丽,强调表现春山春树的青绿,有着独特的风格。其技法被后人称

为“青绿法”，对唐代李思训画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展子虔也被誉为“唐画之祖”。

唐宋时期，范阳卢鸿、胡瓌和河间许道宁、涿郡高益、右北平庞崇穆、瓦桥张勤、易州任询都是燕赵籍有影响的画家。其中，胡瓌、高益、张勤以善画胡人蕃马而独步一时，而卢鸿、许道宁、庞崇穆、任询则以善画山水而享誉画坛。

胡瓌为五代后唐画家，系定居范阳（今北京）的契丹族人。画有《阴山》、《七骑》、《射鹞》等，存世作品有《卓歇图》，描写牧人搭立帐幕歇驻的情景。胡瓌作画“以狼毫缚笔”，疏渲“驼马鬃尾、人衣毛毳”（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使其显得纤健清劲，技法很有特色。

元代蓟丘（今北京）李衍（1245—1320年），字仲宾，号息斋道人，擅画墨竹，是元代画竹的名家。编有《竹谱》一书，对画竹的规则作了系统阐述。存世作品有《四清》、《墨竹》、《双松》等图。

（三）杨柳青和武强年画

中国专用于过年张贴的年画是民间传统绘画的重要体裁，在宋代已经流行。天津杨柳青一带的民间年画艺人在明代中叶开始创制年画。弘治元年（1488年）的《九九消寒图》、隆庆元年（1567年）的《寿星图》，都是杨柳青年画^①。到了清代，杨柳青年画更为兴盛，作品行销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画师。其中，高桐轩的艺术成就最大。

高桐轩（1835—1906年），字荫章，杨柳青人。绘刻有《踏雪寻梅》、《文姬归汉》、《三顾茅庐》等佳作。作品有文人画意境，生动高雅。

杨柳青年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构图丰满，笔法匀整，色彩鲜艳；重要部位，如人物的头脸衣饰等多以粉、金晕染；人物形象完整，但局部表现夸张。

^①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

河北武强年画的历史也很悠久,大约起源于明代。起初是“画纸”,后半印半画,到清朝末年方用木版水印。武强年画设色单纯,不用粉、金,也不重泼彩手绘,强调刻工,粗放简练,以明快见长。

二、燕赵书法艺术

(一) 著名碑刻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尽管在先秦时期还无所谓书法,但由于后来的书法家大多都喜欢寻求古意,因此甲骨文、金文、篆书等先秦文字也就具有了“法书”的意义。

北京昌平出土的带字甲骨、河北辛集出土的作父丁宝罍彝卣、元氏出土的臣谏簋、平山出土的中山王罍鼎、易县出土的郾王咎造行议自夆司马鞞戈以及平山发现的公乘得守丘石刻等金石文字,便代表了燕赵地区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先秦书法风格。

东汉时期隶书的发展已到成熟阶段,树碑立传之风大盛,碑刻极为精湛。元氏的《祀三公山碑》、《封龙山碑》及鸡泽的《淳于长夏承碑》等均为汉碑中的珍品,反映了东汉燕赵地区无名书法家的精湛书法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燕赵地区的书法艺术最辉煌灿烂的时期。起源于燕赵地区的魏碑书法成为北朝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对隋唐楷书、乃至清朝书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县的《皇帝东巡之碑》、隆尧的《杨翬碑》、武安的《龙山寺比丘道瑄造像碑》、灵寿的《赵郡王高叡造无量寿像记》、磁县的《兰陵王碑》、曲阳的《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等堪称魏碑法书,或古朴尚存隶意,或舒畅流利。

正定隆兴寺的《龙藏寺碑》系一块隋碑,字体方正有致,结构朴拙,略带隶意,楷法媚劲,是由魏碑到唐碑的过渡阶段的碑刻精品。

唐宋时期,由于楷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因而碑刻风格也趋于多样化,或雍容华贵,或秀丽遒劲,或险峭峻拔。燕赵地区所存留的唐宋碑刻也体现了这一时代风格。其中有不少珍品,如沙河的《宋璟碑》系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写,赵县的《大观圣作之碑》系宋代书法家蔡京行书题额、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宋徽宗“瘦金体”书写。一些无名书法家的碑刻也表现了高超的书法和碑刻技艺,如深县《马超君造像碑》不仅书法精妙,而且碑系凤眼石制成,遇水后即显出黑珍珠般的绿豆大小的黑点,十分神异。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行书碑刻。北京宛平的《云麾将军李秀残碑》系唐代书法家李邕书写,是行书碑刻中的珍品。

(二) 著名书法家及其作品

东汉时期,随着汉隶逐渐成熟定型,行书和草书也应运而生。草书在东汉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大师有史游、杜度、崔瑗、杜操等。

崔瑗(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曾师从杜度,善章草和小篆,著有《草书势》、《篆草势》等,书法造诣极高,被誉为“草贤”。今草大师张芝曾学过他的字体,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师有钟繇、卫瓘、索靖等人。他们的书法对燕赵书法影响颇大。范阳卢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魏书·卢渊传》),子孙后代颇多书法家。清河崔悦学习卫瓘书体,与范阳卢谌(卢志之子)并以书法著名。两人又“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魏书·崔玄伯传》)。崔悦之孙崔玄伯、曾孙崔浩与卢志的六世孙卢渊都是北魏初年的书法大师,是魏碑书体的奠基人。《魏书·卢渊传》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魏书·崔玄伯传》称:“魏初,重崔、卢之书。”

隋代范阳的卢昌衡,唐代广平的高正臣、昌黎的韩择木、赵郡的李阳冰、范阳的卢藏用,宋代赵州的宋绶和宋敏求、饶阳的李宗谔,金代易州的任询,元代大都的鲜于枢、邢州的刘秉忠,清代永平的张盖、巨鹿的杨思圣、静海的励杜讷、大兴的翁方纲和朱筠等人,都是书法

名家。其书,以李阳冰、鲜于枢、翁方纲最为知名,代表了燕赵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准。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字少温,工篆书。其书迹已亡佚不存,石刻有《怡亭铭》、《般若台题名》等。其书体变化开合,自成风格,为秦代李斯之后的篆书大师。

鲜于枢(1256—1301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工正、行、草书,尤善草书。存世书迹有《渔父词》、《透光古镜歌》等。其书体带河朔伟气,笔力遒劲,奇态横发。其书法造诣在元代仅次于赵孟頫。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苏斋。其正书学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工整浑厚,小楷尤为精绝;其隶书学史晨、韩勅诸碑,端正谨严。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所写碑帖题跋甚多,以《苏斋题跋》、《金刚经》最为精妙。

三、燕赵雕塑艺术

(一) 著名石窟和曲阳石雕

燕赵地区的著名石窟主要有大同云岗石窟、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辽西万佛峡石窟、涉县古中皇山石窟等。

云岗石窟分布在山西大同武州(周)山(又名云岗),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洞窟53个(主洞21个),主要的石窟完成于北魏和平元年至太和十八年间(460—494年),小窟小龕的修建则延续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共有造像51000余尊,最大的高达17米。云岗石窟是中国内地现存的最早的石窟。其雕刻风格是在继承汉代石刻艺术的传统和吸收外来影响而形成的,立体造型和高浮雕技艺都十分成熟,佛像的表情表现得极为生动。个别佛像在造型上已具有唐代雕塑丰满的风格。

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分布在南、北响堂山上,相距约有15公里。

南响堂山有 7 窟,北响堂山有 9 窟。主要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550—559 年)所建,其后续有雕造,共有造像 4300 余尊。其雕刻风格与云岗石窟不同,显得十分洗炼,体现了北齐的新风格。其立体造型已与隋唐相近。

辽西万佛峡石窟分布在辽宁义县的万佛峡,属北魏后期石窟。古中皇山石窟在河北涉县凤凰山上,属北齐高洋时期的石窟。其雕刻风格大致与云岗石窟和南北响堂山石窟相同。

这些石窟造像标志着燕赵石雕艺术的成熟和完美。此后各代,燕赵石雕艺术都是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的。明代的十三陵、清代的東西陵以及故宫、名刹中的许多石雕作品都体现了燕赵石雕艺术的精美,而河北曲阳石雕也以其悠久的历史阐释了燕赵石雕艺术的悠久传统。

曲阳境内的黄山盛产汉白玉石,这是曲阳石雕艺术得天独厚的条件。1953 年,在曲阳修德寺遗址曾发现了大量的石刻造像。按造像的年款铭记,最早的为北魏神龟二年(520 年),最晚的为唐朝天宝九载(750 年)。造像均为汉白玉雕造,以东魏、北齐、隋代雕造的为最多。这说明,曲阳石雕的历史至迟也从北魏时期开始。

曲阳石雕艺术经久不衰。清朝末年,在巴拿马博览会的世界石雕艺术赛会上,曲阳石雕以其精美雅致,获得了世界第二名。

(二) 著名雕塑家

燕赵历代从事雕塑的民间艺人大都只留下了作品而没有留下姓名,留下姓名者又大都没有生平事迹,元代雕塑家刘元和清代天津的“泥人张”则属幸运者。

刘元(生卒年代不详),字秉元,今天津市宝坻县人。初为道士,师从青州杞道录学艺,后从尼波罗国(今尼泊尔)雕塑家,在大都学习佛像雕塑。至元年间(1264—1294 年),他运用塑土、范金等技法为上都和大都的名刹塑像,声名远扬。延祐年间(1314—1320 年),他以唐代

名臣魏征画像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大都南城东岳庙的仁圣帝像。他在上都塑造的“三皇”像也极为精妙。

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是张长林(1826—1906年),字明山,后以字行。他吸收古代泥俑、陶俑以及宗教彩塑的传统手法,自我摸索,练就了一手绝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成功塑造了著名京剧艺人余三胜的泥塑形象,被誉为“泥人张”,一举成名。其后,在巴拿马博览会上,他的泥人作品获得一等奖,轰动海内外,其作品遂成为颇受欢迎的艺术珍品。“泥人张”的作品与无锡惠山泥人齐名。其形态逼真、局部夸张,色彩简洁明快,富有装饰趣味。

第四节 音乐歌舞杂技

一、燕赵音乐歌舞的发展及成就

燕赵素来是音乐歌舞之乡。“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李白:《幽歌行》)诗中的“长歌”、“醉舞”,正是燕赵音乐歌舞闻名于世的写照。

早在战国时期,中山司马惠就称誉赵国是“天下善为音”(《战国策·中山策》)的地方;燕国太子丹在易水之畔送别荆轲,由高渐离击筑、荆轲高唱《易水歌》,也是燕国音乐歌舞兴盛的反映。荀子所著的《乐论》则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对音乐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而且,荀子的《成相》篇更是直接反映了燕赵地区这种被称为“成相”的民间说唱艺术的兴盛。

西汉时期,燕赵音乐歌舞更趋兴盛。司马迁在记叙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的民风时说:“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而赵女也是“设形

容,揆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凭借美貌姿色和能歌善舞来“奔富厚”。(《史记·货殖列传》)著名的“邯郸鼓”大致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也是中山人。他出身于乐工世家,父母兄弟都是乐工。他精通音乐,擅长演唱,汉武帝时任协律都尉,曾经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并模仿西域音乐中《摩诃兜勒》曲,谱写“新声”二十八解,称为“横吹曲”,用于军中。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又共同搜集《周官》以及诸子百家论述音乐的文献,整理成《乐记》一书,对儒家的音乐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其内史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王禹任谒者,便将《乐记》献给朝廷。《乐记》一书后经刘向整理后,便成为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纲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的影响,燕赵音乐歌舞又呈现出新的特色。早在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鲜卑部落首领就从曹魏和西晋政权那里得到了一批音伎和乐器。西晋灭亡后,前赵刘聪和后赵石勒又获得了西晋的大量伶官和乐器。其后,几经辗转,这批伶官和乐器又被北魏政权所获得。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在燕赵地区开始并行兼用。北魏初期,凡朝廷祭祀和聚会,都采用汉乐,“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而在宫廷中,鲜卑统治者则唱鲜卑歌曲《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以示“不忘其本”(《魏书·乐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随着民族大融合的逐渐实现,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便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新风格的燕赵音乐舞蹈。《敕勒歌》、《踏谣娘》、《兰陵王破阵曲》等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优秀燕赵音乐舞蹈的杰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风格。

唐宋盛行大曲。大曲是一种包含有器乐、声乐和舞蹈的大型乐舞表演形式,在当时的雅乐、清乐、燕乐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并陘柿庄的宋墓壁画中有一幅民间的大曲图(图有残缺),从存留部分看,奏乐者

6人,所操乐器为大鼓一、杖鼓二、笛一、箏一、拍板一,舞者1人。这种民间大曲的程式自然不如宫廷复杂,但由此可见大曲在燕赵民间的表演形式。这种程式简化的大曲在伴奏上,其乐器配置已经与鼓子词、诸宫调等民间说唱艺术很接近了。

北宋末年在燕山地区流行着一首“新番嘌唱”《臻蓬蓬》(又名《蓬蓬花》):“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二三月,满城不见主人翁。”(《宣和遗事》)演唱时用鼓伴奏,每唱到曲尾,就用鼓心敲出“蓬蓬蓬”,用鼓边打出“乍乍乍”,再用鼓心敲出“蓬”,作为尾声。这种用鼓伴奏的嘌唱以及当时流行的诸宫调对以后元杂剧的“冀州调”声腔系统和清代的“大鼓书”等说唱艺术均有相当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契丹的音乐歌舞对燕赵地区也有很大影响。如当时演奏“渤海乐”的杵琴,音箱呈正方形,以铁为腔,两面蒙皮,张弦三根,实为三弦之滥觞。宋人陈旸的《乐书》记载,契丹的民间歌舞表演时“歌者一,二人和”,伴奏乐器只有一支小横笛、一个拍板、一个拍鼓。这种表演形式对燕赵的民间歌舞和说唱艺术也有一定影响。而在另一方面,燕赵的音乐歌舞对契丹的影响也很大。五代十国时期,大量的汾、幽、蓟乐工被契丹掳走,把汉族音乐也带入了契丹。从辽阳、锦西、宣化等地的辽墓壁画的乐舞图中,都可以看到“大曲”的表演形式。

元明清时期,由于戏剧艺术的昌盛和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影响,燕赵的音乐歌舞也有较大发展。明人沈德符的《顾曲杂言》记载:“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元人小令到明朝时,已演变成民间小调。“数落山坡羊”起自宣大辽东三镇,在燕赵地区极为流行,以致“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顾曲杂言》)。同时,北京郊区的“插秧歌”、“桔槔水歌”以及燕赵地区的“弹词”、“鼓词”、“岔曲”、“鼓吹”、“吹打”、“十番”、“弦索”等民间音乐歌舞及说唱艺术形式也

极为丰富,与戏剧和曲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起来。

二、燕赵杂技艺术

燕赵杂技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以摔跤表演形式出现的冀州“蚩尤戏”。在汉代“百戏”中,从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墓壁画的百戏场面看,这一时期的燕赵杂技艺术已基本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杂技艺术已趋于成熟。曹魏定都邺城,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都喜好百戏。曹叡“每逢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后赵石虎在邺城也是“殿前作乐,高绳、鱼龙、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邺中记》)。北魏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拓跋珪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下诏“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绳百尺、长趺、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魏书·乐志》)。北齐时有“鱼龙澜慢、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文献通考·乐考二〇》)等杂技节目。这些节目已包含了马戏、魔术、手技、爬竿、走索等类型,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幽州地区的“戴竿”(爬竿)技艺十分精湛。据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幽州人刘交戴长竿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天宝十载(751年),奚、契丹入侵,范阳守将向润容因兵少,见教坊中的戴竿、走索艺人矫健可用,便将他们组织起来出城作战。可见当时从事杂技的艺人数量之多。

明清时期,燕赵地区的杂技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人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高粱桥》记载了北京清明节的杂技表演。其节目有“扒竿”、“筋斗”、“钻圈”、“迭案”、“筒子”、“解数”等,极为精彩。清人李声振(清苑人)把自己在北京所见的100种民间伎艺写成100首“竹枝

词”，取名为《百戏竹枝词》。其中，杂技节目有“口技、弄丸、吞剑、坛技、吞火、蹬梯、扇技、飞刀、射天球”等数十种。在当时的庙会、社火中，常有杂技表演。北京旧时的琉璃厂、西直门外的高粱桥、天桥等地都是杂技艺人固定演出的场地。燕赵地区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艺人。清朝乾隆年间的口技艺人“百鸟张”能表演各种鸟鸣，几可乱真。与他同时的“画眉张”则以善于模仿画眉叫声而享有盛名。河北的吴桥从清末开始，许多人便以杂技为业，家传世习，造就出了一大批著名杂技艺人，影响直到现今，被誉为“杂技之乡”。

第八章 园林、桥梁

燕赵大地古典园林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籍资料上看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周。《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之苑,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文中提到的沙丘苑台(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就是供帝王后妃“乐戏”的一座园林。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及其子在公元前 295 年曾游居沙丘,并发生了沙丘宫变。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于公元前 210 年东巡回返也病逝于沙丘平台,说明至少在秦时沙丘苑台还相当繁盛。古人模山建台不仅有娱乐目的,也表示了对山岳的崇拜,象征着一种不可企及的权势和力量。故尔,随周王室衰微,诸侯各霸一方,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建台设圃之风极盛,如楚庄王筑层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赵武灵王筑丛台等。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随后是汉代秦而兴,秦汉实现大一统,宫苑之盛也空前未有。汉末魏晋时代,魏王曹操在邺都建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高耸凌空,气势宏伟。魏晋还是士人园林得到发展的时期,并以诗情画意般的格调和情韵影响到皇家园林的景观设计。唐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阶段,不仅皇家园林,而且地方州郡园林也有显著发展,如正定的潭园、定州的众春园等,皆名冠北方。

中国造园的一系列手法在唐宋时已逐渐发展成熟,园林景观体

系也更加完美。魏晋以后,尤其唐宋,造园者刻意追求园林与大自然相融合而形成的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征之一,发展到明清更是如此。

自元至明清,三朝的全国性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北京。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已步入末期,但以北京的自然条件与几千年来古典园林建筑的丰富经验相结合,创造出了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京都皇家园林,在燕赵大地再度出现园林艺术的繁盛局面。

桥,“水梁也”。原始的桥梁以石块或树干搁置河道上以便通行。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豫让桥在燕赵大地最为著名,有清光绪碑石立于遗址(今河北邢台市北郊)。魏晋时代,邺都城内有天宝桥横跨漳渠,水自桥下东流入滏水。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斗争的需要,各式各样的桥梁纵横在河道湖池之上,造桥的科学性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建于隋代的赵州大石拱桥——安济桥就具有创新特点和重大的技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典型意义。唐宋辽金时期,以卢沟桥在中外负有盛名,有关“斩龙剑”的神化传说都具有科学的内涵。明清间的桥梁更为多见,举凡邯郸“学步桥”、保定“伍仁桥”、沧州的“杜林桥”、衡水的“衡水石桥”等,虽已历经数百年,但至今神韵犹在。

见载和流传至今的古园林、桥梁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明清以前著名的园林

一、武灵丛台

沙丘苑台已无迹可寻,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武灵丛台至今有遗迹

可考。《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前187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这是丛台之名最早的记载。唐颜师古注曰：“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又据《水经注》：“（牛首水）又东迳丛台南，六国时赵王之台也。”丛台上原建有天桥、雪洞、妆阁、花苑诸景，规模宏大，似人间奇观：“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壮丽奇特，名扬列国。世传丛台建于赵武灵王，故习称武灵丛台，时为观看军事操练和歌舞娱乐的地方，正所谓“台上弦歌醉美人，台下囊韃跃武士”。台址在河北省邯郸市东北，沁河南畔，现仅存一台，高26米。

赵国原是列国中的弱国，赵武灵王即位后，下令变服，教民骑射，以30年的武功而取胡地灭中山，开拓疆域，消除边患，完成了先世未竟事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强国的经远之策，丛台就是赵国革新图强的历史见证。古今凭吊者，无不追慕英雄本人及其业绩。

汉代，丛台是汉之赵国的景物，其历史意义远非当初，主要供游乐而已。东汉初年，以战争为直接原因，邯郸城开始衰落了，丛台也逐渐荒芜湮没，昔日之胜迹已多不存在。唐代诗人岑参诗曰：“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旦生蔓草。”李白《照眉池》诗也有“回首丛台尽荆棘”的描述。不过，一直到宋金时期，台上仍有残破的亭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武灵丛台遭到过无数次天灾人祸的破坏，到明清时有过大规模的修复，但已非原貌。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建据胜亭于台上，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于台上建行宫，道光十年（1830年）大地震严重破坏了丛台建筑，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进行重修。丛台中间夯土筑城，外包青砖，高26米，东西长59米，南北宽22米，台前两侧有砖道，直通台顶。其上有明建据胜亭，门额上书“武灵丛台”四个大字，远眺丛台全景仍有威武雄壮之感。

二、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初入仕，志本不广，“欲为一郡守”而已，但在东汉末的纷争兼并局势中，却成了割据的群雄之一。他戎马半生，以政治家的广阔胸襟、卓越的军事才干，击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中国的基础。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称魏王，都邺。此时，曹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邺作为王业本基，城建巍峨壮观，精舍飞翠，高楼连云。建安十五年(210年)作铜雀台，建安十八年(213年)在铜雀台南作金虎台，次年又筑北台，曰冰井台。左思《魏都赋》曰：“三台列峙而峥嵘也。”《水经注》载，邺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屋顶“云雀踢甃而矫首，壮翼擒于青霄”。金虎台高八丈，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炭，又有粟窖及盐，以防不测。三台中，以铜雀台为最，台高“拟华山之削成”，其雄伟高峻之势象征了魏王的气魄和权势。曹操雅好文学，自己也曾写过《登台赋》借以抒发情怀。东汉末出现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阮禹、徐幹、陈琳、应玚)为核心作家的建安文学，他们开创了一个诗歌的辉煌时代，其特点之一就是慷慨激昂地唱出了建立统一局面的理想，怀抱壮志，希望作出一番事业。曹操的《短歌行》是英雄为自己事业的慷慨悲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曹操广阔的政治胸襟。《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唱出了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曹操筑三台、写《登台赋》都是他宏伟气魄、壮志雄心的艺术体现。从艺术风格上看，三台的外形虽有高下之分，但错落有致，整体布局呈“山”字形，铜雀台居中，原高十丈，南北两侧的金虎台、冰井台各八丈，给人以平稳、对应的和谐之感，说明设计者

对多座单体建筑群在位置、高度的组合关系方面都有完美的艺术追求。

三台曹操始修,以后北朝列国,如后赵、燕、北魏、北齐等都重修过。后赵石虎将铜雀台又增高二丈,立一屋,连栋接檐,于屋上又起五层楼,高十五丈,于楼巅作铜雀,舒翼若飞,整个铜雀台去地二十七丈。石虎是一个暴虐荒淫的统治者,他大修宫苑、圈占猎场,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北周大象二年(380年)北周灭齐,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兵败。杨坚火毁邺城,三台也随之成为荒基零础、蔓草弥望的一片废墟。

三、潭园

宋人沈括说:“镇阳池苑之胜冠于诸镇。”(《梦溪笔谈》卷二四)镇阳即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池苑即府署后的潭园,又称北潭或海子园。

潭园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清光绪《正定县志》记载:“正定潭园之胜自唐已著,历五代至宋时屡见名人题咏,……其胜况可概见。”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王镕承百年之祖业,袭成德军(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晋王李克用发兵来攻,时幽州李匡威率兵相救,击退了晋兵。不料,幽州兵变,李匡威反失故地。王镕为报援救之恩,遂大兴土木,修筑亭馆于潭园,事之如父。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为统一北方,攻辽、灭北汉,宋太祖、宋太宗先后率重兵赴真定驻蹕潭园,潭园改为帝王行宫,其繁盛也自然胜过唐时。

宋吕颐浩《燕魏杂记》载:“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园内景观以水体为主,池中“碧水潏潏”,水中荷花开、水鸟鸣,呈现天然图画。潭水丰沛还可泛舟,真定民俗每年三月十八日为行乐日,欧阳修曾目睹“浪逸春潭逐彩舟”的热闹场面。宋天历四年(1044年),欧

阳修任河北转运按察使,因此他的题咏也较多。繁花满园是潭园又一景观,欧阳修《寄田元均》诗云:“莫忘镇阳遗爱在,北潭桃李正缟纈。”《留题镇阳潭园》云:“……北园潭上花,安问谁所植,春风无先后,烂漫争红白……。”司马光《答李密学诗》曰:“遥知潭上酌,多少插花人。”万紫千红的花卉引得蜂蝶成团,鸟语花香,给潭园增色不少。“古木参天”是潭园植物景观的又一特征,苍劲、挺秀的松、柏经寒不凋。潭园之盛引来宋代名士欧阳修、司马光、沈括等游赏、歌咏,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真定是唐宋时代的名藩大郡,特别在北宋时期,工商、文化都较前发达,盛产丝织名品鹿胎、透背,宋廷在此特设场院。真定又是南北百货交易之所,年商税 3.9 万贯,在全宋也屈指可数。真定隆兴寺有铜铸大悲菩萨高达 22 米,又是佛教文化胜地。潭园园林艺术之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真定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是真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1153 年(金贞元元年)金朝海陵王为修筑中都(今北京市)宫城,命“取真定潭园林木”,致使“大木千章根株断”,百年古木被滥伐,一座以水景、古木、花卉见长的园林横遭罹难,从此潭园风景日渐萧条,“数百年来成寂寞,一泓寒碧漾清波”。

四、莲花池

位于保定市区的莲花池以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有“小西湖”之誉。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 年)保州都元帅张柔大兴园池,在唐代临漪亭的基础上辟为张氏园林,初名雪香园,后因园内池水盈盈,荷莲满塘,改名莲花池。张柔为蒙古南下中原屡建奇功,“名震河朔”,被封为忠武王。以后明清两代,莲花池又作行宫,终成畿南一座帝王园林。

莲花池以水景为主,池中有“水心亭”,其他桥楼台榭皆环池而

建,总面积 2.4 万多平方米,其中水面占 7900 平方米。水心亭原名临漪亭,高 12 米,亭西南有苑虹桥,西北有五孔桥,两桥衔亭接岸。池水分南北二塘,中以藻咏厅(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赋,故名)为界,两塘之间有白玉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桥体小巧玲珑,拱顶雕饕餮纹兽头,两侧栏板浮雕荷中净瓶,是一处完美的艺术小品。池岸多翠柏青松垂柳,池中遍植红白莲荷,其间有游鱼戏水,“燕蹴漪纹”,景象如诗似画。

园内建筑如楼亭轩榭起伏多姿,风景清胜。造园者把诗文、书法艺术融汇于园林,以追求格调清雅的情韵。莲池的书法艺术主要集中在高芬轩后面的碑刻长廊,是清代所建景观,全部 82 方嵌砌在墙壁上,有晋代书圣王羲之、唐代草圣怀素与颜真卿、宋代米芾、明代王阳明与董其昌等人杰作,也有清康熙、乾隆两帝的御题。书法内容包括《莲池十二咏》、《蜀山调歌》、《罗汉赞》、《客座私祝碑》等。书法与园林相映生辉,是莲花池的又一艺术特色。

保州自古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到了元代,张柔不仅马上惯战,而且尽力于文治,自为保州都元帅,使之“楼观相望,陂池映带若图画,遂为燕南一大都会”(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保州文化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莲花池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雕刻艺术有密切关系,造园者运用这些艺术形式突出园林主题,渲染气氛,创造出特定的意境。园中的匾额、楹联引人触景生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成为北方不可多得的园林名胜。

第二节 清代北京皇家园林

北京园林历史悠久,而建造皇家园林则始于辽朝。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作陪都,长春宫、内果园、延芳淀就是皇室

游乐之所。金元两朝人工造园明显增多,如玉泉山、香山、琼华岛、大宁宫,都是供帝王登山玩水的园林名胜。明清两朝的皇家园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达到鼎盛时期。

一、颐和园

全国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坐落在距北京市区 10 公里的西北郊,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典园林,它以鲜明的风格特征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 园史述略

自然条件是建园的基础。北京西北郊有山有水,京西蜿蜒的群山有一支余脉,辽金时称金山,元时改称瓮山,山下多股泉水汇集成湖,名瓮山湖,因位于京西,明时又称“西湖”。环湖十里,盛夏之月,堤柳丛翠,中隐村落,稻田千顷,群蛙乱鸣,一派江南农家气象。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首先吸引了金元皇帝常来游赏,陆续建了多座行宫和寺庙,如护圣寺,寺前有三台,就是金元君主看花钓鱼、游乐更衣之处,寺极壮丽,还有金元御制的碑刻。明朝宣宗、武宗两帝也曾在此修亭、建寺,如望湖亭、园静寺等,于是有了当时的“西湖十景”。清朝定鼎之后,特别“康乾盛世”时期,京西皇家园林获得了大发展,经改建、扩建和新建,有了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这些相互联属的皇家园林。

1. 乾隆时期的清漪园

清漪园是颐和园的前身。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为祝贺母后钮钴禄氏 60 大寿,将瓮山改名万寿山,修建了大报恩延寿寺,西湖经疏竣改名昆明湖。新建中的一座园林名清漪园,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历时 15 年时间建成的清漪园是仿照江南风光景色而建,既有雍荣华贵的宏大气魄,又有清雅俊逸

的情趣。

清漪园建成后,经嘉庆、道光两帝,到咸丰皇帝时遭到严重破坏,中历百年。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入北京后大肆焚掠,“三山五园”变成了一片焦土。清漪园残存的只有铜亭、石舫、多宝琉璃佛塔等难以焚毁的几处建筑。劫后的悲凉情景有诗描述曰:“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绮桥下鱼空泣。”

2. 光绪时期重建改名颐和园

逃往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于1861年病死,年仅6岁的同治帝即位,其生母就是咸丰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以后冠以徽号,尊称“慈禧太后”。同治及其后继者光绪两帝在位47年间,皆由她垂帘听政,把清朝大权独揽在手,干尽了误国误民的坏事。她生活腐化,穷奢极欲,为了个人颐养游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皇帝名义下令修复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含有归政后“颐养太和”之意,实际是欺世盗名。巨额的建筑经费主要靠为强兵而设的海军军费,梁启超说,慈禧“只知有一园(颐和园),而不知有国”(《戊戌政变记》)。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清政府割地又赔款,民族危亡加剧,引起了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海军衙门随之撤销,颐和园的建筑才被迫停止。

颐和园不仅是慈禧太后居住行乐之所,年年二月来园,十月回宫,游山逛水,看戏听曲,而且军国政要之事几乎都由她在这里决策。1900年8月,英、德、俄、美、日、法、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往西安仓皇逃命,而颐和园却遭到了肆意抢掠和践踏。1901年慈禧回到了北京,又动用巨款重新修复残破不堪的颐和园。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同年同月病死,颐和园的修建也就停止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1912年2月12

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一场革命也结束了颐和园作为独家帝王园林的历史。

(二) 园林主要景区景点

1. 东宫门区

东宫门是颐和园正门,进门后有一片富丽堂皇的宫殿,这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从事政治活动和起居的区域。

(1) 仁寿殿 东宫门漆朱红色,上嵌以金黄色的门钉,檐下有光绪皇帝手书的“颐和园”大匾额。进入宫门通过仁寿门就是仁寿殿庭院,殿前有铜龙、铜凤、铜麒麟、太湖石和延年井,既有皇城大殿的肃穆气氛,又不显呆板。仁寿殿是光绪和慈禧坐朝听政的大殿,仿清漪园的勤政殿,七楹,名“仁寿”是取《论语》中“仁者寿”之意。殿内有光绪皇帝御用的宝座、龙案,以及屏风、鼎炉、鹤灯、掌扇等帝王仪仗之物。紫檀木制作的屏风上雕有龙纹,还有 226 个写法各异的“寿”字。

(2) 玉澜堂和乐寿堂 由仁寿殿南侧西行到达玉澜堂,正殿坐北朝南,是光绪皇帝的住所。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曾在此囚禁过光绪,殿内有宝座、御案、香几等陈设。

玉澜堂后有宜芸馆,馆西北是乐寿堂,为慈禧的寝室,晚年多在这里度过。乐寿堂内的陈设豪华,除宝座、御案、掌扇外,有名贵的瓷器、漆器,剔透玲珑的玉雕、牙雕,珠光宝气,多姿多彩。乐寿堂在园中的位置也最优,正门外面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东距仁寿殿不远,西可接长廊,问政、游乐皆便。堂前有石屏,色青而润,原石出在房山,“长三丈、广七尺”,乾隆皇帝令人运至清漪园,置于乐寿堂前,并御题“青芝岫”三字,象征皇基永固。

(3) 戏楼和长廊 仁寿殿北是德和园,专为慈禧看戏而设,由大戏楼、扮戏楼、颐乐殿、看戏廊联属组成,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戏楼。戏台高 21 米,宽 17 米,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有活动地板,即所谓“天井”、“地井”,角色可从天而降,也可破地而

出,表演生动。

慈禧太后喜好京剧,如痴如醉,清末著名表演艺术家谭鑫培、杨小楼等都屡屡在此登台献艺。逢年过节好戏连台,园内锣鼓喧天,异常热闹。颐乐殿是慈禧看戏处,陈设同乐寿堂一般豪华,正中宝座叫金漆珐琅百鸟朝凤宝座,由玉石镶嵌的四季花鸟大插瓶也显得格外精巧,象征四季的牡丹、荷花、菊花、梅花鲜艳夺目。

长廊位于乐寿堂西,通过“邀月门”即可到达。全长 728 米,共合 273 间,横枋上有风景、历史故事、神话、戏曲绘画 546 幅,复加其他陪衬的花卉、虫鸟写意画共计 8000 多幅,长廊就是画廊,也是中国园林中最长的游廊。长廊美如七彩长虹,状如蜿蜒溪水,顺廊可直通石舫,在颐和园景观中起到了沟通山水、连缀景点的纽带作用。

2. 万寿山阳坡制高点风景区

万寿山阳坡有一组上下一字排开的阁楼殿宇,它们从临湖的“云辉玉宇”牌楼依次向上是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到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一条全园的中轴线,其中以佛香阁为主景。这组体态高大凌空阁楼殿堂勾勒出整座园林的天际线。

(1) 排云殿 殿前排云门门阙五间,两侧有铜狮一对和排衙石 12 块。进门入排云殿,原址是清漪园的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帝为母祝寿所建,慈禧也将排云殿作为接受皇帝、群臣祝贺生日的地方。晋郭璞游仙诗中有“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的诗句,殿名“排云”出于此,取其吉祥之意。

(2) 佛香阁 清漪园旧有佛香阁,原意筑 9 层,到 8 层时停建,后毁于英法联军,光绪时期重建。位于大报恩延寿寺后,三层、四重檐、八面形的佛香阁建在一座高达 60 米的台基上,阁高又达 41 米,气势雄伟。在阁西有铜亭一座,这是清漪园旧有建筑,原名宝云阁,“范铜为宇”,独具特色。

(3) 智慧海 颐和园最高处建筑物是智慧海,其特点在于无一

根木料,全用彩色琉璃砖瓦构筑,故又称无梁殿,这是一个匠心独具的伟大创造。殿外壁在乾隆时期原雕有上千尊佛像,后毁于英法联军。殿前还耸立琉璃牌坊一座,额上刻有佛家偈语。

3. 后山后湖风景区

自智慧海而下进入清静幽辟的后山区,与山前景观不同。主要建筑在清漪园时是位于后山中央的“须弥灵境”,一组藏式喇嘛庙,以及四大部洲,即南瞻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贺洲、北拘卢洲。按佛教神话,“须弥山”是宇宙世界的中心,位于大海中央,神仙所居,海中布列的四大洲是一般人类所居之处。这组宗教建筑在咸丰十年(1860年)时被毁,光绪年间又重修。后山东部的多宝琉璃塔也是比较突出的建筑,由五色琉璃合成,八面七层,黄碧彩翠,不施寸木,黄金为顶,玉石为台,千佛瑞相,一一具足,乾隆皇帝曾作御制万寿山多宝佛塔颂。

后山有苏州街又称买卖街,设在后湖俗称苏州河两岸,仿江南水乡风光。岸边“略仿市廛景物”,店铺鳞次栉比,有茶楼绸布、古玩、糕点、金银首饰诸店数十家。

位于后湖的东端有被称为“园中之园”的谐趣园,原名“惠山园”,乾隆十六年(1751年)仿建无锡寄畅园,毁于英法联军,光绪时重建。园内一潭碧水,环湖一组低平线条柔缓的建筑,有用游廊连缀起来的十三座楼台亭榭,竹影拂栏,廊壁漏窗,一派浓郁的江南景色。进入园内一院清静,仿佛踏进另一个园林世界。园名取“以物外之静趣,谐寸田之中和”的含意。

4. 昆明湖风景区

昆明湖水面达二百公顷之广,湖中有堤、岛、桥、亭,湖水碧波荡漾,景色如画。

(1) 西堤 在昆明湖西面有一道南北向长堤,仿杭州苏堤而建,堤上架有造型各异的6座桥,依次为柳桥、幽风桥、玉带桥、镜桥、练桥、界湖桥。其中以玉带桥最著名,通体洁白,半弧形桥身与水中倒影

相连恰似玉带，远看又如一颗水上明珠。长堤上绿柳成行，像珠帘丝垂的走廊。

靠近西堤北端的湖面上有一座汉白玉雕造的石舫，清漪园旧物，也是观赏湖光山色的地方，乾隆御制石舫记曰：“余之石舫，盖筑之昆明湖中，不依汀傍岸，虽无九成之规，而有一帆之慨。弥近烟云之赏，回远风浪之警……。”（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清漪园》）重修颐和园时于船台上加盖西洋式阁楼两层，慈禧称之为“清晏舫”，表江山太平之意。

（2）东堤 与昆明湖西堤遥遥相对的是石砌东堤。乾隆时期，畅春园西接昆明湖，可泛舟相通。后因昆明湖向东扩展，畅春园西堤即“兰芝堤”就变成了昆明湖东堤，乾隆有诗曰：“西堤此日是东堤”即指此，诗句刻在东堤昆仑石上。昆明湖东水面有龙王岛，十七孔白石虹桥把岛与东堤连接起来，长150米，宽8米，两侧石栏上雕有石狮数百，姿态各异，仿卢沟桥而建。

十七孔桥东端有廓如亭，亭北有铜牛，清漪园旧有之物，传说可镇水患。乾隆帝的《金牛铭》铸在牛背上，其文略曰：“夏禹治水，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蛟龙远避，……漪流万顷。金写神牛，用镇悠水。”（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清漪园》）铜牛静卧在石座上，远眺湖面，昂首竖耳，体态矫健。

颐和园是北京三山五园中唯一幸存的一处完整园林，从总体布局到各景区景点，都代表了清代皇家园林的艺术成就。

（三）颐和园的艺术特色

颐和园的建筑继承了我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特点和造园手法，突出体现了京都皇家园林的独特风格。这里的每一处景观都会引起人们的历史联想，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

1. 园林整体布局是山水相间而又以水体为基调，以水取胜。充分利用自然川、泉，丰富园林的水景观，并使水景与众多的建筑相融

合、相映衬,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一个传统。颐和园面积 4350 亩,其中水面积占 3/4,造园者以水面为主设计整体布局,颐和园前身取名“清漪园”就是取其清波满园的意思。^①

考察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和风景点,如佛香阁、乐寿堂都面临湖水,或是俯览湖水。同时,许多建筑如知春亭、玉带桥、西堤、东湖岛等,又无不借助湖光波影创造出优美的景观。

在广阔的昆明湖北岸,耸立着翠屏般的万寿山,高达 60 米。颐和园虽然以水体为主,但湖山结合,浑然一体,清澈的湖水像一面镜子,山临水,水映山,山水相融合,广阔无际。

2. 以传统的造园手法,创造出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将诗、画与园林建筑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如在画中”的境界,这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园林文化的特色。

对比鲜明。在颐和园中,既有金碧辉煌的前山,又有风景幽静的后山;既有宫殿密集的东宫门区,又有景物旷野的西堤区;既有湖面平远的昆明湖景区,又有突兀高远的万寿山景区。颐和园内处处有开阖转换,给人以“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借景映衬。将园外景物借入园中,使有限的园林景观融入到广阔的空间中去,这种意境的感受全靠造园的艺术技巧。从高高的佛香阁远望湖区,园外层层远山和玉泉山宝塔都可纳入视野,使人产生园林景观已融入宇宙的意趣。

集景模写。中国造园艺术讲究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既有了自然的湖山之胜,还需要人工造景来相互映衬。乾隆皇帝曾数次南巡,爱慕江南的风光景色,因此兴建清漪园时,将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南的名胜建筑仿造在园内,如后湖的苏州街,虽人工所造,但宛如江

^① 罗哲文:《颐和园——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珍贵遗产》,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南水乡。其他如西堤仿苏堤、十七孔桥仿卢沟桥等等无不是集景模写的佳作。

穿插串联。让分散的园林景观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离不开穿插串联的造园手法。颐和园沿前山湖岸的长廊,蜿蜒迤邐,从邀月门到石舫岸边的石丈亭,全长 728 米,将前山的多处景观连接在一起,并衔接了山水之隔,使分散的数百处建筑没有杂乱无章之感。而且长廊本身也像一条环绕昆明湖北岸的七彩锦带,又自成一个景观。长廊之外,是广阔的湖面,山湖相映,上下天光,一派诗情画意。

颐和园的造园手法决不止于此,它如向背、开阖、争避、隐显等手法皆得体现,大至风景区,小至山石花木等景点,其安排设计都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3. 中轴对称,殿宇辉煌,充满帝王之气。北京自金元以至明清作为帝王之都已有近 800 年的历史,西郊诸园几乎与帝都有同样长的历史,它们的规划设计、建筑、色彩、气度都是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

历来京都、皇城的整个规划都以对称、整齐为基本原则,宫宇、坛庙及主要官署都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及其两侧,线两边划分若干棋盘区。颐和园的园林建筑在前山区充分体现中轴线的规划态势。前山是全园的建筑中心,这座建筑群,高阁凌空,殿宇辉煌,自山顶智慧海而下是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玉宇坊以达湖岸,构成一条鲜明的中轴线。在两翼,安排了一些起到烘托作用的建筑,佛香阁东侧下方有《万寿山昆明湖碑》和一组宗教殿宇,佛香阁西侧下方有一组建筑,即五方阁。从更大范围上看,前山的東西两面随山势上下还有许多景点建筑,东边有养云轩等,西边有画中游等。颐和园中轴线不只一条,在其他小建筑群内也各有对称的布局。建造具有轴线的殿宇和厅院是帝王权力在皇家苑囿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居于中轴线的排云殿建在宗教性建筑——佛香阁之下,也体现了封建统治

阶级“君权神授”的思想。

清代皇家园林全都有帝王处理政务的宫殿,清漪园中有勤政殿,颐和园有仁寿殿,相当于皇城中的金銮宝殿,是皇帝行使权力的地方,尤其慈禧太后的颐和园更是如此,因而进东宫门是一片富丽庄严、金碧交辉的宫殿式建筑群,殿阁斗拱累累,雕梁画栋。殿内设计也是照宫中帝王规格气派。庭院景物虽有山石花木点缀,但仍呈现出凝重、肃穆、森严的气氛。

颐和园这座精美的皇家园林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优美传统,作为京都皇家园林,它又代表了全国园林文化的最高成就。

二、圆明园

位于北京西郊海淀东北的圆明园是清朝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营建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被誉为“万园之园”,是中国造园史上不朽的杰作。

(一) 建园始末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最初是赐给胤禛(即清世宗雍正皇帝)的花园。建园时,因高就势,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造亭柳,得天然之趣。由于水丰地肥,园内“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鸟池鱼,乐飞潜而自集”,康熙赐以园额曰:“圆明”。雍正的《圆明园记》说明了圆明二字的寓意:“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即恪守圆通中庸、英明远见之意。

经过雍正、乾隆两朝大事营建,全国景观都已完成。到嘉庆时代,清朝国势已明显呈现衰落,圆明园的豪华掩盖不住国家虚弱的本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大肆抢劫园中珍宝,10月18日士兵四处纵火,全园焚尽,火势达三昼夜犹不绝。同治帝即位,先期作过小规模修复,但内务府财源枯竭,重建已力所不及,同治十三年

(1874年)下诏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停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同治、光绪两帝修葺过的少数建筑亦荡然无存。宣统末年,在圆明园废址上,已是麦垆相望,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保留一些山形地貌和少量建筑石雕遗迹供人凭吊。

(二) 圆明园的布局和景物

圆明园由三座相邻的园林连属组成,最大的是圆明园,园东是长春园,东南是万春园,大致成品字形,虽各有宫墙围绕,但水系相通,又是难以分割的整体。园内山水呼应,林径曲折萦回,建筑错落起伏,规模宏大,景致俊秀。

圆明园大致可分五个风景区:

宫廷区,圆明园坐北朝南,宫廷区在最南面,进大宫门是金水桥,过桥是二宫门,进门后是正大光明殿,是清帝朝会听政的地方,7楹,东西配殿各5楹。殿东为勤政视贤殿,5楹,内设宝座,屏风上御书《无逸》一篇,后楹东壁陈御制创业守成难易说,西壁陈御制为君难跋。清帝在这里披省奏章,召对臣工。勤政视贤殿东又有飞云轩、怀清芬等,庭轩明敞,观阁相交。在大宫门前东西两侧分布各部衙门,文武朝房。这组建筑群的北面有前湖和九州清晏殿,7楹。殿北又有后湖,被9个小岛团团环抱,它体现了“一统九州,天下升平”的含意,“九州清晏”殿因此得名。这一组建筑是供皇帝及其后妃们居住、游玩的场所,岛上景色秀丽,如镂月开云岛,殿以楠木为材,覆二色瓦,焕若金碧,前植牡丹数万本,后列青青古松,最宜恬嬉。9个美如花的岛形似一个大花环。

与后湖毗邻是福海区,这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水域,“周广数顷”,水中有“蓬岛瑶台”,原名蓬莱洲,大小三岛,仿唐代画家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状,茗茗亭亭,望之若金堂玉楼。环岛有湖山在望、一碧万顷、别有洞天、平湖秋月、雷峰夕照等十几景,清帝常在海中泛舟取乐,节日夜放烟火,湖水彩色缤纷。在福海东北隅又有一潭池水,临岸

建筑群名“方壶胜境”，是祭祀海神之处。造园者以此境即仙，从中体会无比广大的境界，独有情趣。

后湖的北面和西北面有纵横的水道，将二十几个风景点勾通起来又为一区，与东面的福海区相接。这里的景色别具一格，如武陵春色是据晋人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建，一条小溪，复谷环抱，山桃万株，参错林麓间，或朝或夕，似雪似霞，莫可名状。另一处建筑名万方安和，于湖上架构，屋形卍字，取“安和愿万方”之意。文源阁是建在这个区的藏书楼，阁上下6楹，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皆以贮《四库全书》。

长春园、万春园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风景区。进长春园宫门有澹怀堂，东有茹园，西有倩园。堂北有长桥可通水中岛屿，岛上有金阁，象征海市蜃楼的幻景。西洋式建筑大都集中在这个风景区，形成了长春园的特色。这一组建筑群以三面不同的围墙划分三部分。第一面围墙中有谐奇趣和附属的养雀笼，第二面中有名为万花阵的花园，第三面中有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这里的景色具有异国风格。谐奇趣是第一座西式建筑，因受乾隆皇帝赏识，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创建了第一个水法并相继落成一处宫殿和喷泉，宫前有蓄水池，由4只石羊和10只野鸭组成的喷头放射出一束束光彩夺目的水柱，池中水花万点，凉气宜人，是清帝避暑时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万春园在长春园南面，是三园中最小的一座，主要供清朝历代皇太后、妃子们居住使用，其特点是小型庭院较多，如凝晖殿、中和堂、集禧堂、天地一家春、蔚藻堂等。

圆明园是一座巨大的皇家园林，集中了我国南北造园艺术和中西合璧建筑的精华，园内众多的建筑群布置在山石湖溪之间，由游廊、桥梁、水道串连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无愧于“万园之园”的称誉。

（三）园林艺术特色

1. 规模宏敞，神功壮丽，是大智大慧的结晶。圆明园是北京最大

的一座皇家园林,总面积 350 公顷,周长 10 公里,规模大于颐和园。自康熙始建起,用 150 年之久完成了全园 140 余所堂皇的宫殿阁楼和 100 多处景观建筑。由于规模极为宏大,景色变化万千,被誉为“万园之园”。圆明三园及其附近的园苑连在一起,构成了东西绵延数十里一片瑰丽无比的景色风光。雍正在《圆明园记》中说,此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踰此”。

圆明园主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完成,所谓“康乾盛世”正是有清全盛时期,物阜年丰,库藏殷繁,经营此园所费巨款全依此时国势财力,故年年动工兴筑,岁岁有新景落成。园内景物建筑极为壮丽,鬼斧神工,艺术超群,每一处景观都是殚精构造,凝结着中华民族无比的智慧和惊人的创造力。

2. 荟萃精华,艺术非凡,曲尽游观之妙。圆明园凭借自然水源,挖湖开渠,堆山植木,缩影摹写,营造亭楼台榭,形成了环环相套,层层进深,互为因借的集锦式园林。

著名的四十景是每组景观加上 4 个字的名字形成的,如“镂月开云”、“方壶胜境”等等,景名形象艺术、神形兼具。在四十景中仍以仿江南为多,如模杭州西湖而建的“平湖秋月”,依山面湖,竹树蒙密,秋深月皎,潋滟波光接天,雍正见景曰:“此时谁不道钱塘?”其他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曲院风荷”、“四宜书屋”、“狮子林”等无不使人步入诗画意境。

圆明园的建筑装潢十分精美,如竹园、接秀山房的门窗屏罩全系紫檀制成,嵌以珍宝,雕成“榴开百子”、“万代长春”、“寿献兰孙”等花式,极尽奢华瑰丽之能事,凡殿室陈设之物皆施以金、银、宝石、珍珠、翡翠、玛瑙等宝物,凡紫檀、漆器上皆镂刻山水、楼阁、人物、花木、虫鸟、豪华别致。圆明园内收藏着不计其数的珍宝、文物、工艺制品、古玩字画和大量古籍图书。圆明园是一座艺术巨构,奇丽甲天下。

3. 沟通文化,中西合璧,是造园史上独创。圆明园内西式建筑约20座,有殿堂、水法,异国情调,初为乾隆皇帝主张,并请郎士宁、蒋友仁设计、督造。郎士宁,意大利人,历仕康、雍、乾三朝,专以绘事供奉内廷,其画多参西法而施中国技艺。蒋友仁,法国教士,也专物理学,由乾隆召至京都,二人合作按清帝意图设计西式宫殿和水法,最大之喷泉可与法国凡尔赛及圣克劳教堂喷泉并驾。在海晏堂前的喷泉边缘上有一个精巧的漏壶,这件中国式计时器是蒋友仁仿造而成,其中还有十二青铜雕像,呈人身兽头形,代表中国古代的十二个时辰,时称十二星兽。每个时辰都有一兽口涌射喷水,以后各兽继之,轮流如此,周而复始。中国建筑专家“样式雷”也参与了其中的建筑。“样式雷”是当时对雷发达的尊称,因供役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于内廷营造有功,故名。建筑世家雷氏本江西人,清初营建皇宫三殿是“样式雷”发祥之始。圆明园许多建筑的设计及烫样(模型)皆出于雷氏之手。这些成就是历代传统经验的总结。在雷氏旧物中,有西式建筑谐奇趣、海源堂图样,表明了中西建筑艺术家的合作交流。圆明园既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又吸收了西式建筑的长处,中西兼容,是中西建筑艺术互相沟通的一个范例,是中国造园史上的一个独创。

圆明园是中国皇家园林建筑的典范,在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虽然圆明园已是废沼荒台,但它仍然是中国造园史上的不朽之作。

三、香山、北海

(一) 香山

位于西山东麓,距北京市区20公里,总面积2300多亩,园内最高峰520米。香山之名源于山体顶部状如“香鼎”,每当晨夕,山顶喷

云吐雾,似香烟缭绕,故称香炉山,简称香山。

远在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建香山寺和行宫,元明两代继作帝王游山避暑的驻蹕之地。明嘉靖年间修“见心斋”,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年)建香山宫。自乾隆十年(1245年)起大规模营建风景区,共“二十八景”,总称“静宜园”,这是香山园林最兴盛的时代。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焚毁圆明园,劫掠颐和园,也破坏了静宜园。光绪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再次受到践踏,园内精华被付之一炬。经两次焚掠已被破坏的景观都是精心构画的,与其他京西皇家园林一样瑰丽优美。如勤政殿5楹,南北配殿各5楹,是帝王延见公卿百僚的地方。翠微亭位宫门之南,大木森列,山麓稍北为小亭,入夏千景绿荫,禽声上下,如诗如画。翠微亭东又有青未了,登亭群峰苍翠满目,阡陌村墟,极望无际,都城烟树也隐隐可辨。香山寺位于园内东南部,原建于金朝世宗时期,依岩架壑,前殿5层,金碧辉煌。霞标蹬位于园西部,山路累石为蹬,凡九曲十八盘,仿唐代画家李思训、王维的《蜀山栈道》而建,踏蹬看霞光,景色妖娆。香山的景致既有壮丽的宫殿,更有山林风光的特色。

山是香山静宜园的主体,丰富多变的山林中点缀着亭台楼阁,使香山显得格外幽雅,如见仙境。进入香山游观览旷既可以避暑,又可以陶养性情,领略到融入无穷宇宙空间的意趣,这正是中国魏晋以来士人园林所刻意追求的,它影响到皇家园林的发展,香山静宜园是又一个范例。

(二) 北 海

位于北京市中心区,建园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29年),挖湖堆山,筑琼华岛,是仿海中三神山而建。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重修琼华岛,并建广寒殿,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广寒殿“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板密,其里遍缀金红云,而幡龙矫蹇于丹楹之上”,殿宇壮丽。明清两代不断修缮扩建,

特别乾隆在位时连续施工 30 年。原广寒殿倒塌,在旧址上建北海白塔,光绪年间进行过重修,园内青山绿水,画梁雕栋,风景俊秀,是皇城中一座精美别致的皇家园林。

北海总面积 68 公顷,水面积过半。全园中心是琼华岛,岛高 45 米,周 880 米。白塔为藏式建筑。塔前有善因殿,供奉一尊铜铸千手千眼佛。岛上重要宫殿还有悦心殿,清帝视事于此。殿后有庆霄楼,为乾隆侍太后观冰娱之处。

北海是京都内建园时间最长,而规模又小的皇家园林,面积仅是颐和园的四分之一。园虽小,但景观体系具备,尽收天地丰华、乾坤气象,它体现了创造“壶中天地”意境的造园传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第三节 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位于长城古北口外的冀北山地,属燕山山脉,自古为“引弓之国、刍牧之地”。秦汉时期这一带属渔阳、古北平郡,至明初属于京师北平府。明末,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统一蒙古诸部,承德为蒙古族的游牧之地。清初,属直隶省,雍正元年(1223 年)设热河直隶厅,十一年(1734 年)设置承德直隶州,“承德”名自此始。“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称热河行宫,在今承德市区北部,是清王朝在燕赵大地上兴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宫苑,是清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有第二政治中心之称。

一、山庄史略

(一) 康熙时期

清军入关之前,曾与蒙古结成联军,共同对明军作战。顺治元年

(1644年),清朝在北京定都之后,仍与蒙古王公保持着联姻的关系。到十七世纪中叶,野心勃勃的沙俄侵略者不断侵扰中国北部边界,并勾结蒙古分裂分子发动叛乱。康熙为加强边防管理,密切同蒙古各部的关系,抵御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开始建立北巡制度。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置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每年举行规模盛大的狩猎活动,称之为“秋猕大典”,皇帝亲率宗室亲王、六部大臣以及满、汉、蒙古王公大臣、内蒙古49旗、喀尔喀蒙古4部及西北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台吉等贵族浩浩荡荡开赴围场,盘马弯弓射猎群兽,并将所获分赐给他们,既习武又增强了同边疆民族的团结。从此,北京至围场之间建立了多处行宫,作为康熙休息避暑、处理军政要务的场所。

在各处行宫中,以热河行宫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最优。热河位于滦河右岸喀喇屯,这里群山环抱,土质肥沃,气温湿润,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宜于屯兵就食。同时,热河与北京靠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又紧邻蒙古各部,是岁幸木兰围场和巡视漠南蒙古的必经之地。因此,康熙决定在热河辟治园林,修建离宫。因岭上森林蔽日,一碧万顷,气候凉爽宜人,取名“避暑山庄”。

(二) 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继位后,在山庄内增建了许多新建筑景观,在庄外的东面、北面,也大修庙宇,构成了极为壮观的避暑山庄、外八庙相互联属的清代皇家园林。

山庄在建筑中,乾隆在此的政治活动也十分频繁,朝中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山庄内制定,避暑山庄成为清前期全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自1741年至1782年,乾隆38次至避暑山庄,初夏来,仲秋走,与随行文武大臣共同处理军国庶事。乾隆庆贺生日的万寿大典也在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遇事也在殿内接见王公大臣、各国使节。乾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事尤为重视。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山庄

接见了杜尔伯特蒙古部首领三策凌(即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三位首领),成为反对准噶尔部分裂叛乱势力、维护全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居住在伊犁河畔的达什达瓦部人不受准噶尔叛乱分子的诱惑和胁迫,千里迢迢内迁热河。乾隆下令在山庄东部山麓仿伊犁河畔的“固尔扎都纲”,营建“安远庙”,表示对达什达瓦部宗教信仰的尊重。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土尔扈特部反对沙俄的压迫,部众46万人历经艰险返回中国,乾隆十分感动,并在山庄与部首领渥巴锡欢宴三日,封为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70寿辰,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山庄祝寿,表示心向中央之志。寿辰之日,班禅施了无量寿佛大灌顶,每天率僧为皇帝诵经祝福。班禅在山庄1个月零3天,受到乾隆热情接待,充分反映西藏边境和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在各族人民心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在山庄接见过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并游览了山庄,马嘎尔尼感到“无上之光荣,心甚感激”。除英使外,山庄还接待过越南、朝鲜、南掌(老挝)、缅甸等国使臣,为发展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最强盛的时代,也是避暑山庄最兴旺的时期。嘉庆、道光两帝以来国势转衰,嘉庆帝也只是出于祖训不得已而为之来过山庄,以后因天理会议军一度攻入紫禁城,吓得他再也不敢出京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以“去木兰围场秋猕”为名,逃到山庄,第二年病死“烟波致爽殿”。此后,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均未到过山庄。同治即位之初,内阁曾就山庄发过一道“停工”旨意,这道旨意宣告了避暑山庄作为全国第二政治中心的历史的终结。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不断维修,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已成为中外著名的旅游胜地,被列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受到重点保护。

二、避暑山庄的景观景点

避暑山庄背山面湖,树木葱郁,绿草如茵,著名的 72 景布列园中,殿台亭榭相互掩映,湖洲沼岛错落有致,美不胜收的景观景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

(一) 宫殿区

山庄宫殿区集中在东南部,分为 4 组:正宫、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

1. 正宫

丽正门是正宫的正门,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 年)。进入二宫门即避暑山庄门,门额铜匾上有康熙五十年(1711 年)题“避暑山庄”4 个大字,凝重浑厚,遒劲有力。门内正中大殿即“澹泊敬诚殿”,这是皇帝听政和读书的场所。“澹泊”两字源于《易·系词》“不烦不扰,澹泊不失”。这里也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殿面 7 间,歇山卷棚顶,天花板和隔肩板上有卍字、寿字、蝙蝠、卷草刻花。殿正中有宝座、围屏,《耕织图》雕刻在围屏上。

从澹泊敬诚殿向北,通过走廊到“四知书房”,供皇帝大典之后休息更衣使用,平日处理政务也在这里。继续向北,是“烟波致爽殿”,是清帝的寝宫,面阔 5 间,前后廊,殿内正中有宝座,后妃在这里朝见皇上。咸丰帝就病死在西暖阁中。慈禧太后也是在“烟波致爽殿”策划了“辛酉政变”,处置了顾命八大臣,实现垂帘听政。

2. 松鹤斋

正宫东面有松鹤斋,是供太后居住的地方。这组建筑群,还包括继德堂、乐寿堂、畅远楼。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蟠户外,更欣白鹤舞庭前”。松和鹤都是吉祥长寿的象征。

3. 东宫

在松鹤斋东面有一组庞大建筑群,南起德汇门,北抵塞湖之滨,主体建筑依次有门殿、正殿、清音阁、福寿阁、勤政殿、卷阿胜境殿。勤政殿供皇帝召见大臣、办理政务使用,清方阁是大戏台,“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旗”,福寿楼是后妃听戏的地方。

4. 万壑松风

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是宫殿区兴建最早的一组建筑群,包括万壑松风、鉴始斋、静佳室等殿,这里地势高,俯临湖水。主殿万壑松风坐南朝北,周围有大松林,山风吹来,松涛声不绝于耳。康熙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大臣。鉴始斋是康熙教诲乾隆读书的地方,乾隆即位后为表示不忘教养之恩,改称“纪恩堂”。

(二) 湖区

7个面积不同的湖泊位于山庄东南部,分称:如意湖、上湖、下湖、镜湖、银湖、长湖、澄湖,总称塞湖,面积60万平方米。水源则来自武烈河和西北群山。

1. 东湖区

包括下湖、镜湖水域和岛屿。经过东宫区,出卷阿胜境殿就是东湖区。它包括水心榭、文园狮子林、清舒山馆、戒律堂、汇万总春之庙(花神庙)、金山和热河泉等地方。

水心榭位于下湖与东湖之间,是从卷阿胜境殿进入湖区的必经之地,上有3座重檐式亭榭。榭下承以石梁,梁下有水闸八孔,闸门可调节水量使下湖总能保持高于银湖的水面,流水昼夜不息。

与水心榭隔湖相望的是文园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所建,精巧幽美,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文园内有狮子林、虹桥、浮山等16景。

金山是康熙仿照镇江金山的名胜建造的,最高处是上帝阁,高3层,登临远眺,山湖美景尽收眼底。金山之北有热河泉,这是清帝泛舟游湖和赛龙船的起点。

2. 中湖区

“芝径云堤”仿苏州堤,位于湖区中心,连接着环碧、月色江声、如意洲等岛屿。如意洲美如玉,是湖区中的大洲,洲上有 12 景,如金莲映日、沧浪屿、观莲所等。洲的西北有以“金莲映日”命名的殿室,院内有金莲花,阳光映照如黄金洒地。殿南有观莲所,是一处专供帝王观赏荷花的小亭。位于洲西北还有沧浪屿,意境取材于《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房北有全石为底的小池,湖水清澈,游鱼倏忽往来,此处有“园中之园”之称。

如意洲北有一个小岛,即青莲岛,上有著名的烟雨楼,上下两层,单檐,周围有廊。登楼可欣赏到雨中濛濛的烟雾。这座楼仿浙江省嘉兴县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建造,以感受雨雾如烟的意境。

如意湖与上湖之间的环碧洲上有采菱渡,渡口有草亭一座,夏季到来,“菱花菱实满塘”,清帝与后妃来此采莲泛舟。

3. 西湖区

如意湖及西岸一带属西区,这里有如意湖亭、芳园居,沿湖岸有芳清临流、长虹饮练、临芳墅、知鱼矶等胜迹。

如意湖北有一处四合院式建筑总名芳园居,俗称买卖街,皇帝在山庄居住,由这里提供一切所需物资。在如意湖滨有题名芳清临流的小亭,岸上树木葱茂,亭中可见“远禽出没于烟际”,如画一般。芳清临流之北有殿 5 间就是临芳墅、知鱼矶,皇帝后妃常在此临湖垂钓。在湖区西北,有观瀑亭,亭北有山泉,亭西有瀑布,亭左右有白莲如云的池塘,处处诗情画意。

(三) 平原区

位于湖区以北,直至西北山麓。

1. 东部平原

位于热河泉北,有春好轩、嘉树轩、永祐寺等 9 组建筑,是赏花纳凉的地方,乾隆《秋海棠》诗:“春好轩前风露好,居然八月有三春。”永祐寺是平原区最大一组建筑物,为殿式大型佛寺,山门前有牌坊 3

座,山门以北有钟鼓楼,中轴线上有天王殿、宝轮殿、后殿、舍利塔、御容楼。寺有4块碑文,分汉、满、蒙、藏4种文字,有《永祐寺碑文》、《永祐寺舍利塔记》、《避暑山庄百韵诗》等。塔仿南京报恩寺塔修建,八角形10层,高60米。

2. 中部平原

由万树园、试马埭组成,地广数千亩。

试马埭是“秋猕大典”之前放牧、“调试”马匹之处。万树园面积辽阔,原是蒙古牧马场地,后圈入山庄里。这里芳草如茵,一派草原景色。万树园还是山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特别乾隆、嘉庆两帝常在这里接见蒙古、西藏等民族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外国使节,并且颁赏、赐宴、观火戏、马技等。上千人参加的“大蒙古宴”更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

3. 西部平原

位于万树园迤西的西岭山麓,有文津阁、宁静斋、玉琴轩等建筑。文津阁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模仿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而建。与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合称4阁,为皇家藏书楼。乾隆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其中一部就藏于文津阁。这座楼外观两层,内实三层,中间一层为书库。阁东有乾隆亲写的《文津阁记》碑。阁前有袖珍湖、假山,筑有趣亭和月台。

三、山庄园林的艺术特色

承德避暑山庄是个风景奇丽、熔山水与古建筑于一炉、兼具南秀北雄之美的风景区,又具有清前期第二政治中心的丰富的历史内涵,是集中体现我国园林艺术伟大成就的又一座皇家园林,它完美的园林风貌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1. 充分运用园外借景,突出自然山水之美。承德避暑山庄不以

豪华巍峨的建筑取胜,而是运用借景手法,突出崇山峻岭水态林姿的优美。

山庄总面积 560 公顷,是清代修建的离宫别苑中最大的一个,庄内地形复杂,有山地、湖沼、谷原,而山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整个山庄与武烈河东岸起伏的山峦相呼应。这种整体布局为庄内景点与庄外峰峦形成配景奠定了基础。

《园冶》说:“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有平有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功。”康熙有诗曰:“非是天然石峰起,何以人力作雕题。”上述都点出了造园要充分利用自然景色的思想。避暑山庄于 4 处山巅各建一亭:“四面云山”、“锤峰落照”、“南山积雪”、“北枕山峰”。通过 4 亭把山庄周围的山壑林泉之美都控于园内。如“四面云山”在山庄西北高峰,四周群山环列,于亭中远眺,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南山积雪”远借园外僧帽山,苍翠的山峰闪烁一道白雪。在“锤峰落照”上,可见夕阳映照的磬锤峰。4 亭之外,还有许多亭榭都可因借而成景。在山区中,建有 30 余处园林景点,10 余处寺庙是山庄的精华所在。进入山庄,园林的高远壮观,凌空奇峰,尽染的层峦都极为美妙,给人以“野”的情趣,产生园林融于云山之中的感觉。

造园者一方面发挥了山体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开发水景。山庄利用山涧泉水开挖几座人工湖,通过水把山景引入园内,磬锤峰和罗汉山的峰姿都能倒映在湖中,造成层次深远,山水交融,构图完美的空间。

2. 移天缩地,山庄独具南秀北雄的风格。

“康乾盛世”时代,清帝国统一强大,在造园时要“移天缩地在君怀”是自然产生的欲望。山庄内模仿江南、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名胜景物很多。乾隆主张“略师其意,就天然之势,不舍己之长”,不要简单地抄袭,而是根据山庄的自然条件,吸取外地造园的艺术精华

形成自己的风格。山庄烟雨楼，仿浙江嘉兴南湖之烟雨楼，高二层，四周池水遍植荷苇，每逢降雨，水天一色，比之南湖烟雨楼所见更胜一筹。

万树园是仿蒙古草原风光的园中之园。这里原是蒙古牧马草地，园内草丰树茂，飞禽走兽，野兔出没，麋鹿悠游，几座蒙古包点缀其间，更现出一派西北草原景色，置身园中，野趣横生。山庄凝聚了我国南北园林艺术的精华，形成南秀北雄兼而有之的独特风格。庄内有江南水乡的秀丽，塞外草原的纯朴，西北高原的雄浑；庄外有汇集汉、藏、蒙各族建筑艺术成就的 12 座金碧辉煌的庙宇，祖国锦绣河山的壮丽景象，移天缩地展现在承德避暑山庄。

3. 山庄园林与藏式庙宇融为一体，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象征。寺庙进入园林早自东汉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就逐渐得到发展，塔庙几乎成了园林中不可缺少的景观。康乾两帝在避暑山庄建造喇嘛庙还有它的政治内涵。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清定鼎北京后，蒙古、西藏的分裂分子发动叛乱，康熙、乾隆两帝以武力平定之后，为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强大，积极推行“恩”、“抚”政策。喇嘛教盛行于蒙古、西藏，以宗教为纽带增强与这些地区的联系是当时重要的措施之一，在避暑山庄周围兴建喇嘛庙，其政治目的就在于此。现存的有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这些寺庙皆面向避暑山庄，如众星捧月，象征着“康乾盛世”时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和民族和睦。

承德避暑山庄是占地最广的一座皇家园林，它熔大自然景色和人工造景于一炉，博采汉藏建筑之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园林风格，它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珍宝。

第四节 著名的桥

一、世界首创“敞肩拱”的安济桥

燕赵大地上流传一首“华北四宝”的民谣：“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安济桥习称赵州桥，从历史年代上看，安济桥建于隋代，早于其他三宝，故应属四宝之首。纵观世界桥梁史，安济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径最大的敞肩圆弧拱桥。

(一) 桥梁建筑工程

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南门外约6里的洺河上。赵县，古称赵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州控据太行，襟带横漳”，南达洛阳，北抵涿州（今涿州市）。洺河源头起自西北太行，东流过赵州，入于葫芦河，每当夏季，“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时常阻断南北交通。过去，靠舟船摆渡往来士宦商旅。隋文帝开皇中期，约十一年（591年）至十九年（599年）^①在匠师李春主持下，建成了横跨洺河的安济桥，俗称赵州大石桥。李春其人在史籍上有明确记载，唐中书令张嘉贞写的《石桥铭序》：“赵州洺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者。”

安济桥全长64.4米，宽9米，是一座单孔弧形敞肩坦拱桥。主拱由28道石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跨径37.37米，弧矢7.23米。主拱两端各有2个小拱，近桥侧的小拱跨径3.8米，近桥中央的小拱跨径2.85米。造桥石料由元氏、赞皇、获鹿等县几十公里外运来，石质为素白色石灰岩。新桥建成，不仅外观优美，宛如卧波长虹，而且结构坚

^① 关于建桥年代，学术界说法不一，有说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本书采用开皇说，参见黄梦平等著《中国赵州桥》一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固,承受能力强,是造成后一直屹立至今的最古的桥。历代对大石桥都有修缮保护措施,除桥面、桥栏有换修外,主要部位桥台、桥基都是隋朝原件原物,这在中外桥梁史上均属罕见。

在桥梁结构上,安济桥采用了纵向并列砌筑的施工方法,由平行而紧密并列的 28 个石券构成,使每一道拱圈自成整孔体系。这种结构造成横向联系薄弱,缺乏整体性,容易向两侧分散倾倒。但李春根据汉以来的传统方法,在券面上用横向的石板加一层伏,在券面与伏之间再加许多横向的铁条,把这些券拉连在一起,最后,将桥的宽度中间逐渐减少,使两旁的各道券都微微向内倾斜。由于采取这些措施,每道拱券都能独立自成一体,增强了全桥的整体性。安济桥千年之后仍基本保持原貌,完全证实了造桥的各项施工工艺是成功的。

(二) 安济桥的科学、艺术价值

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割据的局面,开通著名的南北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赵州安济桥建设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成果,是最先进的桥梁技术的结晶。

李春建造安济桥在主拱肋与桥面之间设计了并列的 4 个孔,挖去部分填肩材料,从而形成了“敞肩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赵州桥“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但是它的‘敞肩拱’技术,今天桥梁工程上还在广泛应用,并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新型的‘双曲拱’的技术创造,在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①。

“敞肩拱”的科学性在于:第一,拱肩敞开式可减轻桥的自重。既节省了原材料,又能减轻桥基负担。桥台轻巧了,可以将桥直接建在地基上。经千年,桥台走动很少,地基沉陷极微。科学探测表明,安济桥没有长后座式的桥台,桥台基础没木桩,而是低拱脚、浅基础、短桥台。第二,石拱桥所用拱石压强度极高,安济桥拱石每平方厘米抗压

^① 茅以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强度为 1000 公斤,桥身有超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传说张果老、柴王爷负重过桥,一个在毛驴上装着日、月、星辰,一个在小车上装着五岳名山,所载何其重,但桥面上仅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古人以形象的传说故事表明了大石桥有神化般的稳固性。经现代科学验核发现,由于在拱肩上开出 4 个小孔并采用 16—30 厘米厚的拱顶薄填石后,使拱轴线(一般就是拱券的中心线)和恒载力线^① 甚为接近,造成拱圈各个横截面上均受压力或受到极小的拉力,这是拱圈千年不坠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三,桥身大拱的两肩各有两个小拱,它们的作用还在于当河水暴涨的时候,又能帮助宣泄洪水,增加桥洞的过水量,减少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唐张嘉贞在《石桥铭记》中说:“两崖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讲的也是这一道理。据计算,4 个小拱大约可增加过水面积 16.5%,自隋至清,河北省发生洪水多次,大石桥并没有被冲没,再次证明古人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

古人认为只有“神丁”才能造出这样精美的桥。整座桥两侧共有 44 根望柱、42 块栏板。从雕刻变换方式来说,望柱可分 3 种,一是柱头多用双宝珠,柱脚作成方凸榫,尺寸略小。二是斗子竹节式望柱,它自地袱之上采用竹节,然后连续刻画盆唇,斗形撮顶,覆钵,顶端是轮廓柔和的单宝珠。三是最精美的蟠龙望柱,柱身长,底为地袱,在地袱与盆唇之间浮雕蟠龙,盆唇上连续用斗形撮顶和覆钵,顶部再加节纹 4 节。蟠龙似汪洋戏水,苍龙欲意腾飞,龙兽之状,跌宕多姿,刀法苍劲古朴。在主拱顶上有龙门石一块,雕吸水状龙头,寄寓石桥长久永存,不受水害之意。在仰天石(帽石)雕八瓣莲花,点缀于桥侧,手法浪漫。大石桥的栏板雕琢精美,年代最早的是隋朝雕龙栏板,在半圆形

^① 一根绳子悬在空中,其形状就是该绳子的拉力线,若把它翻转 180°,就是恒载压力线。

寻杖和方形地袱之间刻饕餮或行龙,蛟龙或单或双,或盘或游,有的鳞甲披挂,有的以花叶宝珠衬托,形象如生,神态动人。其次是具有六朝风格的斗子卷叶栏板,在寻杖与地袱间加盆唇一道,其上刻斗子卷叶二、三、四片不等。再次是金代栏板,取人物山水为题。此外还有以故事、龙虎、卷叶荷叶题材的石雕栏板。这些建筑装饰,雕技圆润纯熟,细微之地多富于变化,艺术风格新颖独特,别具其殊。

国内享有盛誉,美名也远扬国外,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中国建桥的技术和艺术经李春之手得到了弘扬和发展,理应受到天下人的景慕,清代饶梦铭诗曰:“谁到桥头问李春,仙驴仙迹幻成真;长虹应卷涛声急,似问残碑悦故人。”

赵州桥堪称世界名桥,它的交通使用价值已成历史,但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世代永存,是燕赵大地上一块夺目的瑰宝。

二、无定河上的“永定”桥——卢沟桥

发源于山西省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东流至河北省称无定河,以因频频泛滥成灾而得名。多少世纪以来,河上从无经久坚固的桥梁问世,自金代建卢沟桥,虽洪水滔天而桥却安然无恙,至今已 800 年,被誉为无定河上的“永定”桥。

(一) 桥梁工程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部,桥名源自卢沟河。这条河又称无定河,清康熙皇帝改称永定河。河的上游桑干河夹带大量泥沙而下,水流混浊,故又叫黑水河,“水黑曰卢”,这是卢沟河桥的名称由来。

卢沟河上原有渡口码头,也有暂用的浮桥,《新唐书》记载:“自桑

干河抵卢思台，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欲通漕至卢沟桥。”不过这座桥是非永久性的。据宋代使臣许亢宗所著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这是北宋使臣在宋宣和四年(1125年)所见。金代海陵王在贞元元年(1153年)决定将都城从东北肇兴之地迁中都(今北京市)。时金宋对峙，作为半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改善中都与都南广大地区的交通状况已势在必为。《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要津，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名广利。”史书记载的广利桥就是卢沟桥。

这座桥长 265 米，由 11 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自 16 米到 21.6 米，宽约 8 米，路面平坦，几乎与河面平行。每两个石拱间有石砌桥墩，把 11 个石拱联成一个整体。由于各拱相联，所以这种桥叫石拱联桥。卢沟桥建成于金，以后历代加以修缮，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令造过街塔于桥上”。明正统九年(1444年)曾重修石栏。清康熙七年(1668年)大修，“整顿如旧”。雍正、乾隆两帝时对桥面、桥柱等部位也作过翻修，至今，卢沟桥仍保存着历史的原貌。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最早向世界介绍这座桥的使者，他说：“自汗八里城(即元大都——今北京市)发足以后，骑行十里，抵一极大河流，名称普里桑干(即卢沟河)。……河上有一美丽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他还说：“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马可波罗游记》)

(二) 卢沟桥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卢沟桥是多跨拱桥，全桥由 11 个不等跨圆弧拱组成，拱卷用框式模联法砌成，在每个拱底有 8 道贯通的模条石与券脸石相交砌，使整个拱形成一体。在拱背上平铺护券石一层，拱石与拱石之间有腰铁

相连。这种多跨拱桥与安济桥不同,11个孔洞间,每相邻的两孔都有一个共同的拱脚,因此,桥上每孔的承载都有全桥各孔的“支援”,参与协同承受压力,使大桥“坚固莫比”。

传说,卢沟桥藏有斩龙剑,每每洪水排山倒海而下,10条恶龙能使洪水驯服地自桥孔中通过,大石桥安然无恙。这10条龙其实就是10个桥墩的分水顶。造桥者根据卢沟河水势凶猛的特点,砌筑了10座特殊的桥墩,墩宽自6.5米至7.9米不等,墩前逆水面均有尖长为4.5米至5.2米的分水尖,也叫“尖嘴”,每个分水尖顶部垂直嵌放一根26厘米边长的三角铁柱,分水尖凤凰台上再加放1.82米厚的压面石,使其更为坚固。每逢洪水冲下,它能斩冰分水,大大减轻冲击力,保护桥墩。据记载,元明清以来,河北省三次特大洪水,两岸河堤均被摧毁,唯卢沟桥得免,足见其坚固。

卢沟桥不仅重于实用,而且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传统,把科学的造型结构与精湛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俗语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石桥上有精雕细琢的502个石狮子就是卢沟桥的艺术特色之一。明朝史籍《长安客话》上说:“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这些石狮多数雕刻在石柱上,姿态各异,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有的像仰望云天。大石狮有雌雄之分,雌的与小狮玩耍,雄的在滚动绣球,千姿百态,神情活现,惟妙惟肖。

卢沟桥自身美,它像“苍龙北峙”,如“卧虹千尺”,同时也增加了环境美。大自然的美与卢沟桥浑然一体,勾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乾隆咏题“卢沟晓月”,成为燕京八景之一,这是情景交融的描绘,是卢沟桥独有的艺术魅力。

坐落在华北至东北陆路交通咽喉要地上的卢沟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建桥以来,金元更迭、明清交替之际,这里都发生过激战。1937年发生在此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和宛平墙头上的累累弹痕,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浴

血奋战,抗击外侮的历史见证。

燕赵大地上饱经风霜的座座古桥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是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九章 帝王陵墓

帝王陵墓建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大地是中国封建帝王陵墓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墓葬起源于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在上古时代，墓上还没有封土或其他标志，即所谓“不封不树”。以后，为识别和祭奠先祖，墓就有了坟丘。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高大的墓冢，《周礼·春官》载“以爵为封丘之度”，即爵位等级越高，封土也越高，状如山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也有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这种形式的封土称为“方上”，用黄土层层夯筑，底宽上狭、方形平顶，故称“方上”。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专称“陵”，将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如“山陵崩”，即指君王去世了。从秦汉起，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皇帝至高无上，其墓上的封土形如高山，帝陵附近还有大范围的礼制建筑物，地下墓室安放皇帝的棺木和随葬品。汉时，个别帝王也有以山为陵的，如汉文帝的灞陵，在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也是开山凿洞修成。这种凿山造墓的形式盛行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唐代。“依山为陵”比“封土为陵”更显得气势雄伟，象征着皇权的神圣尊严，体现了帝王气魄之宏大。经过辽金元数百年，到了明清时期，燕赵大地作为畿辅之地，累世帝王陵墓都在北京附近选点立足于“风水宝地”之上，以山为屏，

宏伟壮丽,格外庄严肃穆,如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皆如是。这一时代的坟丘已变成宝城、宝顶式,宝顶之下是地宫,封建帝王陵由“依山为陵”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所以帝王陵是仿其生前从政和生活的都邑宫室营造的,从巨大的陵墓,到作为供奉、祭祀用的建筑群,形成一个宏大的陵园。早在战国时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就出土一块《兆域图》铜版,即陵园平面图。经过 2000 多年的演变,发展至明清,陵园格局已形成定制,地面建筑主要是祭祀建筑群,一条神道贯穿南北,四周筑以墙垣,满园苍松翠柏。陵园的地下建筑主要是宝顶下的地宫,宫内的建筑和陈设极其豪华精致,可与帝王人间宫殿媲美,大批珍贵的随葬品,如衣冠服饰、丝麻织物、陶瓷玉器、金银珠宝,盈千累万,竞吐光华,无数的宝藏是帝王生前豪华腐朽生活的见证。

历代封建统治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庞大的陵墓和用来供奉、祭祀、朝拜的建筑群,并不断举行隆重的谒陵活动,这是推崇皇权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今天,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建筑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史、建筑史、艺术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和政局变动的很有价值的材料。

第一节 燕、赵、中山王陵

一、燕下都王陵

燕下都是战国时燕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易县城东南高陌村一带。燕下都故城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挖掘、勘察和钻探已证实,内城西北角外“虚粮冢”的土台和内城西北角的“九女台”都是当时燕国王室的陵墓。在“虚粮冢”有 13 座古墓,封土高低不等,有的高达 10—

15米,分4排布列,井然有序。“九女台”还有10座古墓,其中挖掘清理的第16号墓,封土高大,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前后有两处墓道,墓室全长10.4米,宽7.7米,深7.6米。主要出土文物是成组的大型陶器,质地较细、内杂云母、表皮微亮、器形模仿春秋以来的铜器,浑厚大方,如成组的编钟、列鼎、豆、壶、簋、盨、鉴、盘、尊、盃、匜等。器物的足、柄、流、耳、环等部位多成兽面形象。器表刻划、拍印或赭色彩绘花纹,均模仿铜器纹饰,如陶纹、兽面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雷纹等。出土玉石器中,有成组的石磬、珮饰、玉珠等,但未出现铜器。燕下都九女台16号墓的挖掘对了解燕国王室陵墓的结构及器物的一般特征很有价值,而且也为燕国文物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二、赵邯郸王陵

赵邯郸故城遗址,经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勘察,已知在王城西北15公里的陈三陵村是赵王陵墓区。1978年试掘,在西北4公里的万家村一带又发现了赵国贵族的墓地。

赵自敬侯选都邯郸,传八世而亡。八代国王陵墓见于《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有肃侯十五年“赵寿陵”,武灵王陵在“蔚州灵邱县”,末代君王迁“流放于房陵”(今湖北房县)。余下五王(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未见记载。考古工作者发现陈三陵、周窑、温窑五个陵区中的陵台不仅有高大的封土,而且有高大的台基。从遗存的砖瓦证实,当时有“享堂”类建筑,陵周有围墙,各陵背岗面阜十分壮观。5座陵台排列井然有序,布局结构相同。陵前有御路,台上有享殿,台周有坊,园寝外有围墙,其规制与战国中山王霁墓中出土的“兆域图”规制相同。3号陵台可能是赵王和王后的合葬墓。

三、中山国王陵

1974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勘察并发掘了中山国灵寿故城及中山王墓。中山王墓区在城西北部约2公里的西林南坡上,东西并列大墓两座,西边一座是中山王𪔐的陵。封土为陵,高约15米,南北长110米,东西宽约92米,封土中部有地面建筑遗址。墓的主室结构平面呈“中”字形,南北长110米,宽约29米,底距口深5.7米,分南墓道、北墓道、椁室、东库、东北库、西库6部分,规模宏大。陵墓地面上有陪葬墓6座,分列东、西、北三面,南面还有车马坑2座,西侧台下有杂殉坑和葬船坑各一。这是一座典型的战国时代王陵,虽然地表已是荒基零础,但发现于椁室的“兆域图”铜版却显示出王陵初建时的规模和形制。“兆域图”标明了“王堂”、“王后堂”、“哀后堂”,以及其他宫、垣的位置、建筑结构和尺寸。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上面的铭文和建筑标记均用金银镶嵌而成,至今清晰可见。这是全国发现的最早的帝王陵墓规划图实物。按图版所记,地面有二道长方形的宫垣,南边正中开门,宫垣中间并列5间“堂”,中央为“王堂”,左右两边有“王后堂”和“哀后堂”,均“方二百尺”。墓上封土呈覆斗状,顶上有圆形的回廊建筑。所谓宫垣即陵园围墙,所谓“堂”即寝殿,是死者灵魂安居的地方。另一说,“堂”是供后人祭祀祖先用的“享堂”,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二者的分歧姑置不论,先秦陵墓封土的高大和地面建筑的规制对后代王朝肯定有着极大的影响。秦汉帝王陵的宏伟建筑和逐步完善的封建兆葬之制就是在先秦陵寝制度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

中山王墓出土文物丰富,其中最珍贵的如铁足铜鼎,为铜铁合铸,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壁有铭文469字,构字秀美,刀法娴熟。铜方壶,通高36厘米,直径35厘米,盖顶饰云形钮,肩

部饰双龙,造型美观,方壶四壁铭文 450 字,是后人了解中山国君世系的珍贵材料。错金银铜虎噬鹿屏风插座是又一件稀世文物,长 51 厘米,高 21.9 厘米,重 26.6 千克,通体错金纹饰,其形制是一只斑斓猛虎,后尾刚挺上卷,身躯弓曲,刚劲的利爪正捕食一只小鹿,虎前爪悬空,设计者用鹿腿支撑平衡器体,构思奇巧,造型新颖,是国之瑰宝。

第二节 两汉分封王陵墓

一、西汉中山王陵

燕赵大地虽非秦汉帝陵之区,但两汉分封王陵墓却很多,其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山陵,仍以当时少有的凿山造墓的形式以及随葬的金缕玉衣等稀世文物在中国古代陵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满城位于太行山东麓,在县西北山脚下有一片丘陵地带,这里有一座孤立的小山,俗称陵山。陵山高 200 多米,由三个连绵的山峰组成,主峰居中,山顶较为平坦,左右两峰遥相对峙,似人工双阙,天造地设,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就坐落在主峰的东坡上。

汉初大封同姓王,以屏藩皇室。汉景帝的庶子刘胜在公元前 154 年被封中山国,这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辖境相当今狼牙山以南、保定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滹沱以北的地区,治卢奴(今定州市)。刘胜死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 年),统治中山 40 余年之久。

刘胜墓坐西朝东,开凿山岩作墓室,其布局仿人间宫殿建筑。在墓道尽头,南北各有耳室一间,穿过宽敞的中室进入后室,全长 51.7 米,最宽处 32.5 米,最高 6.8 米,墓道长 20 余米。南耳室为车马房,

内葬装饰华丽的马车 6 辆,马 12 匹。北耳室内藏粮食、鱼肉类、满缸的美酒以及各式各样的饮食用具。中室最为宽敞,方形,长 15 米、宽 12 米,两座宴会用的木质帷帐(已朽烂倒塌)十分精美,这是供死者灵魂饮酒作乐的厅堂。中堂的西端有后门一道,门扉上有铜质镀金兽面衔环一对,打开石门即进入后室,内又分主次两室,主室长约 5 米、宽 4 米,由石板砌成,四壁涂红色,室北正中有汉白玉棺床,上置刘胜棺槨。整座墓内有排水系统,沟沟相通,最后流入渗井内,避免了水浸损害。

在刘胜墓北面约 120 米的山坡上建有其妻窦绾墓,内部结构布局与刘胜墓相似,规模略大。两座墓密封无隙,先用石块填充墓道,后砌两道土坯墙,以铁水浇灌弥缝,坚如磐石。刘胜山陵建在山峦之上,居高临下,气势壮观,显示了西汉一方之王的尊严和显贵的地位。

随葬品数量浩大,有铜器、金银器、玉石陶器、漆器等 4000 余件。造型独特、装饰新颖的刘胜墓的漏壶,呈圆筒形,高 22.5 厘米,安插标时的刻箭随水的升降标示时刻。这座古计时仪是目前全国出土的漏壶中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一件。此外,长信宫灯、当户灯、铜羊灯、铜雀灯、错金博山炉、鼎形铜熏炉、长乐宫钟、错金银鸟篆钟、中山内府钟、钫、钺、铎,以及鎏金铜口饰、铜镜、玉人、石俑、铜链子壶、料耳环、各种彩绘陶器、医用金针、穿孔工具、铜戈、铜剑、玉具、铁剑等等,都异常精美,世所少见。

刘胜夫妇的葬服——金缕玉衣是全国第一次出土的最完整的玉衣。玉衣由金丝连缀玉片制成,全身分头部、上衣、裤、手套、鞋 5 部分组成,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形状的玉片,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多边形等,每片约 0.3 毫米厚。刘胜玉衣由 2498 块玉片、金丝 1100 克制成,窦绾玉衣由 2160 块玉片、600 克金丝制成。两套玉衣巧夺天工,堪称国宝。

在刘胜夫妇陵墓的南山梁上还发现 18 处陪葬墓。均以长方巨石

叠砌，上圆下方，宽处长 15 米，高 4—7 米，下有竖穴洞室。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刻有“公官容五斗重七斤九两”的铜鼎。封建王侯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刘胜也不例外，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众多的陪葬墓正是他生前妻妾成群的旁证。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是两汉分封诸王陵的代表。除此以外，还有建于今定州的西汉中山王刘昌、刘修和东汉中山王刘焉以及建于今北京丰台的西汉广阳王刘建、今石家庄小尚村的异姓王赵王张耳的王陵。在今献县也发现了河间献王刘德、孝王刘开、惠王刘良的墓群，都有文物出土，十分珍贵。

二、昭君墓

昭君墓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南 10 公里处的大里河畔。墓身是一座人工夯筑的大土丘，高约 10 余丈。每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之时，惟独昭君墓上的草色青青，因此又称“青冢”。

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昭君墓的是唐代杜佑所著《通典》。在《通典》卷一七九州郡典古冀州下单于大都护府金河县条目下，明确载有“王昭君墓”。宋代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也载，昭君墓在金河县西北，因墓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辽史·皇子表》中也提到青冢。据内蒙古史学家判断，上述史籍所载昭君墓及青冢，均指现今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

王昭君出塞和亲，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封为宁胡阏氏。昭君出塞对当时西汉与匈奴和平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历来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赞颂。在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境内也有一座昭君墓，传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十几座昭君墓。这样多的昭君墓正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王昭君这位民族团结友好使者的怀念，后人

为她立墓表示了对她的敬仰和热爱之情。

第三节 魏晋至辽金帝王陵

一、魏晋北朝群墓、永固陵和茹茹公主墓

经东汉末群雄割据纷争，曹氏建立了魏国。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操为武帝，因曾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故葬于高陵（临漳县西原）。《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曹操曾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在《遗令》中他还说过类似的话：“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知曹操主张薄葬，其高陵也无地面标志，所以后世难寻古迹。其子曹丕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有鉴于“汉氏诸陵无不挖掘”，故“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可见曹氏父子依山为陵，不封不树是防盗掘，所谓“祸由乎厚葬封树”。历史上传说曹操设 72 疑冢以惑后人，这是以讹传讹。一说在河北省磁县东漳河两岸，向东北距磁县城约 10 公里处分布的大型墓群即所谓的 72 疑冢。经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和部分发掘清理，这些墓为东魏、北齐的皇室、王公贵族的墓葬群，与曹操无关。但魏武帝陵冢尚未发现，是中国陵寝史上众多悬案中的一件。

魏晋以后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政权屡易，燕赵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西晋灭亡后，匈奴、羯、氐、羌、鲜卑族等相继在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大多采用传统的“潜埋”葬制，地表不封不树，后世难以发现其所在。只有少数帝王封土起陵，如淝水之战后，鲜卑族慕容垂恢复燕国，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史称后燕，在

今定州市城区就有尚未发掘的慕容陵,封土高数米,市内宋代寺院遗址净众院的碑铭中有“北枕慕容之高陵”的记载。^①

经过十六国以来百余年的纷争,到439年,鲜卑族拓跋珪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为巩固统治,在政治上广封同姓王,分守诸州,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完善封建土地制度,北魏政权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后期的北魏吏治日趋衰败,对南朝战争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祖居河北景县的鲜卑化汉人高欢乘机控制朝政,废孝武帝,另立孝静帝,由洛阳迁都到邺,史称东魏。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又废东魏,建立北齐政权。高欢为巩固统治推行北镇鲜卑集团与河北世族豪强集团联合专政的政策。当时河北世族位居要政的主要有渤海高氏、封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无极甄氏等,他们有力地支持了东魏、北齐政权。这些世族实行“集族而葬”的习俗,在今河北景县东部有俗称封家坟、十八乱冢的墓群,在景县南部有习称“高氏祖故”的群墓,就是封氏和高氏两大家族的茔域。葬制皆封土为陵,封氏墓群占地13.3公顷,最大封土高7米。高氏墓群最大封土高约30米,占地133.3公顷,墓近百座,排列有序。封土下有墓道通墓室,随葬品虽经盗掘,但仍出土丰富,显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尤其是出土的青瓷莲花尊和彩绘陶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957年在河北省无极县史村,发现了北朝时甄氏族墓地,在已发掘的3座墓中除出土大量陶器外,还有甄谦买地券和甄凯志石一方,为研究甄氏一族的历史和北朝门阀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在燕赵大地北部具有帝王陵墓规格的是北魏冯太后的永固陵。冯太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市)人,孝文帝即位初曾临朝听政,时北魏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太后寿陵选定在方山(今大

^① 定州市情调查组编著,《中国国情丛书·定州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同市西北)南部山顶上,基底方形,上部圆形,高 22.87 米,南北长 112 米,东西宽 124 米。在陵南建有永固堂石室,属祠庙性建筑,主要结构用“文石”筑成,檐前四柱用“墨石”雕就,堂前有碑刻、石兽,左右列松柏,陵院外有浮屠、斋堂。整座陵墓形制继承了汉葬之制,又兼具鲜卑族“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这是一座鲜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陵墓,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同时期,在燕赵的南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还有东魏茹茹公主墓,位于河北省磁县东南大冢营村,砖砌,平面作“甲”字形,包括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南北总长 34.89 米,东西宽 5.58 米。墓内保存了大量壁画,绘有墓主茹茹公主的画像及侍女等。墓内早期被盗,但仍出土了各式陶俑、动物模型、青瓷器、各种金饰品等共 1000 多件,还出土了两枚拜占庭金币。墓内出土墓石一方,篆盖有“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铭”,志文 22 行,全文 463 字,字间有界格,字为魏碑体。

茹茹,史作芮芮、蠕蠕,自号柔然,东胡之苗裔,姓郁文闾氏。东魏兴和三年(541 年)丞相高欢送东魏乐安公主嫁予阿那环之子菴罗辰。兴和四年(542 年)“阿那环请以其孙女号邻和公主妻济神武第九子长广公湛,静帝诏为婚焉”,志文和《北史·齐本纪》所载相同。时高湛年仅 8 岁,而茹茹公主年方 5 岁,两家是娃娃亲,志载茹茹公主死于武定八年(550 年),时年 13 岁,此门娃娃亲显然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此志所记内容可以补史,而且为确定高欢、高澄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辽、金帝王陵

北方长期的分裂局面直到隋唐建立才宣告结束,从此进入了中国封建史上最繁盛的时代。燕赵大部分州县隶属唐之河北道。唐朝

实行依山为陵的葬制,岗阜环抱,气势宏大,但也有封土为陵的,如唐敬宗的庄陵。在河北隆尧县城南 15 公里处的王尹村北,有大唐祖陵两座共一茔。建陵始于高祖李渊,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 年)又在陵东建光业寺。建初陵是唐玄宗八代祖李熙陵,启远陵是七代祖李天锡陵。均有高大封土,陵前有华表、石狮、石马,雕刻手法娴熟、形象自然逼真,具有盛唐风格。虽封土已平,寺庙已毁,但石雕犹在,这是燕赵少有的唐代陵墓建筑。以后,在燕赵建都称帝并兴建皇帝陵的是自辽、金两朝开始的。

辽朝是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所建。早期在今辽河一带游牧,唐宋,迭剌部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916 年建国号契丹,947 年改国号为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契丹族建国后与中原联系逐渐加强,农业、手工业得到普遍发展,民俗民风也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辽朝帝王陵分在三个地域:辽太祖阿保机的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太宗、穆宗的怀陵,圣宗、兴宗、道宗的庆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世宗的显陵、景宗的乾陵在今辽宁北镇县境内。凡帝陵均设有奉陵邑,守护陵园。辽陵虽未经发掘整理,但地方民族特色仍可显见,如陵前石人雕成箭袖窄袍,背后梳一条长辫,与中原风格不同。另据 1995 年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现辽代女贵族“苏娘”的墓,从墓画看,墓主人年轻美貌,有众多侍女簇拥,地位显赫。墓室结构具有草原与中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墓葬分内外二层,外面是砖砌仿穹庐式的圆形帐庭,里面是石砌彩绘汉式长方形石房,其独特的风格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这座女贵族墓为了解辽帝王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原分布于东北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一带,长期受辽统治者的压迫。1115 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举旗反辽,建金朝,是为金太祖,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亦称上京。10 年后,金兵亡辽灭北宋,占据中国半壁河山。金朝第四代皇帝

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称中都。随都城内迁,金朝始在中都建陵寝。金初,太祖陵建会宁北城外,称睿陵。完颜亮建中都后,于贞元三年(1156年)三月迁睿陵于北京大房山。房山县位于北京西南约60公里处,自然环境幽静秀丽,西跨太行山北段,山岳重叠,林木丛郁,明秀异常,金陵就建在县西10公里的云峰山下。这里埋葬着金始祖至金章宗皇帝,以及后妃、诸王,成为建在北京的第一个皇陵群。

金陵区大致分帝陵、后妃陵、诸王兆域3部分。帝陵有太祖的睿陵、太宗的恭陵、睿宗的景陵、世宗的兴陵、章宗的道陵。被追谥者有熙宗的思陵、显宗的裕陵。遇弑且被降为庶人的海陵帝则葬在山陵西南侧,这是个例外。诸帝之陵均有皇后陪葬,而各妃死后葬在“诸王兆域”中,位于云峰山之北麓。整个陵区规模很大,世宗在位时,周界近80公里,四周园墙还设有“封侯”即土堡,以加强守护。

金陵是处风景秀丽而又壮观的古建筑群,后世元曲作家冯子振写了《鹧鸪曲·燕南八景》,其一就有“道陵前夕照苍茫”一景,道陵即指金章宗之陵。金陵园的地面建筑在明朝末期受到大肆破坏。当清军所至克捷,兵取辽阳时,明帝感于“形家之说”,以清发祥渤海,疑与王气相关,故天启元年(1621年)起,罢金陵祭祀,次年拆毁金陵,割断地脉,又建关庙其上为厌胜之术。将国运衰微移咎于异代山陵,致使金帝王陵从此荒圯,面目皆非。清康熙皇帝即位初,以“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在兹,追念鸿烈”,于是命礼部“修其颓殿,俾規制如初”。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金太祖陵地面宽平,重建飨殿,筑围墙,立正门,凡祭台甬道倾地处,如式修整。金世宗陵的飨殿、祭台、甬道、燎垣也均行增修。民国时期金陵又屡遭破坏,地面建筑再次被毁殆尽。仅知金太祖陵丘为三合土夯筑,高5米,周长30余米,这是清重修过的遗迹了。在坟南有飨殿遗址,殿基进深12.20米,宽16米,殿柱16根,直径30厘米,陵墙已成残垣断壁。金世宗的兴陵结构与之相似,

规模略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 1986 年起开始对金陵作考古调查，这座具有女真族风格的地下文物宝库将重见天日，再现光华。

总观西晋以来帝王陵寝，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主要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同时保留了本民族的习俗风尚，给燕赵陵墓建筑文化增添了新的一页。

第四节 明十三陵

1368 年元朝的统治被推翻，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王朝，定鼎南京。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葬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是为明孝陵。自明朝第三代皇帝建都于北京的永乐帝起，到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止，共有 13 位皇帝相继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是为明十三陵。

一、十三陵的兴建

早在永乐五年(1403 年)时，皇后徐氏病逝，明成祖派礼部官员去北京择定“吉壤”，先拟定口外屠家营，由于“朱”与“猪”同音，有被宰杀之嫌，犯地讳而不用。又拟选昌平的“狼儿峪”，朱(猪)遇狼是不祥之兆，也不可用。后欲选西郊“燕家台”，因“燕家”与“晏驾”谐音，有死亡之意，更不吉利。直到永乐七年(1405 年)明成祖才亲自择定在燕山支脉的天寿山。

天寿山原名黄土山，位于北京昌平县，距市区约 80 多公里。这里山间明堂广大，群山若封似闭，中间土水深厚，不仅风景优美，而且以山为屏，易守难攻。一日，永乐帝“驻蹕于此饮酒，是日适万寿之期，群臣上寿，故名天寿”，黄土山从此名天寿山(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京

畿·昌平》)。永乐帝遂降旨圈地 80 里作陵区。

经过 4 年的大兴土木,永乐十一年(1413 年)二月,将徐皇后棺椁由南京迁来。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朱棣死于军中,遂与徐皇后合葬,直到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 年)永乐帝长陵才最后竣工。以后相继葬于天寿山的还有仁宗朱高炽,名献陵;宣宗朱瞻基,名景陵;英宗朱祁镇,名裕陵;宪宗朱见深,名茂陵;孝宗朱祐樞,名泰陵;武宗朱厚照,名康陵;世宗朱厚熜,名永陵;穆宗朱载垕,名昭陵;神宗朱翊钧,名定陵;光宗朱常洛,名庆陵;熹宗朱由校,名德陵;思宗朱由检,名思陵。共 13 位明帝埋葬在这里,通称明十三陵。陵区方圆 80 里,东、西、北三面环山,如拱似屏,气势磅礴。十三座陵又各依一个山峦,而明成祖的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主体,其他十二陵分布于东南、西北和西南处,彼此相距 500—1000 余米不等。在天寿山南麓的缓坡上,距长陵约 6 公里处有两座小山崛起,东名蟒山,西名虎峪山,十三陵的大宫门(习称大红门)正居两山之中,成为十三陵的天然入口。

自迁都北京的永乐帝起,明朝有 14 位皇帝,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呢?明朝有一段历史说明了这个问题。迁京后第四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当朝时,西北部蒙古族瓦剌部强大起来,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 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兵大举南侵,明廷宦官王振贪婪蠹国,为恃功自重,竟挟持英宗“御驾亲征”,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蒙古兵俘虏了英宗。消息传到北京,中外惊骇,英宗弟朱祁钰即位,年号景泰,在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抗战派主持下,军民打退了蒙古兵的围攻,保卫了北京,挽救了明王朝的厄运。蒙古瓦剌部自此也日渐削弱,并把英宗释放回京。朱祁镇先称“太上皇”,后发动了“夺门之变”杀害了景泰帝,重新复辟,改元天顺,而把景泰帝及皇后葬在京西的金山。后世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修缮了景泰帝生前所建陵墓,但始终没有迁葬,以后用来安葬短命的光宗皇帝,称庆陵。所以,明十三陵在明时只建了十二陵。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

死后葬于田贵妃园寝，本无明楼、享殿。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拨巨资修复明陵，将田妃园寝重新修葺，一如其他帝陵，明楼享殿之制具备，立神牌木主以供奉，思陵“始为建置”。

二、长陵的建筑

十三陵的正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5间6柱11楼，6根柱脚刻浮雕云龙，上部加饰立雕卧兽。牌坊的中线正对着11公里外的天寿山主峰。过石牌坊往北约1300米就是陵园大宫门，坐北朝南，门3洞，丹壁黄瓦，单檐歇山顶，浑厚端庄。自大宫门起原有绕陵围墙一道，周长约40公里，共设10门，即中山门、东山门、老君堂门、贤庄门、灰岭门、钻石门、雁子门、德胜门、西山门、榨子门，各门均有敌楼，设兵把守，现仅存围墙遗址。门内东有神厨5间，西有神庖5间。进门600米处迎面一座碑亭，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覆顶，距碑亭四角约30米处各有一座华表，上雕云龙，亭内有“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高6.5米，4座盘龙华表矗立衬托，蔚为壮观。穿过碑亭往北，在长达1200米的神道两旁排列着18对石像生，有4狮、4獬豸、4骆驼、4象、4麒麟、4马，各两卧两立，还有4武臣、4文臣、4勋臣，通体由汉白玉石雕琢，大者约30立方米。石像生源于秦代，陵前多置麒麟、辟邪、象、马，以后历代相沿。这种石雕装饰象征帝王生前仪卫，庞大的兽形也显示了皇帝的威严。神道北端就是祔恩门，这座门寓意天门，入此门如升天堂。再往北，沿神道穿过七孔石桥，可直趋长陵。

长陵是明陵的典型代表。这座陵由祔恩殿、明楼宝城、宝顶组成。祔恩殿是地面上的古建筑，富丽堂皇，与皇宫中的太和殿相类似，面阔9间，重檐庑殿顶，座落在汉白玉台基上，台基高3.2米，共3层，每层有栏杆，栏上浮雕云龙纹。大殿东西宽66.95米，南北进深29.311米，面积1956.44平方米，另有东西配殿各15间，这是中国

现存最大的木结构殿宇之一。殿内有 32 根金丝楠木承托殿顶,直径 1.17 米,最高的约 12 米。这些贵重的木料多产在四川、湖广、江西等地的深山老林中,俗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之说,劳动人民以生命作代价从数千里之外运抵工地。由祿恩殿继续向北是内红门,过门是明楼宝城、宝顶。明楼形似小城楼,它因与称作“幽宫”、“玄宫”的地宫相对应而得名。明楼前檐有匾额,刻有“长陵”字样。楼前有石“五供”:香炉 1 个、蜡台 2 个、花瓶 2 个。楼中立庙谥石碑,上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9 个金字,字大径尺。楼后是宝顶,圆丘式,周长 1000 余米,明成祖朱棣的棺椁就深埋在宝顶下的地宫。

长陵地宫尚未发掘,其内部布局结构推想当与打开的定陵地宫相近。

三、定陵地下宫殿

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墓。朱翊钧是明穆宗第三子,1527 年即皇帝位,年仅 10 岁,年号万历、庙号神宗。即位初,宰相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税手续,缓和统治危机。万历帝成年亲政后,迷恋酒色,不常理朝,却大事营建。万历十一年(1584 年)定陵工程破土,陵地选在长陵西南的大峪山下。从此,工程每日役使民工、军夫两三万人,历时 6 年,耗费白银 800 余万两,折成米,可够 1000 万人吃一年。定陵规模大,建筑豪华,它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和永陵而居第三位。由于屡遭破坏,今仅存明楼、宝顶。

揭开地宫之谜一直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研究、探索的课题。1956 年试掘开始,先从宝城内侧着手开掘第一条探沟,后又于明楼后开第二条探沟,发现小石碑一块,上刻“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16 个字。考古工作者在顺小石碑所指方向开掘第三条探沟时发现了石隧道,隧道尽头就是金刚墙。墙中央有一座汉白玉石门,门

高 3.3 米,每扇门宽 1.8 米,重约 4 吨,上雕纵横 9 排门钉和铺首衔环,跨入这座石门,才算进了地宫。

地宫保存完好,宫距墓顶 27 米,全部为石结构,拱券式,分为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的殿堂,总面积 1195 平方米。5 座殿的布局是前中两殿相连,形成长方形甬道,后殿则横在顶端,呈“T”形。中殿两侧有甬道、石门通向左、右配殿。地面铺砌金銮宫殿专用的大方砖,由江南御窑烧造。穿过前殿,有 3 个汉白玉雕成的宝座按“品”字形放置,宝座前有一套用黄琉璃瓦烧成的香炉、香瓶和蜡台,还有青花云龙纹大瓷缸 3 口,内盛香油、灯蕊,时称长明灯。左、右殿各放置一具空着的汉白玉棺床,是一种虚设。后殿是地宫中最大的殿堂,高 9.5 米,长 30.1 米,地面用磨光的花斑石墁砌,这里是地宫的主要部位。在正面的棺床上放置三具棺槨,正中是万历帝的灵柩,楠木做成,棺槨大端高 1.4 米,面宽 1.5 米,长 3.3 米。棺上有丝织铭旌,金书“大行皇帝梓宫”6 个字,铭旌两端木刻龙牌。合葬的孝端和孝靖两皇后的棺槨分列左右,周围有 26 只红漆木箱,内装陪葬品,另有玉石、寿花瓶等明器。

打开万历帝棺槨,尸骨完整,头发、胡须保存尚好。头上打发结、插金簪、戴金丝编织的皇冠,镶嵌两条翻舞戏珠的金龙,姿态生动,制作极精湛,是全国首次出土的金丝龙冠。两位皇后棺内放置四顶凤冠,上嵌龙凤装饰,其中一顶六龙三凤冠,龙在顶端,口衔珠宝,正面有三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每顶凤冠上都镶有珍珠 5000 多颗,宝石 100 多粒。除龙冠凤冠外,大量珍宝充斥棺内,御用织锦、瓷器数量极多,仅袍服衣着和成匹锦缎就有 300 余件。这些珍贵的文物表明当时手工业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

定陵地宫及出土的丰富文物再次证明,地下宫殿蕴藏着难以数计的宝贵财富,是沉积了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

四、明朝陵园的特色

以北京作全国京师自元朝始。蒙古族尚幕天席地的游牧生活习俗,陵墓之制也采取不起坟、不筑陵的秘葬方式。明陵沿袭唐宋以来的帝陵之制,并作了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唐代因山为陵,在山坡凿造墓室,墓道呈阶梯式深入山腹。也有个别帝王如唐僖宗的靖陵是封土为陵,呈覆斗形的土冢。陵园置上宫和下宫,上宫是祭祀仪式的场所,下宫是供奉墓主灵魂起居生活的地方。北宋帝陵不再依山为陵,在陵园正中高筑陵台,呈梯形,陵台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槨的地宫。围绕陵台的神墙,也呈正方形。到明代,从明太祖的孝陵起,陵墓由方形渐变为圆丘形“宝顶”式。六朝以来,南方帝王如南唐的钦陵、顺陵、前蜀高祖永陵,其陵冢均是圆形,建在江南的明孝陵应是受其影响的。以后,明成祖迁都北京,祖陵的“宝顶”式陵冢也延续下来成为定制,直到清朝仍然相沿成约。

明陵的另一项变革是裁撤了下宫建筑,扩大了上宫建筑,宏伟的祔恩殿成为陵区的主体建筑,使祭祀活动更加隆重,这对推崇皇权、加强封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明初,太祖废弃了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互相牵制,兵刑大权由皇帝一人包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发展。明陵加强祭祀先帝活动的规模,突出隆重的仪式,这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陵寝制度上的反映。

不同于宋代方形的陵园围墙,明陵围墙呈长方形,而且分三重院落,呈三进式。第一重庭院有陵门及两侧的神厨、神库和碑亭,第二重庭院是祔恩殿和东西配殿,第三重庭院是牌坊、石五供和方城明楼。三重院落之间都有大小不同的门隔开,显得十分严谨而又自成一体。与地上相应,地宫也设计有三个前室,采取三段连续的大券道的形

式,这是地面上三重庭院式的布局在地宫中的反映。以后,清王朝的东陵、西陵都依此为格局。

明初实行陪葬制。殉葬是一种残酷的落后制度,如明太祖孝陵殉葬嫔妃 46 人,明成祖的长陵殉葬嫔妃 16 人,故嫔妃不独立起陵。在长陵建有东西二井,所谓井,即无隧道而竖直上下的墓穴,从葬的嫔妃就埋在这里,棺木直接从上缒下。东井在德陵东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北,东向。每井都有门 3 道,殿 3 间,两庑各 3 间,绿瓦周垣。这种殉葬制,直到明英宗死前才遗诏废止,“于是妃墓始名”。在明十三陵就有宪宗的万贵妃、神宗的郑贵妃墓及二李、刘、周四妃之墓等等,这项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帝陵不再有人殉,嫔妃死后都建妃园寝,位于帝王陵的附近。废除陪葬制无疑是明清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第五节 清朝帝王三陵区

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基,至宣统帝退位,中经 295 年,历 12 帝。清帝王陵墓就其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划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三部分。

一、清初关外三陵

所谓清初关外三陵即指努尔哈赤的祖陵、皇太极的昭陵以及远祖的永陵。

(一) 永陵

位于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永陵始建于 1598 年,是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长安、父塔克世及其妻的墓地。《钦定

大清会典》记载,“肇祖原皇帝、原皇后,兴祖直皇帝、直皇后,景祖翼皇帝、翼皇后,显祖宣皇帝、宣皇后之陵共一山,在兴京城西北十里,称兴京陵”。后于天命九年(1624年)将景祖翼皇帝、皇后,显祖宣皇帝、皇后陵移到东京城东北四里的杨鲁山,称东京陵,在奉天府城东12.5公里。顺治八年(1652年)封兴京所在陵山名启运山、东京陵山名积庆山。顺治十五年(1659年)将东京陵附于兴京陵,次年尊称为永陵。

永陵坐落在启运山南麓,前临苏子河,依山傍水,陵区占地约12000平方米。地面建筑由功德碑亭、启运殿、宝城三部分构成。进入南面正红门,有横排四座碑亭,给4位祖先歌功颂德的碑石伫立亭中。亭东有祭祀用的祝版房、齐班房,西为茶膳房、涤器房。过碑亭是启运门,门外东西南三面环以垣,门内东有果房、西有膳房。跨过启运门就是永陵的主建筑启运殿,为祭祀活动场所。殿为单檐歇山式,黄琉璃瓦覆顶,3间4门8窗,殿内壁上嵌饰着五彩琉璃蟠龙,设有4座暖阁、龙凤宝床和神位。大殿前有雕饰盘龙的御路,东西配殿各3间,焚帛楼1座。宝城位于启运殿之后,城中陵冢环列,平地起封,封土下为地宫。这里原有一棵老榆树,乾隆皇帝四十三年(1778年)谒陵时作《神树赋》,御笔亲书,刻碑立于西配殿。

(二) 福陵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部10公里山地上的福陵,背依天檀山,前临浑河,山水环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拉那氏的陵寝。初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后由康、乾两帝增修扩大,总面积为19.48万平方米。

福陵比永陵规模大,一入口就颇具帝王之气,南面最前为下马碑和大红门,门前左右列石狮一对、华表一对、石碑楼两座,门墙上嵌雕有蟠龙的琉璃壁。进门后,神道两侧苍松林立,左右列石狮、石马、石虎、石驼各一对,东西华表两对。随地势逐渐升高,过桥直达圣德神功

碑亭,亭前有 108 层台阶,上有康熙书“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向北穿过三重檐的隆恩门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隆恩殿,黄琉璃瓦覆顶,殿周环以雕花石栏,殿内一座大暖阁,设宝床,另设小暖阁一座供奉神牌,阁前有龙凤宝座一对以及福金椅、配椅、五供案等。殿前有雕饰盘龙的御路,东西有配殿各 3 间,西配殿前有焚帛楼一座。殿后是明楼,内立“太祖高皇帝之陵”石碑一通,楼为门洞,门外有石五供。隆恩殿及殿前建筑都包容在一座古堡式的方城之中,城之后是月牙形的宝城,上为宝顶,下为地宫,努尔哈赤和皇后就埋葬在这里。

福陵川水萦绕,山峦屏立,景色秀丽,仿佛福陵融汇于秀水青山之中,成为沈阳八景之一“天柱排青”。

(三) 昭陵

坐落在辽宁沈阳市区北部的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的陵墓。陵区占地面积为 450 万平方米,是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 年),顺治八年(1651 年)完工,并封陵山曰隆业山。

昭陵建制与福陵同。有趣的是在石象生中立石马一对,名“大白”、“小白”,传说是仿太宗生前心爱的两匹宝马良驹雕成。昭陵建筑规格高、石像生数量也多,气势更加壮观。

清初关外三陵是清朝入关前营造的,又经过康乾时代的增修扩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又兼具民族地方特色,如方城的布局结构就表现出城堡式的山城建筑艺术,有别于关内的陵园建筑风格。

二、清东陵

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昌瑞山南麓有一片清代帝王陵墓群,这就是清东陵。

（一）东陵的兴建

遵化县东距北京 125 公里,位于燕山地区的山间盆地,四周环山,河泉交汇,俗有“三山两川”之称,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北靠长城、喜峰口等著名关隘,是历代交通要冲之地。清东陵坐落在县西北 35 公里的风台山南麓,康熙二年(1663 年)“封为昌瑞山”。《大清一统志》载:“山脉自太行逶迤而来,重岗叠阜,凤翥龙蟠,一峰柱笏,状如华盖。前有金星峰,后有分水峪,诸山耸峙环抱。左有鲶鱼关,马兰峪尽西朝,俨然左辅。右有宽佃峪,黄花山皆东向,俨然右弼,千山万壑,回环朝拱,右左两水,分流夹绕,俱汇于龙虎峪。”这里秀色迥异,“为州境最胜处”,清统治者视此地为“上吉之壤”,风水宝地。

东陵区第一陵是顺治帝的孝陵。以昌瑞山作“寿宫”是由顺治帝“校猎至此”亲定。《清史稿·礼志》记载,帝至山前,停辇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遂自取佩鞮掷之,对侍臣说:“鞮落处定为穴”。清东陵从此发端。1661 年正月顺治皇帝病死于养心殿,时年 24 岁,康熙二年(1663 年)顺治梓宫葬入孝陵。以后,相继葬于东陵的还有康熙皇帝,名景陵;乾隆皇帝,名裕陵;咸丰皇帝,名定陵;同治皇帝,名惠陵,以及诸帝后妃陵墓也建在东陵,总计有帝陵 5 座、后陵 4 座、妃园寝 5 座、公主园寝 1 座,共 157 人。15 座陵墓依山势东西排开,绵延苍翠的群山屏立其后,极为秀丽、壮观。陵区南北长 125 公里,东西宽 26 公里,总面积为 2500 平方公里,是全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二）陵园的建筑

东陵的地面建筑以孝陵为代表,无论建筑的布局还是建筑的规模都在其他帝陵之上。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东陵施工,取土于磨盘山,烧瓦于遵化州温泉,烧灰于蓟州,采石于房山卢家庄大石窝,采青砂石于宛平县鞍山,采豆渣石于遵化州鲇鱼关。

孝陵是整座陵区的中心,从正南陵口的石碑坊起,向北到昌瑞山

主峰下的明楼宝顶,长达5公里,12米宽的神道贯通南北,成为孝陵的中轴线,数十座建筑物依次是:大红门、具服殿(更衣殿)、圣德神功碑楼(大碑楼)、石像生、龙凤门、一孔石桥、七孔石桥、五孔石桥、三路三孔石桥、神道碑亭(小碑楼)、神厨库、朝房、隆恩门、焚帛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等。这一系列建筑疏密相间、对称均衡、主次分明,给人以森严、凝重之感。大红门前的石碑坊高12.48米、宽31.35米,5间6柱11楼,石柱浮雕“云龙戏珠”、“双狮滚球”,额坊上有精致的旋子大点金彩绘纹饰。穿过大红门迎面是碑楼,重檐九脊顶,华丽壮观,楼中巨大的龙蝠碑高6.7米,巨石雕成,碑文以满、汉文字雕刻着顺治帝的“功德”。碑楼四角各有一柱华表,高13.8米,直径1.45米,柱体八棱形,用高浮雕手法,刻满龙云纹饰,仿佛飞龙缠柱,把碑楼衬托得更加雄伟,象征帝王功德的神圣。神道两侧整齐排列18对石像生,有文臣武将,兽形有獬豸、马、象、狻猊、麒麟等,形体比明十三陵的略小,但刻工精细,是清代石雕杰作。隆恩殿为重檐歇山顶,金碧交辉,殿身建在汉白玉砌成的巨大须弥座上,前有月台,中有铜鼎,两边有铜鹿、铜鹤,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杆。殿柱金龙盘绕,地面金砖烫蜡,明光如鉴。殿内有东西暖阁、佛阁,供奉顺治皇帝及皇后的神牌。明楼是全陵最高建筑,重檐歇山顶式,斜坡舒展,翼角翘飞,顺治帝的庙号、陵名用满、汉、蒙三种文字雕刻在楼内碑上。

景陵是康熙皇帝的陵墓,位于孝陵的东面偏南。顺治帝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于1661年正月即皇帝位,年号康熙,庙号圣祖,是清代入关后第二代皇帝,在位60年,内政外交均大有建树。康熙二十年(1681年)始建景陵,规模仅次于孝陵。位于孝陵西南胜水峪的是乾隆皇帝的裕陵。雍正皇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于1736年即位,年号乾隆,庙号高宗,是清入关后第四代皇帝。康熙死后传位给雍正帝,但雍正的陵墓并不在东陵,而营于易州(今河北易县),另建西陵,开

创了父子分葬的先例。乾隆皇帝就此制定了新的兆葬之制,大意是:“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内之圣水峪”,而后“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泽”,“至朕孙……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如此“分选东西……亿万斯年”。这就是所谓的清东陵、西陵兆葬之制。一个王朝的帝陵区分在两处,在历史上已有过,如西汉帝陵就分咸阳陵区和长安东南陵区。清乾隆帝以降,各帝也并未完全遵守“兆葬之制”,但封建帝王都择定风水宝地作茔域则是历代王朝的共同点。乾隆帝自1736年至1795年在位,到乾隆六十年(1796年)时,禅位给嘉庆皇帝,自己作了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病逝入葬。裕陵地宫因遭盗掘而真迹已露,成为继明十三陵后又一座经挖掘整理过的地下宫殿。

这是一座一帝两后三妃的坟墓,地宫石棺床上正中放着乾隆帝的棺槨,五位后妃棺槨分置左右。棺内充斥珍奇异宝,仅乾隆一柄九龙宝剑镶有的一块宝石就价值连城。地宫是石雕和石结构相结合的典型建筑物,一条隧道连着四道石门、三重堂券,全长54米,落空面积327平方米,建筑结构为拱券式。乾隆晚年崇信佛教,地宫四壁和券顶都布满与佛教有关的石雕石刻。8扇石门上各浮雕菩萨立像,每尊1.5米高,线条细腻,形态生动。在第一道石门洞的两侧壁上雕有四大天王坐像,俗称“四大金刚”,各持琵琶、宝剑、宝幡、宝塔,威武雄壮。在穿堂券的两壁雕刻着明镜、琵琶、涤香、水果、天衣,名为五供,寓佛教戒除五欲的涵意。在券顶和石门背后雕有轮、螺、伞、盖、花、结、鱼、瓶等八宝,象征吉祥如意。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宫内四壁和券顶都刻满了浮雕装饰和用藏文、梵文阴刻的经文,其中藏文29466字,梵文647字,字体刚劲端庄。以上八大菩萨、四大金刚、五供、八宝和佛经咒语以及装饰图案布局周密,浑然一体,没有杂乱无章之感,堪称石雕艺术宝库。精湛的技艺体现了劳动者的聪明智慧和卓绝的工艺水平,如此精雕细琢的地宫建筑是已打开的历代帝陵墓穴中绝无仅有的。

定陵是咸丰皇帝的陵墓,位于裕陵西的平安路。咸丰帝是道光皇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訢,1830年即位,次年改元咸丰,庙号文宗。咸丰之世,国事日坏,清兵疲懦,外祸尤烈,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重掠而归。咸丰帝逃难热河避暑山庄,次年死于“烟波致爽殿”。定陵没有圣德神功碑楼(大碑楼),按清制,凡帝王失尺寸国土者不立此碑,只以“神道碑”记载生平。自道光帝割让香港,以后外祸不断,所失日多,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帝皆无大碑楼,亦无华表。

惠陵是同治帝陵墓,位于景陵东南6公里许的双山峪。同治皇帝是咸丰帝的长子,1861年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同治,庙号穆宗。6岁登基,由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74年病死,年仅19岁。光绪五年(1879年)葬惠陵,无神道、石像生、大碑楼,规模较小。

东陵的四座皇后陵规制基本相似,其中慈禧太后定东陵最为突出,是全园现存建筑奢华、体系完备的一座皇后陵墓。慈禧姓叶赫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17岁进宫,咸丰六年(1856年)生同治皇帝,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实现垂帘听政,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她独揽朝政,恃权骄恣,生活腐化,终年74岁。定东陵早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修,直到入葬止。慈禧陵墓风格独特,精巧别致,耗资惊人,高达白银227万两。其中,以隆恩殿建筑工艺最为考究,殿内墙壁全是中间“五蝠捧寿”四角盘环万字不到头的雕砖图案,斗拱、梁坊、雕砖部位和天花板上的彩绘全部贴金。64根殿柱制作也极为精美,柱体嵌附有鍍金铜片制成的盘龙,金光闪烁,大殿的豪华仿佛黄金铸成,为陵墓建筑中所独有。殿前的龙凤彩石呈金凤戏龙图案,凤上龙下,与其他帝后的龙凤并列图案截然不同,以其图形美观、艺术精致成为石雕艺术中的珍品。在民国时被盗掘,解放后清整如旧。慈禧地宫进深24.81米,面积154平方米,规模虽不及裕陵地宫,但棺槨的装饰加工糜费惊人,随葬品包括种种珍奇瑰宝

不可胜数,直到封闭地宫的前夕,还不断填塞金银珠玉,奢华之极无与伦比。

清东陵在布局上的一个特例是大红门外东侧建有昭西陵。墓主是孝庄文皇后,顺治皇帝的生母,皇太极的妃子,后又改嫁其弟多尔衮,因有悖封建伦理,死后暂葬孝陵附近,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建陵,以位在关外皇太极“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

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清东陵,自清末至民国,地面建筑不断遭到破坏,裕陵、定东陵地宫也被多次盗掘,地宫内狼藉一片。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年修葺、整理,已逐渐恢复了原貌,并对外开放。

三、清西陵

在河北省易县城西约 15 公里的永宁山下,有一片与清东陵遥遥相对的帝王陵墓群,即清西陵。

(一) 西陵的兴建

易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北京西南 120 公里处。易水源出于太行山,境内多秀水青山,清西陵就选点立基在这山环水抱之中。

西陵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是清朝定鼎北京后第三代皇帝,即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死后,自 1722 年即位,年号“雍正”,庙号世宗。雍正陵址原选在东陵的九凤朝阳山,后来认为“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遂将其废掉。雍正八年命怡亲王会同精通风水的两江总督高其倬在京师西南一带山麓“采卜万年吉地”,最终选定在易州之西太平峪兴隆庄。同年八月十九日特派王公大臣等兴工营造。太平峪位于易州西 30 里,“山势来自太行,巍峨耸拔,脉秀力丰,峻岭崇山,远拱于外,灵岩翠岫,环卫其间,前白涧河旋绕,而清、寇、沙、滋诸水会之,后则拒马河萦流,而胡良、琉璃、大峪诸水会之,信天设之吉地也”(《畿辅通志·陵寝》)。雍正帝于 1735 年 8 月死于

圆明园,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正式入葬墓地,是为泰陵,乾隆帝“封太平峪为永宁山”。这座新陵区以后相继营建的帝陵还有清仁宗嘉庆皇帝的昌陵、清宣宗道光皇帝的慕陵、清德宗光绪皇帝的崇陵。整座西陵区总计14座陵墓,埋葬4位皇帝、9位皇后、57位妃嫔等76人。

(二) 陵园的建筑

总观西陵的布局与东陵大致相同,现存陵寝建筑千余间、石雕和石建筑百余座,是一个规模宏大、建筑精巧的帝王陵群。

在西陵4座帝陵中,建筑规模最大的是泰陵,处于西陵区的中心位置。凡西陵施工,取土烧瓦于易州管头邨、北河头邨,烧灰于房山县韩奇邨、涞水县檀山邨、易州琅山,采石于房山县卢家庄大石窝砂峪、易州鸭子沟。泰陵南北长2.5公里,陵的最南端是火焰牌楼,象征逢凶化吉,皇族兴旺。向北绕过一座小山是一座五孔石拱桥,横跨易水河上,全长87米、宽10米、拱高4.9米,造型如飞虹落地。沿神道往北是3座石牌坊,面南、面东、面西各一与北面的大红门相组合,恰似宽阔的四合院。大红门是西陵的总门,中间门洞称“神门”,专供皇帝梓宫通行,西门称“君门”,供后代帝王祭祀进出,东门称“臣门”供侍卫大臣们出入。通过大红门依次是具服殿、石平桥、圣德神功碑楼,碑楼是神道上的主要建筑,高26.05米,重檐九脊歇山式,黄瓦盖顶,内竖两通巨大的龟驮碑,刻写着满、蒙、汉3种文字,约5000字,内多溢美之辞,也不乏涉及当时政治、军事、礼俗等方面的可贵资料。距楼北数十米是七孔石拱桥,过桥有两排石象生和文臣武将,共5对。神道由此向北蜿蜒伸展,至龙凤门开始进入泰陵的宫殿区。隆恩殿内4根明柱贴金包裹,顶部有旋子彩画,梁枋装饰金线大点金,陈设有神主、宝座、五供、铜炉、蜡台、香亭,天花板上吊挂12盏满堂红灯,地面金砖烫蜡,豪华典雅。清西陵隆恩殿内大脊正中放置宝匣一个,铜质鎏金,内装蓝、绿、红、黄、白5色缎料各1尺,5色线团各1两,以及5

种香料、5种药材、5种杂粮各少许,以此表示祈福禳灾之意。沿大殿向北依次有祭台、方城、明楼、月牙城宝顶。

慕陵位于泰陵西南约6公里的龙泉峪,是嘉庆帝第二子,即爱新觉罗·旻宁的帝陵,1821年即皇帝位,年号道光,庙号宣宗。1840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向列强割地赔款,中国社会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国困民穷,但道光帝仍不惜民脂民膏大事营建陵墓。慕陵原建于东陵区,后因地宫积水,道光帝一怒之下全部拆毁重建于西陵,道光十二年(1832年)破土,十六年(1836年)完工,由于是拆迁改建,所耗白银,更多于其他帝陵,达240多万两。慕陵在清代帝陵中,规制较为简约,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楼、华表、石象生、方城、明楼等建筑。但是建筑作工精致,如隆恩殿、两配殿的梁柱全用金丝楠木,不饰彩绘,呈天然本色,在木雕设计上独具特色,凡天花藻井、梁枋、雀替,乃至隔扇、门窗上都雕刻云纹、游龙蟠龙状,群龙张口鼓腮、喷云吐雾,似“万龙聚合,龙口喷香”一般,形象生动,殿内楠木香气四溢。慕陵的围墙也不同他陵,系“磨砖对缝,干摆灌浆”,不涂红、不上灰,墙顶覆以黄琉璃瓦,墙体随山势起伏,拥殿亭、宝顶于怀抱之中,显得格外严谨、肃穆。慕陵的特点是古代陵墓建筑中少见的。

西陵的后陵、妃园寝都在帝陵附近与东陵相同,后陵的主要建筑也有石拱桥、朝房、班房、灯炉、神厨库、隆恩殿、祭台、方城、明楼、宝顶、地宫等。妃园寝大多数没有明楼、宝顶,坟丘状如圆柱形的砖垛子,封建等级差别十分明显。

清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朝,陵园整体布局更加成熟,在建筑格局上,突出以皇帝为中心,每座帝陵都由帝陵、后陵、妃陵构成。生前陪王伴驾的皇后、贵妃,死后建陵仍要以帝陵为中心,一般都位于帝陵之侧,且以帝陵命名,如顺治帝陵名孝陵,孝惠章皇后和端顺妃等7人,则葬在孝陵东侧附近,故名孝东陵。在建筑规制上也是突出帝陵,如帝陵的隆恩殿、明楼等殿堂及陵园围墙都覆盖黄色琉璃瓦,而

妃陵则用绿色琉璃瓦。在建筑规模上,突出祖陵是又一个特点,东陵最早的帝陵是入关第一代皇帝顺治的孝陵,故东陵的中心是孝陵。史称“康乾盛世”的康熙、乾隆两帝虽处于清王朝国势强大的时代,但其帝陵规模未超越孝陵,并裁撤了石碑坊、更衣殿、龙凤门,石象生数量少,神道也是从孝陵神道分出的,体现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三) 陵寝管理制度

从维护皇帝权威、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清政府为保护帝陵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设置了专职官吏,制定了各项制度。据《清史稿·职官》记载,直接参与帝陵管理的机构有内务府、工部、兵部。同时,又委派辅国公、镇国公代表皇室负责护陵。辅国公、镇国公都是宗室中爵位很高的大臣,有权直接向皇帝上疏陈述有关陵区的事宜。东陵、西陵又设内务府衙门、礼部衙门、工部衙门、兵部衙门,分工负责行政、司法、祭祀、施工等事项。

专职陵寝官,在关外,设三陵总理事务大臣一人,由盛京将军兼充。永陵、福陵、昭陵各设掌关防官一人。东陵,设总管大臣一人,由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西陵设总管大臣一人,也由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各个帝陵分设内务府掌关防郎中或内务府总管一人。除这些主要职官之外,各衙门、各陵寝还有许多大小职官各司其事。《清史稿·职官》:“总管大臣掌督帅官兵巡防游徼,以翊卫陵寝。内务府官掌奉祭祀奠享之礼,司扫除开阖。礼部官掌判署文案,监视礼仪,岁供品物,以序祀事。工部官掌修葺缮治,凡祭祀供厥楮币。”日常细微事务有大量差役办理,每座帝陵从事勤杂的有牛羊吏2人、挤奶人2人、以及扫院人、磨面人、打果人、酱匠、酒匠、糖匠、校厨、粉匠、屠户、果户、陵树户、油匠等。《钦定大清会典》还记载了清廷许多保护帝陵的措施,规定:于陵寝围墙外,环周立红桩为界,禁止樵采耕种。距红桩40步设白桩,又于白桩10里外设青桩,上悬禁牌,令军民人等不得于青桩内取土取石,设窑烧炭,违者论罪。为了防止火

灾,陵区还开辟了火道,如东陵昌瑞山后的火道约 60 多公里,并派兵防范,以免野火蔓延陵内。陵区树木与风水地脉有关,故严禁破坏滥伐,对直接破坏陵墓建筑者更严加惩处,道光年间有人偷窃裕陵琉璃门铜帽钉,政府以“实属胆大藐法”,立决斩首。

对于陵内建筑的维修、清整也有相应规定,如维修建筑不得“改饰”,同治年间给慕陵隆恩殿梁柱加漆,因“颜色过深”,“未能与旧相符”,皇帝责令“赔修,将厚漆刷去,另罩薄漆,以复旧规”,并派“验收大臣”监督执行。定时栽种仪树也是一项维护帝陵的重要措施,规定:陵寝栽树每间隔两丈树一株,对旧有枯树,则实行补栽,以 3 年或 5 年为限补足。特别隆恩门以后及两旁树株,因近宝城围墙,故年年要将树木“注册”,5 年奏报一次“所记之数”。陵寝内多植松柏,每于春或冬栽种,此事“专派大员经理以昭慎重”,务使陵区“围墙内山树、仪树俱皆茂盛。”

以武装守卫陵寝是最重要的保护措施。由兵部衙门统辖八旗营房、绿营兵弁负责防卫陵寝,人数多至数千名,由将官、骑兵、步兵组成。凡陵寝地界以内,都有八旗兵、绿营兵“互相稽查”,附近各隘口、关口并添官兵“互相巡缉”,戒备森严。政府给守陵官兵分配“差地”,让其收取地租。同时,每年还要拨出大量金银俸禄和米粮,这是清廷财政上的一项重大支出。

清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陵墓群,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和明十三陵一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裕陵、慈禧定东陵、慈安陵、裕陵地宫、定东陵地宫都已对外开放,成为名闻中外的游览胜地。

燕赵大地上一座座帝王陵墓就是一处处内涵丰富的“地下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沉积,无论地面上的宏伟建筑,还是地宫宝库,都凝结着中国人民无穷的智慧 and 血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第十章 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发展与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留下的遗迹,构成燕赵宗教文化的主体,在燕赵地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燕赵宗教文化内容丰富,颇具特色,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杰出部分。

燕赵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宗教文化中的民族特色颇为突出。蒙古族、回族在进入燕赵的同时,将本民族的宗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带到了燕赵。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的传入,使燕赵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采。

宗教异于政治,但宗教的发生与发展又与政治密不可分。十六国时期佛教在燕赵的迅速传播与发展,首先是石虎、石勒等最高统治者和士家大族们鼎力支持的结果。天师道自其产生之日,便被奉为北魏国教,成为北魏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新道教产生后,得到蒙古统治者的垂青。借重蒙古统治者的权势,新道教将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顶峰。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燕赵地区,至清代,已有较广泛的传播。建于承德的外八庙等,便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明证。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无不与燕赵成为全国统治中心有密切关系。历代王朝多次定都燕赵大地,使燕赵的宗教文化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

彩。

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与传播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寺庙、宫观、塔院、经幢、石刻、壁画、塑像等,作为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由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历史久远,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燕赵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道 教

一、道教的起源与原始道教——太平道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巫术。战国时,燕齐出现神仙方士,邹衍创阴阳五行说,在北方影响很大。战国末年,燕齐出现神仙方术家,《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东汉顺帝时,“琅邪宫崇(一作嵩)诣阙,上其师干(一作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此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后汉书·襄楷传》)。原始道教的经典开始在燕赵出现。东汉末年,在吸收了神仙思想、五行思想、谶纬思想后,原始道教正式出现,燕赵成为原始道教的一个发祥地。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张角(?—184年),尊奉《太平经》,在熹平年间创立太平道。《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创立后,张角派出八大弟子到四方去“以善道教化”,太平

道发展很快,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卷五八)。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张角便利用太平道组织农民起义。他利用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起义口号,于中平元年(184年)起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发生分化,一部分教徒仍以符水疗疾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被称为符水派;另一部分人主张炼丹修行,被称为金丹派,曹操统一北方,将郗俭等道士集中到邺,笼络收买,软硬兼施,强迫就范。燕赵地区原始道教传播转入秘密方式。

二、寇谦之与天师道

北魏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对早期道教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作了一系列改革,经过寇谦之改革的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寇谦之(365—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属县)人。早年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信奉五斗米道。神瑞二年(415年),自称得太上老君神谕,授他“天师之位”,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命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倡导“礼度”,礼拜炼丹,并糅入儒家“佐国扶民”思想,使新道教与封建礼教结合起来。在冀州大族崔浩的帮助下,寇谦之引儒入道,儒道结合,创立新天师道。天师道还模仿佛教立坛宇,注重斋醮科仪,讲究修行,求积功德。新天师道帮助北魏拓跋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受到北魏太武帝的极大尊崇。太武帝在魏都平城特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魏书·释老志》)。寇谦之被尊为国师,北天师道成

为北魏国教,在幽冀诸州迅速发展起来。

武定六年(548年),北齐高澄以道士伪滥,始罢邺城南郊道坛。天保六年(555年)八月,高洋在邺,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天师道遭到惨重打击,燕赵道教暂时衰落下去。

三、新道教三大派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一些知识分子利用当地民族矛盾的加剧和离乱纷争中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精神无所依托的情况,创立了全真、大道、太一等三个道教新宗派,把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高峰。

(一) 全真教

金代初年,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主张三教合一。不尚符篆,不事黄白之术,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全真教创立后,发展很快。据《重修玉清万寿宫碑》记载,全真教“实倡金正隆、大定,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势如风火”。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20年),全真教龙门派首领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十九年(1224年)回到北京。成吉思汗在宫内建万安宫赏赐给他,并将他暂住的天长观改为长春宫,下旨由丘长春统辖全体道士,掌管道教的一切事务。全真教在燕赵大地迅速发展起来。《长春宫碑铭》载:“长春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及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带黄冠,而持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于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正大四年(1227年),丘长春去世,葬于白云观内丘祖殿。

元朝初年,由于全真教宣扬“老子化胡”说,引起僧徒不满,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年)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教惨败。宪宗召令全真道归还侵占寺院200余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僧道再辩,全真教再次失败,失

去蒙古统治者支持后,全真教由盛转衰。清顺治时,白云观方丈龙门派王常月被封为国师,康熙皈依于王的门下。全真道中的龙门派再次中兴。王常月普度众生,传道放戒主持白云观 20 余年,扩建宫观,整肃道门,严行清规戒律,住观道士常达二三百人,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康熙以后,全真教逐渐衰落下去。

(二) 大道教

大道教是金元时期刘德仁所创道教教派,刘德仁(1122—1180年),号无忧子。祖籍沧州乐陵(今山东聊城西南),后徙居盐山(今河北属县)。早年丧父,家境贫困。21岁时,自称遇一白发老叟,授以“道德经真言”(一称“玄妙道诀”),开始传道。初传教时,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一时信者甚众,自称大道教。金大定元年(1161年),刘德仁奉诏入京,得东岳真人赐号,住于天长观。五传至怀来县人酈希成(诚),受到元宪宗蒙哥召见,被赐太玄真人名号,在北京南城建天宝宫道观。大道教被赐名为“真大道教”。

真大道教不讲飞升化炼之术,不尚符箓,不化缘乞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敬侈于己”(《元史·释老传》)。此教以《道德经》为宗旨,同时吸取儒、释思想。自刘德仁起,便订戒条九则:“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运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宋学士文集·书刘真人集》)九条戒律既迎合统治者要百姓安份守己的愿望,又符合劳动人民希望摆脱战争苦难的心理,充分体现了金代燕赵地区的历史特点。

金人统治燕赵,人民饱尝战争之苦。真大道教的教义深合民心,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于郡

县。元初兴盛时,奉其教者,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大道教已远远超出燕赵之域,发展成为全国性宗教。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大道教内部发生内讧,元泰定(1324—1327年)年间便销声匿迹了。

(三) 太 一 教

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元史·释老传》),创立太一教。太一之祠,起源极其古老。以太一作教名,则从萧抱珍开始。《元史·释老传》称太一教之名源于“太一三元法箓之术”,《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为太一之含义,太一教之教理源出于此,太一三元法箓则是与太一教教理相应的传教方法,它体现了太一教极重符箓法物的传教特点。

萧抱珍创教之初,“郡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天眷初,其法大行”^①。萧抱珍弟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侯澄,深得其师之法,在赵州真定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其子侯元仙继承父业,死后火葬时,送葬者几万人。太一教第二祖被金世祖召至燕京,任天长观住持,不满一月,太一教徒在天长观内已容纳不下,不得不挤在观外。金末元初,北方动荡,人们纷纷信奉太一教。六祖萧全佑在大都与文人名士密切交往,颇有声誉,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赐以承化纯一真人名号。太一教势力迅速发展,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哈刺和林,几乎遍及整个江北地区。

太一教以老子思想为教旨,认为“弱者道之用”,又倡导人伦品行,笃守孝道。太一教与全真教、大道教的不同,便在于太一教极重符箓,以巫覡之术御世。因此,传至第七祖以后,太一教逐渐与正一派

^① 《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引自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12页。

合流。

四、名山、宫观、经幢

道教名山、宫观、经幢,是道教发展传播的历史见证。道教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在燕赵有着广泛影响,因此,道教宫观、名山、经幢等遍布燕赵大地。

(一) 北岳恒山

道教徒的信仰之一便是得道成真,出世成仙。神仙所居世界,便谓洞天福地,河北省曲阳县恒山被称为“第五小洞天”。《道藏辑要·岳渎名山记》载:北岳住有岳神安天王,领仙官、玉女几万人治理此地。《恒山志》载,西汉名士茅盈18岁(前127年)在恒山修道,返家后隐居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被尊为茅山派祖师。被传为八仙之一的张果(亦称张果老)也曾修道恒山。清顺治中,祭北岳恒山之地才改为山西浑源县。在恒山上,存有纯阳宫、九天宫、白云洞、果老岭、望仙亭、会仙府等道教遗迹,这些遗迹现已成为北岳恒山的著名景点。

(二) 宫 观

宫观为道士修道、祀神、举行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太平道称为“茅室”、“幽室”、“精舍”、“靖舍”等,五斗米道则称为“静室”、“靖”、“草屋”等。唐初称观,唐宋以后,道教“宫观”之称基本定型。金元以后,全真派融合三教,亦称其修道场所为“庵”、“堂”。

燕赵大地的道教宫观,隋代以前所建基本已不存在。唐代崇尚道教,在燕赵兴建天长观(北京)、开元观(河北邢台市)、龙兴观(河北易县)、天庆观(河北定州市)等重要道观。宋代,燕赵建有总玄观(河北曲阳)、九峻观(河北唐县)、北极层观(河北安新)、清虚观(河北栾城)等。金元时期,新道教宫观遍布燕赵,全真教官观占十之七八,长春宫

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全真教宫观。大道教在大都(今北京市)南城建有天宝观、玉谷观,在平谷(今北京属县)建延祥观,在房山(今北京)建隆阳观。太一教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建太清观、真定(今河北正定)建迎祥观。元明清时期,新道教与正一派在燕赵建有许多道观,现存道观大多为明清建筑。在众多道观中,北京白云观是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坐落于北京西便门外,是全国著名道观,启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当时称作天长观。十二世纪金军攻取燕京,此观被毁,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重建,先后称为“十方大天长观”、“太极宫”。元代改称“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白云观。

白云观建筑格局以八卦方位布局,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南朝北,主要殿堂位居中路,东西两路对称安排四合院落。中路主要建筑入山门分为五进,有灵官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山门有三洞,象征天神、地祇、人鬼三界,走入山门,意味跳出三界,步入仙境。白云殿中心建筑为丘祖殿,殿堂下埋葬丘处机的遗骨,道教称为“仙蜕”。七真殿,供奉着王喆和其七大弟子。最北端的双层楼阁,上层为三清阁,下层为四御殿。三清阁供奉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殿内设经坛和各种法器、经书,每逢重要祀典,要在这里做隆重道场。四御殿东有“抱元洞府”,西是“会仙福地”,均为道士修炼之处。其中元长殿又叫六十甲子堂,殿内奉祀道教六十位星宿神,诸神以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每年有一神值宿,60年一轮。白云观的山门殿堂、亭台楼阁、园庭回廊,都充分体现了道教思想。全真派实行丛林制度,道众共聚一处,推选贤者管理。全真派重要传人丘处机、王常月都常住于白云观,死后皆葬于白云观,因此,白云观被尊为天下第一丛林。

(三) 经 幢

燕赵之域所存道教经幢有邢台道德经幢和易县道德经幢,易县

道德经幢最为著名。

唐代,玄宗崇尚道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亲注老子《道德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龙角山记·唐明皇诏下庆唐观》),并命各州县镌刻道德经幢,供人颂读。易县与邢台的道德经幢便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易州刺史兼高阳军史田仁琬奉玄宗之命,在易州开元观督建道德经幢,并请当时大书法家苏灵芝书丹,镌刻唐玄宗的《道德经》注本,这便是著名的“易县唐玄宗注道德经石幢”。经幢位于易县城内龙兴观旧址,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幢座为一石雕仰莲,幢身为汉白玉雕造而成,竖立仰莲幢座之上为八角形柱体,主要雕刻为唐玄宗注《道德经》。幢体上为一莲宝盖,其上为幢顶,呈屋顶状,八角形,用一巨大青石雕成,雕有脊、瓦垅、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斗拱承托。造型简朴,典雅美观。

易县道德经幢是全国保存较好、形体较大的道德经幢,它对校译老子《道德经》,研究唐代道教及其有关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邢台道德经幢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邢州刺史李质遂所立。“文革”时期遭破坏,现仅存两块幢体,字迹清晰可辨,存于邢台市南长街办事处后院内。

第二节 佛 教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燕赵有广泛影响。中国佛教的诸多流派如成实、涅槃、毗昙、净土、律宗、禅宗、华严宗等在燕赵均有流传。成群的佛寺,高耸的佛塔,是佛教文化在燕赵大地广为流传的历史见证。

一、佛教在燕赵的传播

(一) 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邺城,受到石勒、石虎尊崇,佛教自此开始在燕赵大规模传播,“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佛图澄前后门人近万人,所历州郡,兴建佛寺 893 处,邺城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

佛教传入不久,燕赵便出现两位著名僧人。道安(312—385 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市)人,佛图澄弟子。道安一生总结前人译经,撰写《经录》,为佛教寺庙定立規制,划一僧人姓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竺道生(355—434 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曾游学庐山,受业于僧伽提婆门下,后入长安,拜鸠摩罗什为师。竺道生一生翻译、著述颇多,他所提出的“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影响长达数百年。

东魏北齐时,佛教传播很快。不仅帝王信佛,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河间邢氏、勃海刁氏等世家大族也都信奉佛教,南北响堂寺、雀离佛寺等著名寺院相继建立。据《大唐内典录·历代三宝记》所载,邺城内寺观达 4000 所,僧尼 8 万人,佛教极盛一时。

(二) 隋唐佛教与临济宗的创立

隋唐时期,燕赵佛教发展较快。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 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京师、并州、相州等地“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隋书·经籍志》)。唐代,燕赵佛教继续发展,各宗各派,名目繁多。唐朝后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不久南派又分为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始创

于燕赵。

慧能六传弟子义玄,受法于洪州黄檗山希运,唐大中八年(854年),他来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在滹沱河边建立临济院,广接徒众,创立临济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圆寂,敕谥慧照禅师。慧然辑录他的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简称《临济录》。

临济宗“应机”多用“棒”与“喝”,棒打喝斥成为其交流某种道理的中介,时称“棒喝”。义玄接引学人,有三玄、三要、四料简之法。三玄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三要与三玄配合,指示言说不失本宗的要点。义玄把三要三玄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得意记言”。“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为四料简,意思是说义玄的言说全在临机发挥,没有定规,但并不因此迷失本宗。义玄的宗旨,便是打破一切枷锁,他认为,佛即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则是所思所行“处处无碍”。因此,真正的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义玄号召“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禅宗反对偶像,轻视教条的风气,至此达到顶端。

因临济宗不需要繁琐经典,也无须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流传日广,元、明、清时期,临济宗以绝对优势在汉地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南宋时,临济宗传入日本,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藏传佛教

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藏,此后,佛教与西藏地方宗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时期,蒙古军进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却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天下释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自开平迁都燕京,于中央设总制

院,以“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任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佛教秘密戒,正式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后妃、皇子和诸王、贵戚等接踵灌顶受戒。1269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忽必烈在燕京称帝后,更加热情地扶植藏传佛教,在大都、中都开平、上都和林等地,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八思巴在大都举行盛大法会,藏传佛教在燕赵地区迅速传播。

明代,皇室提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继续发展。永乐晚年,“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武宗、神宗之世,尤宠藏僧,京师诸寺法王至禅师 437 人,喇嘛诸僧 789 人,亲近武宗的番僧与权贵结成一伙,以兴佛寺,“璫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指北京)城十之一二”(《广志绎》)。

十六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最大教派格鲁派(又称黄教)开始在燕赵北部的蒙古地区传播,蒙古土默特俺答汗首先皈依黄教,在库库和屯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供奉八宝装饰佛像的甘珠尔庙,内蒙古出现第一座黄教寺庙。此后,著名的黄教寺庙大召寺、席力图召等在呼和浩特相继建成,呼和浩特成为明末清初黄教传播中心。万历十五年(1587年),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从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图门汗长孙林丹汗等信仰藏传佛教,在察哈尔部建立许多藏传佛教寺庙。十七世纪初,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清奠都北京后为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尤重喇嘛教,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之约来北京,受到顺治帝优厚礼遇,并得顺治所赐金册金印与封号,此后北京地区的喇嘛越来越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迎接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政府,在蒙古故地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清圣祖组织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内外喀尔喀 12 部参加会盟,为尊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在多伦诺尔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多伦

诺尔很快发展成喀尔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圣祖召一世章嘉到北京,驻锡法源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来到北京,清高宗先在承德避暑山庄淡泊诚敬殿和万树园等地设宴隆重欢迎,后回京在南苑德寿寺亲切接见。六世班禅在京驻锡西黄寺,在那里传经说法。顺治至乾隆诸帝时期,漠南蒙古多伦诺尔、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地新建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敕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封号。到清末,漠南蒙古“旗旗有庙”,藏传佛教寺庙达千所之多。藏传佛教成为燕赵最有影响的宗教教派。

二、佛寺、佛塔

(一) 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活动场所,它既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也是传播的载体。佛寺建筑需耗费巨大资财,除佛教徒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建寺外,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统治或宗教的目的,也在佛寺建筑上投入巨大的财力。燕赵佛教寺院体现了燕赵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基本内容。

1. 五台山寺庙群

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它和峨眉、九华、普陀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北魏孝文帝时,五台山修建了大孚灵鹫寺,清凉寺、佛光寺、观海寺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成。此后北齐、隋唐到明清,五台山寺庙屡有修建,形成庞大的五台山寺庙群。台内现存寺庙37处,各寺建筑壮丽,雕刻精美,壁画彩塑到处可见。五台山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唐时已声名远播,中唐时五台山图传到日本,后又传到敦煌,画进了敦煌壁画。唐宋以后,日本、印尼、尼泊尔等国僧人与五台山均有来往。

现存五台山寺庙群的分布,台怀中心区有显通寺、塔院寺、罗睺寺、万佛寺、广仁寺、善财洞、黛螺顶、文殊寺、灵应寺、普化寺、圆照寺、菩萨顶、三塔寺、殊像寺、广宗寺、三泉寺、寿宁寺、慈福寺;台怀北部有碧山寺、集福寺、七佛寺、广华寺、普寿寺;台怀南部有南山寺(包括极乐寺、善德堂、佑国寺)、万佛洞、镇海寺、观音洞、龙泉寺、金阁寺、古佛寺、海会庵、普济寺、台麓寺、千佛洞等。在这些寺庙中,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罗睺寺、金阁寺最为著名。

显通寺位于灵鹫峰脚下,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时称大孚灵鹫寺。唐武则天时更名大华严寺,明太祖时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清时重修,形成现今规模。寺宇面积8万平方米,各种建筑400余间,中轴线上有7座大殿,自南向北依次为观音殿、文殊殿、大佛殿、七处九会殿、千钵殿、铜殿和藏经殿。七处九会殿为一座砖结构建筑物,取释迦佛曾经于七处讲经九次之意而命名。因殿内供铜铸毗卢佛圣像,又称无量殿。此殿型制奇特,宏伟壮观,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位于中轴线后部的铜殿是一座罕见的青铜建筑物,为明万历年间妙峰祖师所铸。妙峰曾以舌尖之血和着朱砂书写《华严经》,万历皇帝的母亲拜其为师。此殿面阔三间,高不足5米,小巧精致,重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为一室。上层4面,各装6块格扇;下层4面,各装8块格扇。格扇内壁铸有铜像,重重叠叠,号为万佛,格扇外壁铸有花卉图案,非常精美。殿内供文殊菩萨铜像,连同殿壁佛像,共称为万佛朝文殊。大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寺庙,它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誉。

菩萨顶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宣讲道法,成道修道时就住在菩萨顶。此寺始创于北魏孝文帝时,历代重修。明永乐年间,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蒋全曲尔将黄教传入五台山。永乐以后,蒙藏教徒进驻五台,大喇嘛住在菩萨顶,菩萨顶成为著名黄庙。康熙、乾隆几次朝拜五台

山,都住在菩萨顶。此寺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形制、手法及雕刻装绘多参照皇宫宫式制度营造,金碧辉煌,极为华丽,是五台山清代佛寺建筑的典型。

罗睺寺在显通寺东,始建于唐,据《清凉山志》载,唐时张天觉在此见灯,有感而建寺。因相传文殊菩萨经常在这里讲经说法,故寺院落成后,名为“落佛寺”。明万历年间,李彦妃为祈子登基许过愿,以巨款重建寺院。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推重喇嘛,多次修饰罗睺寺,遂成为五台著名黄庙。罗睺寺内第一层殿为天王殿,殿内四大天王的塑制不同于青庙踏八怪的形象。西方广目天王的脸不是红色,而是棕色;不是手执绢索,而是一手抓长蛇,一手握宝珠。北方多闻天王的脸不是绿色,而是黄色;不是手执宝幢,而是一手攥老鼠,一手拿巨伞。这些均是按喇嘛教《度量经》的规定塑造。第二层殿文殊殿内的文殊塑像也与青庙不同;文殊菩萨的坐狮不在砖台或地面,而是卧在莲台上;文殊面容不是金色,而是白色;两肩膀上添了肩花,肩上一边放置智慧剑,一边放经书。这种塑法和着彩,体现了喇嘛庙文殊菩萨的一般特征。第三层殿为大佛殿,殿内三世佛及八大供养菩萨,也是按喇嘛教《度量经》的规矩塑制。

金阁寺座落于台怀西南金阁岭上,始建于唐。唐代宗命不空和尚建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饰佛阁为金阁,因名金阁寺。金阁寺内有高达 17.7 米的千手观音像,为五台山第一大佛像。观音两侧有二十四诸天环侍。千手观音殿是金阁寺主体建筑,也是五台山佛教寺庙中的大型建筑之一。

塔院寺原为显通寺塔院,以院内舍利塔而出名,人们常将此塔作为五台山的标志。

在五台山之外,五台县尚有两座著名寺庙:佛光寺与南禅寺。佛光寺座落于豆村以北莲花山中,据唐著《古清凉传》,它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隋唐时寺名远播,直到长安、敦煌乃至日本。《高僧传》、《法

苑珠林》等佛教经籍均有记载。唐武宗灭佛,殿宇几乎全毁。唐宣宗继位后再兴佛法,愿诚和尚重建寺宇。宋元明清都曾重修。历代名僧如解脱、法照等,曾在寺内讲经说法。寺内现存北魏祖师禅塔、唐建大佛殿、金建文殊殿、唐制经幢等重要佛教遗物。唐建大佛殿设计科学,气势宏伟,规模宏大,是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的杰出代表作。大佛殿荟萃各种艺术于一处,堪称国之瑰宝。梁思成先生将大佛殿的木构、泥塑、壁画、墨迹称为“四绝”。南禅寺座落于李家庄西侧土丘上,始建年代不详,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重建。此寺内唐建大佛殿,是东亚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在佛寺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华严寺与善化寺

大同市的华严寺和善化寺,是辽金时期的大型佛教寺院,寺院内至今保存着辽金建筑,在佛教文化史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华严寺在大同市西部,是辽金时代佛教华严宗的重要寺庙之一。华严宗形成于隋初,兴起于唐代,唐德宗门师澄观,39岁后住在五台山华严寺,主讲《华严经》,使华严宗势力发展到高峰。唐武宗灭佛,华严宗衰微。辽代,华严宗再次兴起,辽道宗亲撰《华严经随品赞》10卷,在大同西郊建此华严寺。现存华严寺分为上下二寺,上寺主要建筑为金代遗构大雄宝殿,下寺主要建筑为辽代遗构薄伽教藏殿。因受契丹建国前流行的原始萨满教的影响,全寺主要殿宇均面朝东方。大雄宝殿是国内所存辽金时期最大佛殿之一。殿内布满壁画,面积之大、色泽之鲜艳,颇为罕见。薄伽教藏殿是一座存放藏经的大殿。辽从兴宗时起,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用汉族文字雕印,通称丹藏。据华严寺金朝碑记载,辽兴宗时校正的藏经有579帙。薄伽教藏殿所保存的辽代木建筑和梁枋彩画、彩塑佛像、藏经柜等,十分珍贵。

善化寺在大同城南门,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称开元寺。五代时改名大普恩寺。辽时寺庙主体毁于战火。金天会六年(1128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主持和尚圆满主持重修寺庙。该寺面积约1.5万平

方米,中轴线上主殿为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东西两侧有文殊阁和普贤阁,全寺布局尚有唐代风格。三圣殿供奉毗卢遮那佛、文殊、普贤,合称“华严三圣”。三圣殿结构糅合宋辽建筑特点,为金初代表性木构建筑。天王殿实为山门,结构独特,前后檐柱各用6柱,共18柱,梁上还吸收了南方建筑工艺,使用月架式构件,砍削规整,形制美观。天王殿是国内现存金代佛寺中最大的一座山门。大雄宝殿是辽代遗构,金代重修,天王殿、三圣殿均为金代建筑。善化寺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辽金寺院,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3. 河北正定隆兴寺

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原名龙藏寺,至今寺内还保存有完整的龙藏寺碑一通,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宋初更名为龙兴寺,清康熙初定名为隆兴寺,因寺内有一尊全国驰名的大佛像,又称大佛寺。全寺占地约5万平方米,是全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庙建筑群。

隆兴寺内现存建筑有天王殿、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以及隋、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碑刻30多通。天王殿、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阁为宋代建筑。摩尼殿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平面呈十字形的大型佛殿,其梁架结构与《营造法式》相符,整殿建筑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点与风格,立体结构富于变化,形制颇为特殊,在同类建筑中实属罕见。转轮藏阁内的“转轮藏”在柱子布局和梁架结构上作了特殊处理,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大悲阁内的铜菩萨又称千手千眼观音,通高22米,42臂,是全国现存最大铜菩萨。隆兴寺以其丰富的佛教文物与建筑,在中国佛教文化史、艺术史、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 天津蓟县独乐寺

蓟县独乐寺,始建于唐,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寺内主体建筑为山门和观音阁。山门的屋顶为五脊四坡式,是全国现存最早的

庑殿顶山门。观音阁是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建筑。建造后经历了多次强烈地震,观音阁建筑设计的抗震性能独特,是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

5. 北京寺庙

辽、金、元、明、清封建统治者定都北京,北京的佛寺建筑非常发达。据1929年调查,当时北京城郊存有佛寺1074所,其中临济宗249所,贤首宗61所,南山宗45所,曹洞宗52所,莲宗11所,法相宗6所,菩萨宗2所,贾菩萨宗1所,龙池宗1所,云门宗1所,华山宗1所,喇嘛庙41所,其余或为民庙,或为无宗派庙。在众多寺庙中,云居寺、雍和宫最为著名。

云居寺的始建年代,一说为北齐,一说为唐贞观五年(631年)。寺内有两大奇珍,一是佛舍利,二是石刻藏经。根据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寺内达观和尚率僧人清理石经版,在藏经洞内发现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置放于函内的佛舍利三粒。“发视际,异香发于函,盖石、银、金函三发,而得小金瓶,舍粒现矣。状黍米,色紫红”(《帝京景物略·畿辅名迹》)。后将舍利子放回,“安置故处”。所载明代舍利子在1981年找到两粒,1987年公诸于世。云居寺石经,建国后在该寺石经山藏经洞内出土。寺内现藏10082片,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石经保存了1200余卷写经刻本,证实了辽刻石经就是《契丹经》刻本,实为“国之重宝”。云居寺因其舍利和石经,在中国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早古刹,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时名悯忠寺,辽清宁三年(1057年)因地震倒塌而重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修,赐名法源寺。法源寺内建筑群布局严谨,空间多变,总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寺庙格局的特点。戒台寺内的戒台为明代所建,是全国著名戒坛。

位于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据说是北京最早的寺庙,燕人谚语说:

“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此寺从唐至清历经改建,规模宏伟。寺内遗物对研究佛教和古建筑很有价值。

雍和宫位于北京东城区,原为雍正帝当皇子时的官邸。乾隆九年(1744年),为给雍正帝超度灵魂,同时吸引蒙藏地区的喇嘛教信徒,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主要建筑有影壁、牌楼、山门、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法轮殿位于雍和宫第四进院内中轴线上,平面呈十字形,黄琉璃瓦,大式歇山顶,中间顶部设五小阁,阁上各建一座小喇嘛塔。形成以汉族传统宫殿加西藏宗教式装饰的独特风格。殿内供奉15米多高的大型宗喀巴铜像。像背后是用檀香木雕刻而成被誉为雍和宫三绝之一的五百罗汉山,殿内存放的大藏经和续藏经,是用藏文书写的两部重要佛教经典。万福阁位于中轴线最北端,阁三层,高30余米。阁内矗放着一尊高26米(地下8米)的木雕弥勒站像,雕造于乾隆年间。七世达赖为感谢乾隆帝的支持,将廓尔喀国(今尼泊尔)国王从印度运来的一棵巨大的白檀树买下,从西藏运到雍和宫。在察汉达尔罕喇嘛的设计指导下,由汉藏工匠一起雕造成大佛。此佛形态端庄、慈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6. 承德外八庙

外八庙是指环列于承德避暑山庄东部和北部山坡上的八座寺庙。八庙有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象寺、溥善寺。溥善寺现已不存。外八庙是自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陆续修建而成。八座寺庙有朝廷派驻喇嘛,由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发放银饷,又位于京师之外,故称“外八庙”。外八庙的建造目的是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宗教信仰,通过建造佛寺密切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外八庙的建筑融合了汉藏建筑特点,是当时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

普宁寺又名大佛寺。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蒙古准

噶尔部达瓦齐汗叛乱,乾隆在避暑山庄宴请厄鲁特四部,分封爵位,取普天安宁之意,建普宁寺。庙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一般佛寺的伽蓝式布局,有山门、碑亭、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后半部是在9米多高的台上建筑的藏式庙宇,布局为曼荼罗式(曼荼罗即喇嘛教对宇宙形象的一种认识)。大乘阁为主要建筑,围绕此阁建造的有日殿、月殿和象征着所谓“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藏族的建筑特点。大乘阁的式样仿照西藏三摩耶庙的乌策殿,全用木结构,气势雄伟,是中国寺庙建筑艺术的杰作。阁内空井置千手千眼菩萨立像,高21.85米,莲花座高2.2米。金漆木雕,有42只手,本身两只手作合掌状,其余40只手各拿法器,为我国著名的木雕大佛。寺庙碑林内存三通乾隆御制石碑,记述了普宁寺的修造经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溥仁寺修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外八庙中修建最早的一座。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康熙60岁生日时,蒙古各部王公大臣到山庄祝贺,为纪念盛况,康熙下令修建溥仁寺。寺内原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东西配殿、正殿、后殿,现存建筑为正殿和后殿,建筑平面布局和建筑造型均为汉族寺庙形式。正殿内供奉的三世佛与二侍者以及东西两侧的十八罗汉,都是用贵重的髹漆夹纆造,艺术价值较高。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为安抚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达什达瓦部,同时满足蒙古其他各部首领朝觐时宗教活动的需要,命仿伊犁河北岸固尔扎庙之制,建安远庙,故此庙又称伊犁庙。庙内主体建筑为普渡殿,殿上檐建筑形制特别,在古代阁楼建筑中非常罕见。屋脊满饰花纹,正吻和合角吻作花丛状,正脊中部置三个铃状喇嘛塔,使整个殿顶极富特色。

普乐寺始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修建此寺目的,是为团结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布鲁特各族上层人物,以加强中

央集权。寺内主要建筑由前至后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配殿、宗印殿、群房、闍城、旭光阁。从山门至宗印殿,是典型的汉族寺庙传统建筑手法;后部群房(已无存)、闍城、旭光阁组成喇嘛教特有建筑。普乐寺前部主要建筑为宗印殿,后部主要建筑为闍城和旭光阁,闍城即坛城,为喇嘛教传法之处。以闍城形式建成的寺庙,普乐寺是中国仅有的实例,在宗教与建筑上都有重要价值。闍城正中是普乐寺主体建筑旭光阁,阁内建有大型立体“曼陀罗”模型,这种立体曼陀罗,除印度与西藏外,十分罕见。阁内藻井造型精美,制作细腻,中央悬有鎏金的二龙戏珠,是稀有的艺术珍品。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占地22公顷,由40座佛殿、僧房组成,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寺庙。此庙是为庆祝乾隆50岁大寿和他的母亲80岁大寿而建。建造时模仿达赖驻地拉萨布达拉宫的法式,普陀宗乘是布达拉的汉译。因此,该庙又被称为小布达拉宫。此庙布局形制体现了汉藏文化的结合,以藏式为主。从山门、碑亭、五塔门到琉璃牌坊,按汉式庙宇对称布局原则排列。从琉璃坊以后,根据山势,自由布置佛殿与僧房,颇富西藏建筑之趣。此庙内有一通《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纪念,历史价值颇高。

须弥福寿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70寿辰时,西藏班禅六世来京朝觐。乾隆为他在承德建立此庙,作为班禅居住讲经之所。庙内建筑模仿班禅六世在后藏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修建,所以又称扎什伦布庙、班禅行宫。庙建成后,清政府在第二年选了180名内地喇嘛在此学习藏经。寺庙外观上为藏式建筑,而平面布局、结构形式和材料装修都结合了汉族建筑的传统手法,例如主体建筑班禅打坐讲经的妙高庄严殿,坐落在藏式平顶大红台正中,周围三层平顶楼群环绕,这是喇嘛教“都纲法式”的形制。主殿高三层,采用汉式台梁式木构架,而柱网布置则采用“都纲”式的回字形。顶部用汉式方

形藻井、天花和斗拱。须弥福寿之庙是汉藏建筑艺术交流、融合的结合品。

殊象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次年完工,建筑仿五台山殊象寺,为典型的汉族寺庙传统手法。清初,曾有清帝是文殊化身之说,乾隆修建此寺之目的,意在神化自己。

外八庙是北京附近气势雄伟、富丽堂皇、具有皇家气派的寺庙建筑群,在宗教历史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7. 内蒙古的喇嘛寺庙

喇嘛教由蒙古族传入,内蒙古境内有许多喇嘛教寺院,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五当召、延福寺都是著名寺院,在这些寺庙中,现存五当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五当召位于包头市东北五当沟,本名叫巴达嘎尔庙。五当为蒙语,意为柳树,“召”是“寺庙”之意,此庙建于柳树沟,故名五当召。初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命名为广觉寺。全寺有6宫、3府、1陵、60多栋僧房和喇嘛塔等,苏古沁独宫是召内主要建筑,全庙性集会在这里举行。洞阔尔独宫为时轮学部,传播数学、天文、占卜历学等,却衣林独宫为宗教哲学部,殿内供奉高达10米的释迦牟尼铜像。阿会独宫为医学部,是传授医学的场所。日木伦独宫为教义学部,是传授喇嘛教义、教规和教史的地方,殿内供奉内蒙古最高的宗喀巴铜像,高达9米,巨像两侧龕内供奉有宗喀巴小塑像1000尊。五当召内的建筑是研究神学、建筑学的珍贵资料。

8. 辽宁义县奉国寺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初名咸熙寺。由于遭受金、元、明、清历次战乱,寺庙一些原建筑被毁灭,独存主体建筑大雄宝殿,现有山门、牌楼、无量殿等皆清代增修。辽代所建的大雄宝殿,座北朝南,为五脊单檐式庑殿式,面阔9间,共48.2米,进深5间,共25.13米,高达21米。殿内辽代所塑七尊佛像,左起依次为迦叶佛、

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含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诸佛皆端坐于须弥座上,通高 8 米以上,中间的毗婆尸佛则高达 9 米多,庄严宏伟,神态雍祥。殿两侧分置金、元、明、清重修奉国寺碑十余方,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 佛塔

佛塔是佛教传播时使用的形象实物中最突出的形象。“塔”原为梵文音译,意为坟墓,本为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舍利而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塔也传入中华大地。中国现存的佛塔样式在燕赵大地几乎均有其代表性的建筑。主要塔式有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花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过街式等,它们是印度佛塔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佛学价值。

1. 楼阁式塔

此塔式在中国古塔中历史最悠久,因其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式样,因此命名为楼阁式塔。燕赵现存著名楼阁式塔有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定州料敌塔、涿县云居寺塔、北京良乡昊天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等,其中应县木塔、定州料敌塔在中国佛塔中占有重要地位。

应县木塔是全国“四大名塔(大雁塔、元和塔、千寻塔)之一,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构建筑。塔身外观为五层六檐,从地面至塔刹高 67.31 米,比例适度,形体端庄,塔顶作八角攒尖式,顶上立铁刹。此塔历经 900 多年仍然屹立,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定州料敌塔又称开元寺塔,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历时 55 年建成。此塔建于高大台基之上,11 层,高 84.2 米,是全国现存最高大的一座古塔。塔身为八角形,平面由两个正方形交错而成,整个塔结构严谨,建造精工。据记载,该塔是开元寺僧人会能去天

竺取经,取回了舍利子,圣上召见后,降旨建造。此塔在佛学文化与建筑史上非常重要。

2. 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最早出现于北朝,辽金时期,以砖石建成的密檐式塔盛行,在中国建塔史上,形成风格独特的辽金古塔,此塔式多为八角十三层砖塔,少数为方形,采用十三层,来源于《大般涅槃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密檐式古塔主要分布在燕赵,北京天宁寺塔、通县燃灯塔、河北昌黎源影塔、正定临济寺青塔、辽宁锦州广济寺塔、北镇崇兴寺双塔、辽阳白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均为全国著名的密檐式塔。在这些密檐塔中,北镇崇兴寺双塔与辽阳白塔的雕刻艺术较高。正定临济寺青塔内埋葬着禅宗创始人义玄的衣钵,具有极高的佛学价值。近年来日本佛教界多次派遣代表团前来参拜祖塔,与中国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建于辽大安五年(1089年)的觉山寺塔为此塔式的典型代表,其下部是方形及八角形两层基座,上置须弥座两层,上层须弥座上有斗承平座、勾栏、须弥座的束腰部分的壶门内雕刻佛像。平座以上用三重莲瓣承托塔身。塔身八角形,转角为圆倚柱;南北设门,东西为假门,其余四面设假窗,檐下砖砌额枋、斗拱。塔身以上有十三层重塔檐,均有砖砌斗拱。塔檐逐层收缩,形成优美的券刹曲线。顶上置铁刹,以八条铁链固定在八条屋脊上。除觉山寺塔外,北京天宁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故城址的大砖塔,也是这种塔式的典型代表。

3. 亭阁式塔

亭阁式塔也是中国古塔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是由中国古亭与塔刹融合而成。山西五台佛光寺祖师塔,便是著名亭阁式塔。祖师塔位于大佛殿左侧,砖砌而成,涂以白色,形制奇特,手法苍古,造型特殊,十分罕见,它是全国仅存两座北魏塔之一,具有极高的佛学价值和文物价值。

4. 花塔

花塔兴盛于宋、辽、金时期，因塔身上部装饰各种繁复的花式而命名。国内现存花塔仅 10 余处，正定广惠寺花塔最为典型。该塔始建于金大定年间。平面布局甚为特异，第一层为八角形，其四角附建扁平的六角形单层小塔。塔身与小塔檐下，设砖制斗拱。斗拱配制也与一般建筑物不同。二层正面门，余面均设佛龕。第三层正面留门，四侧为斜方格假窗。第四层为花束形塔身，塔身上按八面八角的垂直线，交错彩塑狮、象、人物等，形象生动，似一小型雕塑艺术宫。广惠塔造型奇特，装饰富丽，在建筑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5. 覆钵式塔

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塔、藏式塔，是喇嘛教特有的佛塔。此塔式塔身是一个半圆形覆钵，其上安置长大的塔刹，故名覆钵式塔。喇嘛教在燕赵流传很广，内蒙古、北京、河北北部地区非常多见，著名塔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琼岛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内蒙古席力图召白塔等，此塔式的代表作，首推元至元八年（1271 年）尼泊尔匠师设计兴建的元大都西域之释迦舍利通灵之塔，即北京妙应寺白塔。该塔为砖造，基座平面呈“凸”字形，上面置复合“亚”字形须弥座二重，其上为硕大的覆莲承托的瓶形塔身，上部塔颈作相轮状，称作“十三天”，顶端天盖上原置宝瓶，现在上面是一座小喇嘛塔。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又名佛舍利塔，始建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塔身状如藻瓶，造型优美，塔顶盖铜板 8 块，形成圆形，按八卦方位安置。塔顶正中装铜顶一枚，高 5.33 米，覆盘 2.33 米，饰以垂带，金光闪闪。该塔有重要佛学价值，被人们视为五台山佛教圣地的标志。

6. 金刚宝座式塔

金刚宝座式塔属于密宗塔形，以五方佛为供奉对象。此塔式为模仿印度佛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式，同时吸收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而形

成。全国现存的金刚宝座式塔有 10 余处,约有半数存于燕赵。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域塔、五台山圆照寺金刚宝座塔、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慈灯式金刚宝座舍利塔均为著名佛塔。北京真觉寺塔是这种塔形中年代较早而又雕刻精美的代表作品,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成于成化九年(1473 年),为置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进贡的金身玉佛像而建。塔高 17 米,下为高 7.7 米的四方形塔座,座上分建五塔,用砖与汉白玉砌筑而成。座子和小塔身上布满各种图案,雕刻技法生动形象。真觉寺塔在宝座上增建了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重檐琉璃罩亭,是一座融中印建筑风格于一体的佛塔。清净化域塔又称班禅塔,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为圆寂于西黄寺的六世班禅衣冠塔。塔基与塔身均雕刻精美图案,须弥座的中段雕有班禅六世一生故事图。此塔仿照印度菩提伽耶精舍而建,造型优美,雕刻艺术极其精湛。

7. 过街式塔与门式塔

过街式塔建于街衢之上,门式塔与此相似,把塔的下部修成门洞形式,它们是中国古代城关建筑与佛教建筑相结合的产物。燕赵现存过街式塔与门式塔较著名的有北京居庸关佛塔、西郊法海寺门式塔、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外的各式门式塔,普宁寺红、绿、黑、白塔门等。普宁寺塔结合中原地区塔型特点和宗教的需要,塔基座均采用过街塔门式,座下开出拱门,每塔塔身均采用双层“重钵”形式,三个取覆,一个取仰。塔身装饰金刚杵与法轮。在建筑艺术的效果上,四种不同颜色的塔与周围的日形、月形、六角形、三角形等台殿建筑互相配合,衬托出主体建筑大乘阁的雄伟,共同构成了一组完美的建筑布局。

燕赵佛塔由木而砖石,集中了中国建筑的精华,也融会了印度建筑的精华,形式多样,奇丽秀美,成为中国建筑史与佛教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第三节 伊斯兰教

一、伊斯兰教在燕赵的传播

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朝初年传入中国,辽时传入燕赵。据史籍记载,辽耶速鲁丁奉敕建造北京牛街礼拜寺,为伊斯兰教传入燕赵之始。元代,成吉思汗对投靠他的外族人及其宗教实行宽容政策,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开始和蒙古人接触,当时的官文书中称他们为“回回人”。1219年蒙古军3次西征后,回民大批进入中原,有许多被编入“探马赤军”。蒙古统一战争结束后,忽必烈下令各地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在燕赵定居下来,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燕京、和林、定州、易县建立了一些清真寺。易县城内礼拜寺内一幢碑,称其寺建于元朝。定州市礼拜寺内一幢碑,建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碑文中对回民人数、建礼拜寺及对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和一些制度都作了记述,成为燕赵伊斯兰教传播情况的最早记录。《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八《为在大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云:“今体察到本路(中都路)回回入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续抄,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北京的流传情况。《元史·赡思传》称,赡思家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赡思是元代政治家,回族学者,他在正定的定居,为伊斯兰教在燕赵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明代,明成祖称帝后,为填补华北一带的旷地,多次下令迁民华北,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到燕赵定居。据沧县、三河、涿州、宣化、大名等县(府)志和部分礼拜寺现存碑刻,明初这些地区均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迁入。明成祖定都北京,大批官吏、商人、富豪纷纷北

上,其中有不少回民为生活方便,开始在今大厂定居,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回民居住村落。随着大批回民迁入,伊斯兰教在燕赵得到较快发展,大批宗教职业者开始出现,明正德年间的刘景省大阿訇、清道光年间的李四爷及其子李冠度、清末的海思福等,都是北方伊斯兰教界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不仅对伊斯兰经典和汉学有很高造诣,对伊斯兰哲学、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二、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寺院的专称,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集中表现。它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主要物化表现形式。伊斯兰教在燕赵传播较广,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清真寺在各地纷纷建立。北京牛街、东四、安内、锦什坊清真寺、河北沧州市清真北大寺、泊头市清真寺、大厂北坞清真寺、定州市清真寺、易县城内清真寺、保定市清真西寺、秦皇岛市海港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天津穆家庄清真大寺、西北城角附近四大清真寺、沈阳市南清真寺、北清真寺、东清真寺、呼和浩特南大寺等,都是较著名的清真寺。其中北京牛街清真寺、东四清真寺、定州市清真寺、沧州市清真北大寺等驰名全国。

牛街清真寺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始建于966年。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赐名“牛街礼拜寺”,清康熙三十年(1694年),按明风格修葺扩建,形成现今规模。寺内主要建筑有望月楼、大殿、宣礼楼、对厅、讲堂、碑亭等。礼拜大寺为全寺中心,殿堂有3个殿顶,接合处装饰了一道垂直半弧形影壁。殿堂中设一座六角攒尖亭式建筑,俗称穹殿。穹殿正面壁龛上,雕满精巧的阿拉伯文与花卉。殿内西北侧,是聚礼日或节日教长讲经说道的木制宣教台。寺内保存有明弘治九年(1496年)用汉阿两种文字刻写的《敕赐礼拜寺记》碑,是

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文物。东四清真寺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是驰名中外的清真寺之一。初建于元至正六年(1356年),明代重修。寺院建筑颇具明朝风格,将中国建筑特点与阿拉伯建筑艺术结合为一体。寺内珍藏的《古兰经》,是元朝穆斯林学者的手抄本。明万历七年(1579年)用汉阿两种文字雕刻的《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碑》,记述有穆罕默德事迹,该寺在中国伊斯兰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定州市清真寺位于定州城西。寺院布局采用传统的四合院制式,正面和两厢配有大殿、水房和南北讲堂,结构谐调严谨,功能性突出,是中国典型的民族化伊斯兰教建筑群。寺内原有石碑13通,记载着该寺建置经过和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发展。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修礼拜寺碑》,是传世极少的元朝清真寺碑刻之一,同时也是国内穆斯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文献。碑中载道:“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天下之教,儒教尚矣,下此而曰释与老,虚无寂灭不免于妄,……惟回回为教也,寺无象设,惟一空殿,……盖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象则类物,殆亦溘矣。惟有想无象以表其诚,其遗风流俗之美,盖可知也。”此碑碑阴有许多元代职官姓名,并有“掌教某某”字样,表明掌教制度在当时已经形成。该寺经明清几次重修,形成现今规模。它成为十四世纪中叶迁居中国的穆斯林经过一个世纪的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标志。沧州市北大寺占地面积7400平方米,寺院呈东西向,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按传统四合院布置,寺内主体建筑为礼拜大殿,大殿呈“主”字形,有81间,工艺精湛,气度非凡。寺内建筑巍峨壮观,占地面积广,在燕赵屈指可数。此寺历史上经学颇盛,不少著名阿訇、学者至该寺设帐传道,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在伊斯兰教界影响颇大。

第四节 天主教、基督教

天主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正教(东正教)、新教(耶稣教)三大主要教派为广义的基督教,共同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主要经典,狭义的基督教指三大派系中的新教,此概念在中国长期沿用。

一、天主教的传播

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始于元代。蒙古大军远征欧洲,军中士兵和俘虏很多是天主教徒。元定都大都后,这些天主教徒便在北京定居下来。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来到北京,建立两座教堂,传教35年。1307年,罗马教皇在北京建立总教区,孟高维诺被委任为北京总主教,管理包括燕赵在内的东方全境教务。1600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天津,1601年到北京,在宣武门内建教堂,发展教徒200余人。利玛窦在传播天主教过程中,吸收利用儒家经典解释天主教教义,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宗教著作,以利于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利玛窦还广泛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以加强同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联系。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为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作用。1690年,北京设立教区,天主教在燕赵有了较大发展。1785年,法国“味增爵会”在崇礼县西湾子建立教堂,为天主教在长城以外传播打下了基础。康熙雍正年间,多次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天主教在燕赵的势力因之大减。

1832年,崇礼县西湾子、高家营等地遭受自然灾害,天主教会趁机扩大势力,在西湾子建筑了中国当时第一个大教堂,“味增爵会”派

孟振生任第二任丰堂司铎。1838年8月,罗马教宗将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教会统划为蒙古教区,西湾子定为蒙古教区总堂,成为北方第一个总堂和天主教活动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燕赵发展很快。1856年,直隶西南22个州县从北京教区中分离出来,组成正定教区。同年耶稣会传教士郎怀仁从上海进入直隶东南境,先后在威县赵家庄、献县凌上寺建立教堂,发展教徒,1857年从北京教区分离,正式成立直隶东南教区(后改称献县教区),郎怀仁任主教。初在赵家庄设总堂,5年后迁往献县张庄,成为耶稣会在直隶东南的一个重要传教据点。1874年,天津设立崇德堂,成为耶稣会在燕赵的财物管理机构。1898年,永平府10个州县正式从北京教区中分出,成立永平教区,方济众任主教。义和团运动前夕,天主教在燕赵大地广泛传播。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天主教遭到沉重打击。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重新出现高潮,成为颇具影响的宗教。

二、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传入燕赵时间较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批基督教传教士纷纷来到燕赵。早期在燕赵活动的基督教,主要有:1861年传入,流传于北京、天津、保定的公理会,流传于天津、唐山、林西、永燕(今卢龙)、靖安(今昌黎)的圣道公会,流传于北京、天津、沧州、萧张(今枣强)的伦敦会;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流传于北京、天津的圣公会;1863年传入,流传于保定、磁州的北长老会;1864年传入,流传于张家口、宣化的美普会;1868年传入,流传于山海关、遵化的美以美会;1891年传入,流传于获鹿、元氏、晋县、临城、赞皇、行唐、内丘、平山的内地会。

基督教传入后,发展很快。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基督教重视利用兴

办教育事业,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有重大影响的宗教。

三、教 堂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燕赵后,在燕赵大地建立许多教堂,在众多的教堂中,北京天主教四大堂、崇礼县大教堂、献县张家庄总堂最为著名。

北京四大堂为北堂、南堂、东堂、西堂。北堂又称西什库大教堂,其建筑规模在北京所有教堂中最宏伟。北堂原地在中海内蚕池口,清康熙帝因患疟病,服用耶稣会教士所进西药一剂而愈,因此赐银于1703年建成此堂。1887年,清廷扩大故宫禁苑,将北堂圈进中南海之内,另拨西什库一地建成新教堂,即今日之北堂。南堂座落在宣武门顺城街(今前门西大街),是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天主教堂。1605年,利玛窦于该地建成北京城内第一座经堂。1650年,汤若望在该地建起规模壮丽的大教堂,并于1690年将其作为北京主教座堂。义和团运动中此教堂被毁,1904年重建,是为今日南堂。东堂座落在东安门外八面槽路东,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于1655年建成,是继宣武门天主教堂后的北京第二座天主教堂。教堂几度兴废,1884年,田类思主教募集巨款重建罗马式大堂,1900年被毁,1904年重建,是为今日东堂。西堂座落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1723年始建,1811年拆毁,1860年重建。1900年被火烧后,1912年重建,为今日之西堂。

崇礼县西湾子教堂是长城以北传教的第一个总堂,是天主教在长城以北的传播中心。该堂始建于1829年,法国神甫薛玛窦为第一任本堂神甫。1838年蒙古教区成立,西湾子教堂变为总堂。1860年,西湾子建立新堂,计教堂40余间,其余住房及其他房屋300余间,有外国主教神甫10余名,成为塞北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心和外国向中国

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桥梁。1895年后,西湾子教堂因传教功绩显著,得到国外教会的大力赞助,此教堂因此名扬世界。

献县张家庄教堂是献县教区总堂所在地。1862年开始筹建主教教堂,1863年12月奠基,据基石文字载:“教宗庇护九世即位的第十八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即位的第十一年,郎怀仁做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时,至可敬神甫柏克斯做耶稣会总会长时,可敬的戴元英做法国耶稣会会长时,李秀芳神甫做本会区耶稣会会长时,本堂的圣心大殿开始建筑;副理修士吉玉隆为建堂的工程师。”经3年精心施工,1866年竣工。教堂长15丈,宽6.4丈,可容纳2000余人,建筑风格为哥特式。教堂建立后,成为献县教区传播天主教的中心。

第五节 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宗教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著名宗教最初都在民间传播。由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一些后起的民间教派被排斥在正统宗教之外,成为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被迫在下层社会发展,成为民间秘密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苦难人民利用秘密宗教反抗统治者的起义在燕赵大地不断出现。明清时期,燕赵民间秘密宗教发展迅速,多种教派广泛传布。它们不断吸取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正统宗教的营养,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构筑了一套又一套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形成了一个地下宗教王国,民间秘密宗教起义此伏彼起。

一、白莲教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南宋绍兴三年(1133

年),江苏吴郡法门茅子元创白莲宗,从佛教净土信仰领域分离出来,演化成民间教派。元世祖至元五年(1267年),白莲教徒在大都(今北京市)城寅宾里太庙旁建立“无量寿庵”,白莲教传入燕赵。无量寿庵在大都建殿阁,置产业,绵延70余年,上有朝廷显贵、政府要人支持,下有地方官吏、乡里豪绅资助,又拥有众多教徒,颇为兴盛。元武宗至大元年(1380年),朝廷下令禁毁白莲教,毁其祠宇,白莲教道士隶还民籍。至大元年五月,庐山东林寺僧普度,向武宗上“万言书”,力证白莲教“念佛之道有益于国化”。至大四年正月,白莲教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普度等人在大都建莲花池,重振白莲教。元朝末年,白莲教起义遍布祖国南北,燕赵最著名的白莲教起义为韩山童组织的红巾军大起义。

韩山童祖籍河北栾城,“山童祖父,世为白莲会,烧香事佛,江淮河洛之众皆来从”(《明史稿·小明王传》)。后被官府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元史·顺帝纪五》)之罪名,谪徙广平永年县。韩山童承继祖业,以弥勒出世为名,在广平一带烧香结会,“聚为烧香之党”,宣扬“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被捕遇害,其子韩林儿与刘福通率众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后被元军镇压。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白莲教脱离了与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明朝建立,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白莲教,白莲教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明朝中后期,白莲教分化出诸多支派,活动在燕赵大地的民间秘密宗教罗教、闻香教、黄天教、弘阳教、东西大乘教等,都是白莲教的支派,这些教派,成为燕赵民间秘密宗教的主体。

二、罗教

罗教,始称无为教。创教祖师罗梦鸿(1442—1527年),道号无为居士,祖籍山东即墨县,世代隶军籍。青年时到北直隶密云卫当戍军,

开始执著探索宇宙、人世、命运、生死的终极奥秘,最后悟道明心,创立罗教。

罗教有五部经典,世称五部六册宝卷,它们是《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罗教的教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影响深远广泛的五部六册宝卷中。教义主要内容包括:悟道成佛说、人的最终归宿、最高神祇、创世说和戒规等。

悟道成佛是罗教思想体系的中心。经过十多年的苦修,罗梦鸿省悟到禅宗的“觉悟成佛”之理,一个人能否成佛,完全靠个人内心的“悟”与“不悟”来决定。一旦明心见性,当下即可成佛,这种悟道方法即为无为法门,参悟出的佛法为“无为大法”。

罗祖认为,宇宙万物从何而来,最终还要回到何处去。人一旦悟通无为大法,识得“真空法”,就可以回到出身之地“真空家乡”。“真空家乡”是人的最终归宿。

罗教信奉的最高神祇是大千世界的本源“无极圣祖”。在创世说中,罗教的最高精神实体即是无形无相、寂然不动的道,此道又称无极或太虚空。罗教将此非神话的创世说,解释为无极圣祖创造日、月、星、辰及世界万物的神话创世说,以此来阐明世界的本源。

罗教的悟道明心、成佛作祖的思想,比禅宗更加世俗化、民间化,深受下层群众、下层僧侣和佛教徒的欢迎,五部六册宝卷于正德四年(1509年)刊行印刷后,该教迅速传播到民间。在传播过程中,该教又巧妙利用伪造《御制护道榜文》的办法,假借圣旨,大量印发五部六册。罗梦鸿生活的时代,罗教教团已颇具规模。明代后期,罗教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迅速传播,并沿大运河,传播到江苏、浙江、福建和江西等东南沿海一带。在不少地方(如山东)甚至视罗教为佛教,但知有五部六册而不知有佛教经藏,教势超过正统的佛教和

道教。

罗教的兴起,再次改变了中国宗教史的面貌。它的教义对禅宗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提出对宇宙、万物、人生的看法,提出解决生与死、有与无、正与邪等一系列人生命题的方法。它的教义丰富、深刻而通俗。罗教产生后,黄天教、三一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大批新型民间宗教在它的影响下相继出现。罗教的出现,冲击了正统佛教的世袭领地,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宗教世界掀起一场无声的风暴。

三、黄天教

黄天教,又名黄天道、皇天道。明朝末年河北万全人李宾在北直隶万全卫(今河北属县)创立。黄天教是一支佛道相混、以道为宗的教派。黄天教之黄天即真空家乡,也就是明清时代多数民间教派所追求的彼岸世界。其修炼方法便是以修炼内丹的方法达到长生成仙之路。从表面上看,黄天教是崇佛的,但从本质上讲,黄天教受道教的深刻影响,其教义及修炼方法主要源于两宋时代道教内丹派及其后兴起的全真道。可以说它是一支流传于民间的世俗化了的道教教派。

黄天教倡立不久,教势日炽,迅速风靡华北及江南部分地区,到明万历末年,“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四存编·存入编》)。黄天教的传播,对收元教、八卦教等民间教派产生深远影响。

四、混元弘阳教

混元弘阳教,简称弘阳教、红阳教,也称元沌教、混元门。河北永年县人韩太湖(又称飘高)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创立。

弘阳教崇拜众多的神祇,在十几部弘阳教宝卷中,要求信徒崇拜

的神祇有:3000 诸佛、98 位老祖、38 位如来、48 位菩萨和 77 位观音。其神明数量之多、名号花样翻新,前所未有。在众多神祇中,混元老祖、无生老母与飘高祖师是弘阳教的最高神祇,所受崇拜最隆重。弘阳教教义中最重要、最富有吸引力的内容便是三阳劫变。弘阳教提出:过去是青阳之世,燃灯佛掌教;现在是弘阳之世,释迦牟尼佛掌教;未来是白阳之世,弥勒佛掌教。这三世、三阳、三佛说,简称“三阳劫变”。现在是弘阳之世,弘阳教当兴,弘阳末劫即将到来,人类面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灾难,只有信奉弘阳教,才能渡过此劫,出离苦海。另外,弘阳教教义中还有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在教义中也占重要地位。

韩太湖创弘阳教后,便在“燕南赵北”的广平府曲周县传教。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韩太湖进北京活动,结交太监头目,在内厂刊印大量宝卷,弘阳教迅速发展起来,不久便传播到山东、山西等地。清乾嘉时期,多次严厉镇压弘阳教,但弘阳教并未因此而消失,直到现在,仍有弘阳教徒在过自己的宗教生活。

五、闻香教与西大乘教

闻香教又名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大成教、善友会。清代有些门徒又自称弘阳教、无为教,另号清净门。清代,闻香教使用最多的名称是清茶会,又名清净门,俗称清茶门。有时也称归一教。

闻香教是明万历年间顺天府蓟州人王森创立。王森(1524—1619 年)原名石自然,又称王道森。明朝末年,罗教在密云卫传教,李宾在万全卫创黄天教,静空祖师在顺义创静空教,还源祖在永平府滦州东胜卫创还源教。王森对各家教派兼容并蓄,在滦州创立了内涵丰富但没有个性的闻香教。闻香教直接发源于罗教,在发展过程中又继承了白莲教最基本的思想内涵,同时受到周围各类宗教组织、宗教思想的

影响。在其庞杂的教义体系中，“三教应劫”思想和修炼内丹是其中心内容。只有修炼内丹，才能回归本性，渡过劫难，回归“真空家乡”。

闻香教创立不久，内部形成了一个组织完备、等级森严，以王氏家族为核心，各级教会为骨干的秘密地下宗教王国。其教势从北直隶向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蔓延扩张。由于此教派鼓吹改天换地，野心勃勃地参预政治生活，清嘉庆年间，在一次震惊朝野的“邪教案”中被扫荡殆尽。但是，闻香教的影响已遍及下层社会，给民间信仰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王森创立东大乘教同时，北方还存在一支大乘教派，这便是京西黄村皇姑寺归圆所创西大乘教。因两教名称相同，教义相近，却又各立门户，互不统属，故遂以地区方位分为“东”“西”，以示区别。西大乘教具有比罗教更明显的道教色彩，在其系统的宝卷中，充斥着道教内容，皇姑寺供奉的神祇除佛教神祇外，还有道教诸仙，皇姑寺中尼姑的着装，也与道姑相类似。传说中西大乘教创始人吕菩萨，是一位亦佛亦道的人物，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西大乘教创立于佛教寺庙皇姑寺，并以此寺为活动基地，展开宗教活动。在皇姑寺的掩护下，西大乘教得到长期稳固发展，其教势虽不及东大乘教，但在京畿地区也具有广泛影响。

第十一章 民俗文化

中国自古讲究“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尊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燕赵是历史上多民族生活习俗和思想文化的交汇地，元朝理学家、文学家刘因在《过易台》诗中写道：“万里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自辽金。”燕赵的风俗习惯是以汉族为主、北方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的结果，内涵极为丰富，体现在居住、饮食、服饰、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生动反映。由于长期封建政治的影响，有些民俗现象不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民俗文化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因而仍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连贯古今，燕赵民俗文化的许多内容以它独特的魅力得到继承和发扬，流传至今。

第一节 生活习俗

一、居 住

人类利用地形、地势、地物创造了居室。各地、各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居住形式,营造技术风格也各有特色,经长期相演相嬗形成了各自的居住习俗,在燕赵大地上就有多多种的形式。

(一) 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是木架结构的院落式住宅,其形成有漫长的历史,至迟在汉代已有三合院和“日”字形住宅。唐宋时,四合院已成为普遍的住宅形式。北京是元明清历代帝都,王公府第大型四合院也最为显赫,布局十分规整,建筑装饰有独特风格。普通四合院受其影响也比较划一整齐,所以北京四合院具有典型性,在中国住宅建筑史上是一项重要成就。

北京四合院的布局以南北向纵轴线为准,对称的建置偏正住房。院落大门都是双扇,上嵌铜扣环,按八卦“巽”的方位,住宅大门开在东南角,取其吉利。进门迎面是影壁,也称照壁,作为屏障,古人有防鬼护财保安全的意思。拐过影壁向西到前院,南侧的倒座(即南房)一般作客房或是佣人的住处。其对面是木雕的垂花门,即二门,跨过门坎就是后院,这是本宅的中心部位。正北房供长辈人使用,会客、居住全在这里,东西厢房作书房、餐室,或是晚辈人的住处。如此安排体现了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的封建家族制度。三面房屋有走廊相连,便于家人活动。正北房左右各有小跨院、耳房,作厨房、仓库使用。全宅的四周,由临边的房屋后墙和前后院的边墙共同组成围墙,成封闭式,

这种建筑形式是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在住宅建筑上的反映。更大的住宅由纵深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院落构成,并建有小花园。普通人居住的四合院则比较简单,进大门拐过影壁就是东西南北房,中间有个小院落,全称“四合房”,简称“四合”,不分前后院,没有垂花门,也不设走廊,全院青砖青瓦。四合院的屋顶以硬山式为多,屋内讲究四白落地、大白纸糊顶,方砖墁地。大屋用雕花木隔扇隔成小间,在卧室内靠窗户一边有火炕,由砖石、土坯砌造,是睡眠休息的地方,北方冬天寒冷,炕内有灶和烟道,能生火取暖。院内日照充足,空间豁亮,按地面大小可植花种草或栽树三两株,柿子树、核桃树或海棠树,最普遍的还是枣树,夏日可遮荫纳凉,进入四合院给人一种幽静、恬适之感。

此外,还有三合院,由于宅基地面积限制或财力有限,只建北、东、西房,南面是院墙。北京贫苦人家住大杂院,由几户共用,院内错杂,与单门独户的四合院清静闲雅形成鲜明对照。

(二) 农村的宅院

农村宅院以李景汉的《定州社会概况调查》所载具有代表性。农村富户由于人口、财产较多,所以住房有前院、中院、后院、菜园、收获场等部分。院落一般是南北长、东西窄,南面开门。房屋多半是抹灰的平顶,可以晾晒谷物、柴草,也有以砖瓦做顶。屋墙用土坯建筑,外面包砖,也有下砖上土或上下全砖的。正房坐北朝南,分3间,中间是穿堂,两边各一间居室,屋内是土地,少有砖地,房屋总共约15—20间,分卧屋、厨房、仓房、农具库房、磨房、碾房、畜房、饲料房、车棚等。卧屋内有土坯炕,所有房间一般只开一窗,纸糊窗棂格,门为双扇。

普通农民一般有一个院落,约10间房,而贫穷小户只住3间一座的房子,土坯建造,没有院墙。山区普通住房建在阳坡,多用山石砌墙,墩厚朴实。

满族村落的房屋以“口袋房”为典型,以草覆顶,屋门开在东南,状如口袋,宜于保暖。东头一间作外屋,门口面南,西头两间作里屋。

家家户户都有南北火炕,西边还有一条窄炕,长辈人居南炕,小辈人居北炕,西炕供奉祖宗牌位。房屋南北西三面开窗,外糊窗纸,开窗向外,据说为防夜间有虎闯入。

(三) 雁北的窑洞和塞外毡包

山西北部黄土山地多,林木缺乏,难得作栋梁的林木,窑洞就成了民间普通的住宅了,除前面门窗外,整个居室主体都是利用黄土山地掘成的。这种窑洞式住宅叫靠崖窑,在天然土壁上开凿横洞,或单洞或数洞相连,或上下数层,有的在洞内砌砖券或石券,以防止泥土崩塌,有的还在洞外砌砖墙,保护崖面。规模较大的富户住宅,也在崖外建房,组成院落,形成靠崖窑院。窑洞式住宅有许多优点,本地俗称为“冬暖夏凉的神仙洞”。这里的火炕有的用土板或石板盖成,通火保暖。

蒙古族人惯住毡包,习称蒙古包,古文献多称“穹庐”。“包”,满语,即“家”、“屋”的意思。一般为圆形,以木条编织骨架,外覆毛毡,所以叫毡包,顶部呈伞形,开圆形天窗,供通风采光。毡包直径4—6米、高2米左右,整体易拆卸、便游动,适应于游牧生活方式。根据人口和财产状况,或单包,或二三成组,在附近用土墙筑起牲畜圈。住在穹庐毡帐中,安静舒适,挡风保暖,是独具风韵的塞外移动式住宅。傍晚黄昏,悠扬的马头琴声在草原上荡漾,更增添了蒙古包的魅力。

二、饮 食

古往今来,“民以食为天”,广大人民在饮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饮食不外肉食、谷食和蔬菜,但因烹调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风味,形成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一) 日常饮食

普通家庭的食品消费以米面为大宗,包括小米、甘薯、高粱、玉

米、豆类、荞麦、白面,可分别做成窝窝头、干饭、大饼、馒头、面条。甘薯吃法既能蒸、煮鲜食,也可切片晒干或磨面,做成饼或河落条(面条状,煮食)。蔬菜以大白菜、北瓜、苕苕、萝卜为大宗,也有菠菜、茴香、韭菜、大葱、豆角之类。副食多粉条、豆腐,少有猪肉、牛肉、羊肉、鸡蛋、鱼等。农民在农闲时一日两餐,农忙时一日三餐,日常多素食,逢年过节饮酒吃肉,做饺子等食品。果类以西瓜、枣、甜瓜、梨最为普通,除枣子可以晒干长期保存以外,其他水果的季节性很强。南方水果对一般劳动人民家庭来说几乎与之无缘。

许多农村家庭吃饭有个老习惯,夏秋季节,人们往往端着饭碗到街上吃,或蹲或坐,与家人或邻居边吃边谈,有说有笑,虽不大合乎饮食卫生,但也饶有风趣,有着睦邻友好的气氛。

(二) 北京风味食品

京味食品可分京菜、糕点和风味小吃几种。

1. 京菜的形成和特点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古都,千百年来以“首善之区”、“五方杂处”而著称。它有水泉甘美的地理条件、富饶的物产,为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这里自古是汉、蒙、满、契丹、回回等各族文化的汇集点,使北京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的特色。京城是政治、文化中心,为满足皇室、王公府邸、富豪商贾、文人墨客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饮食需要,这里集中了全国最丰美的食品,兼收各派烹调技术的精华,荟萃南北百家之长,“熔八方为一炉”,使饮食五味尽在都门。

京菜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鲜、嫩、酥、脆的特色,用料鲜活、入口爽滑、口感香酥、清脆。北京的烹饪最讲究选料,烤鸭必用北京填鸭,涮羊肉必选口外阉割公羊,烤猪必取京东鞭猪,萝卜丝氽鲫鱼必是滦河鲫等等。京菜烹调技术多样,以爆、炒、炸、熘、烩、蒸、扒、烤、焖、煎、卤、煮、拌、炆、腌、烧、烹、涮、氽、拔丝等为主要技术手段,

作到色、味、形、香俱全。京菜还注重时令,北京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所以也最讲饮食时令,如春吃糖醋黄鱼,夏吃水晶绿豆粥,秋食胜芳河蟹,冬食火锅,四时京菜绚丽多彩,脍炙人口。

2. 著名菜肴

烤鸭、涮羊肉、烤肉合称北京三大风味名菜。元大都已有“烧鸭子”这道名菜,清朝时“便宜坊”尤以焖炉烧鸭知名。将生鸭放入炉内,靠炉壁热度焖烤,叫焖炉烤鸭。故宫存《五台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月间,在13天中乾隆皇帝曾8次食烤鸭。清同治三年(1864年),蓟县人杨全仁在前门外开办“全聚德”烤鸭店,他采用挂炉烧烤法,将生鸭挂在炉膛中,用枣木、杏木等果柴烤制,炉温在 180°C — 250°C 之间,约45分钟即熟。烤鸭色如枣红,皮酥肉嫩,味道醇厚,名噪京师。北京鸭是用玉泉水培育的填鸭,胸脯发达,肌肉丰满,皮薄,肉嫩。烤前要经过充气、开膛、烫坯、涂糖、晾坯几道工序。熟后,每只鸭要片成90—120片(儿),作到片片带皮、片片有肉。吃时,在荷叶形薄饼上先抹上特制甜面酱,夹上葱段,再将鸭肉卷进去,咸甜脆美。

涮羊肉是北京传统清真菜,它吸收了北方民族吃羊肉的特点,并加以发挥创造。吃时将鲜嫩的羊肉片放入红铜锅内的沸水中涮熟,再佐以芝麻酱、韭菜花、酱豆腐、卤虾油混合而成的调料,食之味道鲜美。著名店家有“聚宝堂”、“正阳楼”、“东来顺”等。每逢冬季,京人常以数人围坐吃火锅为乐趣。

烤小猪是明清达官贵人的美味佳肴,也是“满汉全席”的主菜之一。小猪必选杂交北京小花猪,宰杀后,有开膛、剔腿、烫皮、挂糖、晾坯、烤炙等多道工序,方法类似烤鸭,此菜色如红枣,皮酥脆,肉嫩清香。

白肉也叫白煮肉,北京传统名菜,由净猪肉入砂锅加佐料白煮而成。老字号“砂锅居”饭庄专营这种菜,据说可作出100多道菜色不同

的猪全席。吃时蘸蒜末、酱油,另备辣椒酱,入口开胃,不腻,味道醇香。

鱼类中“酥鲤鱼”、“沙锅鱼翅”、“炒银鱼”、“清蒸甲鱼”等都是传统名菜。“炒银鱼”是明宫内廷喜吃的菜肴,以酱水或鸡蛋同炒更佳,味嫩香,有鲜黄瓜之清气。在虾类菜肴中以“罗汉大虾”、“琵琶大虾”、“金钱虾饼”、“酥炸虾球”、“鸳鸯两吃虾”最著名。“罗汉大虾”是北京官邸菜之一,熟后上盘,虾肉状似罗汉挺胸凸肚,故名,色泽红润光亮,质地酥脆。琵琶大虾是一道宫廷菜,去头留尾,从腹部片开,平放、呈琵琶形,油炸前必剃断虾筋,以免炸时卷曲影响造型,熟后外酥里嫩,形象别致、逼真。

在山珍海味类中,鱼翅、海参、鱼肚、鲜贝、熊掌都是主要原料,名贵珍奇。如“白扒鱼肚”,以菜汁鲜香、鱼肚软糯而闻名京城,是一道北京官邸宴席名馐。“茵陈扒熊掌”是一道有滋阴补气之功效的佳肴,用茵陈泡酒与熊掌同烹,既增加营养,又可除熊掌异味,此菜鲜香醇厚,风味独特。

在冷菜类中如“马莲肉”,出自距今已有 300 年历史的“都一处”饭庄,以猪后臀尖、五花肉、猪皮、马莲草为主要原料,熟后冷冻,切片上盘,是一道味美可口的凉菜。在甜菜类、素菜类中,如“酥炸玉兰”、“炒胡萝卜酱”都是宫廷菜,相传是慈禧太后每席必食的菜肴。

这些京味名菜都与老字号的饭庄连在一起,如“便宜坊”、“全聚德”简直成了北京烤鸭的代名词,一说上“全聚德”,就是请吃北京烤鸭。

3. 京味糕点

北京传统糕点兼具南北风味,享誉全国。

“萨其马”,满语“饽饽”,以冰糖、奶油合面,作成面条状,用不灰木烘炉烤熟,色金黄,切成长 3 寸、宽 2 寸、高 1 寸的块状,甜腻绵软,是清代冠婚丧祭不可缺少的食品,旗民、汉民皆喜食。

奶酪是北京特产,先将牛奶煮沸,加白糖、江米汁,再煮,然后凝结成块,夏日冰镇后冷食,口感滑腻,食后沁人心脾。

“酥皮京八件”,用面粉、白糖、苏打水加绍兴黄酒制皮、包馅、烘烤制成。有8种不同的馅,即山楂、玫瑰、白糖、葡萄、椒盐、枣泥、豆沙、青梅杏,皮酥、松软,上面加盖红戳记,是年节馈赠食品。

“月饼”是节日糕点,南北方皆有,但北京有“自来红”、“自来白”、“提浆”等品种,上加红色印圈,有喜庆气氛,老幼皆于八月十五祭月后而食,谓之团圆饼。

“茯苓饼”是由明末清初时传入中国的“西洋饼”演化而成,将8成绿豆淀粉和2成精面粉调成浆,舀入圆形铜质饼模中烘烤,出模后在一面抹上蜂蜜,再撒上桃仁、白糖、桂花等甜料,然后两片合成一饼,色白、质脆、甜适可口,以形似中药白茯苓片得名。其他如绿豆糕、槽子糕、桃酥、蜜供等等都为京人所喜食。

北京人讲究礼仪,糕点不仅可食,而且也是招待客人,或做与亲友礼尚往来的馈赠佳品,可以交流情感、增进友情。

4. 京味小吃

北京风味小吃多半是日常在街头巷尾叫卖的小食品,大饭庄不屑一顾,因而登不了大雅之堂。有的小贩摆设浮摊,支个布棚,亮出字号,摆上条案、长凳,成了小吃摊子。另有些小贩则只有一付担子或一辆手推独轮车随处在小巷一停,顾客站立就食。这些吃食经长期筛选,都具备地方特色,适合北京人的口味,形成固定风味,且经济实惠,适合一般平民消费水平,故得以长期发展,深受京人喜爱。

豆汁是用绿豆渣发酵后先得原浆,再兑入百合粉加热,煮成稀汤,呈淡草绿色,味酸微甜又带一点霉味,佐以辣咸菜丝,汁味浓厚。北京人不拘民族、贫富,没有不嗜豆汁的,尤以冬季为最,愈辣愈喝,愈喝愈热,终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俗说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北京人。

灌肠是用猪大肠灌入淀粉,煮熟,切片油煎,用竹签扎住蘸蒜盐水吃,焦脆香嫩,据说那油是从马肉熬出来的,所以有一种特殊风味,入口顿感喷香。

臭豆腐是北京风味的发酵豆制品,以清朝康熙年间王致和酱园制作的最佳,小贩将“王致和的臭豆腐”叫响北京街头巷尾,家喻户晓。制作以优质黄豆为原料,有制腐、切块、接菌、发酵、腌渍等工序,呈豆青色,以其味异香、质绵腻为特色,是佐食调味佳品。

豆腐脑儿用黄豆磨浆,烧开点以石膏成“脑儿”,质地洁白软嫩,用特制铜平勺从铜锅里舀入浅底小碗中,浇上一勺“口蘑”、羊肉片打成的卤,趁热品尝,也可就烧饼、焦圈(油炸食品,状如镯)同吃,是清真风味早点。

豆面糕,俗称“驴打滚儿”,以黄粘米面为原料,蒸熟后,在案板上摊开擀平,撒上红糖、豆沙馅卷成几层,再滚上熟黄豆面,将大卷用刀切成小段,随切随有豆面飞起,故有“驴打滚”别称,味甜,绵腻而不粘牙。

茶汤是用沸水冲开碗里的糜子面,加红白糖,调成的粥状食品,香甜可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京师向有谚语云: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说明茶汤在明朝时就已经是北京有名的小吃,摊桌上一把特制的开水大铜壶是冲调用具,也是其特有的标志。

糖葫芦是把去核的山里红(山楂果)串在竹棍(儿)上,蘸冰糖制成。小者一尺左右长,大者三四尺长一串,北京春节时琉璃厂专卖此种大糖葫芦,将蘸糖的数十枚山里红串在荆条上,顶头插上小三角彩旗,大人举着,小孩扛着,欢欢喜喜,成了京城春节特有的景观之一。

北京的风味小吃举不胜举,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独具一格。

(三) 燕赵各地风味食品

1. 辽宁、内蒙古

辽宁的传统小吃种类较多,都有上百年的历史。老边饺子是清道光八年(1828年),由河北任丘县边家庄人边福在沈阳创始的风味食品。其独到之处是制皮和调馅。饺子皮是精粉烫面,和面时掺入大油,用开水烫拌,既柔软,筋道又透明。饺子馅选料精良,肉要新鲜,菜要讲究时令,刚出锅的饺子,皮薄肚圆,造型别致,口味鲜醇。马家烧麦是回民风味食品,清嘉庆元年(1796年)开业。作法独到,用开水烫面,用大米粉当补面,肉筛选自牛的三叉、紫盖、腰窝油三部分的鲜嫩精肉调制。制作考究,捏包时不留大纓,状如佛事用的“木鱼”,出锅后皮面晶亮、肉馅松软,馨香四溢,外形如朵朵含苞待放的牡丹。海城的馅饼又别具特色,选用猪肉、牛肉作鸳鸯馅,调馅时加香料10余种。烹制后,馅心嫩爽,薄皮脆韧,蘸以蒜末、辣椒油,味道尤其精美。

“白肉血肠”是满族风味食品,已有百余年历史。满族人过节有杀猪吃白肉血肠的风俗。旗人那吉有开办“那家馆”专营此业,其特点是:白肉肥厚而不油腻,肉烂醇香,血肠明亮,鲜美细嫩,佐以韭菜花、豆腐乳等调料,风味独特,闻名北方。

蒙古族人过幕天席地的游牧生活,羊肉是他们最普通也是最喜爱的食物,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食肉习俗,其中以手扒羊肉最为常见。“手扒羊肉”是将煮熟的整羊端上桌案,众人围坐,用蒙古精制小刀把肉分割下来品尝。制作是选用膘肥体壮的小口齿羯羊,屠宰时,在腹部下刀,使羊血的一部分流聚在胸腔内,一部分渗入肉里,煮时加少量盐,水沸2—3次即可出锅。肉面已熟,但内层粉红见血,吃起来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围坐分食有同甘苦、共协作的含义。这种吃法多用于款待尊贵的客人或婚礼等大型宴会上。在古代,宫廷大汗、王公贵族也视为珍贵食品。

2. 河北

保定“马家老鸡铺”的卤鸡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由河间县回民马氏兄弟所创,特点在于煮鸡时加进益身提味的中药材,味道不同

一般,因此名冠燕赵。经营百余年来,严格作到“三鲜”,即宰鲜、煮鲜、卖鲜,数代继承传统,遂成风味佳品。

高碑店的豆腐丝已有 300 多年历史,久负盛名。原料采用伏地大豆,经筛选、浸泡、磨浆、煮沸、除渣、凝固、压片、切丝、卤煮、捆把等 10 道工序。熟后,色乳黄、条股匀称、入口筋道,堪称素食佳品。清朝帝王、后妃在谒西陵时多食高碑店豆腐丝,它既是宫廷御膳,也是大众化食品。

雁北的台城万卷酥,历史悠久。相传乾隆皇帝吃了五台山僧人的供奉,赞不绝口。其制作以上等的面和以麻油,反复搓擦,然后卷合,经烤制,层薄如纸,酥脆绵润。

3. 天津

“狗不理包子”是天津最著名的风味食品,因创始人高贵友的乳名叫“狗不理”而得名。包子的制作有两大特点,一是用半发面作皮,既有发面的香甜味,又可使肉馅的鲜汁得以保存,不渗进皮里。二是馅要七分瘦、三分肥,调时先一边搅一边放进酱油,再一边搅一边加水,最后才放味精、香油、葱末,这叫水馅。蒸得的包子皮薄馅嫩,鲜香浓郁,风味独特,别无二处。天津还有一种素包,以绿豆菜、粉皮、香干、香菜、面筋、棒槌馓子为馅料,用水泻的酱豆腐、酱油泻的麻酱和小磨香油调搅,素香清淡,回味无穷,尤为老年人所喜食。

桂发祥大麻花是天津麻花食品的代表,制作用热油和面,撒上桂花、闽姜、白糖、青梅、核桃仁、青红丝等,制成酥馅面,搓成条状,与用糖汁和面搓成的白条、沾上芝麻的白条,三股合成一股,拧成麻花,油炸后呈金黄色,立即夹上冰糖块,撒上青红丝、瓜条,做成什锦夹馅麻花,酥脆甜香是其独特风味。“桂发祥”是创始人范氏两兄弟的店铺名。在炸食里,“耳朵眼炸糕”也是深受欢迎的天津名吃,清末,“炸糕刘”——刘万春在北门外大街有小铺面一间,位于耳朵眼胡同口,因以得名。其特点,选上等新粘米进行精加工,发酵兑碱后,下功夫糕

匀,制成炸糕皮,以优质红小豆作成细豆沙馅,炸出锅后,皮薄不露馅,呈金黄色,外表起酥,里皮嫩粘,馅香诱人,极享盛名。

杨村糕干以武清县杨村得名,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稻米面、蔗糖精制而成,蒸熟后洁白色细如茯苓,入口清素软香,适宜老幼食用。

三、传统服饰

1. 北京服饰

衣冠服饰在历代有不同的形制,千百年来,经过种种变革,到清朝形成了以满族装束为主、兼收汉服某些特点的新服饰,并对后世服装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北京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

周朝服装是上衣下裳联在一起的,称为“深衣”,圆袖方领。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提倡穿短衣小袖的“胡服”,以利骑马打仗。汉代服装以袍为贵,宽袖,袖口窄,鸡心领为多,而一般平民则穿麻布作的布襦短衣,大多紧身,袖口窄小,以便劳动服役,头带巾子、斗笠。妇女以深衣为尚,平时生活中也穿襦裙,上身短衣、下配裙子。辽金元时代,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北方男女多穿长袍,左衽、圆领、窄袖。明代,仍以袍服为主,士人平时穿蓝袍,四周镶黑边,妇女常上穿短衣下穿裙,清代男子的服装有袍、褂、袄、裤等制。

清代袍服的等级,以开衩为贵,官吏士庶开两衩,皇族宗室开四衩,不开衩的叫“一裹圆”,是一般平民的服装。开衩的袍袖似马蹄,俗称“马蹄袖”,便于骑马射箭,平日袖口翻起,行礼时放下,这是满族服装一大特色。民国时,长袍左右两侧开气,大襟右衽,成为普遍的民服。

马褂是着于长袍之外的一种上衣,骑马时穿用,故称马褂。其形制有对襟、大襟、缺襟几种,马褂的边缘有镶边,长度齐腰,后腰中有

开衩。按季节有单、夹两种,颜色以黄色为贵,由皇帝赐给。长袍马褂是民国时代的礼服。

坎肩又叫“背子”,俗称“背心”、“马甲”,无袖而短,有大襟、对襟、琵琶襟等式样,另一种多钮扣的马甲叫“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是官员所穿。坎肩制作简易,穿用方便,男女皆宜,最为实用。

京样衫子是一般平民衣著,袖管和腰身窄小,贴身很紧,外穿宽边坎肩,头戴瓜皮帽。清代男人不穿裙,改穿裤子,唐宋以前衣不可不穿,而裤子可以省去,只要袍裙即可,到清代一般都穿裤子,末端用带子系结。还有一种“套裤”,无裤腰。

男人的帽子除百官的礼帽、便帽外,一般人带瓜皮帽、毡帽、风帽,还有儿童用的狗头帽或称兔子帽。高底鞋和方头靴是男人穿用的,农民多穿草鞋。

清代妇女服装最突出的是旗袍。满族妇女的长袍由宽大渐变为窄而瘦长,外穿坎肩,领头渐渐增高,这种服装最终演变为所谓“旗袍”,后人称满族妇女为旗人,因而得名。旗袍右开大襟、两侧开衩、衣长至膝下,有长、短袖之分,紧腰身,臀部稍宽,略收下摆。其优点是由上至下贴身合体,显得亭亭玉立、俏丽大方,衬托出线条美。1912年后,旗袍流行起来,风靡全国,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民族服装。清代妇女服饰精巧,最为明显的是衣边上的变化,到清末,在衣襟领口、袖口处镶嵌花缘,最多镶十八层,俗称十八镶。更华贵的是在衣襟和下摆处,用不同色的珠宝装饰成绚丽花朵。

一般汉族妇女穿衫袄,式样比较宽大,长至膝下,内穿长裙。到清末时,穿裤的增多,形成社会流俗。妇女穿的鞋叫弓鞋。汉族妇女缠足,鞋有木底,弯如弓,《清稗类钞》记载:“弓鞋,……京津人所著者,宛如弓形。”而满族妇女为天足,鞋木底比弓鞋高,因形状而名“花盆底”。

2. 蒙古族的袍服

适应游牧生活的特殊需要,蒙古族服饰富有草原民族特色。蒙古族男女都穿长袍,宽松肥大,长衣袖,高领,下摆不开衩。夏季穿布面或绸面,冬季穿羊皮袍。颜色多彩,男的喜黄、蓝、棕色,女的喜红、绿。腰带和袍料相同,带长而宽,男子系腰带后将袍身上提,显得威武、利索。女人系腰带后,袍衣下垂,富于女性美。一年四季蒙古族人穿靴,或皮或布,特别在牧区,利于骑马护踝,冬季适于保温。农业区蒙古族人则多穿毡靴。

蒙古族妇女讲究头饰,用红、绿绸裹头,首饰有玛瑙、珍珠、宝石、金银饰品。蒙古族五颜六色的族服,在飞驰的马上或翩翩起舞时显得十分飘逸潇洒。

第二节 社会文化习俗

一、岁时节日

(一) 春节

中华民族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就是春节,又称“过年”。从前的“春节”专指立春而言,以农历元月初一日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一般从腊月八日开始作准备,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止。北京过年的形式和内容比其他地方更显得丰富多彩,充分反映了封建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

过腊八是汉族的传统,由来已久。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其思想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产生一定影响。相传吃腊八粥就是为纪念佛祖成道的,元《析津志》记载“十二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供佛”。这一天由芸豆、豌豆、小豆、红豆、绿豆、小米、大米、高粱米熬成的粥叫腊八粥,外加桃仁、瓜子仁、栗子、小枣、红白

糖、桂花等。更讲究的用江米、薏仁米、菱角米、鸡头米、莲子肉为原料,煮成的粥雪白透明,质地精细,撒上蜜饯果脯、荔枝肉、桂圆肉、青红丝,可以摆出图案花样来,谓之“八宝粥”。民谣说:“老太太别心烦,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腊月二十三日是“祭灶”的日子,祭灶神时供桌上摆关东糖、糖瓜、南糖,按尊卑长幼行跪拜礼,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灶谓之“过小年”。这以后,家家买年货进入高潮,除了肉食、蔬菜之外,年前市肆有卖年画的、对子摊写春联的、卖挂钱、绒花福字、绢花灯笼、杂拌糖、花炮等等应有尽有,采办年货者熙攘往来,有时通宵达旦。年俗还有“二十四扫房式”之说,家家户户在这一天打扫房舍,有去旧迎新之意,大有益于家庭卫生和身体健康。

腊月三十日(小建为二十九日)是除夕,俗称“大年三十”,凡街巷胡同住户门框上都贴春联,旧称桃符,门扇上贴门神,大户大家院门外高挂大红灯笼。在中堂设天地供桌,摆香炉、蜡扦等祭器,供奉“天神诸圣之全图”,简称“全神”,以三四尺高的蜜供、精制的糕饼点心以及素食水果、米饭馒头为供品,点缀上绒花、“福”字,更显得“年味”十足。天黑之前,大街小巷都有卖“财神爷”的小孩挨门高喊:“送财神爷来啦!”主人开门“请”进财神,照例付钱,图一个吉利。当晚,在大门到堂屋的走道上铺满芝麻秸,人踩上去“噼啪”作响,叫“踩岁”,取岁岁平安、节节高的意思。俗说“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家家灯火通明,围炉叙话,吃更岁饺子团圆饭,又称“年夜饭”。是日,老幼皆长夜不寝,称为“守岁”。进入“子时”(夜12点钟)是上供上香接神的时候,同时燃放鞭炮,全家互相道禧。接着,给老祖宗磕头,行祭祖礼。然后,小辈给长辈拜年,未成年小儿接受“压岁钱”,意在压邪,希望小儿不遭灾生病。这些节日风俗体现了中国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整个除夕之夜喜气盈庭,欢声笑语,直到旭日当窗。

正月初一日天明后,走亲戚看朋友,拱手作揖互道“恭喜发财”、

“新禧！新禧！”之类吉祥语，俗称“拜年”，普遍互赠礼品，如糕点、名酒、水果、香茶等。这一天，北京到处是喜庆的鞭炮声，“车马喧阗，追欢竞日”，春节达到高潮。初二日祭财神。财神是各阶层普遍信奉的神灵。清晨，住户和商户在供桌上摆公鸡、猪头、活鲤鱼，行叩拜礼毕，将财神像置于庭院的松柏、芝麻秸上与黄钱一起焚化，加放鞭炮。祭罢，吃一顿羊肉馅馄饨，谓之“元宝汤”。饭后，去广安门外五显财神庙进香，买几个纸元宝回家，俗称“借元宝”，第二年加倍奉还，象征一年吉兆。

商店铺户从初一至初五都停业关闭，窗门上粘贴“桃园三结义”、“精忠报国”、“陈州放粮”等年画，表示过年休息。过了“破五”（正月初五日），年禧基本过去，初六日清晨燃放鞭炮，行“送神”礼，然后下铺板（门窗护板），准备营业，“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大幅对联喻示着新的一年买卖兴隆、财源茂盛。

春节期间，除家内娱乐之外，逛庙会是最大的乐趣。厂甸是典型的春节集市庙会，位于和平门外的一条小街上。早年，厂甸庙会有宗教活动，以后逐渐以集市为主。其特点是，文物书画集中交易的场所，同时北京风味小吃也应有尽有，生意分外兴隆。儿童各式各样玩具更是绚丽多彩，扑扑登儿、大风车、大糖葫芦、空竹、木刀枪、花脸面具、布娃、布虎、万花筒、金鱼缸、蜡动物、蜡瓜果、花炮、灯笼、琳琅满目。小手艺有作江米人的、吹糖人的、捏泥人的，各显身手。四面八方的游人扶老携幼赶来逛会，从和平门外的护城河沿到虎坊桥口，喧嚣的人声，京腔京调的吆喝声，“嘎嘎”作响的风车声，“嗡嗡（儿）”的空竹声，“噼啪”的鞭炮声，与身着新衣的游人、五颜六色商货，交织成一幅京师民俗画。逛厂甸成了北京人最喜欢的春节活动。“年”，给人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

春节活动，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又叫灯节，上元节）形成最后一个高潮。元宵节张灯相传始自东汉，为表示对佛的尊敬，汉明帝命百

姓元宵放灯,以后历代的规模越来越大。唐诗人孟浩然在今北京观过灯,写下了“蓊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燃”的诗句。明时,北京形成盛大的灯市,在今北京灯市口。清时,移今前门外大栅栏、琉璃厂、东四、西四、地安门等处。古灯种类很多,有各式各样的绢灯、纱灯、纸灯、通草灯、玻璃灯等,晶莹闪亮。除灯市外,家家户户也悬灯结彩,大小商铺、住户还燃放烟火,火树银花,夜如白昼。

元宵节的应时食品是元宵,又叫汤圆,煮熟后,全家围坐吃元宵,有团圆和睦的含义。在燕赵其他地区,如冀东昌黎、冀中满城、束鹿、涿州等地,街上有舞龙灯的、跳狮子的、踩高跷的、走百索的、敲太平鼓的,蔚为壮观,俗称“闹元宵”,表现了人民在新年元始积极向上的情趣。

(二) 岁时风俗

燕赵的岁时风俗丰富多彩,诸如二月二日龙头节、三月三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乞巧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等。在少数民族的岁时节日中,蒙古族的“那达慕”盛会体现了本民族独特的风韵习俗。“那达慕”,蒙古语,意思是欢乐,在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时举行。会上有精彩的赛马、摔跤、射箭比赛,男女老幼身穿节日盛装,欢跳马刀舞、盅碗舞,表演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好来宝、笑喀(相声)、岱日勒其(对口唱)。大会又是物资交流场所,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货物云集会场。“那达慕”盛会充分显示了草原丰收的成果和人们无比喜悦的心情。“那达慕”大会充满剽悍、尚武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二、庙会

一般大庙或有影响的寺庙都定期有会,庙会有3种:一是香火庙会,纯以烧香敬神为目的,最盛者如娘娘庙会、药王庙会。二是娱乐性

庙会,以敬神为名,以人民自相娱乐为实,如高跷会、龙灯会等,河北的胜芳镇庙会、天津的皇会属于这一种。三是商品交易会,如北京隆福寺,《北平风俗类征·市肆》记载:“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随社会的发展,多数庙会渐变为融交易、游艺、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文化活动形式,燕赵大地每月定期庙会以北京五大庙会为代表。据《老北京的风俗》一书介绍:

土地庙会 在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南口有座建于元代的土地庙,内供土地爷和土地奶奶,每月逢三为庙会,凡家庭用具以及绫罗布衣皆有卖,其中木器、藤器、鸡毛帚子最多,附近丰台一带的花匠也推车前来卖各色花草。

花市 位于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的火神庙,每月逢四有庙会,以卖假花、鲜花为主,故称花市。其中,东花市是纸花、绫绢花、缎花、绒花的集散处,西花市是花农、花贩云集之处,除冬季外鲜花不断。也有趁集市在这里卖鸟、蝻蚰、蝻蚰的。

白塔寺庙会 辽代的大圣寿安寺俗称白塔寺,元明重修,位于阜成门大街宫门口以东,每月逢五、六日是集期。寺内东侧有日用杂品地摊,西侧是风味小吃摊。二院内更热闹,有说唱曲艺场地,表演京味的相声、大鼓等节目。院东侧有卖衣帽鞋袜的、女人用的梳头篦子、化妆品以及儿童玩具等等。西侧有茶馆,经纪人有在这里跑合作买卖的。寺院外围也有作各业营生的,如弹弦唱曲的、相面测字的、卖花鸟虫鱼的。

护国寺庙会 寺建于元代,明清重修,每月逢七、八日开集。此处庙会除一般食品、百货外,以贩卖珠玉、首饰、绫罗、古玩、字画、硬木家具等贵重物品为突出,故尔引得王宅府第的贵族妇女也前来赶会。其他如卖刀子剪子、卖猫狗的、卖野药的以及玩杂耍(儿)等,各种游艺活动都吸引了众多的游人。

隆福寺庙会 始建于明代的隆福寺坐落在东四大街以西。寺

庙建筑宏伟,庙会规模也大,时间长。每月逢一、二、九、十日开集,届时人流如海、商货云集,这里有各种土特产品、风味小吃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戏曲表演,向有“诸市之冠”的称呼。进庙门是竹木器、炊食用具摊,殿内卖古玩珠宝,进二院有日用百货、布匹、玩具商贩,后院是小吃摊、戏棚子座座相连,中间夹杂着相算命的。庙四周多流动摊贩。整个庙会内四方商品杂陈于市,游观者连肩接踵,茶棚酒肆罗列,万头攒动,各路艺人搭台演戏助兴,鼓乐之声不绝于耳。

北京五大庙会在清康、乾时代达到鼎盛。燕赵其他地方著名庙会如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市)药王庙会,相传我国名医扁鹊的故乡在郑州,后人建药王庙,地处北京至大名、天津至保定的交通要冲,传统贸易市场逐渐发展起来。明万历年间重修药王庙,香火极盛,“为畿南之冠”,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每逢庙会开市“幕帘遍野,声乐震天。……贸易游览,阅两旬方渐散”。安国(今河北安国市)的药王庙会,专以南北药材为传统交易内容。在天津有天妃宫庙会,自元代起天妃是保佑海运之神,殿址在天津旧城东北角三叉口西岸,香火很盛。雁北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寺庙建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本地有赶古会的传统习俗。全年有四大会、八小会、七十二普通会,大都因百姓敬神祈求风调雨顺形成的。赶会期间,过会的村镇都搭台请戏班演唱助兴,家家杀猪宰羊,做豆腐、粉条招待过会的亲朋,其中以位于五台山中部的台怀镇六月庙会最盛,届时附近五台山的寺庙群中游人如织,摊贩云集,又称六月骡马大会,场面十分壮观。

三、礼 俗

中国自古就有诞生礼、冠礼、婚礼、寿礼、葬礼等五种礼仪形式,封建社会的繁缛礼仪不胜其详,其中不免迷信荒诞之处,但总是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与民族、地方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而婚、丧仪式

是礼俗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

(一) 婚礼习俗

古代从议婚到完婚分六个过程,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本礼多行于皇室贵族、有门第的人家,但一般平民士庶之家也受其影响,整个婚礼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保亲(说媒) 父母给子女择偶时首先请媒人保亲,男女双方有意后,把各自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家世情况,通过“门户帖”的形式告诉对方。然后,双方家长相亲。

合婚 相亲满意后,再过“八字帖”,上书生人年、月、日、时,请算卦先生占卜男女双方生辰八字阴阳,以定婚姻吉凶,如果属相吉利,把结果写在“龙凤帖”上,就是旧时的结婚证书。

定礼 双方确定联姻关系后,男方给金戒指一枚,戴在女方手上,表示“罗敷有夫”之意。女方送去鞋帽、毛笔之类礼品作为答谢,并向男方索要财礼。小定之后,男方隔一定时间再送去大定礼,表示婚姻关系最后定局。所送礼品都有讲究,如“鹅笼”,内装活鹅一对,代表雁,雁是候鸟,取其顺乎阴阳之意。“喜果”有桂圆、荔枝、花生、栗子、红枣、苹果、藕、柿子等,表示夫妻和谐、情意绵绵、早生贵子的意思。

陪奩 女方收到定礼后,把娘家陪送的嫁妆送往男家,除不陪送剪刀之外,必求齐全。

迎亲 男方择定的婚期送女方家征得同意,名曰请期。娶亲的排场视家境而言,地点可在家里也可在饭庄。在家办喜事先搭喜棚,家院门口要贴大红“囍”字。喜房是新婚夫妇拜天地、坐帐用的屋子,中间设天地桌,供奉天地爷,桌上还放置桃木大弓、柳木箭、马鞍、新秤杆、宝瓶、苹果、胭脂等物,都是礼仪用品。一切准备妥当,开始发轿。旧时娶亲的主要工具是花轿,轿上绣百鸟朝凤、龙凤呈祥图案,轿前仪仗一般都有吹鼓手,富贵者增添旗锣伞扇。至女方家,大门一开,娶亲人撒铜钱于地,小孩争抢,取其热闹气氛。新娘上轿后,起轿、行路

必须平稳。到男方家,花轿抬过“迈火盆”,谓之烧去不吉利的东西,并喻示夫妻越来越红火。至中堂,新娘始下轿跨过马鞍,象征平安,然后与新郎一起“拜堂”,求得天地爷的承认,才成为真正婚姻。拜罢,送神。婚毕,夫妻“坐帐”,新郎用新秤杆挑开新娘头上的盖头,俗称“露脸”,然后喝交杯酒,同吃“子孙饺子”,企盼子孙后代兴旺。窗外一男孩趁时问新郎新娘:“生不生?”回答:“生!”表示生育后代。新婚之夜,花烛之喜,亲朋好友都来“闹”新房,无老少长幼之分,有“闹喜、闹喜、越闹越喜”之说。新房内长命灯一盏,一夜不熄,灯油用蜜调和,祝愿夫妻永远亲密。

婚礼第三天是“回门”,女方家接新郎新娘,俗称姑爷认门。以后新娘还要领新郎答谢女方亲戚,送礼双份,谓之“回拜”。至此,婚礼的最后一个仪式结束。

燕赵大地少数民族的婚俗又各有特殊习惯。辽宁满族有相亲、定亲的过程,迎亲时与汉俗有别。当日凌晨,男方备喜车与女方喜车在中途相遇,车辕并车辕,俗称“插车”,女方兄弟将新娘抱上男方喜车。到新房门口,新郎朝轿门礼仪性的射三箭,这是古代氏族掠婚之遗风。进入新房,新娘上炕当日,要面南席坐一天,俗称“坐福”。围观的亲朋好友高唱喜歌“拉空齐”,汉意即祝生活美满。回族人在订婚时要交换信物并念一段古兰经,请“真主”赐予良缘,举行正婚礼时,要请阿訇当司仪。蒙古族传统婚礼更饶有风趣。当日清晨,新郎骑骏马在娶亲队伍簇拥下,绕新娘家跑一圈,然后到酒宴席前,新郎、新娘开始唱对歌,互相表达美好的心愿。归途中,新郎新娘都争取抢先到自己的新房,你追我赶,笑语欢声满草原。新娘的面纱由男方母亲揭开,新娘手执银壶向客人敬酒,祝贺的人群拉起四胡、马头琴,载歌载舞表示祝福,通宵达旦,尽欢而散。

(二) 丧礼习俗

古代按照周礼“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原则,把对死者的安葬当

成庄严、肃穆的大事。燕赵地区习惯土葬，其约定成俗的礼仪充分反映了对亡者的情感和意愿，但也有着迷信色彩。

停灵 人死后到出殡前，棺木停放在家中，俗称“停灵”，一般 3 或 5 天，也可以更长，但必须是奇数。亲友们为死者作佛事、法事，请僧道诵经，恳求佛给亡人赦罪。出殡前披麻戴孝的人作辞灵仪式，棺木出堂时，长子打幡，次子抱灵牌，以下持“哭丧棒”。

出殡 棺木起杠后，长子捧盆。亲友送殡者，男子在孝子前，女子乘车在灵柩后。由家宅送往墓地途中，凡经过城门、轿头、庙前、路口都要撒纸钱，迷信说法是为死者通向极乐世界撒买路钱。出殡行列包括丧葬锣鼓、纸人、纸马、花圈、挽联、僧道、孝属、灵棺及送殡的车轿。沿途有死者的亲朋好友摆设的茶桌，一为出殡队伍饮水，二为表示悼念和慰问之意。

下葬 事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墓地方位，俗称“破土”。然后，用大绳将灵柩缓缓放入墓穴中，此时鼓乐大作、孝子跪灵，随后，焚烧花圈、挽联、纸钱，丧家及送殡者每人抓一把土洒进穴中，由扛夫填平，堆成坟头，孝子最后叩谢送殡者，至此丧礼告成。

满族的先祖有火葬、树葬等风俗。土葬是受汉葬的影响，棺木入土以后，把供在坟前的供桌、烧纸、酒、肉食、馒头等一齐烧掉，谓之“烧饭”。回族人治丧则照伊斯兰教教规办理，实行土葬，先给死者洗身，用白布包裹，寓意一生洁白之意，并请阿訇念古兰经，停尸不过 3 天，让死者尽快回归安拉之处得到幸福。蒙古族人葬礼简朴，不穿孝，不祭供，也不告亲友。牧区实行野葬、火葬。所谓野葬是用白布包尸，放于野。所谓火葬是将尸体包裹后抹上油，放火焚烧。不论哪种葬法皆以 3 天绝迹为吉，被认为已顺利到达极乐世界。

葬礼把社会习俗与信仰杂糅在一起，既是对死者的追念，也是对死者进入信仰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祝福。

第三节 生产习俗

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各地有各地盛产的物品,经过漫长岁月,代代传袭,便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习俗,是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一、特种工艺和民间工艺

(一) 北京工艺品

硬木家具 造型优美的硬木家具是明、清传统手工艺品,以简洁、端庄、素雅著称。家具的类型、式样与居室成套配置,包括椅凳、几案、床榻、柜橱、屏风等上百个品种,用料名贵,如紫檀木、花梨木、红木、铁梨木、楠木、樟木等,质地坚硬,色泽明丽,散发原木的幽香。制作十分考究,结构严密,框架式结构方法符合力学原则,装饰更富民族特色,雕有龙首、云纹、水纹、花鸟等,既坚固耐用,又有艺术欣赏价值。

绒鸟绢花 北京的丝绒制品包括绒花、绒鸟、绒兽等,制售铺子有“瑞和水”等 10 余家。主要原料是蚕丝、铜丝,工艺细腻,别在发髻上,插在帽子上,象征吉祥,京人喜爱。绢花也称“京花儿”,色泽鲜艳,姿态优美,是婚嫁、寿诞礼的必用之物。北京的花市大街以生产和销售绢花而闻名,主要原料是真丝,少量棉织品,知名艺人有金玉材,人称“花儿金”。

玉器牙雕 玉雕自元代有南北派之分,南玉以苏州为中心,北玉以北京为中心。到清代,北京玉雕融南、北玉作之美,形成独特风格。品种有古今人物、山水花鸟、瓶炉熏鼎、仿古器皿,小件有耳环、手镯、

玉佩、别针,晶莹细腻,色彩绚丽。北京象牙雕刻已有 300 多年历史,以仕女、花卉见长,有圆雕、浮雕、镂空雕等技法。牙雕除作装饰品外,还制作牙席、牙扇以及木器镶嵌。

景泰蓝 北京特有的景泰蓝传统工艺品有尊、觚、仿瓷瓶等器形,制作方法是在铜制胎型上,焊接上按花纹图案掐成的长短不等的细铜丝,在铜丝花纹内填充各种色釉,然后烧制、磨光。这种“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在明朝景泰年间非常盛行,因而习称“景泰蓝”。由于花纹精巧、色彩华丽,是宫廷乃至士庶之家的珍贵陈设品。

雕漆料器 雕漆以铜胎作型,在胎上涂漆数十至百余层,在漆未干之前,刻制各种装饰花纹,在技艺上讲究刺、起、片、铲等传统刀法,制作大到屏风、宝座、大瓶,小至鼻烟壶,各种盒、匣、器皿,多达上千个造型。料器古称琉璃,明末清初北京已是盛产之地,各种小鸟、小虫、小兽、花果,晶莹剔透,形象生动。

其他北京特种手工艺品如画塑、泥塑、宫灯、地毯、彩蛋、葡萄等等都各具特色,远近驰名。

(二) 河北、天津地区工艺品

曲阳石雕 有汉白玉雕刻艺术故乡之称的曲阳石雕有 2000 余年的悠久历史,北京的宫阙、园林、陵园雕刻中都有曲阳石雕的杰作。曲阳城内北岳庙的石狮、唐吴道子所画的“曲阳鬼”雕刻都是古代石雕瑰宝。

易水砚 唐代在河北易县有易水砚,由奚超父子制作,五代十国时南唐皇帝特赐姓李。易水砚的石料是紫灰色水城岩,质地细密柔腻,硬度适中,石质不亚于端溪,具备发墨、储墨、润笔、励笔的优良特性,成为易县传统工艺品,与端砚、歙砚齐名。

保定铁球(健身球) 早在元明时创制的铁球原是实心,明代一位宫廷巧匠改进为带有音响的铁球,其健身功能独特,球体大小正好握于掌中,通过反复揉动,可以疏通经络,调正气血,强筋壮骨。

泥人张彩塑 天津泥人在清代乾隆时代已负盛名,首创者张明山把绘画技巧娴熟地运用到泥塑艺术上,形成独特风格,人称“泥人张”。他的人物作品长于表现人物情感,面型塑造细腻,并善于夸张,是天津民间艺术的奇葩。

杨柳青年画 创于明代崇祯年间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在清朝乾隆时期走向繁荣,其特点是继承历代传统,采用木片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鲜明活泼、喜气洋洋、富有感人魅力的独特风格。画题以现实风俗、历史故事为主,布局丰满、生活气息浓郁,俗称“南有苏州桃花坞,北有天津杨柳青”。这里家家会点染,年画店铺各坊皆是。

其他特种工艺品还有河北的衡水毛笔、武强木板年画、蔚县剪纸、天津的砖刻、草编、刺绣等。

二、“老字号”商铺

“老字号”系指有名的商业老店铺,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些“老字号”自开业以来,保持其传统的经营风格,成为北京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一) 饭庄

全聚德 开业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创办人是河北省冀县人杨寿山,字全仁。初来京师经营鸡鸭摊,几年后买下前门外肉市胡同一家将倒闭的商铺“德聚全”,遂将铺名改称“全聚德”。光绪年间扩大营业,聘请南方名师,采用宫廷御膳“挂炉烤鸭”技术,从此以创制挂炉烤鸭闻名于世。

便宜坊 位于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最早从南京迁来北京,经营“南炉鸭”。由于生意兴隆,同名饭庄先后出现30余家,经过竞争,最后仅剩一家,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开业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经

营“焖炉烤鸭”为主。

都一处 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位于前门大街鲜鱼口南,四年后新建店铺为一间二层小楼。乾隆十七年,旧历年三十之夜,乾隆皇帝微服来店,感慨于全京都是夜,仅此一处营业,回宫后,御题“都一处”三字,派太监用虎头牌匾送到饭庄,从此“都一处”饭庄闻名京师,以马连肉、晾肉、烧麦声誉全城。

东来顺 创办于1914年,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北口,是一处清真饭庄,以经营涮羊肉出名。创办人丁德山,回民,初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摊经营小吃,以后聘请名师,专购德胜门外马甸活羊为肉源,配精选调料,使涮羊肉别具风味,店名为“东来顺羊肉馆”,闻名京城,长盛不衰。

同和居 开业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位于西西南大街,是一处山东风味饭庄,以烹制海味河鲜著称,能制作300多种山东菜。当时与之齐名的还有沙锅居、泰丰居、万福居、福兴居、阳春居、东兴居、广和居,合称“京都八大居”。

北京的“老字号”饭庄还有烤肉季、萃华楼、白魁老号、正阳楼、听鹂馆、仿膳等名馆。

(二) 药店

同仁堂 开业于清康熙年间,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街路南。创始人浙江乐氏,明末来京行医,第四代传人乐尊育为清廷太医院吏目,并在打磨厂开设制药作坊,将“乐家老铺”改称“同仁堂”。雍正元年(1723年)被指定为皇宫制药,从此声名大振。其特点在于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工序严格,贵重药品要经六七十道工序,所制丸药色泽滋润、药香如初。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是北京特产品。

鹤年堂 相传创于明嘉靖末年,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京都俗言:吃丸药膏丹到同仁堂,吃汤剂饮片请到鹤年堂。店名来自明朝宦官严嵩花园的一个厅堂名字,其匾因严府失势而流落药店。

万全堂 位于崇文门外大街,有 500 多年历史,以经营中成药和名贵滋补药著称,如虎骨酒、十全大补丸、参茸卫生丸等。

千芝堂、圣济堂、济安堂、长春堂都是先后开业于明清的老字号药铺。

(三) 食品铺

稻香春 创办人江苏人张森隆,初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作苏式点心,风味独特,为京人所喜食,后聘请名师专制南味糕点和肉食,创建“稻香春”南味食品店。制作玫瑰饼,苏式月饼、牛舌饼、双卷酥,肉食有叉烧肉、美味羊羔等,其他茶食、应时糕点 200 多种。

六必居 位于前门外粮食店街,明嘉靖九年(1530 年)由山西人赵氏兄弟集资创办,是北京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商店,制作销售柴、米、油、盐、酱、醋,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食,故店名“六必居”,相传由当朝权相严嵩题写匾额。所制酱菜脆嫩清香,酱味浓郁,色泽鲜亮,长期为清宫御用食品。

天义顺 开业于清咸丰年间,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口,是京城著名清真酱园,经营 30 余种酱菜。

庆林春 原位于东安市场西街,由福建人林子丹开创的茶叶店。店主原设摊出售罐茶,后改为零售,庆林春开始红火,主要品种有红绿花茶、乌龙茶等名品。

全素斋 北京一家经营素菜的食品店,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产品有素酱肉、素火腿、素肘子、素鸡鸭等,都是用百筋、豆制品、花生米为原料制成,配以香菇、木耳、玉兰片等,色泽鲜艳,味道清香,以独特风味名闻京城。

(四) 鞋帽绸布店

瑞蚨祥 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路北,开业于咸丰年间,创办人是山东章邱的孟鸿升,原在山东济南经营布店,第二代人孟雒川始派人到北京创业,起名“瑞蚨祥”,是北京最大绸布店。其特点是商货齐全,

有皮货、“洋货”、绫罗绸缎,同时讲究服务周到热情,货真价实,历经百年生意兴隆。

内联陞 北京著名鞋店,创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河北武清县人赵挺原有一手高超的制鞋技艺,后筹金自办商店,原位于东交民巷,取名“内联陞”,经营各类鞋,讲究真材实料、造型美观、坚固耐穿。过去以制作“朝靴”闻名,“千层底布鞋”是后来的名品。与内联陞齐名的还有同陞和鞋店。

盛锡福 位于西单北大街,开业于1932年,原是天津盛锡福分号,主要经营礼帽、毡帽、皮帽、老太太帽、儿童帽,品种多,式样美观,制作精良。

马聚源 始创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位于前门外大栅栏,是最老的帽店。早期为贵族制做朝帽缎靴,以后也制作销售缎子小帽、风雪帽、三块瓦皮帽等,货真价实。与瑞蚨祥、内联陞齐名。京城俗说:头带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

北京的“老字号”不下成百上千,遍布各行各业,如经营特制墨汁的“一得阁”,经营传统笔墨文具的“荣宝斋”,北京著名传统产品王麻子刀剪店,专营高级钟表眼镜的“亨得利”等。加上这批“老字号”商店不仅经营有方、商品传统性强,而且其匾额大都为社会名流、著名书法家所写,甚至由皇帝御题,取号文雅含蓄,字体奇姿异彩,更突出了北京“老字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神韵。

三、土特产品

(一) 河北地区

1. 五谷、干鲜果品

河北盛产北方五谷杂粮,小麦、玉米、谷子、芝麻、花生、绿豆、红小豆,高产作物如红薯。蔬菜主要有徐水大白菜、永年大蒜、任县大

葱、鸡泽的辣椒、张家口的“口蘑”、保定的“春不老”(雪里红)等等。一般群众以蒸干粮、熬米粥、炒白菜为风俗饭食。

特殊风味的干鲜果品有深州大蜜桃,个头硕大,重的 500 克一个,外形美,皮薄肉厚,甘汁如蜜,誉满中外,品种有红蜜、白蜜之分,含糖量都在 20% 以上,其他维生素多种,过去是皇室贡品。赵州雪花梨以果实硕大、色泽金黄、味道香脆为特点,同时有药用价值,可生津止渴、润肺清燥。京东板栗是河北名贵干果,含糖量高,糯性极强,涩皮易剥,甘甜清香,主要产地在北京以东地区,如迁西、遵化、昌黎等,栗性甘温,可益气、健脾、补肾。宣化县白牛奶葡萄驰名中外,相传元代始栽种,品种有白牛奶、玫瑰香、肉丁香、马奶子、老虎眼等。白牛奶葡萄粒大皮薄,甜汁浓郁,含糖量高,不仅是上等果品,而且可以酿酒、制作医药辅助剂。沧州金丝小枣皮薄肉厚、细脆甘美、香甜如蜜,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大面积栽种,是历史上的名贵土特产,含糖量达 65%,其他维生素极为丰富,俗有“天天吃三枣,一辈不见老”的说法。其他如阜平大枣、赞皇金丝枣、威县的西瓜、满城雪桃、兴隆红果、涉县的花椒、柿子、核桃都是果中佳品。

2. 陶瓷、皮毛

河北陶瓷以唐山、磁州历史悠久、具有地方独特风格。骨灰瓷、白玉瓷、玉兰瓷、宇宙瓷是唐山瓷主要品种,其中以骨灰瓷为佼佼者,用动物骨灰为主要原料,配以优质陶土,精制焙烧而成,胎质细腻、光灿莹洁。主要装饰技法有雕金、喷彩、釉中彩,由此形成独特地方风格。磁州(今河北磁县)继承宋元以来古窑传统艺术风格,以陶瓷的造型大方,图案形象生动,笔法简洁豪放为特色。定州(今属河北)白瓷自唐宋以来闻名于世,后世仿古瓷制品技艺精湛,享誉极高。

辛集的皮毛制作业已有 300 年历史,清代时是全国皮毛集散地之一。张家口素有北国“皮都”之称,口羔皮的生产已有 300 年历史,皮板质地轻柔,有丝绸感,清新秀丽,别具一格。枣强“营皮”、张北的

皮帽也都有名气。

3. 名酒、药材

衡水“老白干”气味芬芳,醇厚柔和。相传在明嘉靖年间已得名“老白干”,“老是指历史久、白指清澈、干指酒度高”。徐水县“刘伶醉酒”有“小茅台”之称,相传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闻徐水酒味甘醇厚,千里迢迢来饮,一醉三载。丰润涇阳老酒已有180多年历史,为“燕酒第一”,色泽清澈,有水果香味,进口甜,返口香,因用涇水酿制,因而得名。

祁州(今河北安国市)药材有千年历史,素有“药都”之称,加工药材技术独特,药味浓厚,色泽鲜艳,货真价实。

4. 禽畜水产、苇席

张北马体型健美,挽重能力强,是中国良种马之一。武安山羊体型较大,四肢强壮,适于高山饲养,不仅肉质细嫩,宜食,而且皮毛产绒量高。其他良种牲畜还有阳原驴、草原红牛、坝上细毛羊等。水产以渤海对虾享有盛名,誉为“东方对虾”,个体大,肉质鲜嫩。保定白洋淀盛产水生草本植物芦苇,是织席、打箔、造纸、织布的理想原料。

(二) 天津、辽宁、内蒙古

天津土特产品以长芦盐、小站稻、红小豆、沙窝萝卜、天津鸭梨著称。天津的河蟹也是一大名产,通称紫蟹,明清时是宫廷贡品,为宴中珍馐。

辽宁柞蚕丝、金州貂皮,分别是制造丝绸和皮衣的上好原料。西丰鹿茸、辽宁人参都是制药的特产,药用价值极高。辽宁的海味珍品有海参、扇贝、海胆、香螺等,水果以辽南苹果、北镇鸭梨等为地方特产。

内蒙古盛产奇花异树,如樟子树、胡杨、怪柳、常绿树沙冬青、不凋谢的二色补血草,以及上品中药材黄芪、甘草、沙漠人参肉苁蓉。草原上的珍禽异兽有驯鹿、黄羊、野骆驼、貂熊、黑瞎子,以及旖丽的天

鹅、榛鸡等。这些珍贵的动、植物适应了草原气候的特性，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蒙古族人民引以为骄傲，倍加珍惜，自古从不猎取天鹅成了当地的风俗。

参 考 文 献

-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3 年版。
- 毛礼锐等:《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 张庚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0 年版。
-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 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
-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年版。
-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马文龙:《河北梆子简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 年版。
- 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赵洛:《宝地》,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3 年版。
- 李仁甫:《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出版社 1983 年版。
-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陈桥驿:《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北京风物志》,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4 年版。
- 《贾兰坡新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阎崇年:《名城史话》(下),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刘策编著:《中国古典名园》,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 年版。
- 舒牧编:《圆明园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
- 罗哲文、罗扬:《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 年版。
- 兰石、李士禾等编著:《历史名医传略》,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 河北人民出版社编:《河北风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内蒙古风物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天津风物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 《山西风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辽宁风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恒山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避暑山庄研究会编:《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 1986 年版。
- [日]窪德忠:《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 河北省地名办公室编:《河北名胜志》,河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 孙中家、林黎明:《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刘庆桂、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陈宝蓉:《清西陵纵横》,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 李凭、王振芳:《酈道元与〈水经注〉》,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葛晓音编著:《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郑绍宗:《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的主要收获》(1979—1989),《文物春秋》1989 年创刊号。
- 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
- 王玲:《北京通史·辽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
- 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丁守和、劳允兴主编：《北京文化综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编写组：《河北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段玉明：《寺庙与中国文化》，三环出版社 1990 年版。
- 李登科：《北京导游》，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 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 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任继愈总主编、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2 年版。
- 翁立编著：《北京的胡同》，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
- 陈耀庭、刘仲宇：《道、仙、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故宫博物院编著：《紫禁城营缮纪》，紫禁城出版社 1992 年版。
- 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版。
- 郑绍宗：《河北省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 年增刊号。
- 马西沙、韩秉文：《中国民间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年版。
- 陈茂同编著：《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佟长友编著：《京菜烹调 280 例》，金盾出版社 1994 年版。
- 罗哲文主编：《中国古代建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 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